

對抗

半月刊
定價一角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通信處北平南長街地一號

電話一四一五

本期目錄

時事論評

國聯最後之掙扎.....	鐵心
戰債問題嚴重化.....	蒂
英法等國要求緩付美戰債.....	紹
法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新
日本之窮途末技.....	中
美麥借款與救濟農村.....	方興
三中全会的使命.....	一鳴
匪區收復後之視察問題.....	國
禁烟之法律與事實.....	日
川軍轟炸人民之罪惡.....	報
中國社會史研究	陶希聖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徐鶯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評議	中宣
關日政府意見書之謬詞.....	中國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之滿蒙移民概況.....	王輯五
意識形態與經濟結構之關係.....	路人
如何復興中國革命.....	流瑩
「中國問題」批判	若瑜
胡適治學方法批判.....	周鳴之

時事評論

國聯最後之掙扎

連日以來，國際視線又集中於日內瓦召開之國際聯盟之程度的最後的行政院會議，以解決持久不能解決的中日問題。故這一會議之重要的歷史意義，不僅為世界各國對於此項會議的自身所包含的矛盾性與真實的利害衝突底基礎上充分的表現其不平凡的重視；而且，與今後世界人類歷史底危機以及國聯實質上形式上之存在，有決定生死的全權。因此，這次會議的切身的歷史評價，我們直可認為國聯權威之最後試驗，或其延續運命的末一次掙扎！

當九一八不幸事變發生之始，我們對於本問題的前途，即有所論列。即：滿蒙事變，為日帝國主義者經過恒久之準備的必然結果，且日本必傾全力以保障因事變得來底權益的既成事實；同時，以目前的國際環境乃至中國目前的種種的歷史可想條件底呈現，中國已立於失敗的地位而成為供給羣魔痛啖之犧牲品！中國欲打開此危急存亡之局，必基於中國自身之努力！

基於上述的論列，則此項國聯之再度會議，以我們的論斷，在中國的立場上，認為絲毫不能解除目前中國的危機，雖然中國政府對於這次會議有甚般的期望！

我們試一檢閱一年來國聯行政院處理中日糾紛之經過，直可認為無一處能表現國聯有解決此嚴重事件之能力。因國聯的本身，即是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一種荆棘，實質上不能做各帝國主義者不願意做的事。故一年來，行政院開會屢屢，然大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反給日本以無賴

拖延的機會，由九一八更擴大而造成二二八之事變，徒使中國延長痛苦，嚴重犧牲！

調查團之派遣，在國聯本身有兩層意義。即：1. 考察日人在東三省實質上之利益；2. 調和各國在遠東利益的衝突。至於事變之起因與經過，不過是一種的附帶問題而已。

故此大會議的重要議案，乃在研討調查團數月來在遠東奔走的結晶。然就其報告書的內容，假令日本毫不反對，而中國的命運已極可慘，何況日本所提的意見書以及松岡在國聯席上之狂吠，無不表現其謊認絕倫與野蠻無理，國際視聽尤囁於日本武力暴行政策的炎威，中國代表縱有蘇秦張儀之雄辯，亦只有徒事咨嗟而已！故不必等待會議之結果，吾人即可斷定會議前途之暗淡了！

不過，事實終究勝於雄辯，國際聯盟自身存在底基因，既為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一種荆棘，則其所負的使命，必在調和各國的利害衝突，緩和國際重大危機；反之，國聯的存在便無意義。滿蒙事件的發生，中國的領土被他國侵略以及各國在遠東勢力之被威脅，已為不可磨滅之事實。中國不能抵禦強暴而訴諸國聯，同時，各國在遠東之蒙受損害，亦須國聯之力以謀解決。故國聯之最大困難，在一方面必須承認日本在遠東之特殊權益，他方面，又須調和各國在遠東勢力底均衡。若遷就日本，則非各國甘心；若遷就各國，日本又豈能忍受？孔戰後之國際情勢，雖各國仍在不斷的準備戰爭，不斷的各個努力造成再度戰爭的必勝條件，然當此世界恐慌日益加深的今日，對於戰爭的恐怖，終究為各國所危懼的！但所謂國際盟約與九國公約等等，亦祇不過是依賴紙上的一點法律的拘束力以維持世

界和平。這種紙上的和平，本極危險，一旦遇有真實的事變，是必然的被擊破無疑的。

但事實上，各國何嘗不明白盟約之毫無用處，一年來國聯解決中日糾紛之經過，無處不表現其黔驢技窮。但各有一種戰爭的恐怖橫梗在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眸子內，不能不藉此一紙文書，作最後之試驗。這次會議的方式，姑無論其為招集大會或藉九國公約之力，以謀解決的途徑；但其會議本身價值，我們則早已斷定，中國無論如何已立於必敗犧牲的地位。故會議的內容，不僅只是如何調和各國在遠東之權益均衡，與金得日本對於各國遠東權益之相當寄許而已！僅此，國聯尤懼日本之因過於難堪即毅然退出國聯，其他，更何足論？況日本之退出國聯，已成形式上的問題，一年以來，日本人心目中已無國聯之存在，並未遵守盟約與如何決議！

我們對於這次會議不必抱任何樂觀，亦不必抱任何希望，乃日本與各國利害之爭執，與中國的危機毫無金得解決之關係。縱令中國僥倖而得到勝利，日本亦必不肯遵守，國聯亦不能奈何。故中國之出路，仍基於中國自身之努力！不過，國聯本體之存在與各國衝突的緩和，則端賴這次會議之最後試驗與掙扎，假如會議破裂，則不僅國聯本體的存在發生疑問，即明白了世界，亦將有令吾人不能億測的未來了！

(鐵心)

戰債問題嚴重化

洛桑會議後的國際政局，本概是朝着兩個對立的形勢向前發展：一個是以戰債問題為中心的英法與美國的對立，一個是以賠款問題為中心的德意與英法的對立。但是，

英法是目前握有歐洲霸權的兩個盟主，它們因為不願失去自己的地位，總是想把整個歐洲拉攏成一個統一的局面以單純對美，因此，它們不惜對德處處表示讓步，不惜做了偌大的犧牲以維持洛桑會議的成功。積年呻吟於賠款的高壓下的德意志固然是因為英法的「仁慈」得到一點解放了，但是我們却一點也不能相信帝國主義的這種欺騙，且請看與賠款協定同時簽定的英法紳士協定中怎樣說着吧：

「德國之債權國（協約國）在未與協約國本國之債權者（美國）得到滿意之協調以前，不得批准洛桑賠款協定，協約國對美戰債問題，如不能得到妥協辦法，則關係法律上之地位，應與胡佛緩債未發表前之地位相同。」

又說：

「英法對美戰債，在洛桑協定未批准前，亦暫時停付。」

賠款協定之批准既以戰債問題得到解決為前提，這即不啻將賠款問題與戰債問題化為一個問題，使德國對協約國的問題，變為德國對美國的問題，使德國與協約國的對立，變為德國與美國的對立，帝國主義的手腕真高妙啊！英法所領導的洛桑會議，其主要的精神原來是為團結歐洲以一致對美，洛桑會議的成功，實際上就是英法反美計劃初步的告成。所以，一等到美國的大選宣告結束，英法等國就立刻向美國提出緩債的要求了。這裏，却難爲着了號稱金元國家的美國：拒絕嗎？這不啻宣佈甘願與整個歐洲爲敵（不但英法，而且也有德意）。接受嗎？它本身也在感受着經濟恐慌的壓迫，這絕不可能。究竟怎樣呢？美國終究拒絕考慮了。然而這是不是斷然的拒絕呢？不完全是的。我們看英法照會的覆文就可以知道：其對英的態度較

為和緩，對法的態度則比較認真，美國的意旨究竟何在呢？它固不願白白犧牲戰債，然而，環境所迫，它也沒有堅持不犧牲的可能，我們推測它今後的態度，將不外以其它問題（如軍備，對日等）的解決為交換條件而如它自己所說希圖一個「整個的解決」。

但是，無論怎樣，戰債問題在目前不能不說比前嚴重化了，而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衝突也不能不說比前更往前推進一步了！

（蒂）

英法等國要求緩付美戰債

世界大戰，使資本主義體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國際對峙的關係，較諸戰前更形複雜；這複雜的原因，不僅是以前逐世界霸權的主角，在戰後增加了美國和日本，而且也由於反資本帝國主義的蘇聯之存在。所以，世界政治的變局，雖尚難預測，但國際關係的兩大動向，却已非常明顯；這兩大動向，就是資本主義之反蘇聯戰爭的準備，與夫帝國主義昆仲間之火併的準備。明乎此，我們始能分析各個局部的問題，進而洞悉其內幕。

目前，因普遍的經濟恐慌，已使世界經濟陷于山窮水盡的境地。各帝國主義者為挽救經濟恐慌，以苟延其最後的殘喘，除走向戰爭之途外，再也沒有別的出路。事實上，世界大戰雖尚未爆發，而大戰的空氣，却早已迷漫了大地。這樣，列強自不能不加緊進攻蘇聯，以爆發那於資本主義全體最有利亦且最可能的戰爭。但為造成反蘇聯的聯合戰線，實有緩和帝國主義的對立關係之必要，於是裁軍與賠償兩大問題，遂登上日程。唯握有賠償問題之最後解決關鍵者，實為最大的國際債權人北美合衆國。故英法等

國，乃於洛桑會議紳士協定之後，更以共同行動，建議白宮，重開整理戰債會議，並請求在談判未得結果前，停止行將到期之債款。建議提出於紳士協定之後，值英皇批准奧大瓦協定，及軍縮未洽之際，實大有玩味之餘地。為洞悉此問題的意義，並展望其前途，我們且一為回顧戰債之以往的整理過程吧。

大戰甫行告終時，美國與舊協約國間，即開始了戰債問題的爭執。為進行戰爭的借款，是補助金，換言之，即共同戰費的支出呢？抑為應付本利之借款？如其協約國間的債務是一種補助金，那就應該勾銷；否則，英法等國，就有對美利堅支付鉅額債務的義務。歐洲協約國方面抱前一種見解。而美國則基於資本主義的正義觀念持後者的見解。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有力者。一九二二年七月，法國單獨派員赴美，進行整理戰債。至此，英國所極力主張的協約國間債務勾銷論，遂失掉了實行力；而不能不於同月聲明償還對美戰債。但同年十月，英外長伯爾福（Balfour）向法，意，羅其他六國，發出如次的通牒：「英國政府正在正義觀念及政策上，並不主張勾銷德意志或法蘭西其他協約諸國的債務，唯英政府願慮世界所受之經濟打擊，願拋棄德國賠償請求權及對協約諸國的債務償還要求權，以為誘導圓滿解決此重大問題的計劃的一部，而具有放棄一切權利的決心。這一般的解決方法，較諸強制地履行法律上的義務之利益，對於人類實更有價值」。德國賠償支付的困難，使英吉利再提起了戰債勾銷案。伯爾福通牒（Balfour Note）奏了相當的效果。美國代表的態度，已漸趨妥協，而放棄其償還期五十年，利率四分的主張，對於英國代表所提的償還期六十六年，利率三分，來個拆衷，

提出了償還期六十二年，利率最初三分，其後三分五厘的新條件。

自伯爾福通牒建立了歐洲債務國共同反美戰線以來，英國迄未稍變其傳統政策。至洛桑會議，對美的進攻，乃踏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洛桑會議是以英國為領袖的聯合戰線，一邊是德意志意大利，另一邊是法蘭西，以反對蘇與美國。『取消楊格計劃使協約國戰債協定的正個系統成為無底的金字塔』（馬扎亞爾），此所以於洛桑條約之外，又有所謂「紳士協定」。英法等國，就依此精神，更以共同行動，來進攻美國，而提議改訂總額百二十億二千八百萬鉅額之戰債協定，且請求緩付到期之債款了。

美國的一貫政策是：1. 反對在任何形式上把賠償和戰債混為一談；2. 準備談判戰債問題，但須各國來單獨談判，而不和任何聯合談判；3. 想在實際上把賠償和軍縮連帶談判。我們且看司汀生於英法照會到達白宮後談道：「關於這個問題，政府的政策，並無何等變更，各國對於這個問題，應與美國進行個別的交易，而無期待及早召集歐洲各債務國全部參加之一般戰債會議的理由」（聯合社十四日電）。同時，我們還能憶及當洛桑會議中取消賠償及戰債之空氣正濃時，胡佛突向軍縮會議提出全世界軍備減縮三分之一的提案，並聲明裁軍與戰債須同時解決。這明明是要利用戰債問題來做工具，在裁軍上壓迫英法分離歐洲，以奪取世界的霸權。不過，遠東風雲，使美國不能不積極進出世界外交。而國內經濟之山窮水盡，亦亟須尋求出路。於此，美國實亦有其不得不讓步之苦衷。故胡佛主張：以推廣美貨市場貫徹軍縮主張為條件，而為一有條件之戰債緩付。羅斯福認為戰債與關稅得連帶談判，蓋美國之

國際政策，須基於取捨相抵之精神，換言之，即互有利益之政策。這樣，美國為彼垣街金庫設想，以集中現金而謀國內經濟之繁榮計，為一有條件之戰債緩付，蓋亦大有可能。至於取消與減削，觀彼國朝野反對之烈，恐屬無望之事。

根據以上觀察：我們可以斷定：英法等國要求緩付戰債這個問題，將不會得到最終的解決；但亦非無在雙方讓步妥協的協議中找到暫時的出路之可能。不過，這暫時的妥協辦法，並不足表示帝國主義者間的對立關係，有了相當的緩和，相反地，這恰恰暴露了牠們的矛盾之加深。如果洛桑會議，不會把賠償問題徹底解決，反而使之更行複雜，使帝國矛盾更行擴大，那麼，這戰債問題，就將會加速這矛盾的解脫過程。

法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一九三二年，的確是狂風暴雨的時期。國際情勢的嚴重緊張，已趕上前次大戰的前夜。而其複雜程度，且遠非一九一三年所可比擬。各帝國主義者為準備此行將到來的未來大戰，俱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而於此戰雲低迷危機四伏中，遂出現了許多的應景妙文。據巴黎電訊，法國內閣於月之二十五日，已通過法俄互不侵犯條約之最後草案，且決定於二十九日正式簽字。大約耶誕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可交換批准，即接開商約會議。這兩個政體水火的家——一個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一個是歐陸反赤的盟主，今竟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甯非奇異之條？但事情却也有其微妙的背景，並非如彼相反的觀察家之觀察：「至少得證明歐洲無緊張之危機」（大公報）。恰巧相反，

這正是歐洲危機之緊張的產物。

原來，法國之積極領導反蘇聯運動，不僅是要推翻無產階級政權，亦且是欲藉以貫徹其大陸政策。試觀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法國與波蘭簽訂的政治條約，依該約的規定，波蘭在法國的軍事援助之下，接受一種防衛德國之東部戰士的任務。接着於一九二三年更締結了所謂軍事密約，這密約的內容，雖迄未公佈，但據法國共產黨機關報「L'Humanité」所披露的是：依此條約，在波蘭與蘇聯讓成衝突時，法國得任命軍事顧問。供給軍需品，以艦隊封鎖俄羅斯沿岸，當德國對俄波紛爭加入干涉時，法國有參加戰爭之義務。這樣，法國的政策，實係一箭雙鵰，既要消滅蘇聯，同時還要永久牽制德國，確保其大陸霸權，這恰和德國國家社會黨之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上反對蘇聯，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反對法國的政策，針鋒相對。

(5) 不過，法國所領導的反蘇聯運動，就其推翻無產階級政權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各國自具共同利害，而不持何等異議，但就其貫徹大陸政策這一點上，各帝國主義的利害就不能一致了。共同利害，遠不如利害衝突來得迫切，故帝國主義列強終不能在反赤的旗幟之下，掃除成見。結成聯合戰線。反之，德國的親美聯俄，及澎湃的國權運動。意大利的親德反法，英國的抑法助德，都大大地威脅了法帝國主義，而減其武裝進攻蘇聯的可能。蘇聯很清楚地看透了這一點，遂拿出她那所謂和平政策，來分離各國，破壞反俄的聯合戰線，對環境諸邦，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於一九二二年，即開始與法國談判。至一九三〇年，又向法國與波蘭提議正式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法俄互不侵犯條約草案，於去年八月二十四日簽訂。唯該條約之發生效力，則

以蘇聯與波蘭成立同樣條約為條件，波蘭以與羅馬尼亞之歷史關係有合作的義務，乃要求羅馬尼亞共同簽訂此項互不侵犯條約，但羅馬尼亞却以解決伯撒拉比亞合併問題為條件，因此，俄羅斯的交涉，乃告停頓，而法俄談判，遂亦行擱淺。

然帝國主義昆仲間的激化。終使蘇聯的外交，獲得勝利。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波蘭竟不顧羅馬尼亞的反對，而單獨與蘇聯正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矣。事情的原因，當求之於德國的情勢，蓋德國法西斯蒂的猖狂，及巴本之於洛桑的宣言，德國軍縮代表那德魯尼之於日內瓦軍縮會議的宣言，對於法國和波蘭，都是極大的威脅。而國家社會黨，銅盜團，和日耳曼國家主義派之覬覦波蘭走廊及但澤（Lourador and Danzig），尤使波蘭不安。日耳曼事件，奪去了波蘭的注意，她已無力再有事於東鄰。俄波互不侵犯條約，就在這樣的情勢下成立了。

但是，這顯然地不是波蘭——這個在法帝國主義領導下的反蘇聯大同盟的急先鋒的單獨意思，而也是根據法國指令的行動，俄波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究為法俄互不侵犯條約成立之先聲。果也，於俄波締約一日而後，八月二十五日，赫里歐與蘇聯駐法大使杜夫蓋列夫斯基在巴黎舉行懇談，會議的內容，據一般的推測，關係於擱置已久之互不侵犯條約。而此種條約，今又以正式簽字聞矣。誰個能說這是偶然的吧？

由此可知：俄法，俄波互不侵犯條約的成立，實為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之不可調和的結果。列強的對立，已尖銳到使法國痛感地位的不安，而不惜與素昔為敵的蘇聯，講求暫時的友好，用為外交的利器。法國的用

意是在：(1)挽救波蘭的孤立，(2)防止法國在中東歐地位的動搖。同時，藉此後的商約會議，發展對俄商業，携過剩的資本，大量輸出蘇聯市場，以稍蘇國內經濟，挽救恐慌，自亦為一重大動機。故法俄互不侵犯條約的成立，實較一般的不侵犯條約的意義，更為重大。而其影響於國際政局者亦將至鉅，尤其際斯軍縮未洽，戰債問題無法解決時法俄新約乃愈有重大的意義。我們且注視帝國主義列強間的今後的離合關係，靜聽下文吧。(新)

日本之窮途末技

日本對東三省問題，為欲達到其永久佔據之目的，不惜以種種陰謀，偽造法律上與事實上之根據，一以掩飾侵略之跡，一以淆惑世界聽聞。自李頓報告書公布以後，其掩飾與淆惑之作用，幾等於零，世界各國皆知日本獨霸亞洲之野心為可畏，對於中日事件之責任，大抵觀察相同，所不同者，調停或制裁之程度，尚格於他種問題，不易趨於一致耳。本屆國聯大會，將報告書延期討論，延期雖由國聯主動，並非盡徇日本之要求，然日本利用延期以施其鬼魅之技，則為顯然之事實。如日政府對李頓報告書之反駁意見，刻已製成發表，吾人俟讀全文，再行論列。此外如各國宣傳與專員之派遣，日內瓦大小各國代表之折衝，均積極進行，不遺餘力。今距行政院初步討論之期，不過數日，據日內瓦消息，似將專以李頓報告書為討論之根據，雖九十兩章屬於建議部份我國已有反對意見，日本同時亦肆詆譏，然前八章敘述之正確，實為一般人所公認，尤其關於九一八前後日本軍事行動之經過，及「滿洲偽國」製造之原動，鐵案所在，日人縱有百口無以自解，然而日人不

自惶報，猶思極力掩飾，以為世人可欺也。近以義軍蘇炳文佔領東路，俘獲日僑多人，關東軍司令官武藤派遺駐哈特務機關長小松原，赴俄境與蘇軍媾合，為蘇炳文所拒絕，電平報告事實，並稱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奉命赴黑，強迫各縣法團，出具擁護「滿洲國」證明書，由偽省長韓雲階捏造交出，遼吉兩省亦採此同樣辦法，其意蓋欲用為國聯中辯護之工具，然而時機已晚，且一手亦不能盡掩天下耳目，適見其窮途末技，心勞日拙而已。(中)

美麥借款與救濟農村

據報紙上記載，政府現準備向美國再借洋麥六十萬噸，計合美金一千二百萬元。大概因為我們無法探悉此中情形，這項洋麥借款，現正在洽商和進行中。政府要人唐有壬談（北平晨報二十七日上海專電）：「關於續借美麥問題，中央現在正交本人等審查，惟購麥事，吾國商人，向有此舉，不過由政府購，可無須現款，而商人所付與政府之現款，可移作救濟農村之用」。根據這段談話，我們知道：續借美麥是確有其事的，而且這事已交付審查了。在此，我們首先要問，就是現在我們是不是還需要續借美麥？並且，這筆借款，它的用途是在那裏？

像唐先生說的這是「移作救濟農村之用」的嗎？這裏，我們丟開是否「移救濟」這個問題不講；我們單問：中國農村現在是否需要美麥救濟，而且美麥是否就能救濟中國農村？

我們知道中國農村目前是已全部陷入崩潰狀態，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農民大衆一般的饑餓，死亡，和流離的情形，無疑的這個是中國農村當前的重大的問題

談到怎樣救濟，這是布爾喬亞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唱的高調，實際，中國農村如果想從崩潰的狀態中脫了出來，只有土地革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圖從表面去「救濟」，這是極荒謬的理論，而事實上也將證明這是「此路不通」。所以，一切救濟政策，毋寧說它是毫無效用的，況且在事實上，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救濟」，不過是借用了這個名義好去借款罷了，此外，它是什麼也沒有「救濟」的。

就拿去年美麥借款來說，政府向美國借洋麥一千五百萬斛，這些借了來的賑麥，其實大部分並沒有用來放賑，而只把它作價賣出，災民因為無力購買，後來這些洋麥竟致充斥市面，造成了一種糧食過剩的局面。這筆五千萬元的麥借款，只建築了一道據說長七千四百公里的江堤，結果，這項美麥借款，對於亘十六省的水災區，及幾千萬的災民，並無一點「恩惠」。並沒有救濟到他們，而五千萬元的麥借款倒如此訂立了。

二次美麥借款現在是又被提出了，不過今年不比去年，去年是有那空前的十六省的大水災，今年則各地都豐收，糧價現正下跌，如果再把美國過剩的麥借了進來，那麼一定是要更加紊亂糧價，據報紙的記載：湖南今年秋收以後，穀價低落至每石二元四角，米價也跌至六元左右。安徽新稻上等每石僅售二元五六角，次等則僅售二元二三角，江浙情形，大致也是同樣。（上海晨報）糧價跌落已達到可驚的程度，因此，今年雖是豐收，農民反而愈形感到恐慌，反而不利，因為農民收入全靠糧食，現在糧價奇跌，收入方面自非短絀不可，這樣賤價賣出，還抵不上自己投下的生產費，（農民投于食糧的生產費，每石約在七元

左右）農民在這方面——糧食跌價——吃虧是不堪言狀的，加之再受高利貸者，苛捐雜稅，地租及封建式的剝削方法等等剝削，於是，整個的農民層只有趨於極度的貧困化，只有走到饑餓，流離，死亡，……

但是，在表面上企圖「救濟」。這是沒有觸到問題本身；問題乃在於怎樣去廢除這剝削的關係，怎樣推翻帝國主義及和國內封建勢力勾結起來的在中國的統治。

一借美麥——就是又增加了一筆外國借款（外債），也就是增加了國民的負擔——就要談到救濟農村，似乎這項借款一借到手，就要來大救濟一下在崩潰過程中的中國農村，這的確是宣傳借款的方法，因為我們根據以往借款陳例，經驗告訴我們，這是在借款前之照例有一度宣傳方法，但事實是常常與宣傳相反的；就是這次借款，是否用在上述用途上面，我們正未敢必。

然而我們可以拋開「是否移作救濟」這個問題不論，但借款的本身在國民經濟上將發生若何的影響，這個我們是不能不予以注意。

美麥借款成功，這的確是馬上就有一筆巨款到手，即唐有壬說的：「商人所付入政府之現款」現款用途如何姑不必提，但這項借款的負擔，無疑的是加在全國一般勤勞大眾身上，所以美麥借款，其直接的影響，就是國民負擔加重，而農民所受到這借款的危殆尤大，關於這點，布爾經濟學家。也曾大聲呼喊，如楊端六先生說：「今年各處五穀豐收，價格已跌，若是再借美麥，則國內穀價必將更跌，……大多數的農民因此不免陷於破產的境遇，……查現在的穀價在鄉間已經不及往年的一半，若是再借美麥四萬五千噸（另一個消息說是六十萬噸——與）則鄉間穀價

更不知跌到若何程度，百分之七八十的農民……就非束手待斃不可，至少明春的種植發生困難，未來的農產物不免陷于悲觀的地位。」這的確是實話。

因此我們也和楊先生一樣喊：「借美麥有害」。而且，惟其爲了救濟農村，借美麥才正是不應該的，因爲這是違反了救濟的原則。

(方輿)

三中全会的使命

中華民族，已瀕於垂亡時期，目前內政外交諸重大問題之急待解決，莫不延宕敷衍，委諸於下月之三中全会。實則過去諸如此類之會議，亦非不多，其能實際解決問題者，誠屬少見。大都會而少議，議而少決，決而少行。故下月之會，果能解決其急待解決之問題，將實際之功效，而孚吾人之期望者，當未敢必。

然則，三中全会，雖難料是否不蹈過去會議之覆轍，會議結果，不等於明日黃花，無補時艱者；但以時勢相迫，又不能不深望國家大計，藉此會而謀一解決。要之，此會將來之成效如何，當視黨國諸公之覺悟程度如何以爲斷。否則，仍各執一是，成見爲懷，以個人利益爲前提者，卽或散居各地之中委能如期參加，其會議終無結果，至可預言。何況以現下情形而論，各地中委諸公，尙多意見不一，趨起其行者。

回憶去年此時，經多番曲折，幾度往返磋商，始有四大全大會之召集。吾人方期支離破碎之本黨，從茲復歸於完整；黨中領袖，能徹底推誠合作，共挽危亡，毋負九泉之下總理囑望之殷而將多年國民革命之豐功偉跡棄於一旦也。其事實結果，乃使吾人大失所望，慨歎本黨有病入膏

肅，無可救藥之危險。

蓋本黨自執政以來，疊經封建餘孽及反革命勢力之環攻，已如臨風雨飄搖之祖，岌岌乎殆哉！外患既日益交迫，內憂又層出不窮，誠屬自取滅亡之徵兆。即無外侮來臨，而自身已至不可支持之勢。

過去二中全会，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對日外交決議案，亦徒成形式，敷衍門面而已，實則與中日問題，毫無裨益。三中全会，原係本黨全數中央委員之會議機關，在以黨治國之中國，國家一切內政外交對財政等大計，皆取決於黨，換言之，黨權高於一切，諸須受黨支配。而黨內對於一切重大問題之處置，即由中全會實際決定，以便遵行。值此外侮日亟，內憂之際，三中之使命，尤關重大。

中國當前真正問題，不在軍事，亦不關外交，即在如何求本黨自身之團結，集中全力，邁進真正國家大改革，恢復「禮義廉恥」道德，一變過去之不良精神生活，舉凡黨國要人及各級官吏，均須以身做則，應自己身起，勵行改造。或之中國一般民心已死，民族已至衰亡境地。自空前之「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以身許國，臥薪嘗胆與敵肉搏或經日奔走呼號，間接對敵宣戰及作實際之經濟抵抗者，雖頗不乏人；然而醉生夢死，歌舞昇平，不關痛癢者，亦大有人在，甚至有藉國難時期而蠢蠢思動者。其最可痛心者，厥爲內戰之復起與夫共匪之騷動，此二者誠國家之罪人，均不惜斷送數千年有悠久歷史之中華民族也。

下月之會，因事實關係，未必屆時百數十位之中委，皆能齊到，躋躋一堂。不過，負有黨國重大責任，與負有聲譽者，又非參加不可，却甚屬欠佳，而難免有碍於會務

之進行。當此三中全會將開幕之際，即以常委而言，汪先生早已稱病放洋，屆時決無參加之可能，胡先生雖態度曖昧，能否出席尚不得而知，但據張委員知本之談話（十一月十四日報載），胡先生亦因病不能參與。似此情形，三常委之中，已有二者無出席希望，事實上，將來只有蔣先生單人出馬。其他分散各地之中委，即能湧躍赴京出席，要亦大殺風景！執筆至此，真有不寒而慄，實未敢對下月之會，再存多大希望也。雖然，吾人猶願作最後之期望，不惜唇舌，謹略貢獻一二，以備採納；

(1) 充實中樞 一年來之中央政府，疊經政潮之起伏，大有五日京兆之慨。即以最近情形而看，居最高地位之中常會，汪胡因病懶於負責，蔣則因勦匪而不能負責，已等於虛設，其行政最高機關之行政院，汪院長掛名已久，現雖代理有人，究非久計。其它無人負責之各機關，亦須立求充實，凡掛名及觀望者，均須一律停職改任，俾免群龍無首。

(2) 澈底抗日 根據歷史教訓，中日問題，非靠他人所能解決，乃為自身之實力問題，國聯雖為國際主持和平之機關，但無實力以執行其決議，故我國縱萬分勝利，世間之公道獲伸，亦不過得一空虛之決議，當不能以一紙之決議，使日本雙手奉還東三省於我。况國聯之根本用意，因未願承認偽國，將整個東省利益，歸日本獨佔；亦不肯無代價使東省復為中國之領土。據二十一日日內瓦亞細亞電……其惟一希望，即為已在暗地進行之調和，茲聞，調和之要點，係承認滿洲自治之性質。可見國聯之最終目的，即在將滿洲變為自治區，歸國際共管，故東北義勇軍將領馬占山等十四人聯名電國聯曰「中國不能拋棄

主權，造成共管。」即此之意。由此，中國今後對日問題，只有積極抵抗，不稍屈服。抵抗之道，不外武力及經濟兩途，武力除準備全國軍隊外，對於關外奮勇殺敵之義勇軍，須由政府正式撥款接濟，經濟由全體國民總動員擴大低貨運動。同時為安內及集中抗日力量起見，宜採有效辦法，制止內戰及肅清共匪。

(3) 改革教育 數十年來之中國教育，形成畸形發展，不特無有利於國家，民族，抑且使國家，民族，日益沈淪，當局亦無整個教育方針，謀長治久安之計。影響所及，校風全國囂張，竟無法平息。實則已至破產境地。若長此以往，誠有不堪設想者也！為今之計，國家教育，貴乎有一定方針和目的，換言之學宜貴乎實用，其浮虛不着實際之所學，當力予廢除。教育實能挽救中國。凡一個民族之最大危機，即在文化之沒落，被他民族之同化，元雖亡國於蒙族數十年，清雖亡於滿族幾百年，而漢族其仍有復興可能與夫能重建國家之望者，實因文化盛於蒙滿兩族之關係，終於同化他族。故改革教育，復興中國民族文化，實為當前之急務。

(4) 救濟農村 中國以農立國，農業生產，居主要地位。近年來中國農村經濟，已達破產，致影響匪共蔓延，無法消滅，國家財政，亦因之拮据。應藉三中全會討論出整個救濟辦法，使奄奄一息之農村，有復蘇之望。反之，實有喪國脈，匪共固然無法肅清，即抗日亦難以為計，則大有人不亡我，我自亡之之勢！蔣先生前在湘演講，「惟教育與經濟能挽救中國」，實把握目前中國之癥結所存，客觀事實，捨此實無其他救亡之策。

其他應興應革之事，尚有未盡所敘。總之；東三省尚

在日閹鐵路之下，而長期奮鬥之悲痛呼聲，亦漸低減。而社會現象，不振如故，各種危機，也正方興未艾。况國際形式，緊張萬分。日帝國主義者近半年來愈益加厲，積極作大規模之戰備，趕製軍械，廣購物資，儼然兵工廠戰時化。明年豫算海陸軍要求之新經費，有四五萬萬之驚人數字。據本月一日東京電：日海軍造艦計劃，共四萬萬餘元，如此猖獗，居心可知。故現受之禍，尙屬初步；未來大劫，更爲必然。此目前之急需，亟有待於事實之表現，三中全会，實責無傍貸。

復次，中國民族，何以處目前之外患，更何以應未來之大劫，均以三中全会爲轉移，深望中委諸公，各捐除成見，精誠團結，切實會議，多加議決，決後力行，使全國民氣，趨於一致，作政府之後盾，建國救亡，庶乎有焉！

(一鳴)

匪區收復後之視察問題

豫鄂皖邊區匪軍事，雖有顯著成績，老巢巨股，悉告殲除，搜剩餘孽，瞬將竣事，今茲急務，惟在善後設施。前者三省剿匪總部歡迎國內各界團體，前往收復各地，視察現狀。聞上海漢口北平均有視察團之組織，包括新聞界及銀行家實業家，作大規模之團體行動；本京新聞界亦正發起組織，各界是否參加雖不可知，此行之意義，則不能不有相當之認識也。

各省陷匪之區，無論時期久暫，其組織之變更，經界之紊亂，交通建築之破壞，人口財物之喪亡，迥非未陷以前之面目。此時謀復舊觀，是否可復與如何能復，當局雖不無嘉猷，而物質之供給，方法之研討，借賴於國人者甚

多。今各界熱心視察者既如此踴躍爭先，要當體認此行之動機而完成一種目的，不僅作爲尋常之旅行，或爲好奇心所驅使。大抵銀行家實業家之所注意者，爲農村復興之需要，公用事業之建設，以及山林川澤之生利等等；而新聞界之所注意者，則較爲繁深。語其大要，如被匪失陷與收復之因果，匪管時代殘留之形迹，未陷以前與收復以後之政治民情之比較等等；更析言之，如自治實施，農村經濟，土地分配，村治教育，地方自衛等等，要當分別加以概括的及列舉的視察，依視察之結果，參以歷史之利弊，審合民意之傾向，而後知善後之方法，如何最爲適宜，不妨建議以供政府設施之參考。吾曹報人果不欲虛此一行者，則於觀察之人選，程序，項目，分工，似應有充分之考慮與籌備，則他日以其所視察者，貢之當道，公諸世人，方不失爲有意義有價值之工作，同業諸君子，於意云何？(國)

禁烟之法律與事實

國內鴉片之禍，既廣且深，總理拒毒之遺訓，政府禁烟之法令，煌煌具在，而效力則甚微。中央近以民之不畏法也，以爲科刑失輕，擬將禁止種，吸，運，販，之條，悉行加重，使民不敢嘗試，或可徐奏清毒之功，立法之嚴，固應如是。惟吾人徵之事實，過去禁烟刑罰並非不行，特其拘束之效力只及於平民而不及於特殊階級。今日各地監獄中禁犯疊疊，大都爲逐利之小販，與貧苦之癮者。凡有一命以上，及體面之紳士，多財之商賈，其吸自若也；在職大員與有槍階級，其挾帶或庇運自若也；推而至於各省當局，一方承中央之命而布告禁烟，一方勸種收稅又自

若也。如最近某某等省，傳將舉行公賣以裕稅收，雖未成爲事實，然風聲所播，生奸民玩法之心：於是有商議承包者矣，有大批私運者矣，逢惡之徒，無所不至，謂非空穴來風以貽政治清廉之玷耶？又如甘肅原爲產烟之區，歷任省政者皆以種煙爲惟一籌款之法。此次改組以後，原可剷除流毒，與民更新，無如陝軍大部駐甘，餉費無出，仍師往日種烟養兵之故智，致甘省禁烟新政，阻而不行，省府全體委員引責辭職，積重之勢，豈真不可反耶？夫法律之尊嚴，惟恐不至，事實之矛盾，如此顯然，兩者之間，豈容並是？事實爲局部的，法律爲一般的，以局部之不守法，使一般法律之爲具文，惡風相煽，他日干例違法者，恐不止於烟禁一端也。吾人以爲禁煙法之厲行，初不關於科刑之一律加重，最要之原則有三，（一）有罪必罰，（二）同罪不可異罰，（三）政府與軍隊人員犯者倍其罰，準此繩墨，執法不撓，則公開種烟與大宗庇運之風先爲之戢，平民猶敢私運私吸以故觸刑網者，未之有也。至各省因厲行禁烟而發生事實上之困難，政府應籌通盤補救之法，一時爲飲鴆止渴之計，則萬萬不可。

（日）

川軍轟炸人民之罪惡

川戰日烈，政府制止之命，人民呼籲之聲，不足以促川中軍閥絲毫之覺悟，近日渝軍悉力攻取瀘內，以蓉軍結集死守，乃以大砲飛機向城市轟炸，意在威脅守軍之退却，然軍隊有避彈之經驗，憑城亦可作有效之掩護，實受其害者，惟火力所及之民居及其生命財產耳。報載兩劉戰况，或直接來自蓉渝，各張其勢，或出於川軍代表傳說，迹近宣傳，吾人根本反對內戰，以爲一邱之貉，原無是非曲

直之可言。昨旅京川省同鄉會致劉湘之電，痛其桑梓受禍之烈，致引英艦轟萬縣日機炸涪瀘二事爲渝，有云「吾民平時既已安分納稅，儼若牛馬，而戰時又復任人宰割，酷似牛羊，雖吾民之脂膏，尙未能填公等之慾壑，但何忍將吾民之白骨，堆成公等之戰勝紀念塔乎？……吾民厭亂已久，設使摧殘太甚，一至希望斷絕，勢必揭竿而起，爲生存而奮鬥。……同人田園廬墓，皆在公等砲火支配之下，所望激發良知；立停轟炸，退守原防，靜候中央處理。」語哀意激，想見川省同胞，痛苦至何程度。吾人向不偏於指摘者，不欲以感情蔽事理也，今一方猛烈攻擊，一方深溝高壘，攻者明知消滅對方之目的，一時不易達到，乃不惜以無辜之人民爲犧牲，用心慘酷，任舉何種理由，皆不能爲之曲恕。川同鄉會電中所謂「人民揭竿而起」，爲制衡軍閥自動救亡計，誠爲萬不得已，惟以人民習於良懦，懼於積威，在數十萬軍隊壓力之下，恐無人敢爲冒死發難者。若望其激發良知，停止轟炸，靜候中央處置，是無異與虎謀皮。有謂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俟其勝負稍分，則調解自易生救。不知二劉以外之二層將領皆以趁火打劫爲能，蓉劉縱失敗退入康邊，必羣起分肥，轉以渝劉爲公敵，情勢愈雜，調解更難。當此紀綱廢墜之日，吾人宜尊重是非，不宜徒徇利害。中央倘置川事於不問，則亦已矣，既有制止之命於先，假使稍存瞻顧，不惟棄七千萬之川民，亦無以自全其威信。是宜循解決魯事之途徑，派員入川，監視停戰，由中央召集川省善後會議，以謀適當之解決，寧可待其抗命而另行裁制，不可慮其無效而猶豫不行。一面嚴令川軍，不得施用飛機大砲轟炸城市，有不遵者，視爲全國公敵，以實力干涉之，彼飛揚跋扈之軍閥，或猶

有所忌憚，否則空言政治解決，徒延時日以苦川民，政府 固心有未安，國際視聽猶無以自解也 (報)

中華民國名人傳

賈逸君編

本書共收民國名人傳稿五百餘篇，分訂上下兩冊。內容分革命先烈，軍事，政治，外交，教育，學術，藝術，文學，實業，新聞，婦女，前清遺老十二類。共八十萬言，記載極為詳盡。又將有關係之資料，附記於本傳之後，如馮玉祥傳之附錄白話詩，蔡松坡傳之附錄別蜀文，林長民傳之附錄一封情書，余沈壽傳之附錄意后繡價駁辨文，均極饒興趣。卷末更附錄民國已故名人年表，尤便檢閱。研究現代史者，當以先睹為快也。每冊定價一元。

發行處：北平廠甸文化學社

文藝戰線第一卷第三十五期目錄

時事短評

- 應嚴徵示陳孚木等.....金重
- 不要忘了東北義勇軍.....白水
- 從猩紅熱說到收容難民.....雲子

詩家的描繪

JOHNSON 博士著
白杰 譯

馬路上的影子

明天

儀(下)

華明之死

1. 海(詩)

2. 寬路(詩)

3. 獻給青年(詩)

柏林通訊

凡直接訂閱本刊全年者贈少峰先生第六集飄萍一冊(價值八角)愛國獎券一張(價值二角)震東印書館購書優待券一張凡該館自版書均按七扣核算(效期一年)出版部北平宣內絨線胡同一七一號

中國社會史研究

陶希聖

緒言

中國社會發達的階段應怎樣劃分？答案是紛歧的。從前我把周代劃為封建時期；從戰國時代到唐末五代為一期，宋到清為一期；清末到現在為一期；戰國到清末是商業資本主義的階段。當時對於西晉到唐的封建制度曾加注意，以為這是商業資本的衰退及現物經濟的代興，引起來的社會的逆轉即封建制的再建。但當時有兩點，現在覺得要加改正：第一，沒有把中古的封建制度單劃為一個階段。第二，當時我沒有顯明指出兩漢社會與宋以後不同的特性。現在我想作新的嘗試，重估中國社會進化的階段如下：

第一期，氏族社會末期及原始封建社會。

此時期商周屬之。周是由氏族社會到奴隸經濟的過渡時期。因社會組織是氏族集團最為有力，所以財產依身分而分配。因所分配的財產主要是土地，所以氏族貴族對農民的統治，是封建的統治。因之周代社會又與原始封建社會頗有相同之點，或竟可以叫做原始封建社會。

第二期 奴隸社會。

「在古代的世界，商業及商人資本發達的影響，常歸宿於奴隸經濟；或依其出發點的不同，其結果單把那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的家長奴隸制度轉變為生產剩餘價值的同樣的制度。」(Capital, II, p.390-391) 戰國時代就是原始封建形態的社會轉變到奴隸生產占支配地位的商业資本社會的時期。秦漢可以劃入奴隸社會的階段。

第三期 發達的封建制度。

小農的破產，奴隸的涸竭，土地的集中，長期的戰禍

，游牧部落的侵入，把中國從商業資本社會逆轉於封建制度。所不同於周代的，是身分依財產而支持。由漢末到唐初，是封建制度發生，完成，發達的時期，初唐以後，此制由發達而分解。

第四期 城市手工業及商資本主義社會。

宋代以後，城市手工業發達，商業及商人資本鼎盛。自由勞動代奴隸勞動而起。莊園組織分解為小農經濟。這是手工業發達而封建制度分解的時期。

第五期 清末以來半殖民地社會。

最有爭論是清末以來，中國的社會是封建勢力所支配的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自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以先資本主義社會走上半殖民地的路。他的發達已不應拿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經由的過程來規律。他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支配，而封建關係不能肅清，反與資本主義成有機的結合。這樣一個社會形式應叫什麼名稱？他以半殖民地的地位向資本主義轉變。發達的是流過程裏的金融商業暴利資本，阻碍及破壞的是生產資本。工業受商業的支配(Capital, III, p.389)，但商業又是外國工業的奴隸。真理是具體的。我們且作具體的研究。

這次的講義且依上述的各期進行研究。倘不能圓滿解釋過去的歷史，我們再修改，再進行。

本論

第一編 上古期

此期自遠古到戰國時代，由遠古到公元前三世紀。此期是由石銅兼用到鐵器的時期；由游牧到農業；

由現物交換到商業之發達；由氏族社會經過原始封建制度，到達奴隸經濟占優勢的社會。

歷史家說中國歷史，要從公元前五千年說起。但社會政治史只能夠從公元前八世紀說起。此時以前，我們知道的社會事實太少。并且，國家未成立之前，沒有政治，爲明瞭公元前八世紀以降的社會政治制度與現象計，固不得不把此前的社會狀況說明，但這種說明也只是極簡單而不正確的。

第一章 氏族社會

第一節 商之氏族組織

一 商族的生活

(2) 商（通說公元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的文化已達於新石器時代末期，商族的經濟是畜牧經濟，而農耕已經開始。畜牧之盛，由祭祀時所用犧牲之多可以推知。

其祭是牢鬯之數無定數，一以下定之。其牲或曰大牢，或曰小牢，或牛，或羊，或豕，或犬。又曰牲，曰牝，曰羴，曰羝。其用牲之數，或一，或二，或三，或五，或十，或二十，或三十，或四十，而止於百。（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

農耕之存在，由禾，黍，麥，米，糠以及農，耨，這些字時見於卜辭而可知。殷虛堂所藏殷虛文字有如下的卜辭：

西方受禾

北方受禾

癸卯貞東受禾

西受禾

又有：

其田麥畢

車麥田亡戔

殷虛書契考釋有：

受黍年（三卷二九頁）

貞受黍年（同上）

甲申貞黍年（同上）

貞乎黍受年（同上）

住黍受年（三卷三〇頁）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但是我們要問，畜牧生活是轉徙以追隨水草之生活，農耕是定住的生活，在兩種經濟過渡時期，轉徙與定住的矛盾怎樣解決呢？我們先要知道；後期的畜牧生活并不是刻刻遷徙，初期的農耕生活也不是年年定住。後期的畜牧，因種植技術的發明，芻秣可以培植，牛羊的食料比較地有確實一點的來源，所以不必刻刻遷徙。初期的農業是用石錘挾土，然後播種。在挾土以前，燒草關田，即用草灰做肥料，沒有別的肥料。所以甲骨文有

貞焚

卜焚

焚，說文（卷十上）說「燒田也」，石器及燒田法，別的地方到後代還有行之者。北史東夷傳稱流求國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水灌，持一鍤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懸之。（石雅引）并且在前漢初年，楚地還是「火耕而水耨」。（史記貨殖傳）這種耕法，既不施肥，又不深耕，一塊土地當然只能用一年。耕地年年更換，除非在長江流域肥沃之地以外，勢必使這個種族有遷徙的必要。所以說初期農業生活並不是年年定住的。

二 商族的分工與奴隸制度

(3)

這樣看來，商族已經是傾向於定住而沒有完全定住的種族。因為牠的經濟是後期畜牧與初期農耕。高度發達的畜牧經濟，是奴隸制度發生的條件。畜牧是規模愈大則需要勞動力愈多的。放牧收牧以及防衛災害，所用勞動力愈多，則做得愈好，而畜性愈是蕃息，並且畜性愈多，愈須分散放牧。一，以防瘟疫及暴風雨雪的侵襲及於全羣，二，以使強敵不致於一網將全羣打盡，三，以遷就分散的水草地及芻秣田。這樣一分散，那需要的勞動力更多。因此游牧部落有大规模分工，並且發現奴隸制度。

族內分工有老幼分工及男女分工之二種。老幼分工把世代層劃開了。男女分工把男女的職業，居住，及私生活畫開。商族有世代的劃分，沒有縱斷的家族制度，就是因此。一男一女的確定婚姻共同生活沒有顯著的存在，也是因此。又因此而商族輕視父子的生物學的關係。故：

商人自大父以上皆稱曰祖。其不須區別而自明者，不必舉其本號，但云祖某足矣。即須加區別時，亦有不舉其本號而但以數別之者，如云：□□于三祖庚。其稱父者亦然。父者，父與諸父之通稱。卜辭曰：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後編卷上二五葉）。凡單稱父某者，有父甲，有父乙，有父丁，有父己，有父庚，有父辛。（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九）

男女分工是掠奪與勞動之最初分化原因。（Vehlen, Theory of Leirune Class Chap. I）原始人以繼續勞動加於女子，男子則以狩獵，畜牧及戰爭為職業。直至困難的繼續勞動發生以後，男子才回頭從事繼續勞動。在此以前，如炊飯，紡織，乃至初期的農耕，都是女子的職業。從族外掠奪女子為奴，在商族是已經存在的事。以被掠奪的女子

做妾做妻，也是有的。甲骨文之妻妾奴字，皆從長跪式的女子，可以推知。（宋王楙野客叢書有徵引古代文獻證明女子長跪的一條，可以參考。）

男子分工引起奴隸制度。甲骨文有奴字（殷虛書契卷一之三四葉），僕字（後編卷下之二〇葉）。在未能發見勞動力的價值以前，征服者對於被征服者只是殺與掠。剩餘勞動既已出現，則保留被征服者的生命而強制勞動，是文化上一大進步。從前征服者把全數的俘虜，在祖宗之前殺盡。現在，征服者只挑選幾個俘虜來祭祖了。所以殷虛堂所藏殷虛文字有這樣一條：

貞十羊貞十人

這明白是卜以十人與十羊相共為祭祀的犧牲了，這種「人祭」，是從殺掠俘虜到保留俘虜以為奴隸的過程的一種儀式。由此又可知商族有奴隸制度。

三 王僧侶貴族平民

一部分人尤其是奴隸的剩餘勞動，把另一部分人從勞動解放出來。那一部分人因此可以不去勞動而享受別人的剩餘勞動呢？一是勞動組織者，二是戰士。前者指揮族人及奴隸作工，並且管理族人的分工的事務。後者專門作戰，抵抗外來的侵襲。前者是僧侶身分，後者是貴族身分。貴族的權力在於戰術。僧侶的權力託於神意。他們所以能託於神意而有特權，因為他們是生產技術知識的獨占者。戰國時代所記錄的國語，楚語中記有觀射父一段話，是說獨占知識的僧侶和主祭的：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地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體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繫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姓氏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4)

巫與祝是神明所降的。祝與宗，前者是祭師，後者是主祭。這些都是獨占一切知識的，如山川名號，四時節候，祭祀禮儀，祖宗世系，都為他們所壟斷。商族的僧侶當然也是如此。公元前一六二七年，大戊有巫咸。公元前一五二三年祖乙有巫賢。這乃是商族姓字留傳的大巫。

巫啓示神意的方法是卜。商人要卜的事項很多。羅振玉分為九類，即卜祭，卜告，卜享，卜出入，卜田獵，卜征伐，卜年，卜風雨，及雜卜。董作賓分為十二類，即卜祭，卜告，卜享，卜行止，卜田獵，卜征伐，卜年，卜雨，卜霽，卜瘳，卜旬，及雜卜。（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八七頁。）由此分類可見商人所卜的事項很多。依後來的傳說，卜不是決定事務的惟一的力量。王，貴族，庶人，及僧侶，是共同決定事務的。這幾種人的決定權之多少及關係，可從下列一段話看出來：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是指王而言的——編者）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卜，而身其康疆，而子孫其逢吉。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逆，女則逆，卿士逆：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洪範文，從史記卷三十九）

依此傳說，卜與筮占五個決定權之二。卜筮所可的，便可以。卜筮所否的，只好不做。王不能反於僧侶的意見做事，由此也可以看出來。尤其顯著的，是龜單獨可以決定內務。龜又可以反對外務，但須筮也同樣的反對。可見僧侶在內務上是最有力的。

王在這時代，不能反於僧侶，甚至不能反於庶人卿士的意見做事。這不是奇異的事情。半原始種族的王，或不能反於自由的公意決定事務。有時自由民且可以排斥王不許參加會議，如 Kpelle 族是：又或名雖有王而權力在耆老會議，如 Pangeve 族是：（R.H.Lowie, Origin of state, pp. 89-90）又或完全受制於僧侶，賸食，睡眠，均受僧侶的節制，一旦病衰，便須仰藥以死，如東非洲之 Dnyoro 族是（R.H.Lowie, Are We Civilized P.165）。知道了王權直到奴隸經濟發達後才漸漸加高，便不難了解王要服從僧侶的現象。這現象了解以後，我們才不至把伊尹放太甲的傳說看得嚴重了。一朝遭遇七年的大旱，王還得剪爪鬚髮，自作犧牲以禱於桑林。僧侶的神權之大更可知了。

四 王位繼承制度及各王之興衰

依傳說，堯舜公天下，禹湯家天下。堯禪天下於舜，

舜又禪於禹。禹和湯却傳天下於子。這話的確與否，我們不能斷定。我們所知道的是：堯禪天下於舜的傳說，盛於戰國時代，這是有社會的原因的。禹的世系，不大可靠。湯的世系卻是可靠的。因為湯的世系留傳下來了，所以我們說他是家天下。在湯以前，中原是多數種族代興的局面。就各族代興一點上說，好像沒有王位繼承的關係，但各族內部仍然有王位繼承，不過沒有留傳來就是了。

商的王位繼承制度是這樣的：

商之繼承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實甲，沃甲，前庚，盤庚，小辛，小乙，祖甲，康丁），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此三事獨與商人繼承法不合。此蓋史記殷本紀所謂中丁以後九世之亂，其間當有爭立之事，而不可考矣。（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

這三十王之中，湯是受命建立政權的，他受天命，而以玄鳥為符，好像埃及王室以鷹為符一樣。所以詩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八傳至雍己（湯之四世孫）而衰。大戊因祥桑生于朝，恐懼修德，並用巫咸，因而復興，號為中宗。又十傳至陽甲而衰。盤庚繼位，五次遷都。這時候，一方面為求水草和耕地，不得不遷；一方面貴族與平民戀着舊來的耕地和建築，不肯即遷。盤庚拿出先王和天命來勸誡他們，

說道：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顧譯：我們先王沒有一個不是顧全人民的，人民對於君上也都能體貼他的心；因為君臣這等和好，所以很能順着天時生活，不犯什麼凶災。現在天上降下大災來了，我們的先王磁見這種事情，爲了人民利益，也不肯戀了他們手造的宗廟宮室而不遷徙的。）——書盤庚中篇。

三傳則武丁，要用一個平民當政，託於夢而後搜求，才幸免僧侶和貴族的反對。他所用的平民叫做傅說。——但這話是不是戰國時代士人想取貴族而代之的時候造出來的，尙不可知。他看見飛雉登鼎耳而鳴，乃修政事，殷以再興，號為高宗。五傳至武乙，背叛僧侶，（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記卷三）這是怎樣的大罪呵！後來他被暴雷震死。三傳到帝辛即紂。這人也沒有什麼大了不得，不過被周武王打败了，因之武王討他的口實便永留爲他的罪名，經過歷代學者的附會，乃成了天下第一等惡人。武王最大口實，還是說他不祭天。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尙書泰誓上）

由上述又可見商的政事與神的關係，尤其是鳥與商王結不解緣。

四 氏族戰爭及主族與被征服族的關係

商族如甲骨文所記載，已不是原始共產社會。其特徵之一是氏族內部已有身分的分化，且氏族有公有的奴隸。僧侶爲獲得剩餘勞動，渴求奴隸。貴族亦同。於是爲求奴隸而與鄰近氏族作戰。奴隸愈多，則牧場與耕地愈廣，而

貧富懸殊愈甚，而鄰族的征服也愈亟。周代的商族後裔宋人作詩歌頌商族的武功，說：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北方)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南方)

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西方)

(6) 這些歌頌固然不大可靠，但依卜辭，則卜征伐的很是不少。羅振玉所考釋的，卜征伐者三十有五。中央研究院新獲卜辭之中，卜征伐者七。北方之旨，東方之夷，南方之辛，都在征伐之列。這已經顯示商族以一族統治多族的傾向。依史記商本紀所述，當其盛時，諸侯來歸，當其衰時，諸侯不至。所謂諸侯就是服從商族的諸侯長。不過統治族與服從諸族的關係是疏略的。統治族與被治族或許還沒有同居一地，及經常貢獻的關係。這種政治組織至多只能叫做初期的「主族國家」(Chiefdom)。但因氏族內部的貴族平民還不是階級剝削關係，而主族與屬族之間也與剝削階級對剝削階級關係不同，所以叫做國家，不大妥當。主族與被征服族的關係怎樣呢？被征服族對於主族，不過間隔的或定期的貢享。或者主族對被征服族間隔的或定期的劫掠。

第二章 原始封建組織的發生發達

第一節 周族的發展

約公元前一二二二年，由黃河流域上游即中原的西北方，向黃河腹部，來了一個氏族聯盟。聯盟的主族號為周。在此以前，周族已逐漸發達於西北。牠的行動是由西北水草區到陝西高邱。牠有銅製的兵器及銅製的農具。牠發現農業的價值而崇拜一個農神，認為是牠的母神的兒子。詩大雅說：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這是周的母神。小雅斯干之詩說：「似續妣祖，築室百堵」，指出周族是崇拜這位母神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這后稷是農業的發明者。他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飯穰穰，瓜臝嗶嗶。

他又是一個統治神：

是生后稷，……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魯頌)

因此通常總以為周是一個農業民族。但周從西北水草區東來，原來是一個游牧族，到黃河上游高邱以後，始改事農業並征服農民。周的祖宗篤公劉，已經是統治農民的貴族。他一方面「迺場迺疆，迺積斯倉」。他另一方面卻「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他以這種游牧戰士的勢力，對於農民，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大雅)

這是說戰士征服農民之後，君臨他們之上，抽他們耕田所得十分之一(徹)以爲糧。篤公劉的氏族，後來衰了。他的後人古公亶父避匈奴的逼迫，從幽東遷到岐。他的遷移，還是「走馬一來的。古公亶父(約公元前一二二七至一二三一年)之孫號爲文王(約前一八四至一一三五)，斷虞芮之訟，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邶，伐崇侯虎，作豐邑。他由岐遷到豐，他占領陝西高邱，進逼黃河腹部。武王繼位(前一一三四至一一二三年)，於

前一二二二年克殷。

幽岐一帶雖有發達的農業，可以徹田爲糧，商族所在的黃河腹部平原，卻或有火耕農業，或則芻秣草原。一族一族，聚居各處。周族既已克商，對於少數氏族各仍許他們撫有封地：即左傳成公十一年周之劉子單子所謂：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周對於聚居的商族，則以族爲單位分給征服氏族。其中最顯著的是如下的傳說：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般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倍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同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慮。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萁夜旂旌，大呂；般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眡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闕之士，以其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稱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般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四年記襄弘之語）

把被征服族分給征服族，受其支配，同居一地，貢納賦役，這是征服氏族與被征服氏族之間的封建組織成立的

過程。

第二節 原始封建制之成立

一 農業的進步

周族征服中原的時代，銅器的使用已經發達。銅製農具已經使用。詩周頌：「虡乃錢鎛」。傳云，「錢，銚也。鎛，鎛也。」說文也說：「錢，銚也。」錢與鎛字皆從金，可見農器已用金屬。錢形似鎛。鎛爲鋤類。可知西周時代是鋤耕時代。錢鎛之外，又有耜。耜是沒有軛的犁，兩人用手持柄而推。考工記鄭注：「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或者耜是由鋤進化到犁的過渡形式，又或耜就是錢鎛安上木柄。兩人並發，故叫做耜。用這種耕具墾土，必須多數人共耕，所以詩有「千耦其耘」的話。詩又說「亦服爾耜，十千維耦」。多數人共同耕作，其農場面積廣大，多爲圓形方形。每一農場集合多數農夫勞動于其上。

二 農民與耕地的分割

周的氏族把上述的農場與農民征服以後，他們以兩種方法收奪賦役。他們或者分割熟地及其固有的耕者，或者分受被征服的氏族，驅使他們在生地之上開墾。又或由征服氏族驅逐固有住民而以族人自行開墾。當然征服氏族所最喜歡的是熟練農民和耕地。耕地的分配是依征服族中各家族的身分以定多少的。被征服的農民和耕地屬於征服族所共有，並不是受土的家族所私有。貴族的家族分受土地與農民而收地租。自由民則分受耕地以自行

我們要注意的是：貴族不單要耕地，他所要的是賦役，即「耕地與農民」兩者相結所生的剩餘生產及剩餘勞動。所以貴族既受農民，又分土地。分受農民，在周初是以

族爲單位。但農耕技術進步以後，農場漸漸畫分，每一農場只需有一家族的勞動力。這時候，貴族之分割農民，就以家爲單位了。

分授農家或農夫的記錄，舉例如左：

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齊侯鐘）

錫汝鬯一卣冕衣市馬車馬。錫乃祖南公旗用遷。錫

汝邦嗣二百人，鬻（獻）百驥至于庶人六百又五

十有九夫。錫夷嗣王臣十又三百人，鬻千又五十夫

。（孟鼎銘）

分授土地的記錄，舉例如左：

錫之邑二百九十有九。（齊子仲姜罇）

錫汝田于埜，……錫汝田于康，錫汝田于區，錫汝

田于陳原，錫汝田于寒火。（克鼎銘）

(8) 其分授土地時，書土爲界（封）的記錄，以散氏盤的銘語爲最詳。現就字體可識的各語釋寫如左：

一封以陟，二封至于邊柳，……封于原道，封于周道，……

其農家與土田並在記錄者，舉例如左：

易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

不賡敦蓋銘）

以上是從周金文中擇錄下來的。詩經大雅存留封建侯伯的詩句，還有如左記：

王命召伯，定申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邁其

行。（嵩高）

王錫韓侯，其其百緡，奄受北國。因其伯，實

墉實壑，實畝實籍；賦其貌皮，赤豹黃羆。（韓奕）

三 征服與開墾

以上所說，是諸侯對於卿大夫的分封，及天王對於侯伯就已征服的農民和耕地而分封。但是大諸征對於生地和未征服的農民，名爲受封，實際卻須以勞動力來開墾，或以武力來征服。即如齊太公封於營邱，卻必須用武力奪取。史記齊世家語道：

於是武王已平商定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征來伐，與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

又如鄭，初封的時候，還要開闢荒地。左傳昭十六年記有這樣的話：

昔我先君桓公（約公元前八〇六至七七一）與商人（商賈）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又如楚，是由族人開闢生地的。左傳昭十二年：

昔我先王熊繹（約公元前一一〇〇年），辟在荊山，筓酌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四 領地的大小

氏族的領地，既須征伐，或要開墾，當然視各族的勞動力多少及武力厚薄，以定大小。領地的大小，除侯國及王畿以內的卿大夫以外，決無從預定大小的。並且周克商時，對於舊有的氏族還令他們撫封。領地大小又怎樣劃定呢？因此我們可以說後來的學者所稱周代諸侯領地大小的

制度，不過是一些理想。孟子和王制主張：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凡

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王制）

其實何嘗有這樣整齊排列的事？西漢中葉以降，中國版圖及知識分子的地理知識擴大了，於是古諸侯封地被一般學者加大了幾倍。周禮大司徒：

諸公之地，封疆凡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凡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

我們也只能說道：何嘗有這種事？

征服氏族就於他既開闢或既征服的土地，依其遠近大小和生產狀況，向氏族聯盟長之天王納貢。這種制度是有。天王衰落，這貢是弱者來徵收的。公元前六五六年，齊伐楚，齊舉楚的罪狀，說道：

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左傳僖四年）

這還是代徵的口氣。公元前五二九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徵收諸侯的貢。鄭子產爭貢賦的次第，要求的鄭貢減輕說道：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左傳昭十二年）

由此推測，諸侯對天王的貢賦本有相當的規定。國語

周語載：

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外賓服，蠻夷

要服，戎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周代末的貴族歌頌他們的祖先商王，也說是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頌）大概古代有這樣一種制度。後來的學者對這制度卻又加以附會，把每一「服」的距離和面積都整齊的畫出來，便不可信了。禹貢說：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甸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大禹的時候是這樣嗎？我們只好答道：連周代都不是這樣的！周禮大司徒：

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職方氏條把畿字改爲服字）。

這當然是戰國以後的理想，只可與鄒衍的瀛寰九州說對照着讀的。

五 農民生活與井田制度

（A）農民的義務

周族舊治之幽及周代王畿的莊園生活，見於詩豳風及小雅大田甫田諸章。依此諸章，可得左列的概畧：

(一) 公田與私田

民族所占領的耕地，有公田與私田的分別。以一部耕地分給農家耕種，其所得則以供給農家家族的生計。農民的剩餘勞動則於民族的公田施用之。農家必須先耕公田，然後耕私田。所以大田之詩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後來孟子還主張這種制度，說道：「公田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這種以私田供農家必要勞動而以公田收奪農民的剩餘勞動的制度，或只是農業發達的地域才有。在農耕技術沒有發達到劃分耕地為小農場而分配於農民的程度以前，恐怕沒有公田私田的區別。耕地由多數農民耕種，征服民族的貴族只依農民的人數或家數徵收十分之一的生產與勞動。這叫做貢。至公田私田已分之後，農民個以剩餘勞動奉於公田，這叫做助。孟子說得不錯：「惟助為有公田。」

商業發達以後，征服民族的貴族加重對農民的剝削。或者這時候（春秋時代尤其是末期），農民於以剩餘勞動供奉公田之外，私田所得還得納十分之一於貴族。貴族通貢與助而兩徵之。這叫做徹。再到後來，貴族所徵收加到十分之二以上。魯哀公（公元前四九四至四六八年）問有若道：「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說道：「盍徹乎？」哀公說：「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論語）

(二) 徭役勞動

農民在公田上面所提供的剩餘勞動，是在超經濟的強制之下實行的。詩甫田描寫「曾孫」即小貴族及「田峻」即田吏強制農民勞動的狀況如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管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除公田上的強制勞動而外。還有貴族宮內的勞動。幽風七月之詩說：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於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除此以外，於狩獵之時，農民還得從貴族打獵。七月之詩說：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新于公。

(三) 手工與貢納

農民家庭手工業及園圃生產物，也免不了貴族的徵收。公子的裘，裳，以及葵，菽，棗，酒，羔羊，都要由農民貢獻。不獨裳及做衣裳的絲是農女手工作成的，農女自己也不免受公子的收奪。七月之詩說：

春日載陽，有鳴食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藥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農民所留下的只是私田收穫，僅足以度命傳種，抑且整年的勞動，祇落得「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七月之詩。）

(四) 兵役

有軍事的時候，族長料簡農民，編為軍隊。天王號稱六軍。諸侯大國初只一軍，後多改為三軍。如晉到獻公（前六七六至六五一年）十六年始作三軍。魯到襄公（前五七二至五四二年）改作三軍。楚到莊王（前六一三年至五九一年）始建三軍。兵械，兵車，及馬，都由農民自備，大約每田若干，須備千戈車馬若干。司馬法說：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哩，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周禮小司徒鄭注引)

漢書兵志說周制如下：

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十，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之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對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班固這話是受周禮的影響的。古代兵制沒有這樣整齊。我們從這種理想的計算，只可說是看得出農民的兵役義務，包括武裝的供給及武力的供給二種。每到起兵的時候，農民都要離開耕地，不能從事生產。詩唐風鶉羽之詩說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這便是耕戰武士的歎息。

(B) 貴族的生活

耕地及農民，分配于諸侯大夫及士之間。諸侯大夫多些，士少些。士自己還須從事于耕種，大貴族却從生產勞

動解放出來，生長在宮室之中，所學的是禮儀，音樂，算法，打仗的射御術。

(一) 城堡及宮室

他們在耕地之中，建立城堡。小貴族的城堡不過三百雉。鄭祭仲說道：「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左傳隱元年)大貴族當然不止百雉。此城堡之中，是貴族的宗廟和宮室。詩小雅斯干之詩說宗廟宮室的壯麗如下：

似續妣祖(女神姜嫄)，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上下板築嚴密的狀況。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棟宇簷阿的峻美。)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堂室的深廣幽靜。)

(二) 祭祀與打仗

「國之大事，惟祀與戎。」以祭祀會宗族，以打仗開土地，這當然是大事了。春秋時代的貴族已知祭祀不是迷信而是人事。左傳桓公六年(前七〇六年)，楚攻隨。隨侯要追楚兵，自恃祭祀豐盛，可得神助。李梁說道：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但是迷信卻仍支配貴族的生活。左傳昭公二十年(前五二一年)，齊侯久痛不痊，其貴族梁丘據與裔款請殺祝史，說道：

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乎

祝國史歸以辭賓？

最帶原始色彩的故事，是周公於武王害病的時候，祭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他的禱詞裡說：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與璧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尚書金縢）

(三) 狩獵和宴會

狩獵是貴族的娛樂。他們繼承游牧的習慣，在領地裏開闢獵場，時常帶了農民和武士，舉火燒林數打獵。例如鄭風記太叔好獵之盛況說：

叔于田，乘乘馬，執耨于組，兩驂如舞，叔在野，火烈具舉，相褻暴虎，獻于公所。

這獵場當然不小。戰國時代，齊王的獵場有四十里。

孟子說：

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這也可以推知古代貴族的獵場了。狩獵雖是娛樂，貴族卻乘此以料簡農民，訓練戰術，以鎮壓叛亂。開闢疆土。國語周語仲山甫諫周宣王（前八二七年左右）料民，說

王治農于籍，擲于農隙，獮于既蒸，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魯隱公（前七二二至七二一年）五年，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說：

春蒐，夏苗，秋獮，冬藏，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費，昭文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狩獵及徵收所得的食物，用來宴享宗族朋友。所謂

「我有嘉。鼓瑟吹笙」。（小雅鹿鳴）所謂：「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於粢酒殽，陳饋八簋」，（小雅伐木）這是無衣無褐以卒歲的農民所貢獻的。但是農民自己卻不能吃到。

六 貴族平民間的關係

封建的政治組織，是如上所述的身分累積而成的金字塔。耕地主（士）屬于小貴族（卿大夫），小貴族屬于大貴族（諸侯），大貴族以天王為其主。農民，奴隸，再累積於此下而為之基礎。所謂：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左昭上年）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左襄上四年）

這些等級是固定的，是不能遷改的。秦子囊說晉國的好處道：

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左襄九年）晏子說禮，以為：

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昭二十六年）

這些等級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其原則是：諸侯以下皆臣於諸侯，諸侯是最高權力。諸侯以下的貴族對於天王沒有直接的臣屬關係。天王是一個大諸侯，名位特高而已。現在分別說明於下：

(一) 諸侯的臣民對諸侯及天王的關係口衰儀禮漸衰章：「君。傳曰：君，至尊也。」父。傳曰：父，至尊也。「夫，傳曰：夫，至尊也」。這可以叫做三綱之股。斬衰三年原是子對父加隆之服。「資於事父以事君則敬同」，所以臣以加於君。但君是天王還是諸侯呢？天王的臣對天王斬衰。諸侯的臣如諸侯斬衰，而為天王薨衰。這可見諸侯以下的貴族對天王是間接的。諸侯的上卿，天王加一道命令而已，其餘卿大夫士都不受天王的命。

(二) 諸侯對天王及彼此間的關係 這關係表現朝覲會盟。朝覲會盟的期限，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左傳說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周禮大行人說是「侯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王制卻說：「諸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

大約朝覲會盟實際上沒有定期。有軍戎或大禮即便舉行。

第三節 王與霸——封建組織之發達

一 共主時代

周代的社會，是民族分立的社會。我們如果認定西周是像羅馬帝國一樣的單一國，那便錯了。羅馬是環臨地中海的都市國。因地中海這內南構成亞洲及歐洲三海岸上都市的商業大路，商業成了羅馬立國的基礎。牠的中心乃由此而在于商業都市。牠的勞動乃由此而是奴隸勞動，牠的政權乃由商業經濟集中而為單一國。反之，中國在西周時代，正是以黃河流域為主要地域的大陸社會。牠的基礎是農業，而中心在鄉村。都市文化並不顯著。社會勞動是在

於被征服的農民，及征服民族的自由民，還有奴隸。

但西周時代，共主之天王有時頗有權力。

西周之初期（前一一二二年至一〇五三年），由武王至康王時代，是游牧貴族東向商人及東夷農業區征服的時代，同時是他們向西北土耳其族即獯鬻或玁狁及通古斯族之肅慎抗拒及威服的時代。征服中原的氏族聯盟極力抗拒那些觀覲中原的游牧部落。被征服的農民，經安撫以後，也恐怖那些游牧部落再征服及再分割。但分立的氏族只各有少數的兵車和武士及徒衆。他們必須有共同首領集中指揮以達抗拒的目的。東征的戰勝餘威因此繼續緊張，提高共主的權力。

一切安定，貴族各撫其封。王畿的領地不足保持這樣的王權。昭王（前一〇五二年至一〇〇二年）南征不返。穆王（前一〇〇一年至九四九年）西征淮夷奉徐偃王而叛周，好容易才鎮服下來。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前一〇〇一年至八七九年）沒有可紀的政事和戰役。厲王（前八七八年至八四二年）因行專制，為所謂「國人」的自由民所驅逐。由前八四一年至八二八年，由貴族共同執政，號曰共和。

西北游牧部落乘周室內亂而向農業區移動。宣王（前八二七年至七八二年）與玁狁一戰而勝，號稱中興之主。小雅六月之詩歌頌中興事業，專寫玁狁之戰。抗拒游牧部落的侵入，本來是共主威權之所寄。

周的戰術是使用兵車的。土耳其族之獯鬻或玁狁為騎兵戰。中記匈奴傳：

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水草而轉移。……毋城廓常處耕田之業。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征伐。其天性也。

故宣王雖戰勝檢狝，「至于太原，」再西北一點的山林及沙漠，便非周的兵車所能到。幽王（前七八一年至七七一年）時，遂爲匈奴所反攻以至於覆滅。

二、霸權時代

征服者內部的民族組織，征服族對被征服族封建的統治，這種社會組織之下，一切都是固定的。但是征服族與被征服族的人口卻不斷的變化。征服者固有的氏族組織與封建統治相結，於是有長子繼承。長子繼承領地管理權，次子以下必須另闢耕地。農民的負擔過重，一遇凶歉，不能夠保持家口。爲補充耕種勞動人口，貴族又不得不向外掠取奴隸。如果農民因秩序安定而人口繁殖，則過剩的勞力又須另覓耕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第一便是戰爭。戰爭的目的，或在奪取一土地與農民，或在奪取土地，或在掠取奴隸。自平王（前七七〇年至七二〇年）東遷洛陽之後，春秋所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諸侯的混戰非常頻繁。由行爲來分類，有「侵」六十，「伐」二百十二，「戰」二十三，「圍」四十四，「入」二十七，「取師」三，「襲」一，「追」二。由結果來看，有「滅」者三十，「取」者十六，「遷」者十。因此，周初的「八百」諸侯，到了這時以後只賸下四五十國。較有聲勢的只有十四國：晉，楚，齊，秦，魯，燕，蔡，曹，衛，鄭，吳，宋，陳，越。子產說得好：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左襄二十五年）

戰爭最大的目標便是人口最繁耕地最熟的黃河流域腹

部。這個區域，氏族並立「地醜德齊」，不相上下。到是中原的邊地，幼稚種族所據的生地區域，一經開發，可增加開發者的勢力。自幽王覆滅以來，游牧狩獵及幼稚種族散居中原的很多。洪邁容齋隨筆：

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匠于魯，亦曰夷。

而西北諸戎（Hittite）仍不斷南窺。於是邊地的族長，依其開發生地所得的武力，更號召中原諸侯。所征服的地域與俘虜，當然歸於號召的諸侯而不歸被號召的中原諸侯。因此，邊地諸侯勢力更大，乘此以臨中原。中原諸侯敢不聽命？這些邊地諸侯就是所謂霸。

齊桓公（前六八五年至六四三年）用管仲的重商政策，國富兵強。（管子這書裏有許多重農抑商的政策，不是管仲的本來主張。）管仲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國語齊語）士即耕戰的農民，專從事於戰鬥。「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凡五鄉爲一軍，共三軍。軍的編制是以家爲單位。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爲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每家出一個兵，一鄉二千人爲旅，五鄉爲軍。這叫做作內政以寄軍令。至于工商之鄉則免兵役。並且他取出口稅豁免的方法：

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爲諸侯利。（國語齊語）

於是齊國的商業繁盛，向中原開闢商場。政府以兵力

從之，制勝諸侯。

晉自文公（前六三六年至六二八年）至悼公（前五七二年至五八年）五都是強君。牠的環境是「晉處深山，戎狄之與鄰」。（左昭十五年）牠用征服與同化的手段，把戎狄開發了。牠與戎狄抗爭的結果，戰鬥力極大。牠號召諸侯，抑制楚國。楚莊王（前六一三年至五九一年）時代，楚已併吞漢上諸姬，以其開墾山林及兼併農地的勞力，北向問鼎之大小輕重於周室。秦穆公（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時代，秦為戎狄最強的氏族。牠據有農業最發達的陝西，及畜牧最發達的甘肅一帶。牠的戰鬥力是很強的。這三族都是以土地開拓稱霸的。

浙西北都平原之越，卻與齊同，以商業政策而稱霸。當勾踐之世（前四九六年至四六五年），范蠡用計然之策，

對於貿易——

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上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原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投強吳。（史記貨殖傳）

這是說：越以需要供給的法則，觀察商品的貴賤。需要少于供給則貴，於是商人必爭販此物而來，於是貴的又賤了。貴極則賤，相反亦然。越的政策則使商品流通迅速，貨幣一滯，以為蓄積。蓄積的方法是商品價賤，則收買有如珠玉；商品價昂，則脫賣有如糞土。賤買貴賣，不停一瞬，於是利潤便到了手。越以所得利潤，雇用戰士，以致戰勝強吳，稱霸中國。

（未完）

最近各派思潮編輯啟事

最近各派思潮頗為複雜，青年學子每苦於目迷五色，不易辨認。作者歷年奔走革命，久認大學教授，經驗學識俱極豐富，本其心得，著成是書，共分六章，都二十萬言，純本科學方法，根據客觀事實，分析說明，均甚明悉誠青年求學之南針，學者處世之密寶苟能人手一編，何異讀破萬卷，定價低廉，不日出書印刷無多，勿失交臂！要目列後：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社會民主黨

第三章 第三黨

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

第五章 中國青年黨

第六章 結論

定價一元，預約五角，歐美加兩倍。郵費在內，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預約處：北平東安市場丹桂商場內華盛書局，岐山書社。鼓樓通俗教育館何一鳴。西單商場學聯合作社，毓華書社，絨線胡同震東書館。琉璃場西北書局

對抗第五期目錄

時事論評

內戰之不可再起

國聯調查團的結論與東北國際共管

英國閉關與保護關稅政策

由貿易上觀察日本積極備戰

對閉東北海關之意義與影響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批評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與國際展望

關於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批判

我們應該怎樣紀念「國慶」

紀念二十一年國慶日的感想

二十一年來的「雙十」

雙十節的吶喊

國慶中國應有的努力

血的信號

由去年的國慶日到今年的國慶日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

雙十節的隱痛

今年雙十節的認識

傷心慘目的一篇流水賬

紀念國慶應有的認識

紀念雙十節感歌

紀念雙十節感歌

一 鳴 廣 庸 何 原 火 興 方 興 方 興 廣 興 星 可 西 農 西 農 吳 永 樂 夫 僕 敏 茨 風 瀾 趙 善 慶 滂 若 楊 大 荒 威 遠 佳 谷 彩 岑 彩 岑

中國革命的經濟政策

徐 鼎

第一 導論

(一)

目前中國的革命，已陷在極大的危機中，國外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封建勢力的復興，以及由於飢荒所釀成的共產黨暴亂，都已到了極點；而在革命的本身，則經濟破產，民生凋敝，黨國破碎，革命力量渙散。這一切，都是鐵的事實，我們無法否認。在這革命遇到了危機的情勢下，我們將用什麼方法挽救革命呢？社會的事實是早已決定了我們的行動了，挽救革命的方法，第一是確立真正黨治的基礎，恢復革命的常態，第二是決定切實的經濟政策，發展社會經濟，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務。本篇所要討論的，便是關於後者經濟政策的問題。

決定和實行革命的經濟政策，這在革命是根本重要的任務。革命在未取得政權以前，所謂經濟政策只還是一個口頭宣傳的理論，待取得政權以後，必須立即把這理論轉變成行動。國民黨在孫中山存在的當時，在幾次北伐的時候，關於經濟方面的宣傳，都叫得震天價響。但等到民國十六年政權到了手裏——因為國民黨革命的領導權縱從共產黨篡竊的手中奪回來，又因為黨的分裂黨的腐化，致使過去所宣傳號召的經濟政策絲毫都未實現，於是民生問題不得解決，民生主義不得實現，國民黨革命在民衆方面失掉了信用，湘鄂贛豫皖等十幾省的共產黨得到機會建樹起勢力來了，過去政府的軍事劇劇，事實上也並沒有見到如何的勝利。

單憑軍事的手段去希望剿滅共產黨，那是不易成功的

。從解決經濟問題解決失業問題方面着手，那解決共產黨是很容易的。民生主義一實現，共產黨憑有天花亂墜的理論，有進步的新式的紅軍，也決不能促起中國民衆的暴動。如果民生主義不實現，民衆的痛苦不能解決，那末不論共產黨的理論怎樣幼稚，共產黨的軍兵怎樣惡劣，共產黨的勢力也自然會形成起來，那些在三民主義下掙扎而仍舊不能得到生路的民衆，都很輕易的成爲共產黨了。自國共分裂後，大家都感覺到對共產黨的專事剿殺是錯誤的。我們如把共產黨生長的根本原因解除了，那末共產黨不等我們去殺戮，也是要絕跡的。

共產黨生長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衰落民生凋敝，解決這根本原因的方法當然是發展經濟，繁榮民生。要發展經濟，繁榮民生，在目前這中國的情勢下，唯一的方法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除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外，非但整個的國民黨得不到出路，就是整個的中國革命，整個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都得不到出路。

孫中山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同時也是反對資本主義的，他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實實在在是限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的實現民生主義的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我們如不是喪心病狂，或是瞎了眼睛，決不會承認『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

(二)

講到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有很多人提倡過，但都只把牠當做口頭上宣傳的理論，一到行動的時候，便連國家資本這個名詞都忘記了。過去改組派也有一個時期主

張過國家資本主義。可是一遇到陳公博騙到實業部長，便大聲喊着「走向資本主義之路」，把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丟在毛廁裏了。

我們不要看見陳公博等人的背棄國家資本主義、便以為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不能實行，事實上只是陳公博這位要人，並沒有真正把握着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容，不過口頭上借此號召，暫時騙騙民衆以攬得地位，一到逼近行動，到了台上要實行的時候，便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把得意敘述的國家資本主義藏拙不提了。陳公博不相信自己是個空虛的經濟學者，祇會炫耀名詞，大着膽去做實業部長；做了實業部長，他得意的「大作」第一部是發行公債五千萬，第二部是籌借外債千萬，第三部是提撥庚款×千萬，陳公博這樣的東借債，西借債，以為這樣就算是籌設發展國家經濟的資本，就算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就算是實行民生主義了。其實真可憐，陳公博這個「空子」能否借得到錢做國家的資本是第一問題，借到了錢能否真用在發展實業上是第二個問題，這幾千萬幾千萬的小數目是否真正有力發展中國產業是第三個問題。陳公博的實業計劃既蘊藏着這樣多的問題，還說什麼國家資本主義，還說什麼民生主義呢？陳公博在南京實業部的作爲，老老實實便是沒落的資本主義者的作爲，一個起碼的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手段還比陳部長高明得許多，一個起碼的企業家還能自由借債，除了向債主說好話外，不必仰軍閥的鼻息，並且多少也能夠使他的事業實現一部分，或全部分，陳公博這個空頭的資本主義的實業計劃却毫無實現的可能。如說陳公博的計劃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實業計劃，是民生主義等實業計劃，那就「天曉得」了，陳公博沒有把握到發展

國家資本的內容，也沒有解決全國失業問題的決心，這樣空虛無力的計劃（號召了半年多的五年實業計劃，至今還在爪哇國裏，也許陳部長說這話是騙人的，再等半年也恐怕不會拿出計劃來。恕我不能久等，根據着南京實業部的行動和陳部長的零星談話，估定他的全部計劃了。）既沒有一點國家資本主義的氣味，也沒有一點民生主義的影子啊！

(三)

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孫中山早在民國元年的「救亡策」——「錢幣革命論」——的初期著作中已經顯現了端倪，後來的民生主義的演講稿和節制資本及平均地權的經濟政策，則更確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基礎。孫中山不滿意資本主義，但同時又反對共產主義，就必然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上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一直等到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纔在蘇俄革命的導師列寧的口中特別嚴重而有意義地叫了出來。

國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唯一必經的路線，不單是生產落後如中國和蘇俄那樣的國家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階段，就是歐美產業發達的國家恐怕也不能跳過這個階段，而一脚跨上社會主義的社會呢。所以中國人不必存着恐怖的心理說國家資本主義是第三國際共產的辦法，儘可依着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既成路線放膽走去。同時國家資本主義是孫中山早已建立下了的經濟基礎，共產黨的也不必擔憂在三民主義政權下不能實現國家資本主義。革命是爲着全中國的民衆求生存，是爲着全世界的人類求出路，並不是爲着共產黨，也不是爲着國民黨，列寧在提倡

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既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以求國內經濟的穩定和發展，那末爲什麼共產黨員還要緊守着馬克斯的半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死路呢。

爲全世界人類的利益，服從真理，並且擁護和執行真理，那纔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那纔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者。如若堅執先入之見，迷信着一個非真理的思想，結果必走上個人主義的末路。試想，革命而不能服從真理，不能忠實於全國民衆和世界人類的利益，而至死不悟的忠實於一個黨，迷信着一個半空想的馬克斯主義的思想，我們雖不敢冒昧說這樣的人仍舊沒有脫掉個人主義的劣根性，但可以大膽說這樣的人乃是愚蠢的宗教的信徒，絕不是一個革命的信徒。

孫中山既首先在錢幣革命和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政策中立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列寧在晚年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代，則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服從國家資本主義，那末國家資本主義是建設社會主義必經的階段，是社會革命的唯一真理，毫無疑義了。又列寧常說蘇俄社會主義革命的是否能成功，這與佔世界人口絕對多數的中國革命和印度革命有極大的關係，蘇俄必須時刻注意和幫助中國及印度的革命。中國與印度，同處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地位上，中國與印度，如欲脫出帝國主義的經濟囚籠，如希望反帝的革命成功，便必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蘇俄如希望中國革命印度革命成功，如希望世界革命勝利，便必須中國革命的勝利。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以來，蘇俄一心扶助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這實在是幼稚的錯誤的策略，數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把中國中節富庶之區的

農村社會都市社會的秩序完全擾亂了，食糧和茶紙等的生產完全停頓了。過去中國的食糧和茶葉可以大批出口，現在中國却已成爲帝國主義在銷售食糧的主要市場，這不是承共產黨世界革命的饋賜嗎？幫助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擴展市場，削弱中國在經濟上反帝的力量，這那裏是幫助中國革命，促進世界革命，老實是在開倒車，破壞世界革命罷了。

中國與蘇俄，實在是世界革命過程中兩個唇齒相依的盟友，並且，孫中山和列寧兩個領袖一個是中國革命的導師，一個是蘇俄革命的導師，這兩個導師在國家資本主義方面的主張既完全相同，那末凡是孫中山和列寧的信徒，都應該擁護兩執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若懷着徇私的見識，懷疑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性，致使世界革命延緩下來，這樣的人飛但不配做孫中山和列寧的信徒，事實上這些挂羊頭賣狗肉的販子，倒是孫中山和列寧的叛徒呢。我們知道，孫中山列寧是一時一刻都系念着世界革命的利益的，所以當初蘇俄與中國的攜手，以及共產黨的加入國民黨革命，這都是孫中山列寧在佈置世界革命的行程上所應有的表現，待列寧孫中山兩大導師相繼棄世，由于中國共產黨的背叛革命，不幸把革命的聯合戰線撕破，共產黨更變本加厲的亂動，盲動，國民黨也不實行孫先生的主義而向後轉了，至使革命流產，失敗，現在我們應當盡所有的力量，努力促成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使中國能在經濟上形成反抗帝國主義的努力。中國只要在經濟上有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那末此外的政治侵略和軍事侵略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成功，就是中國的革命成功，在中國革命，成功的時候，世界革命的問題就已經解決了大

半了。所以中國的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論蘇俄，不論第三國際，不論在中國的共產黨，假如他們正確是列寧主義者，正確是社會主義者，便都須積極起來幫助。否則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實際社會所需要，第三國際共產黨縱使下了絕大的決心從中破壞和搗亂，結果也徒勞無功。

(四)

記得孫中山曾說過，國民黨第一步工作是推倒滿清皇朝，第二步便是剷除曹吳等軍閥。辛亥革命，滿清已被推倒了，十六年北伐，曹吳等軍閥也已經剷除了。現在要實行第三步工作，這便是繁榮社會經濟，發展國內生產力，施行國家資本主義，實行民生主義，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4)

革命在取消政權以前，牠當前的任務是圍攻敵人，推倒統治階級，既取得政權以後，牠當前的任務便是解決社會經濟問題，實行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在過去，在未取得政權以前不過是口頭號召的理論，現在國民黨已取得政權，那末過去所口頭號召的民生主義的理論，必須開始轉變為手頭實施的行動了。革命如單憑口去鼓吹而不用手去實行，這就成了革命騙子。假如張宗昌吳佩孚等肯不顧人格，願意犧牲他們誠信的舊道德，也只要昧着良心抄襲幾句孫中山馬克斯的理論，他們也可以做一等一的革命家，說不定比汪精衛陳公博等的革命還要漂亮些。

國民黨現在已經握得中國的政權了，那末國民黨必須立即開始經濟建設了。革命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革命的需要奪取政權是爲了經濟問題，因爲必須取得政權以後，革命黨人纔有力量實踐革命的經濟政策。沒有政權在手，任何漂亮的經濟政策都只是畫餅充飢，不能成爲事實。

握得了政權的國民黨，牠的當前任務，當然就是實施孫中山所決定的經濟政策，實施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實施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一切漂亮的軍事計劃政治計劃教育計劃都可放下不提，然而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是不能不急求實行的。全國民衆在飢荒內亂與帝國主義之侵略下，都已生命懸諸旦夕，急於要求得一份養命的口糧，革命的要人們却儘高坐着暢談軍事，政治，教育，這是怎樣的迂腐呢。我們並能主張革命不需要談軍事政治教育，但在事情的緩急上考慮，我們就不得不把一切問題都放下，將所有力量集中在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上。

(五)

中國革命自十六北伐勝利，皇帝軍閥這兩個大敵都消除了，現在第三個敵人便是「飢荒」。國民黨從來對於皇帝，對於軍閥，都是舉國一致，拚死進攻的，但對於「飢荒」却不能一致進攻，這實是嚴重的錯誤。我們應該知道飢荒對於革命的危殆，實在比軍閥比皇帝要嚴重，軍閥和皇帝已經失去時代性和社會性，遲早要死亡，飢荒則有一定的規律性，從社會最下層多數的民衆中生長出來，力量極端偉大，而且充滿着爆裂性，牠能夠摧毀革命的基礎，牠能夠使革命功敗垂成。目前共產黨的不可消滅，致使整個的中國混亂鼎沸，無法自拔，便是建築在這飢荒的基礎上的。

蘇俄革命爲着撲滅飢荒，列寧「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要全國一致實行新經濟政策。蘇俄因爲有列寧的指導，全國一致的向飢荒進攻，拚命實行五年經濟計劃，於是蘇俄現在的社會纔能穩定繁榮起來，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都比不上了。全世界都爲飢荒這個惡魔蹂躪着，黃金國家的

美國尙且有失業人口千萬，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就更不必提，可是蘇俄恰恰相反，大革命後幾千萬的失業人口都已有了職業，連體力薄弱的女子也都有職業了。

(5) 蘇俄革命，因為是走的馬克斯的不完全的路線，中途遇到飢荒，逼得要「犧牲主義」以實行新經濟政策。何況在中國，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用民生主義的方法去撲滅飢荒，是孫中山早已規定了的路線呢。民族主義叫我們去打倒滿清皇帝，打倒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叫我們去打倒獨裁，最後的民生主義則很明白的叫我們去打倒飢荒。而且孫中山又親自規定了打倒飢荒的方法，從錢幣革命論（下文尙須說明）起，到實業計劃，以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這都是孫中山一貫的打倒飢荒的路線。我們既一致自承為中山主義者，矢志要完成中國革命，那末我們對於孫中山的完善正確的主張應如何堅決執行呢。

革命總走到半途，同志們便就把革根本重要的任務忘掉，把民生問題棄置不顧，惟個人權位是爭，各執着半截槍桿子互相毆殺，這痛心的現象，我們不敢罵誰是孫中山的叛徒，批判誰是反革命誰是不革命，但我們可以正確明瞭的斷定，歷史的車輪將要把這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在輾為碎粉了。

第二 銀行政策

(一)

中國要消滅飢荒，解決民生問題，只有從發展生產，解決普遍的失業現象着手。但講到發展生產，當前最困難的問題便是資本，沒有資本是什麼事都不能做的。

在社會經濟落後的時代，資本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有了勞力，土地，原料，便是可以從事生產。但自從社會

脫離了封建經濟制度，脫離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後，這個資本二字所代表的便不是勞力土地原料，而是貨幣了。現在人們談起缺少資本的話，便是指缺少貨幣，決不是指缺少勞力，土地，也不是缺少原料。

現在的中國，生產落後萬分了，可是說到勞力土地原料的話，却還是很豐富。四萬萬的人口，有一萬萬以上的人在賦閒着，那就是中國現在有一萬萬以上的勞力在廢置着。至於土地，則至少有數百萬數十萬方里的土地在荒廢着。原料則中國處在溫帶和鄰近熱帶上，植物多，鑛藏亦多，原料真是豐富得很。中國既有這樣多的勞力，土地，原料，閒置着，那末為什麼還說發展生產沒有資本呢。這中間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沒有貨幣去聯絡他們，不能使他們互相發生關係，於是雖有着衆多的勞力，廣大的土地，豐富的原料，但終不能從事生產。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有這許多勞力土地原料的生產條件，但因為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於是生產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發展了。

貨幣本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是應着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的勞動的分工」完成了堅強的基础，社會開始走入商品經濟制度，便必然有貨幣出現。從古代物物交換起，到現代嚴密的金融制度止，這中間，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貨幣變遷的歷史。人類最早的貨幣是龜貝獸皮以及其他各種金屬器具，其次是各種鑄成定型的金屬物，最後則有紙幣出現。我們如欲把貨幣的歷史劃分出階段來，那末可指龜貝獸皮以及金屬器具為自然物貨幣時代，各種鑄成定型的金屬物為鑄金貨幣時代，紙幣流通為信託貨幣時代。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社會上有了這個紐帶在作用着，於是社會的生產與消費能平衡發展，社會的經濟

組織總能順利地進步。在自然物貨幣時代，每一個經濟組織祇狹小地限於一個部落或一個地域，水澤的捕魚部落以龜貝為經濟紐帶，高原的獸獵部落以獸皮為經濟紐帶，這些部落中的勞動，因為有龜貝獸皮的流通作用存在，分工便漸漸精密，而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也得進步了。不過以自然物為貨幣的時代，貨幣的交換價值寄存于貨幣的自身，很少為的拘束。待人類的政治組織到相當完備的時代，人們覺得自然物貨幣的流通諸多不便，便有鑄金貨幣出現。鑄金貨幣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比較自然物貨幣時代的社會經濟組織，範圍當然擴大得多了。在某一種政治勢力所達到的地方，某一種鑄金貨幣便也流通到這個地方；不論地域有若何阻隔，生活有若何的差異，在一個政治勢力統治之下的地方，總是流通著一種貨幣。

鑄金貨幣流通了一個長時期後，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力已極度發展，消費力也增高了，另一方面則人類經濟組織的範圍擴大，由一個國家以內擴大到國家以外；貨幣需要的數量激增起來，但自然界所能供給的金屬物質都極有限，於是根據信用的原理，而有紙幣出現了。紙幣只是一張紙，牠底本身毫無一點價值，牠比不上一塊金子，比不上一塊銀子，甚至也比不上一張獸皮，一個貝殼，但因為信用的關係，這印着花紋的紙頭却可以在市場上兌換貨物。以紙幣為社會的經濟紐帶，那便是信用貨幣時代了。

貨幣由自然物貨幣進展為鑄金貨幣，更由鑄金貨幣進展為信貨幣，這些變遷都是隨着社會的需要而出現的，並沒有什麼上帝在暗中主持，也沒有什麼鬼神在其間播弄。倒是人類為不能隨着社會的需要把經濟紐帶——貨幣——時時改變以求適應，人類的經濟反要發生混亂的現象呢。自

從「產業革命」以後，機器的生產工具出現，「社會的勞動的分工」日趨精密，生產力突飛猛進，商品經濟張開血盆大口把整的個地球都吞下了，於是鑄金貨幣這個經濟紐帶因受物質的限制，再也維持不下這廣漠無邊的市場，鑄金貨幣不足以供需要，便走上信用貨幣制度，以紙幣為流通工具了。可是現代紙幣的信用建築在現金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築在物品的基礎上，因之社會的商品總價值與貨幣總價值相差過於懸殊的時候，信用恐慌就不免的出現，經濟秩序就要發生混亂了。現在世界各國大都以金為主幣，各國的商品當然都以金價計算，商品在各國是日夜不息地在趕造出來，但金鑛的開採却很少；這樣，商品的產量很快的上升到一百一千以至於一萬的數量，而金子的產量則始終徘徊在一百的數量上，這樣數量相差懸殊的金子，大家還硬把當作流通商品的經濟紐帶，還會不發生恐慌或混亂嗎？一尺長的紗帶去圍二尺粗的物體，紗帶當免於斷裂，何況以一寸的金子紐帶去約束一丈以上的商品，這紐帶會不斷裂而現出恐慌來嗎？

在「這資本主義第三期」的世界，要免除恐慌，只有澈底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依着社會經濟的需要，以商品（黃金和白銀也作為商品）作保證發行充分的紙幣，俾貨幣與經濟紐帶能夠發生充分的作用。否則就使蘇俄在五年或十年以後，也仍要鬧着激烈的經濟恐慌呢。

作者因說到「中國有這許多勞力土地原料的生產條件，但因為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於是生產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發展了，」便把貨幣的原理冗長地敘述了一下，現在可以把話頭拉回來了。中國既有勞力，有土地，有原料，生產條件可說完全俱備了，但為什麼還鬧着經濟衰落

，物質不足的飢荒呢？說中國「沒有貨幣這個經濟紐帶」，那實在是冤枉，中國不是同樣流通着貨幣，不是同樣使用着貨幣嗎？「經濟紐帶」是有的，不過太脆弱，太微細，對於社會經濟的作用太不充分罷了。

中國貨幣在制度上既沒有統一，「兩」與「文」並用，「大洋」「小洋」「銅元」早晚市價各有上落；在地域上則更不統一，北方有老頭票，南方有香港票，老頭票和香港票都比中國票通行；雲南的貨幣制與四川不同四川與廣東不同，廣東與上海又不同，西藏蒙古則簡直不要說起，幣制紛亂到這般田地，我們憤慨地說中國沒有貨幣也可以。前面說過了，貨幣是社會經濟的紐帶，是發展生產的要素，中國要解決社會經濟，要發展生產，第一步必先解決貨幣問題。貨幣問題，中國早已有很多人注意了，但因認的模糊。誰拿不出具體實行的辦法，改「兩歸元」咧，「金本位」咧，「萬國複本位」咧，鬧得烏煙瘴氣眼花撩亂，可是這始終是鬧鬧而已。任憑馮碩初李權時口齒靈利，筆頭生花，但理論是理論，事實還是事實。南京國民政府爲了幣制問題，還特別聘請了幾個外國顧問，但外國顧問也沒有三頭六臂，貨幣問題仍是解決不了。

孫中山在「錢幣革命」中說：

錢幣之革命者何？現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爲我國今日必較昔日窮乏，其實不然，我之財力如故，而出產有加，其所以成此窮困之現像者，錢幣之不足也。錢幣如何，不過交易之中準，而貨財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商業發達之國，財貨溢於金銀之千萬倍，多以紙票代之矣。然則紙票者，將必盡奪金銀之用而爲未來之錢幣，如金銀之奪往昔布帛刀貝之用而爲錢幣也。此天然之進化，勢所

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進行，是謂之革命，此錢幣革命之理也。其法如何？即以國家法令所制定紙幣爲錢幣，而悉貶金銀爲貨物，國家收支，市廛交易，悉用紙幣，嚴禁金銀。其現作錢幣之金銀，祇准向紙幣發行局兌換紙幣，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則紙幣一出，必立得暢行無滯，財用可通矣。」

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孫中山解決貨幣問題的方法，他沒有斤斤於「元」「兩」之爭「本位」之爭，直捷痛快的就是主張打消鑄金貨幣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一切元兩問題，本位問題，都只是皮相的爭論，只有徹底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纔是根本的解決方法。

劉有莘在中央半月刊第十六十七兩期發表「革命與幣制」一文，劉氏說：

「如果我們要想根本改革現行貨幣制，第一要使用一種永遠不變物質生產量的支配的東西，來做真正交易中準的貨幣本位，將現存的制度一律廢除，第二，是要把交通運輸大宗生產分配和消費及調劑需要與供給的事件，都給國家去管理指導或支配，要是這樣，纔有辦法，纔使幣制合乎幣制原理與國民經濟的要求。」劉氏第一的主張是明顯地主張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二的主張則是明顯地主張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因爲不實行信用貨幣制度，幣制便不能「不受物質生產量的支配」，不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健全的信用貨幣制度便無從開始，無從成立。同時不實行信用貨幣制度國家資本主義也只是「一個空名詞」，因爲資本既無從調集，那末國家發展生產的話不是「紙上談兵」嗎？

對於一個新制度的產生，我們絕不能認爲是一紙命令或幾句空談所能成功。尤其貨幣問題是經濟方面的任務，完全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上，決非政治權力所可一手包辦，更非單純的政治權力所能獨力支配。貨幣是經濟方面的東西，經濟方面東西自然非用經濟的權力去支配不可。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貨幣，社會徒然惹起紛擾，結果一無所成。雖然貨幣是政治性的經濟產物，但我們相信在政治未握充分的經濟權力以前，政治萬萬沒有權力去干涉或支配經濟。中國幣制的紛亂和幼稚是有目共睹老幼咸知的事實，南京政府對此也未嘗不想改革，但終以南京政府的經濟權力太薄弱，雖欲加以支配，干涉，改革，而事實上不能啊？

既不能直接用政治權力去支配而改革貨幣制度，那末用什麼方法去實現信用貨幣制度呢？關於這個，我們仍得從貨幣本身的歷史和中國的經濟現狀去檢討。最初的貨幣只用交換工具，在原始經濟時代，在封建經濟時代，貨幣唯一重要的作用是作交換工具，作爲調劑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紐帶，待轉入商品經濟時代，轉入現代的金融經濟時代，則貨幣兼任做生產資本了。在前一時期，貨幣只是消費資本，在後一時期，貨幣兼作生產資本了。社會經濟愈進步，社會的財富愈增高，貨幣的任務便愈擴大，其數量的需要也愈膨漲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超過貨幣價值幾十倍以至幾千百倍以上，社會感覺貨幣的缺乏，經濟不便流通，便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信用制度；如借貸，抵押，賒欠，期票等等，這些信用制度都是因爲貨幣不足而出現的。隨着信用制度的出現，社會便跟着成立了許多特殊的經濟機關如當舖，錢莊，銀行等類。當舖，錢莊銀行不是生產機

關，也不是商品運輸或分配機關，更不是什麼國家的政治機關或教育機關；而是一種調劑金融的信用機關。我們如說國家的政府組織是政治權力所寄託的機關，那末這些當舖錢莊銀行的信用組織便是經濟權力所寄託的機關了。剛纔說政治權力不能直接干涉改革幣制，現在發現了這些有經濟權力的信用機關，對於解決貨幣問題有了線索了。

當舖是農工商人的信用機關，錢莊是中小資本家及地主的信用機關，銀行則是大資本家及金融資本家的信用機關，中國這三種信用機關，錢莊銀行處於互相抗衡的地位，當舖只是一種從屬的信用機關而已。當舖對下雖有力量各自去支配一部分農工小商人，但在整個的經濟權力上講，則當舖的權力仍是很微弱，必須依附於銀行或錢莊。

中國的銀行制度現在還很幼稚，雖有政治上及經營上的各種便利，如特許發行紙幣經營債券等等。但終因客觀條件的經營業落後和其主觀條件的組織不普及與資力薄弱的關係，還未能形成巨大的經濟權力。在國際間不能和各國銀行競爭，在國內也不能和錢莊銀號競爭，在生產上更說不到什麼集中管理或支配的託了。本來行的基礎完全建築在信用制度上，銀行離開信用便一天都不能立足，非馬上倒閉不可。可是中國的信用制度並沒有完全爲銀行所利用，第一因爲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外商運用可怕的鉅大的資本在中國開設銀行，一方面吸收了多量的存款，一方面又發出多量的外國鈔票，差不多把中國的信用制度利用了十分之五以上；第二因爲國內經濟的封建勢力的殘留，高利貸的錢莊當舖仍佔優勢；第三因爲政治混亂，軍閥橫行，產業衰落，交通阻塞，銀行事業更隨步遇着障礙；所以現在中國的銀行所能運用的信用力量，非但不到十分之一，

也許還不到百分之一呢。中國的銀行如能夠充分地運用信用的力量，那末牠的經濟權力毫無問題的可以統御全國，並在國際間佔得重要的地位。

要改革貨幣制度，必須有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有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那末由這個機關去實行改革的計劃，國家制貨幣的法律從旁用政治權力去幫助，改革幣制便很容易實現了。中國現在這樣的經濟權力的機關還沒有，錢莊當舖是行將沒落的東西，銀行則很幼稚，如要創這樣的統一而強大的經濟權力機關，並且要這機關將來不違背民衆的利益而常常受着國家和民意的支配，須從整理現存各銀行及各信用機關入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統一政策；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

C 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

D 銀行集中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支配機關，實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

上述四項，都是實行銀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骨幹，缺少了任何一項，銀行就不能成爲社會的經濟權力的機關，就不能充分的調劑金融發展生產了。現在再逐項加以補充，說明於下：

A 「用科學的合理化方法，在政府管理監督之下，實行銀行統一政策。」調劑金融，這原是關係整個社會利害的事業，像交通事業的郵電鐵路一樣，照理是應由國家專營的。但因為習慣的關係，現在各國除蘇俄外銀行都許人民私營，中國是產業後起的國家，對於銀行由私人經營的

事當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銀行由私人經營，有兩個最大弊病：第一，私人經營的目的專於謀利，很少適應社會的需要；第二私人經營必然造成多頭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同一事業分割着許多機關（上海有銀行錢莊二百家）去執行，徒然多費開支。一九三〇年世界經濟恐慌出現，美國銀行動不起打擊而倒閉的約有二千餘家。上海近年來頗盛行銀行熱，銀行公司風起雲湧的成立起來，這投機潮遲早總要引起大紛亂。爲銀行本身的前途打算，爲中國的社會經濟打算，中國的銀行必須實行合理化，歸併各錢莊銀號銀公司及銀行爲一個大銀行，實行銀行統一組織，成立一個總行，這大銀行便作爲國家銀行，將現有各銀行各銀號一律作爲國家銀行的分行。國家銀行除規定由國家撥入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股本外，其餘均由人民投資，但銀行業務所得的純益，須以國家爲主體，人民的股份除支付官息外，紅利規定以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爲限，多餘的純利即作爲國家的收入或擴充爲國家在銀行中的股本，或公債金。國家銀行的董事十分之二或三由政府委銀行專家及經濟學專家充任外，其餘當然由股東會選出。中國成立統一的國家銀行，如按照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需要，其股本至少須五十萬萬元，五十萬萬元的股本或有人驚爲太大，擔憂集合不起來，其實中國雖窮，祇歸併各銀行莊號的股本，也許已經過此數了。中國有此雄厚資力，對內既可充分的力量調劑金融發展生產，對外也可以免強和帝國主義的金融勢力抗禦了。

B 「設立普遍全國的銀行網。」——銀行是調劑社會經濟的金融機關，牠的工作是便利人類的經濟生活，那末爲社會人羣的福利計，爲銀行業務的發展計，銀行必須隨

着人類足跡所達到的地方設立分事務所。中國在目前，因為政治混亂關係，銀行幾乎完全集中在上海天津廣州這幾個地方，此外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省簡直就和外國或荒島一樣，壹個銀行都沒有。試想，銀行是經濟的中心機關，沒有銀行的地方，產業會發達嗎？英國是資本主義較老的國家，英國銀行的分行數目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現在當然更多了。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多幾十倍，中國土地也大幾十倍，那末分行的數目至少也要和美國相等。中國有二千多縣城，加上各種重要市鎮及通商口岸，國家銀行設立銀行網，成立五千個分行實是最低限度的數目。中國現在內地人口過庶，急欲移民邊疆，各地的銀行網就是更為重要。因為資本的足跡所到的地方，人口總是隨着涌過去的。淺見的銀行家常以為荒疆無利可圖，殊不知把荒疆變成熟土，獲利纔真大得無可計算。香港是個人煙絕跡的荒島，但英帝國主義把香港開闢成熟土，把香港變成繁華的市場，誰能計算得清，英國人在香港所得的利息呢？銀行在人口庶密的地方所獲得的只是蠅頭微利，在鉅荒絕域的地方纔能獲得無限的寶藏。所以中國國家銀行不設立銀行網則已，如欲設立銀行網，設立邊疆的分行，是不可忽略的。又全國設立五千個分行驟然看去似乎驚其太多而不易成功，但事實上把各地錢莊歸併起來，決當超過此數，國家銀行除添設若干邊疆的分行外，在內地只要把各錢莊銀號改造一下就好了。

C「確立信用制度，實行信用貨幣制度。」——銀行的基礎是信用，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調劑金融，發達生產，作支付的中人，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貨幣資本，把不活動的生產條件（勞力，土地，原料，）變為有價值

的東西，不生產的東西變為生產的東西。銀行的機能是很偉大的，但視我們巧妙地運用而已。中國號稱窮乏之國家，國富總數三八二八九百萬元，每人平均不到百元，是世界上最枯窘的國家，連英國的殖民地印度（一三八元）都比不上。如能確立信用制度，使國家銀行得盡量發揮其機能，國民經濟得盡量發展，那末不要幾年，中國的國富一定能上升幾倍。中國確立信用制度的辦法，在國家方面是清理債券，確定預算，劃一稅制，在人民方面是消滅高利貸，國家銀行設立普遍的低利的常備，厲行生產合作消費合作。不過，確立信用制度要算在於國家銀行，國家銀行根本的信用的機能又在發行紙幣。中國要驟然完全用紙幣去流通市面，取締一切的現金，驟然實行信用貨幣制度，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國家銀行要實行信用貨幣制度，第一步是確立十進位（照數學原理，則十二進位就更好。分角元一孫）的貨幣，取消「兩」及其他小洋銅元等雜幣的流通；這事件的實行是一方面由國家制定公佈幣制的法律，銀行則依社會的需要發行一分的銅幣一角一元的銀幣一「孫」五「孫」十「孫」的金幣和五分一角五角一元五元一「孫」五「孫」及十「孫」的紙幣。金銀銅幣及紙幣的印造當然由銀行自己去執行，政府和人民祇有監督的權限。幣制統一以後，待社會行使便利而發生了信用，那時再由國家改訂貨幣的法律，取消金屬貨幣，行使幣紙，而實行信用貨幣制度，便輕而易舉了。

D「銀行集中管理並監督交通運輸生產及分配機關，執行國家在社會經濟及發展生產方面的任務，並助理國家的財政事業及公共事業。」——社會是由兩種組織的交互錯綜而構成成功的，一種是政治組織，一種是經濟組織，

前者如教育機關倫理機關公安機關而國家爲其總樞紐，後者如生產機關運輸機關分配機關而銀行爲其總樞紐。政治組織是着重於人類精神生活方面的組織，經濟組織則是着重於人類物質生活方面的組織，社會的這兩個組織是交相爲用，並行不背的。國家的組織須有政治基礎，同時也須有經濟基礎，但歷來的國家都有一種錯誤傾向，就是專重政治而把經濟忽略了。作社會運動的人類憤於人類物質生活的沒有保障，遷怒於國家，無政府主義在根本主張不要國家，共產主義者則主張國家逐漸衰落而死亡，其實這都錯誤了，人類的經濟組織政治組織只有愈趨愈嚴密，而國家的基礎也是愈趨愈鞏固的，除非地球消滅了，國家的組織纔不得不消滅。中國革命無疑義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那末中國的國家無疑義的便須兼負起社會經濟方面的任務。中國現在的政府驟然要管理社會的經濟組織，顯然不可能，如同政治權力去強行干涉經濟事務，徒然惹起騷擾，無補於事，但用銀行去管理經濟事務，用銀行去管理各種經濟機關，那却是便簡捷的道路。一切經濟事務都需要資本，銀行正是資本的淵源，一切經濟機關逃不了金融的支配，銀行正是金融的中心機關，銀行自有歷史以來，就無時不站在管理並監督社會經濟組織的地位上。更明顯的例子，則是歐美各金融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並沒有授與銀行管理社會經濟機關的權力，但事實上少數銀行巨頭已經利用其金融勢力支配着全國的生產機關了。銀行的管理社會經濟組織，就和國家的管理社會政治組織一樣，已成爲不可逃避的事實，同時，銀行與生產也是相依爲命的，銀行離了生產便不能發揮機能，便不能生存，生產沒有銀行，便不能發展，便不能進步，中國是產業最落後的國家，要想

把中國從大飢荒中救出來，自然利用銀行這個偉大的機關去發展生產不可。

近年來中國於天災人禍，產業衰落到極點，各地都在鬧着大飢荒，於是很多的先生們羨慕蘇俄的新經濟政策，亂紛紛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六年計劃以至於十年計劃，簡直充滿耳鼓，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可是沒有資本，這些計劃都成了畫餅充飢，紙上談兵。又有些人抄襲了孫中山經濟主張的半段尾巴——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要大借外債來發展生產。可是這夢想的不能實現，就如天上美麗的繁星不能移植到地上來一樣，永遠是個夢想，永遠救不得中國！

第三 交通政策

(一)

社會上一切的文化與經濟的流通，都靠着有各類交通機關。交通機關的對於社會，就如筋絡的對於人的身體一樣，筋絡發生阻礙，血液便不能暢流，人體便不能強健，交通有了缺點，文化與經濟便不能順利流通，社會便不能發達了。現代的社會，一切都離不了組織，在組織的原理上講，離了交通就談不到組織了。離了交通，社會的一切將都成爲絕緣體，人與人以及集團與集團之間不論在文化上在經濟上不能互相溝通，一切的社會組織都將土崩瓦解，結果社會只有死亡而已。

要強壯一個人的身體，必須從鍛鍊筋絡做起，要發展一個社會，必先從發展交通做起，否則所謂強壯身體，所謂發展社會，都只是一句空話。尤其是在社會的經濟組織方面，沒有健全的交通機關，產業的發展便會受着意外的損失和障礙，使生產與消費之間不能發生調劑平衡的作用

。雲南和東三省邊境等地方，至今尚有因無法消納而把糧食焚燬或當作肥料的事情，可是另外却有因災荒而食糧斷絕無法購買，整千整萬的人民坐待餓斃，凡這種怪異而慘酷的現象，在交通便利的國家所沒有的現象，在中國則因為交通腐敗的緣故，已成爲習見的平常的故事。

交通的腐敗和幼稚，實在是中國經濟衰落不能進步的大原因。中國要發展生產，其第一個問題必須解決的是資本問題，可是有了資本，而沒有便利的交通機關去供給運輸消納商品，生產仍舊不能發展的。中國號稱窮乏的國家，然仍有大批游資彙集上海，銀價低落，而洋釐則更低落，這實在是交通阻滯，產業難於發展的徵象啊！歷年的內戰除直接摧燬了許多產業外，對於交通方面鐵路及江河航輪的損失更難於計算。平漢津浦等路除內戰所燬傷外，當有一千數百餘輛的機客貨車被張學良劫奪出關，現在則爲日本南滿鐵道所有了。國民政府成立六七年，未能興築什麼交通幹線，舊有幹線反在任其腐敗燬壞，產業焉得不衰落呢？

(12)

(二) 發展交通，非但與文化與經濟有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國防上，關係也是十分重大的。九一八日本侵佔東三省，國人都知奮起力爭，政府在人民的呼號與督促之下，也不得不勉強在外交上做一點，敷衍民氣的工作。可是我們如能平心靜氣仔細想一下，則在九一八事件東三省被佔以前還喪失了兩處重要的領土，一是外蒙古，一是西藏，現在西藏在英人的策動下，更向西康和川邊侵略進來了。

喪失了西藏，喪失了外蒙，爲什麼國人都不知不覺，若無其事，喪失東三省，全國民衆都驚得跳起來，要督促

政府甚至自己起來組織武力收復失地呢？這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爲外蒙西藏的交通隔絕，與中國內地的文化和經濟失了聯絡，好像一個人體筋絡敗壞了的肢體，雖然被人用刀割去了，便不知不覺的不關痛癢。東三省則因爲與內地交通便利，不論在文化上，在經濟上，都成爲中國主要的部份，好像筋絡健全的肢體，只要被人用針刺一下，便痛號吼暴跳起來了。所以日本軍國主義者雖盡其所有的力量來霸佔東三省，但我們可以相信，在中國民衆的堅強反抗之下，日本軍閥終究要失望而歸。東三省如沒有一條北寧路免中國內地聯絡，那末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的發生作用，東三省將不是中國的東三省，早爲日俄兩國所分有了。

交通在國防上既有這樣重大的作用，非但在外表上便利國防的軍事運輸，在無形中更能收到鞏固防的效用，那末，我們在決定中國的交通政策的時候，對於國防方面的交通也是不可忽略的。

(三)

中國談交通，各鐵路及道路的建築規劃固然重要，但各種江河航運也是很重要的。航運一方面與水利有關，同時是發展生產商品的主要工具，可以幫助工業的發展。

孫中山在國際共同業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中，規定「運輸交通之開發」如下項。

甲 鐵道一十萬英里。

乙 鋪石馬路一百萬英里。

丙 修濬現有運河。

(子) 杭州天津間運河。

(丑) 西江揚子江間運河。

丁新開運河

(子) 遼河松花江間運河。

(丑) 其他運河。

戊治河。

(子) 揚子江築堤，濬水路。起漢口，迄於海。以便

航洋船直達該港，無間冬夏。

(丑) 黃河築堤，濬水路。以免洪水之泛濫。

(寅) 導西江。

(卯) 導淮河。

(辰) 導其他河流。

已增設電報線電話及無電線郵政局等，使普遍全國。

(13)

孫中山對於運輸交通的規劃，在「實業計劃」中具有體的解說，我們無須多攪雜意見。但這偉大的交通計劃的實現，却必須急起努力。孫中山的計劃實在太偉大了，如全部估算所需的資本，數目字之大恐怕大得難於計算。可是我們不要以為資本太大而畏縮不前，在口頭上等着，封建觀念「總理，總理」喊不絕口，而在行動上把孫中山的一切主張和計劃都無期擱置下來。

孫中山全部計劃的資本數目雖然太大，有不能舉辦之勢，但我們如審察緩急輕重。估計資本力量，逐漸去實行，那是很容易的。在緩急輕重上講，國防的交通線與經濟的交通是並重的，絕不可專注內地而忽於邊疆。在資本方面講：為避免龍斷起見，當然以國營為原則，不過在財政困難舉債度日的現狀下要拿出這樣鉅大的資本來，實是不可能，不得不利用外資和允許私人經營。不過沒有政府的具體設計和領導提倡，而希望外國來投資，希望外人來經營，那是夢想。

中國發展交通，比如鋪石馬路和修濬運河及治河等類，除了新開運河及揚子江黃河的開濬以外，我覺得都可以由中央設計而交由地方政府去執行。與水利有關的河道及省縣村市等的交通要道，地方政府去開濬和建築，原是不可推諉的義務。電報郵政則中國現在已有基礎，將來的發展可以沒有困難。唯一困難的，那是建築鐵道。依孫中山的計劃，全中國建築鐵道十萬英里，實在不能說是太多，中國土地之廣和人口之衆，十萬英里，的鐵道實是最低限度的數目。十萬英里的鐵路，如任其自然的發展，恐怕五十年一百年都不能完成，必須由政府定好整個的計劃，而分期策動，力求實現。

在孫中山所規劃的十萬英里鐵路中，國防線佔極少數，經濟線差不多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經濟線大都有利可圖，政府祇須有完善的設計，外國和私人一定樂於投資經營，所以對於經濟線的交通政策，應取開放主義，任外國或私人經營，但在政府與經營者訂立的合同上規定國家應享的權利，規定不得妨礙國家在經濟上的發展，並不得有壟斷或妨礙社會福利行為。至於國防線，大多數經過荒疆絕域，毫無近利可圖，私人 and 外國一定不願意經營的。雖然在若干年後殖邊成熟，國防線也能變成經濟線，可以獲得鉅大的利益，但外國和私人却決不肯投下這久遠的資本。同時為國防的安全計和轉移國內軍人對內、(內爭)發展的目標轉向對外，國防線鐵路的建築，不得不由國家和地方政府合作經營。國防線交給私人或外國經營，事實上既不能實現，而且就使實現了，也於國防有損無益，所以堅決採取國營政策。

(四)

在統一全國金融機關的銀行政策實行後，發展交通也是國家銀行的重要任務之一，對於鐵道及其他交通要具的設計和資本的籌集，國家銀行當能盡重大的領導作用。例如設立造船廠，設立機關車客貨車製造廠，設立大規模的輪船局發展外洋及江河航線，這些在國家銀行的領導下，都是不難實現的。

至於濬導江河及建築一百萬英里的石馬路，可以利用裁兵從事建設。中國有兵二百萬，照人口比例或不能嫌其太多，但這些國防不足內爭有餘的軍隊，如不努力裁汰，中國真是不能得救的。爲國防計，中國必須實行徵兵制，爲澄清政治消弭內亂計，中國必須裁汰老弱及廢敗軍隊，但裁兵有兩個主要的難題，一是裁兵的經費，二是兵士。裁後怎樣不使其淪落失業流爲盜匪，如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編練被裁兵士去從事築路，和濬河，一方面兵士被裁後既不致失業，而裁兵的經費也不難解決了。

(五)

交通是一切經濟文化及國防的基礎工具，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資本與人口都必然的會繁殖起來。社會的經濟與文化也自然會發展的。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任你有很大的資本，有繁庶的人口，但這一塊與社會與世界絕緣的土地，始終無從開發。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的地方，便是世界各國的交通都已極便利，而中國的交通則至今仍極隔絕，外人都在向外開拓富源了，中國則連本身的富源都無從發展。外國因爲交通已經很發達，所以在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很少提到發展交通，但在中國，交通還是和原始時代一樣，如不求得根本解決的方法，什麼政治經濟文化國防都無從談起。

第四 農業政策

(一)

目前一般人談起中國的經濟問題來，總是斤斤於土地問題，好像土地問題得到解決，其他的經濟問題都不難解決了。事實上，這是不正確的，目前中國的農村經濟的日趨破產，農村社會日趨混亂，並不是土地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由於外來的襲擊。外來的襲擊除內戰災荒外，第一是因爲世界經濟的恐慌的關係，各國都發生普遍的農業恐慌，中國跌到最低限度的農產品，其價格也不得不大跌特跌；第二是因國內交通阻塞的關係，過廣的人口被困於故土，無法移殖，馴致失業增加，盜匪遍地，農村社會便陷入暴亂狀態中去了。所以目前解決農村經濟的主要點，第一是整頓全國的金融，避免恐慌的襲擊，第二是發展全國的交通，可以便利移民。確定了整個的銀行政策和交通政策以後，那時纔提到農業政策，解決農民問題。這裏並不是說土地問題農村問題不重要，不過在金融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任何三頭六臂的大神怪，也沒有能力解決土地問題，解決農村經濟問題。

中國土地制度的複雜，簡直是世界的縮影，至於濃厚的封建色彩和原始色彩，更是世界所無。地主與佃戶之間的關係，既各地不同，就在同一地方，也有差別。在宗族的觀念的社會，土地所有權十分之五甚至十分之七以上操在各姓祠堂手裏，租種祠堂土地的則又大半是本姓子孫，在這種情形下，佃戶與地主（祠堂）之間的關係，當然模糊到了萬分。而且這些佃戶大都握有若干自由純粹藉租田謀生的簡直沒有。祠堂既不純然是藉剝削地租謀生的地主，而各祠堂子孫也不剝削，於是藉種租田謀生的佃戶，這樣

中國的地主與佃戶之間正面的關係簡直些法確定了。同時因爲人口過庶，一部份農民求種租田而無不可得出外邦工。可是僱用邦工的又未必全是自耕中和地主，却大部份是個農兼自耕的大農中農及富農。這些大農中農富農在經濟好況的時候自然可以多用邦工，但在不景氣的時候就不得不減少用邦工甚至不用邦工了。因之在不景氣到來的時代，佔鄉村人口大部份的貧農與僱農只有坐待餓斃，若更加以苦荒的侵襲，那就連中農山農甚至富農也加入飢民的隊伍中去了。一般人討論中國中部的共禍，成羣的農民傾向共產黨，便以爲是土地制度亦有矛盾，其實這是錯誤了，共產黨在中國中部的得有羣衆，不是由於農村中階級——地主與佃戶——的矛盾而是由於整個的「飢荒」農民的私有觀念最濃厚，只要「飢荒」一過去，所謂共產黨在中國中部的羣衆便馬上要散失的。

拯救中國的農村決非爲改革土地制度所能解決中國有入口過庶的熟土，同時更有大批的農人耕種的土地，「土地國有」也好，「土地私有」也好，都沒有什麼問題。你說要土地國有嗎？荒廢了的土地，多着，不說邊疆絕域，就是在內地人口過庶的地帶，「官荒」及「無主廢地」就已經是不少了；國家如需要土地，這些「官荒」「無主廢地」及邊疆無人耕種的土地儘夠收用了。你說要土地私有嗎？現在就是行的土地私有制度懇懇的，土地雖然不夠耕種，但大批的「官荒」只要農民出很微細的手續費去認領，但農民都望不前。農民最富於保守性，又富於私有觀念，不把有利的事實放在他們面前，空空洞洞的去改革制度，那對革命毫無幫助，徒然惹起糾紛而已。蘇俄十月革命後和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的土地政策，這兩種政策的失敗與成功

，可以作爲中國土地問題的鑑。中國的土地矛盾遠不如沙皇時代的俄國，俄國地主與農奴的衝突是有歷史性的，以這樣的基礎去施行共產黨的土政策，農民仍不免於普遍的怠工，那末在土地制度這樣複雜土地——地主與佃農——矛盾這樣模糊的中國，希望以單純的改革制度來救濟農村，那不是夢想麼？

(二)

革命的根本任務在於救人而不在於殺人，如革命徒以找尋「對象」加以殺伐爲任務，那革命就成爲人類互相殺伐的現象，而不是爲人類求取出路了。雖然在大多數人民被因壓於兇殘的偶像和吃人的制度下的時候，革命必給以撲滅這些偶像和制度爲急務，可時中國的農村，目前並沒有一致的明顯的反動的偶像和制度，但廣大的農民羣衆仍因在飢寒之中，那我們去撲滅什麼呢？革命當然不能以去可撲滅的「對象」而停止或息工（但中國一般自革命的統治者，怠工已多年了。），中國的農村雖沒有什麼反動的偶像和制度可供我們去撲滅，（封建勢力因受國際資本主義的襲擊，將入於自然死亡的狀態。）但仍有一個明顯而全國一致的革命的對象放在我們面前，那便是橫掃全中國的「飢荒」。打退了「飢荒」，把二萬萬以上嗷嗷重斃的農民救出來，這不偉大的革命工作嗎？

在原則上，孫中山及晚年的列甯（新經濟政策以後）所釐定的土地制度和農業政策是無可改變的，我們如要在孫中山列甯以外去尋覓什麼農業政策，去另外創造什麼土地制度，那不單是多事，也是徒勞無功，白費精力。列甯對於俄國所定的農業政策，由於斯太林及其黨人的努力，已逐漸實現而走上勝利的前途，現在蘇聯的國家資本已成

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土地因有制度的實行將來是沒有什麼巨大障礙了。可惜的是中國，國民黨雖已握得政權但是完成了少數人的升官發財，而把孫中山所手定的解放中國農民的土政策農業政策無期擱置下來。現在中國的農民問題是越弄越糟了。整千整萬的農民走入共產黨，使共產黨很輕易地成立了紅軍土地革命如長此怠工下去，那末中國的農業危機和「飢荒」只有一天一天的擴大開來，由中部擴大到南部北部，擴大到揚子江的上游下游，那時紅軍的足跡將踏遍全國，我們的少數領袖倘縱欲繼續爭奪個人權位恐怕也無權位可爭了。

(16) 現在，中國的農業危機和「飢荒」已成了深入的普遍的現象，農村基礎與孫中山當時所見到的遠不相同了，但我們說這樣的話並不是要放棄孫中山所定的土地制度和政策，而是要追求補救的方法，如孫中山的主張建築一一鞏固的永久的基礎。所謂補救的方法，便是打倒「飢荒」，撲滅危害革命的「飢荒」。實行撲滅「飢荒」的補救方法，並不是改變了孫中山的土地制度和政策，只是應着現實社會的需要，根據着孫中山的原則，而增添了一種應付事實的手段，增添了一種實行土地革命的策打罷了。

(三) 應付目前土地革命的補救方法，在對象方面是打倒「撲滅「飢荒」在方法方面可分為：

- (一) 成立國家農場。
- (二) 厲行農業合作制度及保險制度。
- (三) 厲行農業信託制度。
- (四) 造林及發展漁業。
- (五) 發展鑛業。

有了這五項撲滅「飢荒」的土地革命的基礎，同時實行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政策走上土地國有制度便更無困難了。茲逐項解說於下：

(一) 成立國家農場。——中國現在有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一萬萬以上的農村失業人口，第二是食糧缺乏，每年由外國進口六萬萬或拾萬萬兩以上，中國號稱以農立國，照理要有鉅額的食糧及衣料供給外國，現在反而仰求於外國，這不是國本動搖了嗎？如果讓這情形繼續維持下去，外國雖然不出兵來滅亡中國，中國已等於滅亡了。因為農村失業，紅軍和土匪已遍地開展，因為食糧及衣料缺乏，帝國主義的經濟鐵鎚把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敲打遍了。中國要解決兩個嚴重的現象，除了國家自己起來經營農業成立農場以外，一切空口的號召甜蜜的煽動都是泡影，在歷史之前與奮狂歡，在歷史之後重頭喪氣，所以共產黨不合實際的左傾的土地革命，其結果和過去的國民黨怠工的土地革並不高明多少。

國家農場需要大批的農業工人，這是解決農村失業人口的生力軍；國家農場經過短期的墾種以後，便可收穫相當的農業產品如食糧棉花之類，那時於食糧衣料的缺乏也有解救了，中國如能決心開闢國家農場，如以九方里或二十方里為壹個農場面積單位，每農場容納五百或二千以上的農民，其出產每年當在二萬兩或五萬兩以上，那末全國每年平均成立五千個農場，每年便可減少五百萬以上的農村失業人口，增加一萬萬兩以上的農產品，祇要五年至十年以後，中國的土地革命便可以成立鞏固的基礎了，成立國家農場的基本條件是農業工人，土地，耕種工具和流動資本四種。中國有一萬萬以上的失業農民，農業工人的招

用當然不成問題。全國十八萬萬畝的耕地面積，祇合全國土地面積百分之二十左右，如用新式的方法去墾種，至少還可得到二十萬畝左右的耕地，那末土地也不成問題了。至於耕種工具，本國原有的加以改良外，可向美國或蘇俄各國除購各種農業的機械，更由本國設立新式的農具廠，耕種工具可以不難解決。至於流動資本，那在銀行政策實現。國家銀行成立以後，籌集的時候決不發生困難。

(二)

實行農業合作制度及保險制度。——成立國家農場，祇把已經破產的佃農佃農貧農和一部分吸納了進去，換句話說，就是國家農場祇解放不願佃農貧農和壹部份小農的痛苦，而富農乃一部份不願意離開故土的山農則被革命放棄了。富農雖然手頭或有若干資本，可以勉強維持下去，但困疲的中農和山農則簡直一無辦法，祇好坐待淘汰。革命對於任何民衆的痛苦都不能坐視不顧，中農小農和富農自然也要積極與以援助。援助的辦法便是由政府助和黨的領導，中農小農——富農自然也可以——一律參加生產合作消費合作的組織，成立合作農場，由國家除購耕種的械並給種籽。合作農場的土除社員農民所自有的以外，地主（自己不耕種者）的土地一律由國家收買，仍低價租給合作農場耕種。

合作制度以外，保險制度也必須的。農民經濟力量軟弱，因為怕遭失敗的緣故，常常不敢經營較大的事業和添置鉅價的工具，政府必須有完善的保險制度，如牲畜保險，住宅保險，倉庫保險，風災水災及種種保險，耕種機器保險，完善的保險制度實行起來，農民就可以放膽去發展農業了。

(三) 實行農業信用制度。——中國農村自有歷史以來，從來就是輾轉困頓在高利貸的壓迫下面的。禁止高利貸，表面上雖是幫助農民的辦法，可是實際上是割斷了農民信用活動的生命，高利貸者不過由公開轉變為秘密罷了。禁止或取締高利貸，於農民有損無益。真正與農民有利益的，乃是政府設法去抵制高利貸，使農民有活動金融的機關，不必再去仰求於高利貸者。確定農業信用制度的方法，那便是國家銀行成立普遍全國深入農村的銀行網，國家銀行當然不能在每一個農村都去設立一個分行，但國家銀行各縣分行可以有担保的放款給各合作農場以及各信用合作社。各縣分行更可應事實的需要，在各農村中心的市鎮設立當舖，以月息一分以內的低利典押借款於中小農民。

(四)

造林及發展漁業。——中國每年的外國出口貨，不單食糧衣料及工業品有所可驚的數目字，就是木材，紙和海貨也是進口的大宗。木材和紙，須從造林入手。收回海貨進口的利權則須從發展漁業入手。在這造林與漁業兩方面，經濟上既有鉅大的發展，而對於社會上也可以減少很大的失業人口的數目字。中國海岸線雖較短，漁業發展後，自給自足是有餘的，目前閩浙蘇魯一帶漁權盡被日人偷竊，實在很可惜。造林是防止水旱風災的根本事業，近年來中國各地年年都鬧着水災旱災，這便森林衰落的嚴重象徵。要免除水災旱災，除治標方法的濬河築堤以外，根本辦法便是造林。造林除消滅水旱風災外，真本身也有厚利可獲。如松杉是造紙的原料，白楊是製火柴的原料，此外建築及交通方面需用的木材更多，中國充分造林以後，所挽回的利權至少當在數萬萬兩以上。至造林的辦法，在內

地附近國家農場或合作農場的荒山瘠地，這些荒山瘠地的造林儘可作為附近農場的副業。如在巨荒或附近沙漠地帶，則可作為畜牧場或植棉麻等農場的副業。其餘沒有附近農場可以依賴的農場。而可以廣植白楊松杉或菓林的，可設立國有農場或私家農場。至於防災及治安的森林，當然由國家管理比較相宜。但重要事情，便是一切林場均須有經常負責管理保護的人，森林總造成的希望。如近數年來國民政府所提倡的造林，每年在植樹節日舉行一次造林運動，上至國府主席，下至縣長警察都慎重其事的手植一株樹苗，官吏們的樹苗既植得不多，但這不多的樹苗也在兩天或三天以後就被人踐踏或裝死了。這樣的造林，是沒出息的官僚玩把戲，真正造林不是這樣的一曝十寒，只見運動不見事實！

(五)發展鑛業。——發展鑛業，是應當在工業政策中提出的。但發展鑛業有兩點和農民問題及農業政策相關聯，第一，發展鑛業需用大批的鑛工，這對於解決農民失業問題是一個不小的幫助，因為鑛工大都是由失業的農民去補充的。第二，煤鐵鑛的廉價開採和廉價供給，這對於交通的發展和對機械化的發展都有極大的幫助。否則煤鐵價格高昂，兼且產量不足，中國不能制耕種的機械，長久仰賴外國供給，那是很危險的事情。既然發展鑛業，第一可以幫助農民失業的解決，第二可以鞏固將來農業發展的基礎，我們在討論農業政策的時候，自然不能不加以注意，但詳細的解說，還留待工業政策中討論罷。

四

中國現在社會經濟問題最嚴重的是失業和飢荒，在這失業和飢荒之前的兩個嚴重問題是金融枯塞和交通阻滯，

中國如不能同時解決這四個問題，那末中國在目前這激烈的國際戰場中，除滅亡外簡直一無辦法。但我們又相信，中國如有決心力求自拔。那末中國非但可以自救，並且還可以救世界。在前兩篇銀行政策與交通政策的基礎下，這裏的農業政策把失業和飢荒的問題又同時解決了。中國農業政策的實行，在本國的價值不必說，對於世界的貢獻，雖未必能夠永遠撲滅世界的經濟恐慌，但這尖銳到了極度的世界經濟恐慌得到中國農業政策的援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至少可以移後十年了。中國的農業政策實行與中國農村的產業將普遍而根深蒂固的發展起來，根本肅清封建的經濟勢力。中國社會能逐漸剷除經濟的封建勢力，國際間對這個廣大淵博的市場（中國）的開發恐怕十年也還開發不完呢。

第五 工業政策

(一)

從來的人討論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總是集中其注意力在工業問題上，好似只要工業上沒有矛盾，其餘的一切社會經濟問題就都解決了。其實這樣的觀察是錯誤了，工業組織只是社會經濟機構中的一個環業如果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單只有工業一個部門很發達，而沒有其他的業農交通商業等經濟部門作輔助的基礎，這樣的國家或社會，他的經濟組織便很少獨立性。雖然現代的許多工業畸形發達的國家如英日等等，不論經濟問題政治問題在國際上都佔優勢，這是因為有強大的軍備作各種侵略——政治的和經濟——的工具；如果英國或日本失去了那強大的軍備，那就會一敗塗地，政治失了優勢，經濟便必然走上被動的地位，而不能再行操縱或壟斷了。

在經濟上沒有獨立性的基礎，而單只有一個畸形發展的工業部門，這種國家雖可以工業的國家或資本主義的國家自豪，然而因其本身組織脆弱的關係，其自身因不時的要暴露出經濟恐慌的破綻來。若萬一與一個矛盾的對手國發生衝突，對手國不要用武力來抵抗，祇需實行經濟封鎖的政策，這個在經濟上沒有獨立基礎的國家便有根本崩潰而瓦解的危險了。一九一四年前的德意志總莫英雄一世獨霸全球的強國了，可是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各國在軍備上在武器上雖然敵不過德國，但因為各國厲行經濟封鎖的關係，撐持了四年工夫，終究因為各種經濟恐慌的重重發生，尤其是普遍全國的「飢荒」的現象，不得不向對手的協約國求和了。

社會主義的革命唯一的目的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以政治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可是無論用怎樣的巧妙手段，單只注意於工業部門，單只去煽動勞動階級起來奪取政權，這種方法雖然在政治上或在可以微伴獲得勝利，但在經濟上的勝利則毫無希望。蘇俄的十月革命，奪得政權的前鋒隊伍雖然是工人，如沒有集體農場的成敗，獲得廣大農民羣衆的同情和擁護，沒有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獲得金融統制的鞏固基礎，那末誰不能担保蘇俄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後勝利。列寧是唯一的馬克斯主義的承繼者，可是在蘇俄革命後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的時候，也逼得大聲疾呼，「不惜犧牲一切的主義」積極主張實行新經濟政策了。新經濟政策的作用，便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平衡作用。新經濟政策對於直接發展工業的效用並不顯明，可是新經濟政策立下了平衡的發展經濟的基礎，這對於工業部門的發展却收到了極大的作用。

像中國這樣生產落後的國家，只有少數幾個通商大埠稍具有工業經濟的雛形，大部份的地方都還停留在半原始經濟時代封建經濟時代，工業經濟的形態簡直無法出現。革命對於社會的經濟問題有兩個任務，一是剷除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制度的矛盾，二解決是人類對於自然間生產方法的矛盾。目前中國革命的經濟任務，改革經濟制度當然是重要任務之一，但更重要的則是改革生產方法。人與人之間唯一的經濟矛盾是「恐慌」，人與自然之間的經濟矛盾却是那可恐怖的「飢荒」，「恐慌」的襲擊固然可怕，但「飢荒」的襲擊却更可怕啊！現在的中國，「恐慌」的現象很輕淡，但「飢荒」的現象却已普遍全國，成為唯一嚴重的經濟問題了。

在前篇「農業政策」中，我們已把「飢荒」的問題有了相當的解決。但有一點我們必需注意，就是中國農業是否將永遠保存手工生產的方法，抑是必需努力走上農業機械化的前途。本來工業的作用是改變農業所生產的原料為各種各樣的供給人類的消費品，可是農業機械化完全成熟以後，農業與工業的分界便很淡薄，到了那時候，可說農業也已變做工業了。

我們並不是主張中國革命不需要發展工業，但對於社會經濟不能平衡發展的工業，畸形的單獨發展的工業，則中國非但沒有這樣的需要，也沒有這樣的可能。在目前的世界上，各國為了爭奪原料，爭奪市場，大戰隨時都有一觸即發之勢，中國在這潮流中，也想畸形的發展工業，希望與英日等帝國主義來爭奪原料，爭奪市場，這真是夢想。工業的畸形發展，這便是帝國主義成長的天性的經濟基礎，因為工業畸形發展的國家如強行抑制着不向外國施行侵略

政策，那末畸形發達的工業非但要立即萎敗，結果連整個的國家組織也要根本崩潰呢。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前途，中國不需要步英日法美的後塵做帝國主義者，當然也不需要畸形的來發展工業，不需要這樣來作對外經濟侵略的工具。至於在經濟地理上的優點，把本國的生產品與外國相交換，那是爲了人類生活上的需要，不能說牠是帝國主義性的經濟侵略。

(二)

中國的經濟問題，除了健全金融制度和發展全國交通外，生產方法的改進自然是不可或緩的重要任務。所謂原始色彩建色彩十分濃厚的「亞細亞式」的生產方法，在現代已是必須淘汰的東西了。淘汰亞細亞式的生產方法，絕不是空口所能成功，這必須對於生產技術生產工具有澈底的改造要澈底改造亞細亞式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唯一的方法，便是發展工業，並使農業亦要走上機械化的前途。

在目前激烈的世界經濟恐慌的漩渦中，也許有人擔憂中國工業發展沒有的可能，這實在是杞人憂天了。中國如企圖步資本帝國主義後塵來發展工業，那無疑是不可能的，但如中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方法來走入社會主義的前途，組織了全國的經濟力來發展工業，那就輕而易舉。中國雖然窮窘，可是因爲鑛藏和各種工業原料的豐富，勞動力的廉價和衆多，土地的廣大和適宜於種植，發展工業的自然條件極充分，祇要向外國購買若干機器和訓練若干新式技術的工業人材。中國的工業便可以走上順利發展的道路。

煤鐵是主要的近代發展工業的自然條件，而中國對於

煤鐵的鑛藏却特別豐富。據美國德拉克的估計，我國的煤鑛儲藏量如下：

省名	儲煤量(單位噸)
山西	七二四·三四〇〇〇〇〇
湖南	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川	八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雲南	三〇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貴州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河北	二二·六六八〇〇〇〇〇
河南	九·二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山東	七·〇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甘肅	五·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
江西	三·三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蒙古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廣西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安徽	一八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湖北	一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福建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浙江	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江蘇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九九六·六一二·七〇〇〇〇

鐵鑛的儲藏量據前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調查的結果，全國各省的儲藏量如下：

省名	儲鐵量(單位噸)
河北	九一·四七九〇〇〇
遼寧	三八七·五八〇〇〇〇
山東	二九·九二〇〇〇〇〇

河南	三·四〇〇·〇〇〇
安徽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江西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湖北	五二·六六〇·〇〇〇
江蘇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福建	七·五〇〇·〇〇〇
浙江	二·三〇〇·〇〇〇
合計	六六七·八九九·〇〇〇

煤藏佔世界第二位，鐵佔世界第五位，石油儲量至少亦可敵美國總儲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如錫，鎳，金，銀，鉛，鋅，鋅，等工農必需品的儲藏也都量十分豐富。中國有這樣多的鐵藏，所以中國要努力製造機器發展農業的國家為工業的國家那是有充分的基礎的。

至於工業原料方面，絲，棉，豆，麥，羊毛犬類的出產在世界各國從來就很重要的地位，不過近年來因為國內政治混亂和世界經濟恐慌的關係，有許多原料品的生產比率或急或緩的下降了。

(三)

中國的鐵藏和工業原料品既這樣的豐富，那末創立五金工業，創立重工業的工廠，創立生活必需品如衣食住行等製造廠，就都沒有困難。比較困難而必須討論的，那是經濟制度和經營方式的問題。在經濟制度方面，比較有現實性的可分兩種，一種是私人資本主義，另一種是國家資本主義。前者完全是個人主義的沒有組織性的經濟制度，不論生產消費運輸等經濟行動，都陷在無政府的狀態中，後者則是較近於某國主義，而是有整個統制計劃的經濟制度，不論生產消費運輸等一切人類在經濟方面的行為都

成爲有組織的經濟活動。

在經營方式方面，可分爲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准許外人經營三種。這三種經營方式，不論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或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都能存在，其不同的之點，只是生產資本的存在，前者以國家爲主體，而後者則以私人爲主體，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所謂國營事業只是輔助私人資本的發展；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容許私人經營或外人經營，那是輔助國家資本的發展了。有許多人鑑於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官營事業的腐敗，常常把國家資本主義和官營事業混合在一起，以爲國家資本主義不能成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和官營事業是截然不相同的兩個東西：國家資本主義所發展國家資本爲手段；而以解決人類生活走入社會主義的經濟前途爲目的；官營事業則是爲維持私人資本主義的秩序，防止獨佔及調和私人競爭，這是無前途的。

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並不是把一切生產事業都作爲官營事業，只是在國家的整體經濟計劃之下，圖謀全國產業的發展罷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發展生產的方法，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則是無政府狀態的自由競爭的方法。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經濟是有組織計劃的發展，所以社會不會發生「恐慌」或「飢荒」的現象。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都是各自爲政，而且各自營植私人勢力，作不經濟的市場競爭，因這競爭的作用影響到生產的各部门和各機構，社會便自然地醞釀出種種矛盾來，結果恐慌是循環不息地出現，而飢荒則隨着天災人禍的發動，經常出現於人類的各部分。

中國生產落後，資產薄弱，用私人資本主義的方法來

發展生產，因為主觀力量的薄弱，萬不能抵抗環繞四週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經濟上只有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但如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嚴密國內的金融組織，集中全國的經濟力量來發展經濟，對內固然有了雄厚的資本可以從事生產，而對外亦可以勉作抵抗了。以一個幼稚的中國資本家的力量來和一個外國資本家抗爭，那是以卵投石，中國資本家必碎無影；若以廣大的全中國的經濟力量來和一個外國資本家抗爭，外國的資本家反而會變做卵一樣的脆弱，不能抵禦中國，不能再向中國進行侵略了。

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生產發展的順利起見，其初期經營生產的方式將仍和私人資本主義時代一樣，保存着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外人經營的三種形態。其不同的地方，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私人經營和外人經營的事業須受國家最高經濟設計機關——最高經濟委員會或最高經濟計劃委員會——的統制，絕對不許作不合理的自由競爭的行為。國家必須有力量統制社會經濟，孫中山在「節制資本」的政綱中早已有明確的表現，只是國民黨至今當未能決心實行罷了。

(四)

統一金融機關的「銀行政策」的實現，這對於中國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極大幫助。有了統一的金融機關中國便有充分的力量採用外國的各種新式工具，本國並可自設定的各種製造機器的工廠。有了統一的金融機關，中國便可以充分的力量調動配合國內各種生產條件——原料，土地，勞動力——去從事生產。中國如能徵集了各種工具，原料，土地和勞動，而加以適當和有組織的配合，那末中國工業的發展就是很簡單而容易的事了。

關於大工業的創立，萬不能依賴私人或外國，國勢必須直接起來經營。關於衣食住行的種種生活必需品的製造，其小規模的或家庭工業式的製造廠，國家非但不應當加阻止，在過渡時期並應當給予種種便利，助長其發展，但大規模的托位拉式的必需品製造機關，則必須歸國家經營，至少國家亦須經常加以管理和統制。並且發展工業不應專於集中在城市，必須依着經濟地理的自然條件，在各原料出產地的中心地點創立工廠，使工業與農業得以發生密切的聯繫，同時可使農村社會的經濟與都市社會的經濟得以平衡發展，農村經濟不致再遙遠的落在都市經濟之後使農民再變着無限的痛苦。

農村電話化，對於農村工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同時對於農村文化和農民生活的改進也有大的幫助，但經濟枯窘文化低落的中國農民，萬不能有自行使農村電話化的能力，這必須先決定了具體的整個的計劃，纔能逐漸實現。

採鑛是發展各種生產事業的主要條件，但目前中國礦業尚極幼稚，大多數都用土法開採。中國在經濟發展上了正軌以後，煤鐵的需要量必較目前激增數十倍或至百倍以上，因為工具和技術拙劣的關係，中國自身決不能有力適應這激增的需要，祇得在相當限度下允許外國來經營開採。允許外人在中國經營鑛業，在中國祇要沒有任何政治條件的束縛，同時執業的外籍人民能不違背中國法律，這對外人固然有利，對中國產發展的前進也是有利無弊的。

第六 商業政策

商業在社會經濟組織中佔怎樣的地位，現在還有許多

人在各持成見，爭論不決。有人說商業是不生產的，但有人則說商業是生產的。其實社會現象不能有絕對的永遠不變的真理，商業對於社會的經濟組織是否有價值，是否能產生生產的作用，這要觀察各時代不同的環境而決定。在原始時代，人類生產幼稚，慾望簡單，一個人所生產的物品剛夠一個人自己消費同時一個人的慾望也決不會超過一個人生產量以上，在這樣的時代，人們都是自給自足，當然無需乎商業。但經過相當時期以後，由於生產的進步，每個人的生產除自給自足外還可以有剩餘，另一方面新的慾望也增添了出來，在這樣的時代，商業制度便必然要出現，成為社會經濟組織中必需的部門了。

我們試看社會經濟的流程序：農業部門成功了各種各樣的原料，原料經過加工而成為供給消費的物品，可是堆積在工廠貨棧中的物品不能直接供人類消費，必須經過商業的運輸和分配作用，這些物品纔做成爲有價值的消費品。如果工廠中的物品是日夜不息地生產出來，沒有各種商業機關把這鉅量的品運輸而分配到社會各層階去，那末那些物品將長期存放在貨棧中霉爛，結果變成無價值的東西了。

當然，商業在其有身的發展過程中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形態：有原始的物物交換的形態，有封建的社會制度的形態，有產業革命後自由貿易的形態，有近代資本主義完全成熟以後的獨佔性的形態，將來社會經濟更發展下去，商業或要歸國家專營，漸漸形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商業基礎。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社會的勞動的分工」當然只有更進步，生產的分工制度既然不能消滅，那末「有無相通」「交互慾望」的商業制度當然也仍舊要存在的。不論商業的形態

如何，其所處的時代如何，各有其流弊，而且也各有作用，一定的經濟時代必然產生一定的商業制度，那是無可推翻的事實。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一般的商業形態可說完全是封建性的，甚至原始式的物物交換的地也很多。定期的「集趕」「趕場」固然是當時鄉村間主要的商業方式，而城鎮的「商行」則是以「賤買貴賣」的目的，使農村與都市發生經濟的聯繫。比較發生的都市，纔有專門經營商業的店鋪，纔有專門製造手工藝品的工匠，商業組織的中心則操在所謂「同業公會」「同行公會」的手裏。那些同業公會同行會除了各奉有一個神而以神廟爲會所外，其組織與規律戈與歐洲中世紀的「基爾特」可說完全相像，凡加入行會的鋪戶，才可以向各地城鎮經辦貨物，並以此之銷售於各大都市。可是自從鴉片戰爭以後，歐洲各產業先進的國家挾其雄原的經濟勢力湧入中國，於是中各種固有的商業形式使逐漸被破壞了。

中國封建性的商業制度的破壞，並不是像歐洲產業革命那樣產生了新的制度，舊的制度被淘汰了。中國社會自身並沒有產生到的商業制度，只是因爲外來的經濟侵略的關係，舊的經濟制度根本摧毀，新的制度無從成長起來，於是中國社會的經濟便陷入飄泊無依的形態中，現在則完全成爲金融帝國主義者的經濟附屬物了，在帝國主義的經濟鐵蹄下，中國將永遠做帝國主義國家排泄過剩生產物的尾閘，中國民族資本將永遠不能抬頭，中國民衆的生活也只有有一天苦似一天，永遠陷在飢寒的牢獄中。

半殖民地的中國，要想脫離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求得一光明的出路，必先求解放商業制度的束縛。工業以市

場爲生命，沒有市場，工業便不能發展，所以中國要想發展工業，要想發展民族資本，奪取市場和解決商業上的矛盾實是唯一要着。既到奪取市場和解決商業矛盾，便須看商業政策如何決定了。

商業政策的決定，可分對內與對外兩種，對外是國際貿易，對內是國內貿易，現在試把這兩個問題，分述於下：

(一) 國際貿易政策

社會經濟組織發展到現代，已經衝破了一切人爲的天然的界限——民族的界限，地域的界限等——，整個的世界被納入一個系統中了。經濟本來沒有國界，但在近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人類自私心的發展形成了吃人的帝國主義的惡魔，結果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國界的存在成了發展世界經濟的障礙物。在以謀利爲目的的經濟制度下，個人與個人之間固存在着剝削關係，而產業先進國家對於產業落後國家的剝削關係則更爲明顯。產業先進國家憑藉着雄厚的軍備用武力征服了落後的國家在政治上或創造成宗主國的地位，或創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在政治上成立了侵略的基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便永無抬頭之日了。

中國在閉關時代，直目空一切，以所謂「夷狄」對待外國。鴉片戰爭，義和團戰爭和中日戰爭等戰敗以後，於是割地，賠款，締結不平等條約等等，一切產業先進國侵略殖民地國家的條件都先後成立了。

外國貨品輸入中國祇准抽輕稅，中國貨品輸入外國則須抽重稅，這樣，中國非但不能在外部取得市場連本國的市場也保不牢。加以國內的封建勢力至今不能肅清，本

國產品因苛捐雜稅的拖累，本國貨的成本比外國貨的成本反要大數倍，苛虐的釐金名目土雖已取消，但特稅產銷稅等等新名目的繁興，實比釐金還要繁重，外貨進口只抽單一稅，本國貨的流通則捐稅重重疊疊，結果外貨在中國市場，因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作祟，立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中國民族資本陷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當然要每年入超十數萬萬兩以上，並且出口貨還要逐年低落了。

因歐洲大戰和歷年幾次「排貨」運動的刺激，中國貨品得了一些恢復市場的機會。可惜這些外來的偶的現象，自身並沒有鞏固的經濟基礎，所以中國的民族資本屢次走入萌芽時期，又屢次被摧燬而回頭了。帝國主義者摧毀中國剛剛萌芽的民族資本，第一步利用不平等條約的非法權利，第二步用跌價競爭——的方法，第一第二兩個步驟不能收到美滿的成功，便不惜第三步用噸稅政策來實行轟燬中國新興的產業了。最近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的爆發，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白熱化的經濟恐慌中，作最後一次的掙扎，希望藉這次暴行，從根本上摧毀中國的產業，佔有中國的市場，而維護其商業的侵畧政策。

中國的經濟革命除對內肅清封建勢力，建立堅強的革命政策權外，對外的反帝的任務更是萬分急迫。中國革命不實行澈底的反帝的工作，那末中國將永遠不擺脫國際間政治的和經濟的束縛，革命的現象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不是革命被反動力量所撲滅，便是革命的團結陷於腐化，趨於反動，反帝的工作不實現，革命的基礎便不能鞏固，而革命的現象也就不能持久了。反帝主要的工作是消不平等條約，取消不平等條約，本是孫中山生平所極力主張的

，可惜國民黨取得政權以後，黨成了維持個人地位和內爭的工具，對於反帝的工作竟完全擱置了。

反帝，的確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革命一件極繁重極艱難困苦的工作！反帝運動的失敗，往往使革命力量根本摧毀，使革命失敗於功虧一簣，——尤其是一般不信任民衆力量而不能運用民衆力量的革命領袖們，一遇着反帝問題便頭昏目眩，眼花撩亂，不由自主地走上屈服或投降的道路。可是我們如不對革命失望，不對民衆力量懷疑，那末我們相信反帝運動實是革命過程中不可迴避的工作。

空口喊取消不平等條約，把全中國人民的耳朵叫破了，帝國主義國家也決不肯輕易自動放棄用砲火換來的既得利益。必須發動全國民衆的力量，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作有組織有計劃的反抗運動，那樣終能有把握的有前途的去切實執行反帝工作，獲得反帝的最後的勝利。對於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反帝工作，我想留待別的機會去討論，這裏能專把經濟方面的反帝計劃討論一下。在經濟方面反帝，主要的便是商業問題，商業是一切經濟侵略的前鋒，工業和農業當只是經濟戰的後營而已。雖然後營的工業農業不穩固，前鋒的商業也不能得到勝利，但中國如不能先抵禦着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前鋒隊，爭取一部份市場，那末後營方面工農和農業的鞏固便根本是夢想。講到爭取市場，講到抵禦帝國主義的商業戰線，其具體的現實，便是整個的國際貿易政策的決定了。

國際貿易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也是經濟侵略的前鋒隊，中國必須在這方面築成堅強的防禦線，本國被束縛着的產業纔有伸展發達的可能。所謂國際商業的防禦線，積極的方法是增高進口稅率，實行保護關稅政策

，消極的方法是抵制外貨，鼓起民衆的愛國觀念爲本國產品護得市場。但因中國的積弱，關稅自主不能馬上成功，而排貨運動則是一時的感情作用，不能持久。關稅自由是獨立國家的主權之一，排貨運動能相當補助本國產業的發展，這兩者，我們當然不能放棄，可是這仍舊不能成立國際商業的防禦線，必須實行國家專營的國際貿易政策，進口出口事業一律歸國家專營。國際貿易歸國家專營那末對外可以利用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力量，調動和集中國內的農產品與工業品，作有組織有計劃的出口事業，這樣中國在外國的市場便可以得到相當的擴大。至於對內，因商業制度的改革，外貨進口必須經過政府之手，政府很容易加以適當的操縱和支配，對於壓迫中國產業的外貨，可依事實的需要抬高其價格或竟拒絕採辦，這樣，帝國主義者便不能繼續運用不平等條約，便不能繼續霸佔中國市場了。

自帝國主義在運用其堅利的戰艦政策和優勢的經濟力量衝破了中國的城壁，非但國內市場爲帝國主義者所壟斷，即各種土產輸出的利權也都爲帝國主義者剝削乾淨了。外商在中國設立銀行，擁有鉅大的銀行資本——

- 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
-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磅：
- 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
-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 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戈爾登：

——這鉅大的外國銀行的資本，遠遠超過於本國銀行資本的總數以上。外商藉這些銀行資本的作用，於是一切採辦原料，開發礦產，建築鐵路發展航線，設立工廠，都可以

得心應手操縱自如。如限制國際貿易歸國家專營，那末出口貨的利權可以收回，而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瘋狂行爲也將失却憑藉。

實行國家專營的國際貿易政策，帝國主義在所加於中國種種不平等條件的鑄錢將完全失去效用，鉅大的外國銀行的資本也不容許有發狂的投機的侵略行爲了。至於中國實行國家專營的國際貿易政策，需要鉅大的資本，這在統一經濟組織——金融機關——的「銀行政策」實現後，資本權絲毫不成問題。

(二) 國內的商業政策

中國因受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商業經濟皆已漸具雛形。不過這些雛形的商業的成長，並沒有給中國的社會經濟以良好的影響，祇做着國際帝國主義商業前鋒隊的附屬品罷了。在世界經濟好況的時候，中國得承些許餘瀝，商業一時興盛起來。世界經濟剛有點不景氣的氣象，中國商業便立即退向萎謝的道路。加以苛捐雜稅和高利貸制度的繼續存在，中國商業對外雖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提携，在國內却常要遇到一些，封建勢力的摧殘，不能有基礎的成長起來。二十年來軍閥混戰連年不息，交通破壞，田產蕩然，民生凋敝，財源枯竭，中國的商業更如風雨殘燭，時時刻刻都有熄滅潰亡的危險。

年來帝國主義者的商品，幾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大到每一個都市，每一個城鎮，小到三家村的窮鄉僻壤，深山絕域，都已擁擠着洋貨的足跡，烙上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印鑑。外貨能夠普遍地深入中國每一塊土地，外商自己並沒有在中國內地設立大小的商業機關，倒是中國的大小商店做了替外商推廣和販運貨品的商業機關。我們如

調查一下本國各種大小商店的營業統計，那末洋貨至少當佔全數的十分之五以上。這樣看來，中國人的商店不是中國貨品的經銷機關，只是外國貨品的經銷機關罷了。中國商店專做外國貨的經銷機關，財富一天一天向外流，結果中國的社會一天窮一天，市場一天狹一天，商業也就只有一天一天銷沉下去了。

商業的興盛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發展生產，一是發展民衆的生活慾望，由這個條件的平衡發展，商業的興盛便毫無問題了。中國現在的生產事業只有一天一天衰落，而民衆生活的慾望却變着國際資本主義的刺激，一天一天伸展，外貨擁進金銀外流，中國的社會經濟成了無底洞，只有去路，沒有來路，生產與消費失了平衡，商業當然不能興盛了，中國除了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同時自由主義的商業制度也蘊藏着很多的矛盾，其一是賤買貴賣，買入的價格幾乎要比賣出的價格小一倍，根本上形成一種社會剝削的基礎；其二是無政府的盲目的自由競爭，單以市場的變遷去限制生產，而不是以消費的需要來調劑生產；其三是自由主義的商業制度，商業機關運輸機關絕不統一，商業上多頭競爭的繁興，這是社會經濟行爲上的一種浪費。革命後的中國商業，當然要以調劑生產與消費爲目的，那末未來的商業制度當然不能再建築在封建的或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而要建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了。在「國際家專營國際貿易政策」之下，中國對外已成立了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商業防禦線，帝國主義者不能再繼續剝削中國，那末只要設法消滅國內的自相剝削的關係，全成調劑生產與消費的基礎，中國的商業便可以走入永久繁榮的前途了。

改造旬刊合訂本目錄

發刊詞

時事論評

諾桑會議的前因後果.....	何一鳴
滿洲國承認問題之國法學上的檢驗.....	何一鳴
由日本承認滿洲國問題談到日本與國聯.....	何一鳴
中俄復交問題.....	何一鳴
東北之收復.....	何一鳴
統一軍權與封建割據.....	何一鳴
廢止內戰與澈底肅清封建勢力.....	何一鳴
蘇俄第一五年計劃的結算.....	呂振羽
帝國主義時代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	徐 翦
德國法西斯蒂運動批判.....	孟 倫
世界經濟恐慌之一般底檢討.....	鍾懷璋
英雄與領袖.....	子 樵
日本帝國歷年戰費支出的調查.....	鍾辛茹
中國在國際上的敵人與友人.....	白 民

1. 統一商業機關，這可以免除多頭的自由競爭的浪費，成立穩固的繁榮的基礎。並且商業機關統一後，社會可以有一個具體組織的偉大力量去調劑生產與消費，永遠保持生產與消費之間平衡發展的關係。至於統一的方法，除各產業部門成立各種社會主義性的托拉斯的組織外，更可以成立各級國家批發所，中國家採辦了各種商品，然後再普遍地有組織地分發給各商業機關去銷售，去供給消費，遇到必要或可能的時候，國家還可以擇地設立省縣市鎮各大規模的百貨商店呢。

2. 厲行消費合作制度，可以使民衆的便宜的金錢去按

照的價格購得商品，不致再受舊式商店「貴賣」的損失，同時消費合作制度普遍的成立了後，一方面是有組織的去供給消費，另一方面則正可以說是有組織的去開闢市場發展生產呢。

3. 厲行生產合作制度，可以免除私人操縱經濟的流弊，平民的小資本的生產在不致再因急求脫售而把物品價格盡量降低，遭受舊式商店「賤買」的損失。並且實行生產合作制度以後，生產因得了合作的基礎，生產的發展更加猛進了。

(每本售價壹角五分郵費在內通)
 (信處北平南長街土地廟一號)

國民黨的歧途與正道..... 屏金
理論與行動..... 生聲
民生主義與建設國家資本..... 群

第二期

時事論評

整頓田賦與發行共債..... 長清
廬山會議與勳匪..... 明
康藏問題..... 民
東北關稅問題..... 悟

對於孫科一抗日救國綱領草案的評價..... 悟
附錄廬山會議蔣先生對五省軍政長官訓話..... 民

中國封建制度研究..... 慰
評李一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 生
在革命的立場上檢討中國軍隊問題..... 太
現代列強國家全武裝之狀況..... 流
敬錄孫總理語誠黨員訓詞..... 耿

第二期

時事論評

洛桑會議或立協定的動力..... 長清
評牛蘭案..... 明
讀蔣介石氏明志閣議的談話以後..... 陳
辯法及其在政治上的應用..... 勞
評楊廉教授一國難與教育改造..... 屏
各國勞動婦女運動之概況..... 火
中國學生運動之史的發展..... 梅
東北義勇軍抗日方略的檢討..... 女
第四期..... 士

第四期

時事論評

「廢止內戰運動」評議..... 火
日本出兵熱河..... 方
普魯士政變..... 原

第四期

時事論評

東方弱小民族爭底新趨..... 曼
調政與憲政爭論的表裏..... 君
怎樣復興十三年的革命精神?..... 陶
建設新的中國應有的覺悟和感想..... 若
勤匪計劃的商榷..... 希
△告日本勞苦士兵(小詩一首)..... 聖

第四期

時事論評

△告日本勞苦士兵(小詩一首)..... 神
..... 州
..... 之
..... 春

第四期

時事論評

△告日本勞苦士兵(小詩一首)..... 瀟
..... 寇
..... 田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評議

中宣

前言

第一章 對於報告書敘述東北事實之申論

一、九一八事變責任之判明

1. 揭開所謂「自衛」的幌子
2. 事變擴大證明日本為侵略者
3. 蓄意破壞國聯盟約證明日本為侵略者

二、傀儡組織之本來面目

1. 日本一手製造之傀儡組織
2. 傀儡組織之實質究竟何在
3. 中國人民絕對否認傀儡組織

三、闡明東三省為中國之領土

第二章 對於報告書批評中國現狀之辯正

一、中國現狀調查團未認識清楚

1. 「要求國際地位平等」與「排外」之意義有別
2. 「國際合作」與「國際共同發展實業」之性質不同
3. 失態之批評與矛盾之敘述
4. 中日對外政策與教育方針之比較

二、所謂中國共產黨之真相

1. 所謂中國共產黨之性質
2. 所謂中國共產黨之理論與行動
3. 所謂中國共產黨之現狀

第三章 對於報告書責難經濟絕交之辯正

一、抵貨係人民愛國心之發動與黨部政府無關

1. 抵制日貨決非中日衝突之重要原因
2. 認國民黨為主動與組織經濟絕交之錯誤

二、經濟絕交之根據與抗日宣傳之由來

1. 經濟絕交為盟約所許且有法律根據
2. 抗日宣傳乃由於日本武力侵略所激成

三、評中日經濟合作與國際協定抵貨之主張

第四章 對於報告書解決東案建議之駁議

一、顧問會議與外國顧問

1. 顧問會議產生上之矛盾
2. 顧問會議產生上之困難

3. 顧問會議職權之偏頗

4. 外國顧問為遷就既成事實

5. 外國顧問即變相國際共管

二、「滿洲自治」之不當

1. 民族自治及民族自決之意義與範圍

2. 「滿洲自治」違反民族自決之意義

3. 「滿洲自治」為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

三、撤廢東北軍備之無理

1. 軍備與國家主權之關係

2. 東三省不能撤廢軍備

3. 撤廢東北軍備即係損害中國主權

四、樹立中日新約之評議

前 言

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事件，實為掀動險惡風潮之開端，非惟遠東局勢已呈極度不安，即世界之永久和平，亦遭蒙莫大之危害；究竟國際上以信義相守之條約是否由此撕成廢紙，全人類日夕祈求之幸福是否由此絕望而毀滅，胥視此次糾紛之解決能否合於公理正義之要求。

當去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始，中國依據國聯盟約之精神，即採用和平之方式，將事變本末申訴於國聯行政院請求公斷，使是非曲直得以分明，冀能制裁橫暴以消弭戰禍。自是，東案乃由國際聯盟受理，舉世之目光遂亦專注於國聯解決東案所採之態度。蓋國際聯盟產生之由來，原為防止國際戰爭，而促進並維護世界永久和平又為其最終之目的，故對於日本軍事侵略之行動，世人固切望其能以公正之方法，作毅然決然之措置也。

1. 關於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

(a) 對樹立新約原則可以接受

(b) 建議辦法殊難同意

(一) 忽略法律方面之審察

(二) 建議各節為超二十一條之新局

面

(三) 將中國權利贈送日本

(四) 大償日人所欲

(五) 不適合於公斷人之合法形式

2. 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與互助條約

3. 中日商約

第五章 結論

然而，東北淪陷於日本武力劫持之下，種種暴行，發揮無遺；國際聯盟雖屢加干預，一再決議限令日本撤退佔東三省之軍隊，無如事實上日本政府不僅無履行撤兵諾言之誠意，更驅使其軍隊擴大佔領之區域，且日益顯露其政治的陰謀。日本甘冒不韙為世界和平之魔障，國聯有無解決此案之力量，乃成為國聯維持其自身存在之絕大關鍵矣。

計自去年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決議日本軍隊限期撤退，日本未為履行，十月十三日至廿四日重開會議，亦限令日本從速撤兵，因日本反對，決議未得結果，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日又在巴黎開會，達四星期之久，始有決定遣派調查團實地調查中日爭端之舉；此後於今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九日開會一次，三月三日至四月三十日，

並舉行特別大會會議。在此場合，世界輿論，以國聯已遣派調查團，認為國聯調處糾紛尚有所待，復移其注意國聯態度之目光，轉注意於調查團調查之結果；希望調查團本其擁護和平伸張公理之道德的使命，能供給國聯以真確事實之證據，尋覓適當公允之解決途徑，對於強暴者能予以懲處，對於委曲者有相當補償，以維護國聯盟約之威信，而樹立世界永久和平之根基。

三月初，調查團東來，旋即往東北作實地調查，辛勤工作之結果，費去七個月之光陰，卒草成洋洋十數萬言之報告書，於十月二日向世界公佈節要，十月十三日公布全文。此項報告書共分十章，包括所敘述之事實及其建議之意見。報告書發表以後，日本政府即堅決表示其拒絕接受之態度，中國政府之意見，從負責當局談話中，亦可窺見其注意之深切。蓋以報告書關係今後遠東局勢者甚重且大；

第一章 對於報告書敘述東北事實之申論

一、九一八事變責任之判明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時，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軌道旁突發巨大之轟炸聲。日本駐紮關東之軍隊得此信號，遂開始實行其充分準備之計劃，迅速襲擊毫無抵抗之北大營中國駐軍，旋即佔據東三省政治中心之瀋陽城。

九一八事變之發生，為日本武力佔領東三省之初步，為遠東擾攘局面之起點，為動搖全人類和平幸福根基之開端。在嚴重的國際現勢中，已明示其關係之重要；是則事變責任之究應誰屬，實為不容忽視之問題，必須確切判明，始可尋求解決中日問題之方策；進一步言，必須制裁應

中日糾紛之是非曲直，固以此報告書為衡，而國際聯盟今後之命運如何，亦將決定於報告書內容之所指示是否完全適合公理正義之要求。故報告書所敘述之事實及其建議之意見，果能完成其任務與使命耶？果能據為解決東案之合理的根據耶？實為今日最堪注意之一事也。

國內外輿論界於十月二日以後發表之評論，已連篇累牘，然能舉其得失作一有系統有條理之批評者，不可多觀。竊以東北事件之解決，國聯責無旁貸，但若昧於事理，誤其觀察，則影響所及，將益迷或其途徑；故吾人對於報告書之所云，亦應探索其究竟，而加以公正之評議，藉供國聯參考之資助。爰就報告書列論各點，分別項目，加以申述及辯正，俾吾國外交當局鑒於折衝之困難，得為方針之預定；同時並指陳要點於全國國民之前，俾明辨利害，確定其努力之方向。斯篇之作，或亦國人之所樂觀歟！

負責任之一方，而後乃能維護公理正義，消滅未來之一切危機也。

1. 揭開所謂「自衛」的幌子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敘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經過，根據真確事實加以充分研究，發表結論曰：「本調查團曾得一種證明：日方於事前確有充分計劃以應付中日間萬一發生之戰事。此計劃於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之夜見諸實行，迅速證確。中國方面遵守上峰之訓令，既無進攻日軍之準備，在彼時或在該地亦無危害日人生命財產之計劃。對付日軍並未集中應戰，亦未奉命開火，故於日軍之突擊及其以後

之行動，莫不認爲詭異。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至十時半，在路軌上或路軌旁發生炸裂事雖無疑義，惟鐵軌縱有破壞，實際上並未阻止長春南下列車之準時到站，斷不能引爲軍事行動之理由。故……日軍在是夜所採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爲合法之自衛手段。」調查團確立此段公允之結論，實已完全揭開日本政府所謂「自衛」的幌子，此實爲調查團報告書乘其正當使命所得最大成功之一點。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本政府依其預定之計劃，即向國際間屢作事變發生之起因由於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之聲明，認日軍之行動爲「自衛」的措置。此種「自衛」的幌子，日本政府不獨用以騰諸口端，且時形諸毫墨；計自事變以來，其以「自衛」爲言者，已不一而足：如十月十一日對中國政府抗議中國人民抵制日貨，則曰：「此次滿洲事件，乃中國之多年排日思想，對我國的軍隊挑撥的態度使然，此乃我軍方面自衛之措置，日本政府業已聲明在案，故中國政府對此案當然須負其責任。」十月十三日對日內瓦國際聯盟會之宣言，則曰：「當九月十八日事件發生時，日本司令官所採之辦法爲合法的防衛手段，以任何代價避免威脅日本在滿洲地位存在之緊急危險。」十月十四日對中國政府抗議日軍飛機在錦州拋擲炸彈之答覆，則曰：「此事因接有貴國方面在錦州糾合軍隊，計劃擾亂滿洲沿線治安之報告，日軍飛機前往偵察，受中國軍隊之狙擊，予以反擊，此乃我方自衛上當然之行爲。」十月二十一日對國聯理事會各國政府請求日方注意非戰公約之通牒之答覆，則曰：「此次滿洲事變，完全由於自衛權發動之措置，帝國政府並無用戰爭手段解決懸案之意思。」蓋日本政府以「自衛」爲絕妙好詞，藉此「自衛」幌子之遮

掩，企圖淆惑國際之觀聽，卸脫其侵略戎首之責任也。

然而，日本政府所謂「自衛權之發動」，果能遮掩其侵略之暴行耶？在國際法上自衛權之解釋，近世國際法學者之意見及國際上之先例，固已有明顯之共同觀點與標準矣。自衛權之行使，僅限於絕對必要的急切情勢的條件，同時不得超過於必要保護自衛行爲之外。換言之，其條件必須危險之情形極重大而急迫，萬無暇從容考量，又無其他方法可以救濟或避免，同時所在國亦實無力量可以控制此種危險，而被害國所受之危害與其應受立刻之保障，較所在國主權之利害已達至更爲重要之情勢時，始能引用自衛權，採取非常行動。但其引用之範圍，亦有限制，即因自衛而採取之非常行動，絕對不許逾越情勢所十分切要之程度，若逾越當時情勢所需要之程度，則非常行動已非必要。凱洛 Kellogg 氏曰：「保護她的領土，防衛攻擊或寇之行爲，謂之自衛權。」可知自衛權行使之條件與範圍，原有一定之界限。如一九二五年希保事件，即爲極好之實例。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希國有一哨兵在邊界被殺，遂造成希保兩國軍隊之正式衝突。當希國軍隊攻入保國邊界佔領其領土時，希國即宣稱此種行動爲自衛權之行使。國聯理事會爲解決此案而組成之委員會，在報告書中關於此案之解釋曰：「希軍司令官在她的領土之內，有用武力壓制入寇之權，但是在……地位業已穩固之際，她保守她的邊境一方足矣，初無深入保國領土之必要。」又曰：「希國地方長官及政府判斷適合於她的安全，在她的境界之內有採取軍事行動之權。反之，希國政府沒有派遣軍隊侵入保國領土之權利，因爲在邊界地帶領土之內採取安全手段已經完全足夠，若希國爲重行佔領一駐兵地，而施以大規模

之攻擊，以爲非如此不能阻止對方之攻擊，此是不能承認爲必要的。』理事會最後判定，「爲自衛而侵犯保國領土之理由是不成立的。』根據自衛權行使之正當解釋及國際上之先例，則由於日本實行武力發動之九一八事變，決不能認日本政府所引用之自衛權爲正當。因日本發動之暴行地點全在中國領土以內，而中國方面又始終無危害日本之準備，中國軍隊更絕無準備攻擊之事實，即南滿鐵路被炸一節，亦不足以引起極重大而急迫之危險情形，且在此場合中，救濟方案甚多，萬無採取非常行動之必要。縱如日本自身認爲當時已至最急迫之情勢，但日軍亦祇得在此發生事變範圍之內，採取其認爲必要之手段，設法使其停止而已；乃日軍行動竟超出於防止破壞鐵路之必要限度以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強佔毫無抵抗準備之瀋陽城。如此明顯的有計劃之大規模軍事攻擊，尙可視爲自衛權之行使乎？况九一八之夜，日軍行動不僅在瀋陽一地表現其橫暴，誠如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所云：「所有滿洲全部日軍以及若干朝鮮駐軍，於九月十八夜在南滿鐵路自長春至旅順一帶區域內，幾乎同時發動。」益可證明日本政府之狹飾詭辯爲強詞奪理！今調查團報告書已指責日軍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的自衛手段，則日本政府以「自衛」爲侵略的幌子，已完全揭穿，日本即不能逃避其應負之責任矣。

2. 事變範圍之擴大證明日本爲侵略者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未明白指出日本爲侵略者，此在日本朝野上下引爲最可安慰之一事；但日軍之行動已非「自衛」，其反面之正確概念，即爲「侵略」，毫無疑義，今報告書避開此字不用，就調查團之職責言，實爲莫大之憾事！

雖然，日本侵略中國之爲絕對的事實，固極明顯也。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日軍擴大範圍之暴行，即爲日本侵略中國之真憑實據；此種種暴行，調查團報告書已分別敘述。茲更分析言之如次：

日本軍隊在有充分計劃的指使之下佔有瀋陽，南滿鐵路線之重要城鎮，均同時發動，其他各交通線，亦完成其迅速之佔領：計南滿線如遼陽，鞍山，海城，蓋平，復縣，長春等處，安奉線如本溪，鳳城，安東等處，吉長線如鐵嶺，開原，公主嶺，長春南嶺等處，及四平街，營口，撫順等處，均於十九日同時佔領，他如永吉，敦化，新民，通遼，溝帮子，洮南等處，先後於一週間，完全佔領。日本軍隊於中國軍隊毫無抵抗之下極力擴大事變之範圍，侵佔中國領土至二百萬華方里之廣大面積，其爲侵略行爲，乃顯而易見之事實。

抑日本軍隊佔據遼寧及吉林以後，一方面派遣大批海軍艦隊分赴中國沿海各港，實施其威脅政策，舉彼日本政府對於九一八事變會稱爲地方事件之聲言而不稍回顧，不恤在各處挑釁以遂其破壞進擊之機會；一方面則製造侵略組織，以爲併吞之企圖。天津暴動事件之結果即爲日軍將校士肥原揆走廢帝溥儀，而成今日傀儡組織之所謂執政。凡此嚴密之布置，周到之用心，豈非日本預有侵略計劃之明證乎？及後錦州之襲擊，哈爾濱之佔據，及煽動張海鵬，資助凌印清諸項事實，無不明目張膽進行侵略計劃之實現。自經嫩江橋之役，且進佔齊齊哈爾與黑龍江之其他各地；淞滬戰事方停，又有由錦州進窺熱河，覬覦華北之陰謀。最近更誣指散處東三省各地忠於中國國家之義勇軍爲土匪，實行大規模之征勦；尤濫用飛機之威力，隨處拋擲

炸彈，傷害無辜之民衆，日本軍隊已盡量發揮其戰鬥行爲矣。至於日隊掠取公私財物，凌虐良善居民之非法措置，調查團報告書亦概乎言之，苟日本不以中國之東三省爲征服地，奚敢如此妄作妄爲！

要之，日本引起九一八事變之暴發，即有擴大事變之計劃，其在東三省及津滬各地之暴行，已充分顯露其侵略之野心。調查團報告書雖未加日本以侵略者之名，而細察報告書所敘述各節，字裏行間，實有極清楚之侵略概念寓於其中，日本爲侵略者，乃成定論，固無待詳爲解說也。

3. 蓄意破壞國聯盟約證明日本爲侵略者

茲更從日本蓄意破壞國聯盟約之事實，以爲日本實行武力侵略之真憑實據。

誠如調查團報告書所敘述，中日爭執之種種問題，均爲中日間發生齟齬之原動力；然試問日本所憑藉之口實，凡此種種爭執之問題，果足以引起九一八武力發動之事變乎？日本政府借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軌道之轟炸爲啟釁之藉口，已濫用自衛權之行使，復極力擴大事變之範圍，侵略暴行，百口莫辯；若再從國聯盟約所規定之義務以衡日本政府應負之責任，則日本政府蓄意破壞國聯盟約，爲侵略之戒首，又極明顯也。

中日發生之爭執問題，自歷史上觀之，由來已久，問題雖云繁瑣，撮其要者，不過四端，一曰鐵路問題，二曰商租問題，三曰萬寶山事件，四曰中村事件，此乃九一八事變之原因，即調查團目爲重要之原動力者。茲先就鐵路問題言之：可分爲兩類，一爲日人欲擴張其鐵路勢力範圍，一爲欲壟斷南滿鐵路之利益，前者即吉會鐵路與長大鐵路問題，後者即打通鐵路，濱海鐵路，吉海鐵路及葫蘆島築

港問題。吉會鐵路爲日本處心攫奪之鐵路，以其關係於軍事經濟的政治均極重大，四十年來日人寤寐以求之，所謂「兩港兩路」，所謂「滿鮮一元」，無處不流露其絕大之欲望；今因中國未實行建築，無由達其野心，乃轉恨我國無履行契約之誠意。長大鐵路亦爲日本處心積慮，極力經營之鐵路，在經濟利益上顯示其有偉大之價值，日人不恤以卑劣手段，攫取非法權利，冀能達其目的；今因中國實行鐵路網計劃，毅然自行建造，致遭日本之忌，積怨在懷，遂形成東三省事件爆發原因之一。打通鐵路，濱海鐵路，吉海鐵路均爲我國自建之鐵路，日本認爲南滿鐵路之平行線，影響其收益，會屢次提出無理之抗議；益以我國近年積極進行葫蘆島築港工事，認爲乃南滿鐵路及大連商港之大敵，更深憤懣。日本以南滿鐵路爲侵略滿蒙之幹線，對於中國在東北之鐵路建設，胥視爲敵意行動，蓄意攔奪或破壞，遂釀成東三省事件爆發之又一原因。至於商租問題，發生於日本以武力威脅訂立之二十一條件，此條件始終爲中國人民所反對，日本執此條約以蠶食東三省之土地，自易引起糾紛，且東三省官吏已有法令限制，日人不能飽其慾望，久懷怨望，亦爲釀成東三省事爆發之原因。關於去歲日本代表芳澤在國聯答覆白里安撤兵之問，其所列之條件，第四條第五條即爲鐵路問題及商租問題，可知日本用意所在，完全欲以武力爲解決種種爭執問題之手段。若萬寶山事件，則爲日本袒護韓人貫澈其移民政策所引起，日人利用此種機會，並煽動韓人在朝鮮慘殺中國僑民，使風潮擴大，俾便乘機打劫；故隨即有中村事件之喧擾，以造成中日衝突之嚴重情勢。日本政府處此時機，竭力鼓勵其軍民之憤慨，東三省事件遂於九一八之夜在日

本週密計劃之下爆發矣。

雖然，中日發生爭執之種種問題，基於國聯盟約第十二條之規定，「倘盟員國間發生爭端，可使邦交決裂者，應將此項爭端，提交公斷，或依司法手續解決，或交理事會審查。」同條，「無論如何，非俟公斷員或法庭之判決，或理事會報告後，三個月屆滿前，不得從事戰爭。」日本苟無武力侵略之野心，儘可依據和平的合法的方法以求解決，初無緊急採用戰爭行為之必要。其關於條約爭執部份，照國聯盟約第十三條之規定，亦可交由國際常會設法庭處置。國聯盟約之規定，凡為國際聯盟之盟員國，均有遵從之義務。在種種中日爭執問題中，日本所認為發生爭執之理由，倘屬正當，均在國聯盟約所規定各條款保護之內，日本自應照盟約之規定，以期得到保護之滿足；乃日本始終藐視國聯盟約之神聖，蓄意破壞之，不和平解決，違用盟約所禁止之武力行動，實行武力之侵略，此種違反國聯盟約之責任，豈容漠然忽視？

調查團報告書對於中日爭執問題之敘述，亦稱「就此間所云，此方或彼方意圖解決各案之努力觀察，即可知一部分之努力，係欲以正則的外交交涉及和平方法，解決各案。而此項和平方法，則尚未用盡……」，日本政府即從事「除武力解決無他法」的鼓吹，其存心採用武力侵略，蓋彰彰明甚。至於所稱爲九一八事變之導火線的中村事件，報告書且證明中國方面圖求解決之努力，謂「……意圖解決本案之外交交涉，直至九月十八日之夜，事實上均仍在順利進行之中。」然日本已迫不及待，迅速實行其有充分計劃之戰爭行動，爆發九一八事變矣。

由於上述各節之說明，調查團報告書已完全揭露九一

八事變之經過真相，日本政府欲再以「自衛」遮掩其「侵略」行為已不可得，國際聯盟爲貫徹保護世界和平之初衷，及維持其自身存在之意義，根據報告書所敘述之事實，判明日本破壞國聯盟約之規定，應負九一八事變之責任，洵爲今後必要之圖也。

二、傀儡組織之本來面目

1. 日本一手製造之傀儡組織

日本以武力佔領東三省後，隨即依其預定之計劃，着着從事於「滿蒙獨立運動」之進行，期在東三省樹立傀儡政府，使之脫離中國之統治關係，以達其實行吞併之目的；此種陰謀，蓋舉世所稔知者也。其進行之步驟，一方面極力捏造事實，散播謠言，以淆亂世界人士之耳目；一方面脅誘少數漢奸，使爲傀儡，以宰制東三省人民，形成所謂獨立運動之基礎。此項預定之計劃，在佔據瀋陽之時即有立刻實行之勢，曾強迫前遼甯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贊助獨立，而被拒絕，臧遂被逮捕拘禁；其後，日本政府復藉維持地方治安秩序之名，籠絡少數利慾薰心之士紳如袁金凱，于冲漢，趙欣伯之流，進而爲自治性質之組織，日軍關東軍司令部即設立「自治指導部」以扶助各地自治機關，而供利用，并分派日本官吏散居各地以便監督指導；自是吉林，黑龍江及哈爾濱等處，因日本軍隊佔據領域之擴大，一切非法組織亦隨之增多，乃由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威脅一般叛逆分子，舉行「建立新國」之會議，一切組織方案，均依照本莊繁之暗示而被宣告成立。日本在東三省方面之布置，至此已臻成熟，乃借端引起淞滬戰事，轉移國際視線，即於此時實現傀儡組織，完成所謂「滿洲國」建立之滑稽劇。此幕日本排演之趣劇中，有最堪發噱之數

事，一爲首席傀儡溥儀「執政」之被挾走，造成國際政治場中最可恥笑之記錄。先是廢帝溥儀原寓天津日本租界，東三省既被日本武力佔領，日本即藉故擾亂天津，派土肥原誘脅溥儀赴瀋，溥儀恐懼萬分，未即承允，土肥原乃投炸彈以恐嚇之，並斷絕其寓宅之水料供給以窘迫之，旋即乘亂強挾溥儀登日本輪船駛赴大連，武裝監視於日人開設之大和旅館內，旋由本莊繁派遣之僱用代表表演安排妥貼之三次勸駕後，始在本莊繁親任式下完成其傀儡登場。一爲瀋陽舉行之全滿會議，充分表現強奸民意之怪狀，證實日本政府之卑劣行爲。原來東三省各地已在「自治指導部」領導之下，從事促成獨立運動之活動，各種醜態，陸續表演，如運動大會，示威遊行，響應通電，代表請願諸般把戲，均一一遵照日人之計劃，如法泡製。繼瀋陽，吉林，齊齊哈爾各處之會議後，又有所謂表示民意之「全滿會議」之召集，此會亦由「自治指導部」發起，所有參加份子，除大部分爲日人外，其餘即爲旅居東三省之朝鮮人及少數叛逆漢奸，由此御用會議決定推舉溥儀爲首腦，旋即通過預擬之宣言而散。日本據以宣揚爲「滿洲」民意之一致，以迷亂世人之聽聞。此趣劇中有聲有色之布擺，即今日所稱爲「滿洲國」建立經過之寫真！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對於所謂「滿洲國」之建立，詳細分析其歷程，乃作極嚴正之結論，所有日本播弄捏造之虛偽事實，在報告書中，均揭露無遺。其言曰：「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在日本軍事當局之行動中，不論在軍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爲濃厚。日方逐步以武力佔據東三省，使齊齊哈爾，錦州，哈爾濱，及最後滿洲境內一切重要城市，脫離中國之統治，並於每次佔據之後，

即將該地民事行政機關改組。故獨立運動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滿洲從未聽得；所以能有此項運動者，僅由於日本軍隊之在場。甚爲明顯。……日本新政治運動有密切關係之現任或已退職之日本文武官吏，會考量，組織，並實行此項運動……該官吏等利用某種華人之名義及舉動，并利用不滿從前政府之少數居民，企圖達到上述目的。日本參謀本部自始或至少在短期內，明瞭此項自治運動之可以利用，又毫無疑義。故該部對於獨立運動之組織份子，予以援助及指導。調查團認爲滿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證據，確信助成滿洲國成立之原動力雖有若干種，但其中兩種，即一爲日本軍隊之在場，一爲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兩者聯合，發生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斷，若無此兩者，新國家不能成立。其此理由，現在政體，不能認爲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調查團此節正確之立論，誠足以使世界人士認識「滿洲國」產生之由來，實完全爲日本一手所製造。

2. 傀儡組織之實質究竟安在

「滿洲國」之傀儡組織，純爲日本軍人與官吏包辦而成，不僅非出自本欲東三省三千萬中國人民之意志，且爲東三省三千萬中國人民所絕對否認；即傀儡溥儀就任偽執政，亦未必純出本人意志，特日本欲用爲工具，百端誘脅，故被一時利用耳。現傀儡組織之大小機關，皆爲日人所把持，發號施令，黜陟隨意，一切大權，均歸掌握，而一般傀儡不過俯首帖耳聽其支配，重要行政殊難過問。計操縱傀儡組織政權之日籍官吏，其來源約可分爲三類，一爲滿鐵會社派出之社員，二爲日本政府直接調派之官僚，三爲日本國內新入政界之大學生。由滿鐵派出之社員，大都

爲傀儡組織之幹部人員，由日政府派出之官僚及大學生，則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分發各縣地方，掠取政權，與傀儡幹部遙相呼應，以宰制東三省人民。此輩日本官吏，揚言採取屬地主義，在何地方作事，即屬何地方人，其用意無非欲使彼輩所作所爲，在表面上避開與日本政府之直接關係。關於此事，在所謂「滿洲國」國務會議席上，曾引起日籍官吏之入籍問題，被迫爲傀儡之熙洽等曾有若干意見之陳述，但即遭日籍顧問駒井嚴詞申斥，並謂「凡居留滿洲之日人，均由鐵血換來，自應確實新國國籍，無審慎討論之必要。至於是否脫離日本國籍，日人自有權衡，毋容第三者過問。」此種雙重國籍之怪象，實爲日人在東三省爲非作惡之一種護身符。日人居心如此，所謂「滿洲國」之實質與前途，蓋不問可知矣。

調查團報告書對於所謂「滿洲國政府」之批評，亦明白指出其爲傀儡之性質。其言曰，「……該「政府」及行政機關，其各部名義上之領袖雖係居住滿洲之中國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權，則仍操諸日本官吏及日本顧問之手。該「政府」之政治的及行政的組織，不僅予此項官吏及顧問以供獻專家意見之權，抑且予以實行管理及指揮行政之機會。此輩……遇重要問題發生時，……遵照日本當局之意向行事。此當局者，因其軍隊佔領滿洲土地，而「滿洲國政府」又依賴該軍隊維持其對內對外之權威，同時「滿洲國」管轄下之鐵路又委託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代行管理，最後又以有日本領事駐在重要城市以通聲氣，是以無論遇何時機，彼日本當局者均有運用其絕大力量之法。「滿洲國政府」與日本當局之聯絡，自最近派遣專使後，更覺密切。」由此觀之，所謂「滿洲國」者，其實質

究竟安在？謂非日本利用之傀儡組織，其誰信之？調查團公允真實之申說，即爲供獻世界人士觀察所謂「新國家」本來面目之純正的報告，由此可以獲得澈底之了解。

3. 中國人民絕對否認傀儡組織

調查團報告書更直率說明中國人民對於傀儡組織之態度，其言曰：「一般中國人對「滿洲國政府」均不贊助，此所謂「滿洲國政府」者在當地中國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良以日本製造傀儡組織之時，彼邦政府當局，屢次宣稱「滿洲國」之產生，「爲「民族自決之表示」，爲「中國分離運動之結果」，內田外相更強詞奪理謂「滿洲人民自覺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運動，對於舊東北政權所引的暴虐而崛起，遂建設獨立國家。」此種詐巧之飾詞，絕不能抹殺事實之真相。觀於東三省三千萬中國人民之不肯屈服於日本暴力之下，各地義勇軍之風起雲湧，及其前仆後繼之奮勇精神，即可知東三省絕無與中國分離之意向，日人以民族自決之新名詞炫耀世界，徒顯示其手段之醜惡耳。

抑日本當局又嘗謂「滿洲獨立運動有多數歷史上之先例」，強指建立所謂新國家，爲「自然趨勢之結果」；此項荒謬之見解，亦經調查團報告書指出其錯誤，證明「以前東三省地方政府對中國中央政府，雖曾屢次宣布獨立，願其人民悉與中國相同，固未嘗有與中國脫離之意。」則日本假借往昔中國內部之偶然的紛擾，強指爲民族分離之證據，企以掩飾其橫暴行動，適足以顯露其心勞日拙而已。故日本以暴力分離中國之毒計，可斷言其徒勞無益。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發表以來，所謂「滿洲國」之真相，已大白於國際之間，日本存心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

，顯然違反國聯盟約之規定，自應負其完全之責任。中國人民對於此項傀儡組織，絕對的永遠否認其存在，終必以最大之努力，斷然根絕日本之野心，而收回中國固有之東三省也。

二、闡明東三省為中國之領土

調查團報告書不嫌繁複，迭以「東三省為中國領土之一部」為言，實足以闢日人「滿蒙非中國領土」論之狂妄。蓋日人沈酣於世界霸王之迷夢，欲暢行其傳統之大陸政策，對於東三省土地之侵略，久已懷挾莫大之野心，欲將中國主權，排除於滿洲之外；故自彼邦矢野教授發表「滿蒙非中國領土」一文後，此等荒誕不經之論，一時風靡三島，並據為宣傳資料，企以淆惑世界之聽聞。茲特申述中國史實，藉以闡明東三省為中國不可分離之領土，並以反映日人捏造謬論之陰謀。

從東三省之建置歷史言：東三省因民族活動而構成之史蹟，殆已三千餘年。黃帝劃天下為九州，遼寧省屬於冀，青二州；大禹治水後，分冀州東部恆山之地為并州，東北暨無閭山之地為幽州，又以青州東北遼寧之地為營州。夏，殷復黃帝之舊，又併青，冀。周興，封建諸侯，是為燕國。戰國時仍其舊。國策蘇秦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北饒碣石，雁門之勝，南有栗，梨之利，真天府也。」可資參證。秦置郡縣，以幽為遼西，蒼為遼東，秦，楚之際，復為燕國。漢仍其舊，以雁門，太原至遼陽為燕代國；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魏時改州。晉有天下，分十六州，幽州，平州多即今遼境。太興時封鮮卑慕容廆為遼東郡公，廆子皝，自稱燕王，後竟稱帝，旋亡於苻秦。

五代時，後燕，北燕，東魏，西魏，皆今遼地。隋代除營府外，多沒入高句麗。唐興，分天下為十道，其河北道統二十二州，營州，遼州屬焉；後平高麗，置安東都護使，所治幾盡屬遼寧省境。渤海大氏興，睿宗拜其酋祚榮為渤海郡王，以其所總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其後分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在遼境者為龍原，南海諸府，鴨綠一府則奄有朝鮮。兩宋之世，契丹，女真，盡據東北；迨遼耶律氏興，襲渤海之舊，置五京五十六軍州，大半皆在遼省疆域。金興，代遼分其地為四路，且及今熱河之建平，元入主中國，立十一行省，其在東北者曰遼陽省，征東省則併高麗矣。明初奠定邊疆，設遼東都指揮使司，統興州，營州，建州等廿餘衛，除朵顏屬熱河外，其餘各衛皆遼境也。清愛新覺羅氏崛起建州，肇基興京，後都瀋陽，號曰盛京；順治元年入關定鼎，仍以盛京為留都；光緒三十三年建省，與中國本部十八省劃一制度，計轄八府，五直隸廳，三廳，六州，十八縣。民國以來，增設縣治甚多，十八年全國統一後，省名由奉天改稱遼寧，領有五十九縣。至於吉林省則在古為肅慎國，周初即以其楷矢貢至。漢武帝嘗納降，以其地為蒼海郡；漢魏之際，仍復肅慎之稱，為挹婁夫餘諸國，納貢內附，史乘迭載。至晉時，肅慎更號為勿吉；隋稱靺鞨，分為七部。唐以其地為燕州，迄渤海大氏興，分置府州，在吉境者曰龍泉，扶餘，東平，長嶺，率賓諸府及凍州，終唐之世，及於五季，貢使不絕。其後契丹，女真以至遼，金，均以其地為根本重地。元興則屬遼陽省之開元路及合園府，水達等路。明時為奴爾干都司治地，所屬凡十一府，三州，五廳，十八縣，乃全具行省規模。民國改制，今領四十一縣，一設治

局。若黑龍江省，在虞夏，殷，周之時，其在南部與吉林同爲肅慎氏之國。中古時爲挹婁國；迄魏，晉之世，與中國交往機會尙少。隋時靺鞨所屬七部中，黑水一部即今黑龍江流域。唐時內附，建其地爲黑水州，旋改稱府，並賜其酋姓名李獻誠，先稱濛利州刺史，繼領黑水經略使，幽州都督，至是黑省始爲中國領土。渤海大氏建府州時，在黑境者爲嫩江一帶，其西境則爲室韋五部所據，隸於安東都護府。遼興分其地隸長春州，別於東境置鐵驪諸部族節度使，西境置突呂不室韋部及烏古室韋部諸節度使。金時廢部置路，蒲輿路爲今龍江嫩江之地，北京路爲今呼倫廬濱之地，上京路爲今呼蘭，肇州，大賚，安達之地。元主中國，太祖以黑省封其弟乃顏，自今呼倫池以東，洶爾河南北，嫩江東西，皆屬之。明興則屬奴爾干都司所轄，至明末沒入索倫，達呼爾兩部。清初，兩部乃以其地內屬，順治時統於留都之盛京；自光緒二十年後，即仿內地行省治理，至宣統時凡轄七府，六廳，一州，七縣。入民國增設縣治，今領五十三縣，內設治局十一。

從東三省之民族源流言：今日東三省之民族，爲土著及久居移民兩部所構成。既立於平等之地位，迭經同化，畛域久已泯滅，特仍有少數以生活狀態之不同，於人種學上存立其位置而已。漢族自燕將拓地，遼東置郡，固已早有遺留。比至烏桓內附，鮮卑西遷，東晉以來，所謂東三省民族，已經混合。唐，宋以降，契丹，女真，蒙古，滿洲諸族，陸續雜居中原，往復回旋，形成民族之變化，其事益爲顯著。漢族於明代中葉，渡海越關，遷至東北，滋生繁衍，浸成東三省民族重要部份。故言東北民族，自以漢族，滿族及蒙族爲主，其他各族之裔嗣，則自夫餘，靺鞨以後

，已不復佔有重要位置。東三省民族之所以構成今日之現狀，雖血統上或未完全融合，實有其種種政治上，文化上之同化點。最初，東三省之民族，曰肅慎，曰東胡，曰貉。其與漢族接觸最早者爲東胡，次則貉族，肅慎知名於中原最早，而發生關係則最晚。東胡一支爲山戎，鮮卑，契丹，蒙古，貉族爲濊，貉，夫餘，高句驪，新羅，百濟，肅慎一支則爲挹婁，勿吉，渤海，女真，滿洲。有一族而屢易其名稱者，如肅慎，息慎，稷慎，勿吉，靺鞨；有同族而異其國號者，如金源之與滿洲；有以異族血統相混合者，如金完顏氏之始祖出於高句驪；有以居處相接血統混淆者，如元博爾濟金氏之出於室韋，靺鞨，突厥之混合。故現代之東三省民族，久已畛域漸消，非復三族之舊。漢民族之移居東三省，由來已久，以明朝爲最盛，近百年來又爲一度之擴張。明時以山東布政使司遙領遼東，隔海相望，視若毗連，以故遼瀋各地，漢人已多，大抵浮海而來，習同土著，其時遼河流域已達五六十萬，吉，黑邊境亦多漢人之足跡。滿洲崛起之後，固嘗招致其中壯丁，轉戰四方，別爲勁旅。後因滿清厲行邊禁，移民漸少，直至嘉慶弛禁，又復漸次激增，除累年自行遷入者外，以政治原因加入者爲官莊，站丁，台丁，水手，流人亦復爲數不少，益以舊戶，人丁繁衍，繁榮之漢族，乃確立於東三省之大地。二百年來，自由遷入東三省之族，以沿海關係，舊稱魯，蘇，浙，閩爲多，魯人以地理上之便利，分布最爲廣闊。至於晉人，豫人之早達黑龍江，滇人，湘人之廣集吉林，訥河之鄂人住戶，遼寧各縣之浙省移民，近數年來，豫，陝難民更有巨量之遷入，均爲漢民族在東三省發展之重要記載。今日三千餘萬之東三省人民

，漢民族實居百分之八十以上，白山黑水之間，胥爲中國民族繁衍生息之大好河山，熙熙皞皞以繼續其生命於無窮。

據上所陳，依歷史建置言，則史籍所詳，東三省確爲中國數千年來之舊壤，顯然略無疑義；依民族源流言，則東三省人民，百之八十均屬漢族，即少數之滿族，蒙族亦爲漢族同化之民族，不特語言，文字，風俗，習慣類多相同，血緣所出，且無分向；是則東三省之土地，爲中國之土地，東三省之人民，爲中國之人民，歷史非武力所可變更，事實非空言所可抹殺。况東三省之於中國，內則現行法制固不顯示其爲中國之領土，外則國際約章從無不加規定以爲

第二章 對於報告書批評中國現狀之辯正

一、中國現狀調查團未認識清楚

「要求國際地位平等」與「排外」之意義有別。國聯調查團在中國停留約五閱月，而大部份時間則耗費於調查中心之東三省；其對於我國民族革命運動之根本精神與文化價值，因時間與空間之限制，均不能容許其有詳細研究正確認識之可能。是以其報告書之第一，二等章，對於中國近年來民族運動之描寫，謬誤矛盾之處甚多。此雖屬逾越調查團報告之必要範圍以外之空論；但吾人鑒於此報告書足以影響於世界和平之重大關係，同時此種謬誤矛盾之處，更足予狂妄之日本人以口實，將益肆其簧鼓誣妄之舌，以欺惑世人，是以不得不略加辯正，俾世人對於我國民族革命運動，有相當之認識，不致一誤再誤永爲強暴者所矇蔽。

信守，彼日本自與中國通好以還，所有關於東三省之條約，亦從來認中國爲對手，爲主人，其爲不可變易之歷史的事實，彰彰明甚。何來「滿蒙非中國領土」之怪論？荒誕謬妄，不攻自破也。

東三省爲中國之領土，本無待調查團爲之證明，特以報告書已屢提及，於國際公正輿論之間，亦可以增進世人對日本慣用狡猾手段之深切認識；今東三省問題已因日本陰謀引起極端嚴重之形勢，全人類之和平幸福是否由此動搖而趨於破滅，胥視國聯有無制裁日本橫暴之決心與力量以爲斷！

吾人對於該報告書內容首應辯正者，即調查團對於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之根本精神認識不清，故其立論措辭，俱多遺憾。如該報告書第一章謂：「中國對於外國人士，不願接納，其已在華之外僑，亦加歧視，不免造成不良之結果。」吾人對於此點，不願多所論辯。試問自瀛海棧通以來，就海關貿易冊報告，外人在中國所獲之利益如何？就各處領使館報告，外人在中國所受之待遇如何？如此而猶曰「不願接納」，「亦加歧視」，「造成不良之結果」，不知中國人之至外國，暨中國華僑之旅居各國，又有若何之優越接納與善良之結果也。况中國民族向以寬仁博大爲懷，絕不似日本人之褊狹忌刻，但望調查團諸公對於支配我國四萬萬人民，維繫數千年光榮歷史之王道哲學，與夫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偉大思想，略加研究，則不至輕率詰責

中國「欲堅守其舊文化及領域」為不當矣。

尤可怪者，該報告書不知根據何種事實，竟直指領導中國之中國國民黨為「欲以排除外國勢力之特殊色彩，引入於中國民族主義之中，並將其運動之目標擴大，期將所有亞洲之民族，尙受「帝國主義壓迫」者，盡舉而解放之。此種概念，係受前與共產黨接近時所貼標語之影響。」而其敘述中國國民黨「排外」之行爲的表現則為「要求收回租界，及鐵路區域內外國所享有之行政權及非純粹商業性質之權，又租界及外僑居留地之行政權亦欲一併收回，尤欲取消有約國之領事裁判權」云云。就國際公理言，試問中國國民黨此種要求，為合理乎？抑為不合理乎？為國際地位平等之要求乎？抑「排除外國勢力之特殊色彩」乎？推測查閱此種論調，是直武斷我中華民族無獨立自由之資格，必須受共產黨標語之影響而後方有「國際地位平等」之要求，而此種正當之要求竟又被指為「排外」之明證！吾人聚聽之下，實惶駭驚疑而不能自已。吾人尤痛心者，調查團竟完全誤解中華民族之自覺心與民族性，更進者一步的誣蔑中國「因採取猛烈之排外宣傳，肆意爲之，以致助成發生現時衝突之形勢。」一若此次日本暴劫東三省，中國亦有不能辭其咎者。但調查團同時又承認「一國民既有國家統一之覺悟，則當然具有一種對外解放之願望。」是調查團已明知有對外解放之願望，而又誣蔑為「排外」宣傳。立論之矛盾，莫甚於此。

吾人雅不願推測調查團作此種論調爲別有用心之存在，但就文字之表面而論，調查團絕難避卸其失當攻擊我中國國民黨而有大意爲日人辯護之嫌。至以「排外」二字加諸我國民族之上，將「中國國民黨」與「排外」二字聯爲

一體，認國民黨爲反對外國勢力之團體，更將我全國人民敵視之共產黨與代表全國人民之國民黨拉在一起，謂非黑白不分，多所誣蔑，其誰能信？

調查團亦曾將中國國民黨之對外政策一加研究乎？若曰未也，則容吾人略述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策之根本精神。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策第一條曰：「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國民黨一切對外方針，均以此條爲最高原則，且處處以「合法手續」行之，事實俱在，可以覆案。我國之所求者，明明爲「平等」「互尊」，何來「排外」，何來「色彩」？即當日本加其暴力於我東北領土，繼續在我領土內逞其殺戮恐怖之淫威時，我國政府仍一本其和平原則，信賴國際約章。而我國民乘在此種忍無可忍之情況下，亦僅僅從事於經濟絕交，抵制劣貨；乃此種最低限度之抵抗行爲，而調查團竟認爲「排外」，認爲「不當」。吾不知國際公理之謂何？國際約章之謂何？國際聯合會成立之意義又謂何？

中國人民之所要求者爲「國際地位之平等」。中國爲有文化之民族，不但數千年歷史上從無「排外」之舉動，且敢信今後亦絕無「排外」事實之發生。若曰要求國際地位平等即是「排外」，則準情酌理，豈可謂平？

2. 「國際合作」與「國際共同發展實業」之性質不同

據國聯調查團所述，其本身之任務有二：（一）考察業經提交行政院之中日爭端，包括此項爭端之原因，發展，及調查時之狀況；（二）考慮中日爭端之可能的解決

方法，該解決方法將使兩國基本利益予以調和。調查團爲國聯之代表，其任務又如是其重大，則於執行任務時應如何翔確考察，忠實考慮？然而調查團報告書之第一章，對於我國現狀，即予以失實的敘述及不當的攻擊。如誣蔑中國國民黨之「排外」，曲解民族主義之真義，謾罵我國政治之紊亂與中央權力之脆弱，及誇張的描寫我國赤匪之跋扈等等，胥已越出調查團任務之範圍。不料對我國現狀予以惡意攻擊之後，復擬以可驚之解決條件十種，彌覺遺憾。最後一條，即所謂「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

(14)
其言曰：「中國遵循此國際合作之道，當能得最確定及最迅速之進步。」又謂：「此種政策，可使列強易於供應中央政府之需求，並迅速而有效的贊助中國移去足以危害中國與其餘世界間之和平關係之任何原因。」又謂：「當如孫逸仙博士之所主張，由國際共同合作，以完成中國國家之建設」云云。今吾人試揭開外交面幕而研求其內容，所謂「國際合作」云者，所謂「列強易於供應中央政府之需求」及「迅速而有效的贊助中國移去足以危害中國與其餘世界間之和平關係之任何原因」云者，實即「國際共管」之變相。此種謬論，根本否認我國有獨立國家之資格，予我中華民族以重大之侮辱，其爲淆惑世界觀聽，尙屬其次。

自此種失實不當之報告發表後，日本首先引爲滿意，附和其說。如報告書發表之第二日，日外務省公然謂：「惟調查團關於滿洲之建議，大可施行於中國與列強之關係而獲裨益。如制定國際共管計劃問題是也。」又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亦有「由和平機關之國聯而論，真正關心事，爲中國的自體之最重形勢。滿蒙問題，不過係其一部」

之言。此種「國際共管」之論調，胥由報告書「國際合作」一語演繹而來，然基於報告書此項錯誤而發生種種謬論，固不止在別有用意之日本爲然，其餘各國輿論，亦多受有同樣之不良影響。如倫敦彙報謂：「今日欲謀歐陸各國之安全，應由各國採取同一戰線。」太晤士報謂：「此事不宜倉卒定奪，且須各國共同行動。」晨郵報謂：「以中華民國爲中國之統治者，乃一種「禮貌之名詞」而已；若日本及各國能合作，爲中國改建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自可謂爲一大成功。」紐約時報亦謂：「渴望中日兩國從事和解，及列強彼此合作。」又贊揚報告書「包含豐富，鞭辟入裏。」凡此種種出乎情理之言論，我中國人民，無男無女，無長無幼，一息尙存，均所銘心刻骨，朝念夕誦而不能一日忘懷者也。吾人曠昔祈禱世界和平，服膺國際公理，而其結果乃竟如此，實令吾人疾首痛心，莫能自解。須知我中華民族爲世界上文化優越歷史悠久之進化民族，我中國國家爲四千年來擁有巨大面積之純粹的統一國家，祇以酷受和平，崇尚王道，致邇近爲強暴者所侵略壓迫耳。然即在此種強暴侵略壓迫之下，吾人猶信世界尙有公理公道，不變其和平王道之信念，若倫敦晨報所云，根本不知有世界歷史，不值有識者之一哂。然此種種錯誤，其起點皆導源於報告書之觀點錯誤；吾人祇須從根本上着手，糾正報告書之錯誤已足，其餘因此而引起之一切謬論，實無暇一一置辯矣。

查該報告書又有所謂「當如孫逸仙博士之所主張，由國際共同合作，以完成中國國家之建設」云云，此言亦甚錯誤。蓋吾人之一舉一動，均以孫中山先生之遺教爲根據，但對於孫先生主張之原意有誤解者，則不得不提出嚴重

之糾正。孫先生擬具國際共同發展實業之計劃。僅限於借用外資以發展中國實業，絕不如其第九章解決條件第十項所云：「圓滿的解決之最終條件，厥惟依據孫中山博士之建議，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此所謂圓滿的解決，係指東北事件之圓滿解決。東北事件為政治問題，開發中國實業為經濟問題，調查團將其混為一談，且謂其為「最終條件」，是何用心？調查團亦知孫先生實業計劃之動機，從何而起乎？孫先生自序曰：「歐戰甫完之夕，作者始從事於研究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而成此六種計劃，蓋欲利用開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展之發達，而成我國民突飛之進步，……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後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吾人體察孫先生之遺意，則所謂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者，論其時，則為歐戰甫完之後，而非東北淪陷，亦匪擾亂之今日，論其事，則主權須操之在我，不能操之在人！故在我國內憂外患，尙未平定以前，事實上甚難以整個的國家力量，從事實業建設，亦無須乎「國際共同發展實業」。所謂「國際合作」云云，更不敢煩勞列強之越俎代謀也。國聯調查團認「國際共同發展實業」為「國際合作」，並認「國際合作」為「足以移去危害世界和平」之辦法，尤屬大錯特錯。際茲唯力是尙，唯利是圖之複雜國際情勢下，此種建議，不獨妨害中國。即於世界甯能有利。苟國聯果欲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政策，加諸中國，是不啻激增列強間利害之衝突，置中國於各國重砲之交射線內；不獨中國悉為犧牲，恐世界各國亦必蒙其損害也。

3. 失當之批評與矛盾之敘述

調查報告書往往越出報告範圍而作干涉中國內政之批評，且其批評極多失當之處，已如前述，茲再舉其吾人亟應注意者，如報告書第一章中國近年發展之述要節內，於描寫中國內部紊亂與中央權力脆弱後，復謂此種現象，「足使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蒙受不利之影響。」又謂「且必將繼續威脅世界之和平，以構成世界不景氣之原因。」此種論調，不僅為日方之暴行開脫罪名，抑且足以令壓迫中國者增多其罪惡，查歷年來中國之內亂，皆非中國自身之好亂，實由壓迫中國者伺隙侵略，煽構接濟所釀成。例如東北事件發生後，日方即派遣大批密使間諜，潛赴中國內部，煽動內亂，並接濟共黨，使為牽制。至於世界不景氣，任何人皆知其為資本主義發展至某種程度之必然結果，亦經濟學上所謂「定期恐慌」與「循環恐慌」，不但與中國之現狀無關，且亦為中國經濟凋敝之間接造因。是則此不景氣之現象，乃係「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予我以「不利之影響」，並非「蒙受」我國「不利之影響」也；此乃「繼續威脅」我國而危害「世界之和平」，並非我國「繼續威脅世界之和平」也。因果倒置，一至於此，吾人誠不能不心佩調查團之巧於立辭而善於取悅日本矣。

此外該報告書尙有矛盾可笑之處甚多。例如既曰「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中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之規定」，何以又建議將東三省變為「自治政府」，且又「不許中國駐兵」，「不許中國收稅」，而「廣聘外國顧問」？既曰「尊重中國主權」，何以又承認日方用暴力掠奪之破壞中國主權之權益？調查團諸君為各國一時碩彥，何竟矛盾至此？

又如第一章指摘我國「大多數民衆側重於家族或地方

觀念，而不重國家觀念。……真正國家之統一，必以大多數民衆具有國家觀念爲前提。」其意蓋謂此種前提，中國尙未具備。吾人姑不必辯論此言之是非，且翻閱其第七章對於經濟絕交之敘論：「既出於民衆，復具有組織，雖係強烈之民族情緒所產生，爲強烈之民族情緒所擁護，而操縱之指揮之者，大有能發能收之團體在。」既謂其爲不能統一之國家，而又謂其有組織完備，指揮統一之社會，曠觀古今中外，有此矛盾之現象否乎？誠不知調查團諸君，將何以自圓其說也。姑讓一步，不必問其敘論之當否，就事實方面論，調查團之一再逾越其報告範圍而指摘我「民族情緒強烈」與「國家不能統一」，無非欲爲日本實證其東三省與中國政府成分離之局面之言，然於第二章則又明明謂「張學良不顧日本勸告，與國民黨及南京之關係，日趨接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宣告服從中央。」是則中日衝突焦點所在之東三省，初非以「不重國家觀念」及「不統一」之罪戾而招致日本之分裂詭計，實因我東北人民國家觀念與民族情緒日趨進步，使日本覺悟其和平侵略，難以速效，故不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造成古今中外罕有之罪惡。事實俱在，調查團非不知之。知之而不能明言，乃反逾越範圍，指摘我民族「不重國家觀念」及「不統一」，仰又何歟？或謂此次調查團之過日，備受日方之虛偽宣傳，以致倒果爲因，措詞失態；果爾，則又吾人所不欲極論者矣。

4. 中日對外政策與教育方針之比較

調查團以昧於我國之對外政策，故輕率以「排外」二字加諸我國；更昧於我國之教育方針，又輕率以「欲於仇害心理上，建樹人格」十一字加諸我國，今吾人試平心靜

氣，將中日兩國之對外政策與教育方針，作一綜合的比較，俾世人因此確知中國與日本，究竟孰爲「排外」，孰爲「仇害」。

我國之對外政策，一以孫中山先生之「民族主義」爲原則。孫先生之「民族主義」，係主張「世界民族一律平等」，以求達到「世界大同」之目的。其根本精神，既不基於「報仇排外」之褊狹觀念，又不以「單純的企求自私自利之富國強兵」爲目標；其終結之最高目的，實在「企圖世界全體人類之共存共榮」。中國國民黨秉承此遺教，作成對外政策，故中國雖處受壓迫屈辱之地位，而仍時以「和平合法」之手續，要求「地位之平等」，「希圖國際公理公法之實現。而日本則如何？日本之對外政策，無時無地不以侵略鄰邦，危害和平爲職志。舉其要者如：

「我日人爲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

「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即日華之戰，將來欲制中國，必先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

「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若夫華盛頓九國公約，純爲貿易商戰之精神。」

「最可怕者則中國人民日就醒覺。……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到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中國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國之利源。以中國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

（均見田中義一滿蒙積極政策）

以上皆爲日本近數年來對外一貫之政策，雖其蠻橫誇大，不值識者一笑；然其陰謀與野心，則已躍然紙上，且見諸事實矣。此種含有絕大危險性之日本之對外政策，奈何調查團竟視若無覩，而不一加敘論乎？

復次，吾人再將中日兩國教育方針，作一綜合的比較

我國以「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教育之基本原則，故民國十八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其第二項謂：「普通教育，須根據總理遺教，以陶融兒童及青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國民道德，以養成國民之生產技能，增進國民生產能力爲主要目的。」各學校之課本，完全以此方針爲標準的。如新中華三民主義課本謂：「日本維新之前，國勢也狼狽。因爲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能發奮爲雄，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爲富強的國家。」綜合編制三民主義課本謂：「從前我們民族的道德，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的多，所以能夠同化外族，現在固有的道德已經墮落，非把牠恢復不可。」三民主義教課書又謂：「什麼是中國固有的道德呢？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都是美德，並且是我們民族四千年生存的道理。我們應當發揮光大。」

似此和平忠實，提倡民族舊有道德之教科材料，未悉調查團已否見及？今乃漫然於該報告書第一章，指責中國之教科書，謂「試一翻閱各校課本，即使讀者感覺著書之人，圖以嫉恨之火，燃燒愛國觀念，又欲於仇害心理上，建樹人格。此種猛烈排外之宣傳，初起於學校。」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調查團亦能確指其書名否？吾人對於此

種失實的批評與無的的攻擊，實覺萬分惋惜。茲再不憚煩縷，將日人所著之教科書及其他論文中詆毀我國之文字，摘錄數則如左，以見日本之教育方針，較之中國，究竟孰爲「仇害」，孰爲「嫉恨」。

一、「支那爲無地理之國名，古來雖自稱中華，自誇中國，皆爲妄自尊大之詞；支那實爲一無嚴密組織之國家。」（三省堂外國史）

二、「支那古來雖自誇爲中華，安知他日滅此中華國者，非蠻夷乎？」（三省堂國文讀本）

三、「支那爲無秩序之共和國，無統治之野蠻國家。」（須藤助理著併吞滿蒙論）

四、「支那已土崩瓦解，吾等應注意支那問題，探討其過去歷史，以定將來征服之手段，圖帝國之發展，朝野應共同研究支那。」（三省堂東洋史）

五、「支那不值日本鎧袖一觸，應舉全國之力，以掃蕩支那之橫暴。」（須藤助理著併吞滿蒙論）

六、「支那無國境，且非國家，非近代之國家。」（矢野仁一著近代支那）

七、「對支那問題之解決，須用實力權威懲其不法，不可躊躇，須定最後之決心。」（細野繁勝著滿蒙與實力）

諸如此類之「仇害」，「嫉恨」等教科材料，幾於汗牛充棟，不勝枚舉，調查團奈何竟熟視無覩，而獨於中國以三民主義爲國民教育之基本原則，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國民道德之教材，而反任情臆斷，肆意誣指乎？此種輕受宣傳，顛倒是非之敘論，竟亦出諸國際聯盟調查團諸君之口，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二、所謂中國共產黨之真相

1. 所謂中國共產黨之性質

調查團因受日本誇大的宣傳之影響，對於中國共產黨之觀察與敘論，頗有不確之處：第一，認中國共產黨為一政黨，一若歐美各國之左傾黨與共產黨，而且「已成爲國民政府之強敵」；第二，認中國共產黨係一真正爲無產階級謀利益之團體，「因此，極苦之農民得由共產主義而享受甚多之利益」；第三，認中國共產黨爲有適合中國國情之理論的組織，故「中國各市鎮幾無處不有與共產主義同情之人」。基於以上三種錯誤之觀點，因有「福建江西之大部份，及廣東之一部份，據確實報告，均已完全赤化；而共產黨之勢力範圍，更爲廣大；遠及於揚子江南之一大部份，及揚子江以北湖北，安徽，江蘇各省之一部份」，及「彼時共產黨勢力之強，能將政府第一第二兩次派往剿辦之軍隊擊敗；第三次剿共，係蔣總司令中正親自指揮，始將共產黨屢次挫敗」等誇張不實之敘述。（括弧內之詞句見報告書第一章）若中國共產黨勢力誠如報告書所言之甚，斯不獨中國國民政府之危機，亦遠東前途之隱患。幸而中國共產黨之猖獗，尙不至如調查團諸君所想像之甚。茲吾人不嫌煩瑣，略述中國共產黨之真相。

吾人因中國共產黨專以殺人放火姦淫劫掠爲事，純粹爲一種土匪行爲，根本上不能冒稱爲「黨」，故國人皆呼之曰「匪」。以其施行赤色恐怖，標榜共產主義，又處處受赤俄之指揮與監督也，故名之爲「赤匪」。近數年來，我國人民，祇知有「赤匪」之作亂，從不知有所謂中國共產黨「爲國民政府之強敵」。中國共產黨既非有良好政治主張之政黨，尤非爲勞苦羣衆謀利益之革命黨；完全係一羣

土匪流寇嘯聚作亂之匪徒也。論其力量，羽徒不過十餘萬，且大多數皆由逼脅而來；論其行爲，焚殺劫掠外不知有他；論其內幕，分崩離析，醜態百出。此種含有歷史根源之羣衆暴動行爲，乃純粹的土匪作亂，調查團不察，貿然稱之爲中國共產黨——爲中國國民政府強敵之中國共產黨，吾人竊以爲不當也。

共產黨之性質既已辯明之後，茲更進而敘述其內情。

2. 所謂中國共產黨之理論與行動

共產黨根本無適合中國國情之理論，其所標榜者爲馬克斯主義。馬氏以物質爲歷史中心，提倡「階級鬥爭」，久已爲世界各國所公認之錯誤，而尤以在中國爲甚。中國乃受強者壓迫之國家，資本與勞動兩階級，尙未顯明；乃共產黨偏欲造成階級，然後以鬥爭方式，消除階級之區別，是何異先令民死，而後令其更甦？矛盾幼稚，一至於此。尙成何種理論？再言「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乃共產黨騙民衆之第二法寶；但此種謬見，更不適合於中國國情。我國當前農業經濟之大患，并非「寡而不均」，實爲「舉國皆貧」。在中國有田產之農民中，十畝至二十畝者佔百分之六十二，三十畝以上者佔百分之二十一，五十畝以上者佔百分之十一，百畝以上者不足百分之六。且土地狀態，日趨分割，共產黨不知有改良技術，增加生產，擴充耕地，移民墾荒諸方法，而斤斤於「分配土地」；此種削足適履牽強附會之宣傳，乃益暴露其矛盾與幼稚。

其理論既極錯誤，所演成之行動自更荒謬。

中國共產黨之發軔，係淵源於少數智識份子好奇心之衝動。自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孫中山先生允許共產黨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據調查團報告，「是時全部共

產黨員及其附和者，不過三千人」。其後潛伏於中國國民黨黨旗幟之下，利用黨團組織，實行其「掛羊頭賣狗肉」之伎倆，故勢力頗有發展。其後此種陰謀暴露，國民黨以雷厲風行之方法，大舉清黨；共產黨失所憑依，其勢力一落千丈。於是挺而走險，冀以恐怖政策，劫奪羣衆，因而南昌與廣州之兩次暴動，相繼發生，但不旋踵即爲國民黨之武力所掃滅。自此以後，共產黨仍繼續其焚殺政策，迄今不變。

計江西一省人民爲匪軍所殺者有十八萬；湖南被殺者七萬餘人；房屋被焚者二十餘萬棟，誠如報告書第一章所言，「在兩三個月內，損失生命約二十萬，財產約一萬萬元。」此種企圖消滅整個社會之惡魔，如何能獲得人民之同情，羣衆之擁戴？

共產黨常以「擁護農工利益」一語欺騙民衆；實則無處不表現其摧殘農工之狠毒凶惡。農民固不值共黨之一顧，即於工人，亦絕無好意。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致第三國際之報告書有云：「全黨工人黨員最高度尚不到四千人，其所吸引之勢力亦頗微弱。」何以共黨擾攘多年，而工人羣衆反如此微弱？共產黨徒宋逢春嘗於告同志書曰：「現在的中共在思想上早已解除武裝，誓已非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而純粹係少數遊民無產階級爲基礎的投機和冒險行動，其份子皆爲與羣衆完全隔離之失意政客與官僚。」由此可想見其「擁護農工利益」之真面目矣。

共產黨又常以「實行社會政策」一語欺騙民衆？如宣傳設立公共醫院，免費治療，設立消費合作社，使人人得購廉價之日用品等等，一般人幾疑「極苦之農民」真能享得其利益。但揆諸實際，凡匪軍所到之處，一切均遭毀滅，不

獨不能以廉價購得貨物，即出重價，亦有無物可購之苦。謂予不信，請看江西剿共北路分部之報告：「經濟狀況：商業衰弱，日形蕭條，一年來擾亂的結果，以致農業生產日低，工人失業日多，鄉村商業停頓，使生產不能發展，民衆生活極感痛苦，農村經濟破產，造成全北部的經濟恐慌，一般農民已感覺生活的深深困苦。」因此，江西匪區之伙食費，每日每人僅得小洋三分；是以爲我捕獲之匪徒，莫不槁餓枯瘦，令人惻然！共產黨之社會政策，竟如此也。

尤可笑者，共產黨爲博得赤俄之歡心，騙取多量之盧布起見，往往誇述功績，誑報實力，一若共黨之勢力，真不可侮。赤俄信以爲真，即一再迫令其武裝暴動。但每一次共黨暴動事件發生後，不獨人民遭受塗炭，而共黨之勢力，亦因之銳減。

在此實力薄弱情勢下之共黨，其內部復離心離德，形同水火，分裂離析，互相攻殺。共黨內部，最初有所謂左派（亦稱南方派，陳延年蘇兆徵等爲首領），右派（亦稱中央派，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等爲首領），中間派（亦稱北方派，以李大釗羅章龍等爲首領）之別。自李大釗被殺，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共黨內部又有所謂幹部派，取消派之分立。此兩派互相火併，蓋前者係斯大林之羽翼，而後者則托洛斯基之信徒故也。在各派之下，又各有所謂系，系之多無慮數百，真所謂千萬人有千萬人之心也。

共產黨之內情如此，其必由崩潰而走入幻滅之途，蓋不待智者而後知。

3. 所謂中國共產黨之現狀

自今年夏季國民政府宣布剿匪方針後，蔣總司令親往

指揮，薄弱紊亂之共黨，不堪中央軍隊之一擊；國軍所至之處，匪徒莫不瓦解，有如秋風之掃殘葉。赤匪著名之巢穴如金家寨，洪湖，蕪埠，新集等地，皆為國軍相機收復；赤匪首要，均早經就戮；而其碩果僅存之陳獨秀，彭述之二人，亦於最近在上海就逮。據軍事報告，現在長江流域所有股匪，均已擊破；所餘殘匪，指日亦可肅清。江西方面，經國軍多次痛剿之後，死灰已不能復燃；福建方面

，自十九路軍奉命往勦後，早已望風遁竄，滅跡掃塵矣。現在之共黨，已由總崩潰而走入完全幻滅之時期；調查團不知此種情形，誤聽日方之誣譏與宣傳，認共黨為中國當前唯一之問題，因此而發生上述種種錯誤之敘述。是以略述所謂中國共產黨之梗概，俾世之留心中國問題者有所參考焉。

第三章 對於報告書責難經濟絕交之辯正

(20) 調查團于報告書第七章「日本之經濟利益與中國人之經濟絕交」中，認為中日間之鬥爭，不僅屬於軍事性質，且屬於經濟性質，故於敘述中國人對日本之經濟絕交，頗多指摘之處。如謂中國之經濟絕交，亦為中日衝突重要原因之一，而主動與組織經濟絕交運動者，則為秉執政權之國民黨，中國政府不無含有相當責任；且謂此種經濟絕交與抗日宣傳是否合法，尚屬疑問；終則主張中日經濟聯絡合作，並望國聯將經濟絕交問題，加以國際協約之規定。吾人細味此章全文，深覺調查團雖未明言中國人對日經濟絕交有何不當，但却處處隱示中國之經濟絕交運動一似有何種不當者。此蓋由於調查團對於中國人經濟絕交之因果關係及實際情形未能觀察透澈，又備受日本虛偽之宣傳與謾蔽，以致敘述各點，彌多錯誤；茲逐項擇要辯正於下。

一、抵貨係人民愛國心之發動與黨部政府無關

1. 抵制日貨決非中日衝突之重要原因
調查團于本章敘述中，開始即謂中國人之抵制日貨，

為中日衝突之一重要原因，其言曰：「前三章以專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軍事及政治事件為主旨，願欲使中日衝突之敘述，臻于準確或完備之程度，就須論及另一重要衝突原因，即中國人之抵制日貨是」。又曰：「近年來中日間關係之日趨惡劣，經濟絕交為其原因之一，則要無疑義。」細釋其意，一似確認中日兩國之所以衝突，與夫東北事件之所以爆發，實造因于中國人之對日經濟絕交。欲衡論此種觀察與論斷之是否確當，姑不必取證於十餘年來中日關係之史實，即就去歲中日關係情形而加以審察，亦可以證明其不合于當時之事實。去歲中國人民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實為萬寶山事件及朝鮮排華慘案之反響；自日本侵佔東北後，乃更形擴大。此在調查團報告書中，亦曾明白指出。如第三章謂「此種種暴動（按即指萬寶山案及朝鮮事件）之一重要結果，即為中國全國對日經濟絕交之復活」，及本章中「一九三一年之經濟絕交，係直接因同年六月間萬寶山事件及七月間韓人之屠殺，方始發生，而同年九月之瀋陽事件及一九三二年一月之上海事件

，復使之變本加厲」等論斷，皆足為中國遭受日本之侵凌，人民始起而對日經濟絕交以作抵抗之明證。故此種經濟絕交運動，實為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凌之報復行為，決非釀成中日衝突之要因。且此種最低限度之抵抗行為，以擬於國家民族求生存之一切手段，真可謂和平輕微，不足置論，中日問題根本解決之後，自然消滅。乃調查團於報告書中，一再論列，且認為中日衝突之重要原因，豈非反果為因，顛倒事實！

中日兩國之衝突，既非由於中國方面之抵貨，則其真因果何在？報告書第三章末段有云：「因有本章所云之種種爭議及事件（按即指萬寶山案朝鮮排華事件及中村案件），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之末，中日兩方，關於滿洲之關係，遂致非常緊張。」又云：「九月中，日方關於中國問題之輿情，以中村案件為焦點，極為激昂。且時時有一種論調，以為容許滿洲方面有如許未決之懸案，實已使中國當局輕視日本；于是必要時應以武力解決一切懸案之語，遂為一通行之口號。凡武力解決之決議，陸軍省參謀本部等討論武力計劃之會議，以及關於必要時如何實行此項計劃所發致關東軍司令官及駐在奉天九月初被召至東京且主張從速以武力解決一切懸案之土肥原上校之確定的訓令，均在各報中隨意引載。」是則中日衝突與滿陽事件之唯一重要原因，實為日本方面之蓄意武力侵略中國，決非中國方面之經濟絕交；中國之經濟絕交，不過為日本武力侵略之反響，日本為主動，中國乃被動，其事實至為顯明。乃調查團竟忽視此點，枝節營求，遂致因果倒置，產生經濟絕交亦為中日衝突錯誤要因之論斷，此吾人所深為遺憾者也。

2. 認國民黨為主動與組織經濟絕交之錯誤

調查團復於本章敘述中，明指經濟絕交運動係由國民黨組織而成，謂「每次經濟絕交發生，國民黨輒增加其控制之能力，時至今日，國民黨遂為組織，促進，聯絡及監督此項示威運動之真正原動力。」又謂「中國之經濟絕交既出於民衆，復具有組織，……操縱之指揮之者，大有能發能收之團體在，……而重要之支配機關，厥為國民黨。」其為此言，非受日方宣傳所蒙蔽，即為觀察不周之錯誤。中國國民黨固為今日領導中國民衆之唯一的最大組織，但若謂經濟絕交純為國民黨所主動，則難免有味於中國人民過去對日經濟絕交歷史之嫌。蓋當國民黨尚未掌握政權，尚未領導組織中國民衆之時代，中國人民早已有自動對日施行經濟絕交之舉動，何待中國國民黨為主動與組織，始有對日經濟絕交之運動哉？試詳言之：一九〇八年中國人民第一次抵制日貨事件，起因于日本船私運軍火，為中國海關所扣留，交涉結果，中國失敗，廣州，北京，漢口，上海各大城市市民激于義憤，宣布抵制日本一切貨物，此中國人民自動對日經濟絕交之開始也。一九〇九年十月，日本強索安東奉天中間之鐵道敷設權，對中國政府下最後通牒，因又引起中國人民第二次之自動抵制日貨。第三次在一九一五年，因日本乘歐戰機會，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要求，中國人民遂又自動抵制日貨。第四次在一九一九年，因日兵佔據青島，久不撤退，又激動中國人民公憤，起而抵制日貨。第五次在一九二〇年，因旅順，大連延期收回問題而抵制日貨。第六次在一九二五年，因上海日本紗廠慘殺工人顧正紅案而抵制日貨。第七次在一九二八年，因日本出兵山東濟南慘殺案而抵制日貨。準

上所述，日本每侵凌中國一次，中國人民必起而對日經濟絕交一次，此純爲中國人民自動抵抗強暴之愛國行動，何有于國民黨之主動？更有于國民黨之組織？于此不但足以窺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非爲國民黨所主動所組織，且更足以證明中國人民每次之抵制日貨運動，胥由于日本之侵凌中國也。

即就去歲所發生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而論，其起因實由于日本之造成萬寶山事件。朝鮮排華慘案，及武力佔奪東北，侵擾中國各地；此層調查團在本章中亦曾加以肯認，其言曰：「一九三一年之經濟絕交，係直接因同年六月間萬寶山事件及七月間韓人之屠殺，方始發生，而同年九月之瀋陽事件及一九三二年一月之上海事件，復使之變本加厲。」是知此次由日本武力侵略壓迫而起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縱無中國國民黨，勢亦必至發生。今乃謂爲國民黨所主動所組織，匪特昧于中國人民過去歷次自動抵制日貨之原因與歷史，且亦未認清此次對日經濟絕交運動之必然性。惟因此次運動適發生于國民黨掌政時期，而國民黨又爲領導全中國人民之唯一政黨，遂被誤認爲國民黨所主動所組織耳。即讓一步說，國民黨既爲領導中國人民之革命政黨，以領導者之地位言，自當以全民之意志爲意志。民衆因受日本侵略之反感，起而作抵制日貨之消極運動，係完全出於人民愛國之熱忱，且亦爲在合法範圍以內之愛國行動，國民黨何能逆民之意而加以制裁，加以取締？且世界上任何國家，任何政黨，斷不能強迫其人民購買其所不欲使用之外國貨品，同時亦不能強制其人民不銷售其所需要之外國貨品。國聯調查團不明察及此，乃貿貿然指國民黨不能制止中國人民不購日貨之一事，謂係國民黨官居領導

對日經濟絕交之主動地位，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要之，國聯調查團諸君對中國人民抵制日貨之因果，未嘗加以精確之研究，而遽爾加以莫須有之斷語，實不能不謂爲出於武斷，且跡近左袒日本也。調查團于本章中，又述及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絕交之關係，謂「調查團所得之書面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對於現時之經濟絕交之參加……吾人並非暗示謂政府各部份援助經濟絕交運動有何不當之處，惟所欲指明者，即官方之鼓勵，不無含有政府之責任耳。」認爲錯誤，亦與前同。

二、經濟絕交之根據與抗日宣傳之由來

1. 經濟絕交爲盟約所許且有法律根據

調查團對於中國之對日經濟絕交行爲頗多疑詞，且似認爲非國際法所許可。其本章有云：「在經濟絕交運動之行爲中所採用之方法是否始終合法，調查團就所搜集證據而得之結論，除認爲不合法舉動常有施行，而當局與法院未加以盡量之制止外，殊難另下其他斷語。」又於評論中云：「單獨對於某一國家之貿易，實行有組織之抵制，是否合於睦誼，抑或與條約義務不相抵觸，乃係一國際法之問題。」吾人今先討論國際法問題。所謂「經濟絕交」，在國際聯盟第十六條早有明文之規定，爲制裁橫暴武力侵略之平和手段；調查團諸君國際聯盟之使者，何竟如斯健忘，認爲應加討論？按盟約之第十六條云：

「聯合會會員如有不願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之規約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於所有聯合會員及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會員担任立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各種往來，并阻止其

他任何一國爲聯合會會員或非聯合會會員之人民，與該國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

夫爲制裁橫暴之武力侵略，其他國聯合會員，尙有參加經濟絕交之義務，則身受暴力侵略之中國，其採取此項手段之獲得許可，更何待言！今日日本突以戰爭行爲侵佔中國之領土，調查團不責其釁自彼開，破壞兩國之睦誼，毀棄兩國之條約，而反以此懷疑中國所採取之消極抵抗的經濟絕交，調查之謂何？國聯盟約之謂何？調查團亦自知其懷疑之未必中理，於是復冠以「單獨對於某一國家」等等字樣；彼其意蓋謂實行有組織之抵制，在中國固自有其理由，但單獨施之某一國家之貿易，則非國際法所容許，若此推測匪談，則調查團諸君之昧於事理，益可概見。倘單獨抵制某一國家之事實果係發生於兩國邦交敦睦之平時，自當爲國際法所不容許，而抵制者確亦應負破壞睦誼及毀棄條約義務之責任。但過去事實所昭示，中國歷次之對日經濟絕交，皆由日本之侵略壓迫中國而引起，彼以侵略加我，我以抵抗應之，認清對手，講求對策，此固國家民族求生存之必要手段，而爲國際法所絕對容許者。况此次日本以暴力侵佔中國領土，尤屬蔑視國際公法，兩國間之睦誼及條約義務，早已由日方破壞無餘。若至此而猶謂中國不應抵抗，並不應單獨對日施行經濟絕交，誠不知國聯盟約尙有何用，而所依據者又爲何種國際法也！

中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之合於國際法，既如上述，今更進而討論其行爲中所採取之方法是否始終合法。原夫中國各地之經濟絕交運動，只爲中國人民間互相規勸不買日貨之行爲，此在人民有絕對之自由，不受任何勢力之干涉或制止。即調查團亦嘗謂「中國人民，在不違反國家法律

之下，其個人拒絕。購買日貨……或以個人行動或以團體行動宣傳此項意見之權，無人可予否認。」至其採用檢查扣留，或予以制裁之手段，亦屬人民間互相防止或制裁破壞信約及違反公意者之必要舉措。此種人民愛國心理及信約行爲之表現，與國家法律并不牴觸，若無何等破壞秩序逾越軌範之事實，政府自不得任意制止之。彼調查團諸君徒以在全國經濟絕交聲中，嘗發生一二不幸之越軌事件，遂輕下斷語，「認爲不合法舉動常有施行」，認識不週，彌深遺憾！抑吾人尙有欲問調查團諸君者，去歲日本人在其國境內大舉慘殺華僑，日本政府並未予以制止或懲戒。調查團於此等不法行爲，未聞有所指摘，更未料以引起中日衝突之責任，而獨於中國人民之和平的消極的經濟絕交運動，則確認爲不合法，且爲中日衝突之一要因，偏頗失實，一至於此，謂爲認識不週，猶屬吾人之恕詞！

2. 抗日宣傳乃由於日本武力侵略所激成

調查團批評中國人民之抗日宣傳，謂「據調查團所見，現正進行之對日經濟絕交，其種種有效方法均用以使人對於不購日貨之愛國義務有深切之觀念。中國報紙篇幅中，充滿此類宣傳文字。城市房屋墻垣之上，遍貼標語，其語氣每趨於極端激烈。」調查團雖未明言此項宣傳方法是否合於睦誼，而其意則似已認爲不當，故視爲「一種可畏之宣傳」。此種抗日宣傳之事實，中國人民並不否認；但此皆爲日本暴力所激成，絕非中國人民所希望。且所宣傳者亦僅以「不購日貨」抵抗日本之侵略暴行，絕非仇視日本之國民。此種意義，極爲明顯。調查團認此種「對日惡感」爲「政治上之緊張狀態所引致」，固有相當之見地；然必含混其辭，以緊張責任歸之中日「兩國」，巧爲日本

開脫，此不能不深致遺憾者也！蓋自中日，日俄兩戰後，日本無時不以被征服者視中國，極盡其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之能事。就其顯著者言之，如民四二十一條約之壓迫，民十七濟南之屠殺，去歲萬寶山案韓人慘殺華僑等事件，中國之領土主權，與人民之生命財產，其被日本蹂躪損害者，何可以數字計！彼處處壓迫中國，時時侵略中國，使中國人民，只見其戰艦巨砲之可畏可恨，而不覺其同文同種之可近可親，「對日惡感」，夫豈無因！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既以暴力佔奪東北，並在中國各地作不絕之騷擾，「政治上之緊張狀態」，果由中日「兩國」共同造成乎？抑由日本單獨造成乎？如為日本所單獨造成，則中國人民之「對日惡感」為有因，而「抗日宣傳」為合理。被日本所加於中國之慘痛，絕非任何民族所能忍受，中國人民，寧獨例外；其不能延頸受戮，毫無反響，而以沉着忍耐之和平方法，起而為抗敵救國之宣傳，此為一切國家民族生存自衛之正當權利，何得以此指摘中國人民？不特此也，日本方面之仇華宣傳，其赴機之速，進行之烈，且視中國高出倍蓰。日本當局於每次侵略壓迫中國之先，必預為種種誣蔑之宣傳，且公然主張對中國加以所謂「膺懲」，以鼓動其國民，朝野一致，舉國若狂。即就去歲朝鮮排華慘案論，當事件發生之先，日本人之仇華宣傳，已遍其國內，因以釀成慘案，而中國留日學生及工人之無故被逐出境者，亦幾及萬人。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先，日人亦捏造「中村事件」為仇華之宣傳題材，隨即發動此震撼世界之侵略暴行。此與中國之抵抗的和平的抗日宣傳相較，其動機與影響為如何？調查團不責日本而祇責中國，實不得謂為事理之平。總之，若欲中國取消此項抗日宣傳，惟有

先令日本拋棄其侵略中國之政策，停止其殺人掠地之暴行；否則中國人民為行使其生存自衛之權利起見，對於日本之武力壓迫侵略，決然繼續進行，誓死反抗也！

三、評中日經濟合作與國際協定抵貨之

主張

在本章末段中，調查團認為「日本依賴中國市場因為日本人所完全承認，一方面，中國又為一急需發展各種經濟生活之國，雖有經濟絕交之事，而日本仍佔中國國外貿易總額之第一位，似可見日本與中國在經濟方面之聯絡，實較他國為尤密，以中日貿易之互相依賴，及雙方之利益而言，經濟接近，實有必要。」故主張中日兩國應入於互諒合作之途。吾人認為在今日日本武力侵略狀態之下，姑無論中國決無與日本實行合作政策之可能，即採取合作政策，而其是吾有效，亦屬絕大之疑問。吾人以爲欲使中日兩國經濟接近，必先尋求其所以不能接近之根本原因，設法為澈底之掃除；原因既除，接近自無阻礙。此根本原因維何？即日本之對華侵略政策及暴行是也。調查團果欲設法消弭中國之經濟抵制運動，使兩國經濟接近者，即應向國聯建議，制止日本對華之侵略暴行，將強佔東北各地之日軍，悉數撤退，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之原狀，並將中日間一切不平等之事實及條約，一律剷除，則中國之經濟抵制運動，自可因對象之不存在而消弭，而中日兩國之邦交，亦可漸趨親睦，以達其經濟合作之目的。捨此不圖，而欲強令中國於現在情況之下，放棄經濟絕交手段，與日本經濟合作，世界固無是理，事實亦不可能。調查團既知「兩國間政治關係一日不圓滿，以至於一方採取武力，一方則採取經濟抵制力量以相扼持，則一日無接近之可能」，而

又抹殺原因，欲以國際力量，強制中國放棄對日經濟絕交運動，謂「爲舉世各國之利益計，調查團希望此項問題，應及早加以討論，并以國際協約加以規定。」無論中國之對日經濟絕交，絕未妨害舉世各國之利益，國際的協約，顯爲侵害中國之主權，危及中外之邦交；即令舉世各國，不顧一切，貿然強制執行，而結果所至，徒以引起中國人

第四章 對於報告書解決東案建議之駁議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於敘述此次東北事變之經過及歷來之糾紛情形以後，附以九十兩章之建議。其建議之方案，關係重大者，歸納言之，可分爲次列四項：

- (一) 產生顧問會議與聘用外國顧問
- (二) 滿洲自治
- (三) 撤廢軍備
- (四) 樹立中日新約

此項建議，爲調查團諸君認爲解決中日糾紛之可能辦法，同時亦認爲任何圓滿解決所應依據之原則。實則此種建議，全係遷就日軍閥在東北所造成之既成事實，跡近屈服於武力之辦法，欲以此解決東北問題，相去甚遠，圓滿解決云乎哉。如東北問題果依此而解決，是不啻獎勵強者之侵略，禁錮弱者之生存，既破壞國際公約，亦毀損國聯之立場。中國政府及人民，自東北事變以來，即竭力抑制情感，力避衝突，申訴國聯。斷爲有效之處置，並始終信任，將整個問題付託國聯。意在遵守公約。以和平之途徑，求公允之解決。詎意往者一載，我領土主權，備受日本之蹂躪，東北民衆，慘遭日軍之屠殺。而結果調查團竟提出此矛

民之反感，增加對日經濟絕交之決心；於中日經濟合作固無絲毫之補益，即於舉世各國對華利益之前途，亦未見有若何之增進。調查團之使命，原爲調查中日衝突之事實及原因；今乃忽視事實，抹殺原因，發爲枝節旁歧之論，此吾人於辯正之餘，所爲遺憾痛惜不置者也！

盾之建議，吾人於此殊難同意。吾人反對之理由，極爲充分。爲便利討論起見，將上述歸納之四項，分別指正之。

一、顧問會議與外國顧問

1. 顧問會議產生上之矛盾

調查團根據事實之證明，承認東北事件之發生，爲日本預定之計劃，而不可視爲合法之自衛；傀儡組織成立，亦係日本之指使操縱，而非由於當地居民之自決。於日本之破壞世界和平，侵害中國之主權領土，原已知之甚詳。故報告書肯定「此問題之真正及最後之解決，必須適合世界和平組織所依賴之基本條約，華府會議時所驅使各國代表之意旨，現仍有效；扶助中國主權及領土之完整爲保持和平之必要條件」。又謂「日本不得因經濟關係即可操縱東三省經濟上乃至政治上之發展。日本爲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我等亦不以爲無理；但此種情況，惟有合作於當地民意而完全順乎彼等之情感及志願之行政機關，始能爲安全的與切實的担保。基此原則，自應尊重公約，根據法律，權衡利害，提出一合法公平之建議，並與日本以相當制裁，然後始足以戢侵略之

野心，而維世界之和平。不意調查團捨此不圖，竟提議成立違反上述原則之「顧問會議」，以爲解決糾紛之方案。此種不合理論自相矛盾之建議，誠令人深滋遺憾！調查團既知「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將東北三省自中國他部割裂，日後將造成一更嚴重難解決之問題」，何獨不知不恢復九一八以前之原狀，亦必陷於同一之結論？夫日本既負此次事變之責任，而東北又爲中國領土，則將來東北之政制，無論如何改革，企以適合外人經濟活動之安全，而要必以恢復原狀爲最必要最正當之解決辦法。若使日本因侵略結果，對東北政治之根本組織，得與中國有同等權力之參加，是明明違反世界和平之一切基本條約，破壞中國領土主權行政完整之條件，而與報告書之理論的前提大相逕庭。蓋若一國領土，一經他國之暴力侵略，即不能恢復原狀，則世界之野心國家，尙何憚而不群起效尤？今日日本以暴力侵略中國東北疆土，國聯非特不科以侵略之責任，反欲變更該地之政治組織，予日本以超經濟上之政治權，是一切國際公約，俱無存在之必要矣。抑有進者，按照報告書之建議，此項顧問會議，爲自治政府之產生機關，自治政府產生之後，顧問會議是否繼續存在，報告書雖未言及，然會明白規定，如將來改組所謂滿洲自治政府時，必須依照組織時之同樣手續。是中日共同主持之顧問會議，不啻爲滿洲政府之立法機關。於此吾人不能不質問調查團諸君者：東三省之統治權，究竟屬於中國乎，抑屬於日本乎？如曰屬於中日任何一國，則此辦法爲不適。如曰屬於中日兩國，是承認中國之主權，可以分割，中國之領土，可以受他國統治，天下寧有是理？與報告書所鄭重申明尊重中國主權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者，寧非矛盾？須知東三省爲中國

之東三省，其領土與主權，完整統一，不能分割。東北問題之解決，經濟方面，固應顧及關係國合理之利益，但政治主權，絕不能絲毫讓人。此爲本問題解決之基本原則，爲吾人所絕對堅持者。願乎此，則顧問會議產生之矛盾，不攻自破矣。

2. 顧問會議產生上之困難

調查團建議顧問會議產生之方法，「可由中日兩國政府之代表，暨代表當地人民之代表團兩組組成之；該兩組代表團，一由中國政府規定之方法選出之，一由日本政府規定之方法選出之」。此項建議，試一分析其構成份子，即發覺其乖謬所在。調查團既知東三省爲中國領土，是中國在該地方握有不可侵犯之主權。日本及其居留民，根據何種理由，有參與討論東北政治組織之權利？茲姑如調查團之建議，而所謂當地人民代表，其產生實爲一嚴重之困難問題。試問在日本軍隊未撤退，滿洲偽組織未消滅之前，中國將以何種方法，使在日軍暴力威脅下之東北民衆，可以行使其選舉真正代表之權？倘使日軍不先行撤退，則所選之代表，亦猶如偽組織成立前，胥屬強姦民意，假借自治之媚日漢奸，豈能代表東三省人民之真正意志？若所選舉者盡爲日本走狗，如謝介石，張燕卿，趙欣伯之流，則所謂顧問會議，又豈能有公正之討論？是所謂顧問會議中，雖有四種代表，其實無異中日對立。贊否之間，中國得一權，而日本可得三權，則中國主張之失敗，已確定於未開會之前矣。而所謂顧問會議者，果尙有何種價值乎？今再退一步言，即令顧問會議無此弊病，而顧問會議所應討論者，爲下列四事：一，中國政府宣言，依照顧問會議所提辦法，組織一特殊制度，治理東三省；二，關

於日本利益之中日商約；三，中日和解公約不侵犯與互助條約；四，中日商約。此四者，除第一項外，幾與東北地方無關，而必使東北人民參加其間，是何意義？且東三省之應否實行自治，此純爲中國內政問題，決非他國所得干與。若該地方人民果真有此要求，亦僅能由中國政府與該地方人民，自行商決，絕無外國干涉餘地。今無端加入日本代表，及其居留民代表，而同時對於日軍佔領下無從表現自由意志之東北人民，亦強其參加，則所謂顧問會議者，爲國際會議乎，抑爲內政會議乎？可謂擬於不倫矣。調查團既否認「滿洲國」，然又主張滿洲人民參加中日會議，此無異認滿洲地方亦爲獨立之單位。且其所代表者，又必非真正之民意，是何異扶植傀儡組織變相出現！不寧惟是，吾人再從東北人口方面，批駁日本居留民參加會議之妄。東三省之人口，爲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而日本在東三省之僑民，即連關東租借地，與所有滿鐵服務之家屬併計，亦不過二十一萬人；以如此不到百分之一之少數人口，以何種權利，得與中國人民有同等選舉代表參與會議之權？凡此種種，皆屬違背法理，在報告書本身爲自毀立場之矛盾主張，在中國爲破壞主權完整之不可忍受的辦法。

3. 顧問會議職權之偏頗

調查團對顧問會議所應討論之事項，亦曾作下列之規定：

- 一、顧問會議之集會，地點，代表之性質，是否願有中立觀察人員；
- 二、維持中國領土，行政完整之原則，及准許東省有高度之自治；
- 三、以一種特殊憲警爲維持內部治安唯一辦法之政策

- 四、以所擬各種條約解決各項事件之原則；
- 五、對於所有曾經參加東省最近政治運動人員之准予特赦。

就上述五項以觀，除第一項無關宏旨外，餘均爲關於今後東北建置之重要問題，及中國內政上之問題（如第五項），顧問會議職權之大，可謂無與倫比。實則此項建議所涉及之問題，除第四項條約方面應由中日雙方共同討論以外，餘均屬中國政治問題（內政問題），既無日人參與之必要，更無日人越俎代謀之理。今調查團建議日方有與中國同等參加顧問會議之職權，此其偏頗不公者一。對於所有曾經參加東省最近政治運動人員之准予特赦，與否，純係中國內政上的司法問題，日人豈有置喙之理。且此次參加東北傀儡組織之人員，實爲串通外寇，危害民族生存，破壞國家獨立之叛逆，觸犯外患刑章，案情至爲重大。若不付諸有司，律以嚴刑，將何以申國法而遏亂源？今調查團建議「准予特赦」，是不啻獎勵奸宄，且予日人以干與中國司法權之機，是更甚於領事裁判權矣。此其偏頗不公者二。調查團既主張「東省經濟上之開發，日本得自由參加，但不得因此而取得經濟上或政治上管理該地之權」。所謂顧問會議，明係主持今後東北建置之機關，兼有經濟上與政治上之管理權；而中日雙方又係以同等機會參加顧問會議，故日方亦同樣具有經濟上與政治上之管理權。是則日人於自由參加東三省經濟上之發展外，更享有管理東北之經濟權與政治權。此其偏頗不公者三。顧問會議，原爲解決東北糾紛之會議，則自東北事變以來之一切問題，均應在討論之列。今該會議職權之範圍，僅限於中國領土之分割，

政權之削減，權益之讓予；而對於日本侵略之責任，中國人民傷亡之慘狀，中國權益損失之情形，既不在討論之範圍，復未有賠償之規定，一若此次東北事變，係為中國所造成，顧問會議為「磨擦」中國而設者。此其偏頗不公正者四。調查團諸君之眼光，自云高瞻遠矚，欲藉顧問會議，以永息中日糾紛。今乃偏頗若此，行見糾紛之滋長而已！

4. 外國顧問為遷就「既成事實」

調查團認為東北傀儡組織係受日本政府指揮扶助，故其成立，決非當地民意之表現，遂以維持偽組織之存在，為違背現存國際義務之基本原則，且與遠東和平有礙。惟調查團子否認偽組織存在之後，忽又認恢復九一八以前原狀為不可能。察其用意，似一方欲中國承認東北為特殊區域，予外國顧問以廣泛之權限；一方欲日本取消傀儡組織，承認中國在東北有名義上之主權；必須雙方皆有退讓，方有解決之可能。此種解決方案，在調查團諸君固自認為公允，實則偏頗殊甚。夫東北既為中國領土，中國對於行政之設施自有其絕對自主權；外國顧問之任用與否，權限之範圍如何，中國政府自有權衡，何能預為規定？意者調查團諸君以今日之東北，係在日人武裝佔領之下，遂認為中國若恢復名義上之主權，必須不辭犧牲領土行政之完整，以為取消傀儡組織之交換條件乎？果如建議所云，則凡野心國武力侵略之任何土地，皆常有特殊制度，以為解決之交換條件矣，豈非開世界空前之惡例乎？按調查團設置外國顧問之建議，當係根據現時東北傀儡組織之外國顧問制而來。調查團於此，且引證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外相內田在日本議會演說之一段「我國（指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以後，雇用多數外籍人員為顧問或正式官吏；在一

八七五年前後，其數目超過五百人之多。」可見調查團諸君實憧憬於日本明治維新外籍顧問之功能，因而確定外籍顧問之建議，且明言日本人應佔一重要之比例。殊不知日本明治維新時代之外籍顧問，全係出於日政府之自動任用，既非由於國際間之建議，復不受國際間之限制，何得混為一談？且取捨之間，以人才為標準，不以國籍為限制，故於主權無礙。今東北傀儡組織之顧問制能如是乎？所謂日本顧問者，實即傀儡組織之太上政府；小而事務之微，大而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無不在此輩顧問之掌握中。此種畸形現象，調查團諸君親臨該地，目擊耳聞，夫豈不知？報告書第六章第二節叙及日本官員及顧問時，亦有如次之一段：

在「滿洲國政府」中，日本官員甚為重要，各部均有日本顧問。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雖均為華人，但在新國家組織中實際上操有最大權力之各總務廳，其廳長則均屬日人，其初命名為顧問，但最近職位之重要者，已被實授為政府官員一如華人。僅計中央政府方面，而不計地方政府，軍政部軍隊，以及政府經營事業中之日人，日人之為「滿洲國」官員者，為數已近二百。

日本人控制事實上等於國務總理衙門之總務廳，法制局，諮議局，及各部各省之總務廳，各縣區之自治指導委員會，以及奉天吉林及黑龍江省之警察廳。日本顧問參議及秘書，各局大率有之。

可見調查團諸君對於日本顧問在偽組織中之專橫跋扈情形，原極洞悉。既明知之，而又規定在名額上應佔一重要之比例，豈非滑稽之尤？以言「在中日合作空氣中，指

派較多日籍顧問，可使此項官員，貢獻其特別適宜於當地情形之訓練與學識，此直夢囈耳！此項建議，其與現時傀儡組織顧問稍異者，即指除日本顧問外，尚須指派其他國籍之顧問耳。總之，調查團此項建議，完全為屈服日本暴力，遷就「既成事實」之表現，此吾人所絕難同意者也。

5. 外國顧問即變相國際共管

調查團認今後東北政府非有高度之自治權，不足以調和中日之紛爭，故建議滿洲有實行特殊制度任用外國顧問之必要，且規定此種制度，必須經日方之同意。此揆諸法理，尤屬錯誤已極。吾人姑讓步承認東北有施行特殊制度之必要，然其施政方針，官吏任用，亦應出於中國政府之自由意志，方為合理。依調查團所建議，特殊制度之外國顧問，除日本應佔一重要比例外，又須就國聯理事會所指定之名單指派之；其中有二名顧問，一為監督稅收，一為監督警察；地方最高法院亦任用二名，中央銀行亦須聘請一名總顧問。以一地方政府，而竟需用權限廣泛之多數外國顧問以監督之，管理之，是直國際共管耳。所謂自治政府者，其財政權，警察權，司法權皆操諸外國顧問，所謂「自治」者何事，尚得謂之政府也耶？調查團對於此項外國顧問，雖曾聲明為代表一種國際合作之方式，且又以顧問自身應為僱用國之公僕相勉勵。然此特調查團理想的空談，而忘却其所謂外國顧問者，非僅以備諮詢，且據有執行權與管理權矣。其權限廣泛若此，且有多名為國聯理事會所指定，與其謂為僱用國之公僕，無寧謂為國際共管之代表為恰當。夫國際共管之說，由來已久，然欲實現於我國家已臻統一，民族意識日益發達之今日，其可能乎？匪特

不可能，而東亞之糾紛，世界之禍患，胥以此而增加其嚴重。此又吾人所絕難同意者也。

二、滿洲自治之不當

「滿洲自治」，為調查團解決中日糾紛重要建議之一。報告書第九章解決之原則及條件，其第七項有云：「滿洲政府應加以變更，俾其在適合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獲得足以適應該三省地方情形與特性之高度自治權。」第十章內，更將中國中央政府與東三省之權限與該地方自治政府之權限，加以劃分。據其提案所云：

保留於中央政府之權限：

(一) 除特別規定外，有管理一般的條約及外交關係之權，但中央政府不得締結與宣言條款相違反之國際協定。

(二) 有管理海關，郵政，鹽稅之權，並或可有管理印花稅及烟酒行政之權。關於此類稅款之純收入，中央政府與東三省政府間如何公平分配，當由顧問會議規定之。

(三) 有依照宣言所規定之程序，任命東三省政府行政長官之權，至少初步應當如此。至出缺時，當以同樣方法補充，或以東三省某種選舉制度行之，此則應由顧問會議合意議定，並列入宣言之內。

(四) 有對於東三省行政長官頒發某種必要訓令以保證履行中國中央政府所締結關於東三省自治政府管轄下各事項之國際協定之權。

(五) 顧問會議所合意議定之其他權限。地方政府之權限：一切其他權限，均屬於東三

省自治政府。

果如調查團建議所云，則我國對於東三省，除管轄海關，郵政，鹽稅，並維持中央政府之名義外，東三省實質上匪特爲一整個獨立之政府，直儼然一整個獨立之國家。其建議管理海關，郵政鹽與稅者，全基於担保外債之關係，爲列強自身利益着想，設無上述關係，此項管理權，當亦歸劃地方政府也。所謂滿洲自治云者，在此種場合之下，始如愛爾蘭 (Ireland)，印度 (India) 之於英吉利，(The British Empire)；其共戴一中央之名義，則有如一八六七年奧 (Austria) 匈 (Hungary) 兩國之所謂兼君政體 (Dual Monarchy)，即奧地利國王兼任匈牙利君主，除維持外交及官戰之關係外，彼此獨立，不相干涉；且今後東三省尙須廢除軍備，撤退中國駐軍，是又類大戰後國際共管下之薩爾煤區 (Saar) 與但澤 (Danzig) 自由市；依照第十章對於締結新約之建議：「締約國之一方或第三者，如對於無軍備區域有任何侵犯，即成爲一種侵略行爲，其他一方——或遇第三者攻擊時，則締約雙方——有採取其所認爲適當之任何辦法，以防備無軍備區域之權。」是又類歐陸之比利時 (Belgium) 與瑞士 (Switzerland)，爲世界之永遠中立國矣。意者調查團諸君，震撼於日閥強權之暴力，對於東北問題，若無解決之良策，故假借民族自治之名義，而爲此不倫不類的「滿洲自治」之建議，藉塞調查之責。調查團諸君之苦心孤詣，吾人固可深諒；但所謂滿洲自治者，關係至大，影響至鉅，其間之矛盾錯誤，吾人不可以不辯。茲將吾人之理由分述如次：

1. 民族自治及民族自決之意義與範圍

民族自治與民族自決，雖爲不同之名詞，實具同一之

涵義。此種潮流，導源於十九世紀之民族主義運動，而發揚於日爾曼與意大利之統一，至歐戰後，經美總統威爾遜氏之提倡，益登峰造極。吾人試展十九世紀之世界史，則自一八五〇年以後，戰爭迭起，如克里米亞戰爭 (Crimean War) 一八五四——五六年，意大利戰爭 (一八五九——六〇年，普奧對丹麥戰爭 (一八六四年)，普奧戰爭 (一八六六年)，普法戰爭 (一八七〇——七一年)，俄土戰爭 (一八七七——七八年)，不一而足。凡此種戰爭，均直接間接起自民族統一獨立運動。蓋此時歐洲政治活動之中心在民族運動，其能號召成功者，即爲揭發領導此運動之民族主義。如日爾曼與意大利之統一，俾斯麥 (Bismarck) 與加富爾 (Cavour) 之才具，固不爲無功；而其統一之主要因素，實民族主義有以促成之，此種族，宗教，語文，風俗，地理相同之民族，要求統一而自決自治之實例也。至若種族，宗教，語文，風俗，地理不同之民族，雖強納於統一之下，亦必趨於分裂之途。如印度夙爲獨立國，後以英人之侵略，致滅全印，而印人宵無日不在作獨立與自治之運動。英人對於所謂印度叛黨，捕之，拘之，殺之；對於印度之國民大會，則驅散之，槍擊之，然卒有甘地氏之「不合作主義」，使英政府不得不考慮印人之要求。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之新選舉，可謂印度自治之先聲。但印人以目的未遂，其抵抗並不稍減，於是英政府又根據一九一七年之「孟泰格祺母斯福報告」(Montagu-Chelmsford Report)，造成一較完整之自治議案，於一九一九年，由議會通過，稱爲印度政府法。至一九三〇年，約翰西門 (Sir John Simon) 於議會中更提出一改良一九一九年之自治案，改印度爲大聯邦，與以完全之自治，英軍總司

(31)

令不得干與印度政治，於不能解決之事項發生時，印度總督，方能一用其大權。此印度之所以自治也。又如愛爾蘭之地理環境，與風俗，宗教，種族，大部分異於英格蘭與蘇格蘭。蓋其初三島之民，均爲加爾特人，復被薩克森人征服，不列顛（與加爾特同種）被逐於英格蘭之外，自是英格蘭多爲薩克森人，愛爾蘭多爲加爾特人。因此之故，英，愛屢生糾紛，致成仇隙，愛爾蘭終欲獨立。英政府遂於一八八六年通過一自治案，規定設立愛爾蘭議會；一八九三年，更由格萊斯頓提出第二次自治案，規定在英國平民院中，有議員八十名爲代表；第三次自治案，爲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〇年之第四次自治案，規定愛爾蘭設兩分立議會，及一聯邦會（Federal Council），除重要事項如國防與外交外，餘皆由愛爾蘭自理。然愛爾蘭猶以爲未足，於一九二一年之條約，要求英國更爲愛爾蘭頒布新憲法，此憲法，即爲愛爾蘭自由邦憲法。此愛爾蘭之所以自治也。（事見Minor: Government of Europe Chapters 17, 18.）此則種族，宗教，風俗，地理不同之民族，要求分離而自決自治之實例也。世界大戰以後，新興之邦，若爾後春筍，如波蘭之復興，匈牙利之離奧獨立，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芬蘭（Finland），澳志（Hedjaz）等國之獨立建國，此則昔爲獨立國家，而種族，宗教，語文，風俗亦或不同之民族，要求分離而自決自治之又一實例也。

從上述之實例以觀，則所謂民族自決自治者，自有其特殊之意義與範圍。即凡種族，宗教，語文，風俗，地理相同之民族，雖以暴力強使分離，終必歸於統一；反之，凡種族，宗教，語文，風俗，地理相異之民族，或會爲獨

立國家之民族，雖以暴力強使統一，終必趨於分離。故適合於前者之條件者，維持統一，不失民族自決之意義與範圍；適合於後者之條件者，維持獨立，亦不失民族自決之意義與範圍。非然者，即軼出自決之範圍而喪失自決之意義矣。此意與範圍者，即吾人討論本題之根據也。

2. 滿洲自治違反民族自決之意義

調查團建議「滿洲自治」，雖未明言根據民族自決之意義；但以此會涉及東三省之少數民族問題，並言及一部分民衆對於現時東北傀儡組織之善意，似又確爲民族自決而發。使調查團諸君之本意果如此者，則吾人當請教於調查團諸君之前：滿洲民族，適合於上述獨立之條件乎？抑類似上述統一之條件也？吾恐調查團諸君對此匪特無以置答，且將無以自解矣。夫滿洲之土地，考諸遠古，即係中國之版圖。此非獨中國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經濟上各方面足以証明之，即調查團諸君對此亦多所申明。報告書第一章之首段有云：「滿洲爲中國之一部，而在地理上，並處於日俄兩國領土之間。」第二章之首節有云：「而今日之滿洲，遂爲中國人之滿洲，不可移易矣。」同章第二節有云：「蓋中國人在滿洲之地位，根深蒂固，迄今已二千年，（事實上已三千年），中國文化在南滿部份早已活躍。當明代之時（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此種文化之勢力，已極強盛，明代之威權，實際已遍及於滿洲之全部。」夫以文化與主權統屬於中國已逾三千年之滿洲，竟建議自治，脫離祖國（名義上雖未脫離，實際上等於脫離）。此違反民族自決之意義者一。東三省之種族，宗教，語文，風俗，地理等與中國其他各省一致之情形，吾人已於第一章詳爲闡明，即報告書對此相同之事實，亦迭有

例證，多所申述。以種族，宗教，語文，風俗，地理等完全相同之民族，竟抹殺事實，以「滿洲自治」為解決糾紛之辦法。此違反民族自決之意義者二。現存之東省傀儡組織，係形成於此次東北事變之後，完全為日本武人及政客浪人所包辦製造，師亡韓之故智，資為吞併之手段者。我東北三千萬民衆，對此無不痛心疾首，堅決反對。此種情形，即調查團諸君亦甚明瞭，報告書第六章第一節之結論有云：「獨立運動，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滿洲從未應得；其所以有此運動者，乃日本軍隊在場所致也。」又云：「以各方面所得之一切證據而論，本調查團認為『滿洲國』之構成，雖有若干助成份子，但其最有力之兩種份子，厥為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依本調查團之判斷，若無此兩者，新國決不能成立也。基此理由，現在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第三節之結論有云：「即一般中國人對『滿洲國政府』均不贊助。此所謂『滿洲國政府』者，在當地中國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夫所謂『滿洲國』者，既非滿洲自來獨立之國家，而其成立適值日本武力侵佔東北之後，且又非東北民衆「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斷為不能維持及承認其現時組織，固屬至當。然夷考其實，東北三千萬民衆，對於「獨立」固極端反對，即於「自治」亦未嘗有此要求；今乃違反人民意志，遷就既成事實，建議自治。此違反民族自決之意義者三。

調查團諸君既明知現時東北傀儡組織為日人所強迫造成，「以為解決九月十八日以後滿洲局面之辦法」，（見報告書第六章第一節）；同時又明知「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將該省等自中國他部割離，日後恐將造成一嚴重之「

未收回領土」問題，使中國常存敵意，以致危及和平，且有引起繼續抵制日貨運動之可能」（見第九章）；而偏作此不倫不類的「滿洲自治」之建議，實所不解。以近代民族問題而論，為違反自決之意義；以國聯之立場及歷次對於東北問題之決議而論，為一種嚴重之矛盾。此吾人所深致遺憾者也。

3. 滿洲自治為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

吾人欲明白「滿洲自治」是否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當先了解主權與宗主權之區別。主權（Sovereignty）者，一國最高無上之統治權也。凡國家領土所在之區，即其主權所至之地，如中國擁有江，浙，皖，贛等二十八行省及西藏，外蒙古等二區，則凡在此省區以內，中國政府均有其最高之統治權。宗主權（Suzerainty）者，即對於屬邦或附庸國之統治權也。如昔之保加利亞（Bulgaria），於一八七八年，遵柏林條約，為土耳其之屬邦，故此時之土耳其，對於保加利亞，有所謂宗主權；如昔之脫蘭士哇（Transvaal），自一八八五年為英之屬邦，故英之於脫蘭士哇，亦有所謂宗主權；又如往時中國之於朝鮮，亦其明例。但此宗主權有一定之範圍，即：（a）不能認附庸國為宗主國之直接領土；（b）不能承認宗主國對於附庸國行政之完整。

權限既明，請進而討論「滿洲自治」與中國領土主權之關係。今世人之所謂「滿洲」者，即中國之所謂「東三省」也。東三省者，中國領土之一部，國家主權之所寄，具有數千年之歷史，與中國內部有種種不可分離之連鎖關係。今建議「滿洲自治」，是無異割裂中國之領土，摧殘中國之主權，此非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而何？九

國公約之第一條第一款曰：「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其第二款曰：「給與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之鞏固政府。」今「滿洲自治」之建議，既割裂中國之領土，復破壞中國之主權，是否爲「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年來中國之政府，正在日趨發展鞏固之途，今既遭日本暴力之侵襲，復欲割裂其領土與主權，此非特有失「給與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之鞏固政府」之精神，實爲「給與中國發展並維持一有力之鞏固政府」之絕大障礙。此非違反九國公約而何？國聯盟約之第十條曰：「聯合會會員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如遇此種侵犯，或有此種侵犯之任何威脅或危險之虞時，行政院應籌履行此項義務之方法。」今中日兩國各爲國聯會員之一員，現日本不顧盟約，侵佔中國領土，蹂躪中國主權，國聯不採取有效辦法，以履行其制止侵略之義務，而其調查團之建議，竟遷就暴力所造成之既成事實，破壞會員國之領土完全及政治獨立，此非抵觸國聯盟約而何？

此「滿洲自治」之建議，如果實現，即爲割裂我國領土，破壞我國主權，違反九國公約，抵觸國聯盟約，此又吾人所堅決反對者也。

二、撤廢東北軍備之無理

報告書中所建議之事項，其最令吾人詫異者，莫如撤廢東三省軍備，而以外國教練官所指揮之憲警代之一事。蓋我國之於東北領土，由偶失而成爲永失之關鍵在此，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之是否由茲破壞，其關鍵亦在此，不可不加研究也。

調查團建議撤廢軍備之大意，謂東三省境內之秩序，應由一種地方憲警維持之。此種憲警之成立，由外國教練官協助辦理。憲警以外之軍隊，連任何特別警備隊或護路隊在內，不問其爲華人或日人，一律撤退，並由關係各國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以避免外來之侵略，倘以後締約國之一方或第三者對無軍備區域加以攻擊時，其他一方，有權採取任何辦法，以防衛此無軍備區域。茲分四項評論之。

1. 軍備與國家主權之關係

國家之生存於國際社會中，與個人之生存於人羣社會中，初無差異。人在生存時，不能不有自衛力，國家在生存時，亦不能不有自衛力，雖自衛之方法不同，而其重要則一。人苟無自衛力，必易招外來之侮辱；國苟無自衛力，必難逃危亡之厄運。史實彰彰，可資殷鑒。孫中山先生所著之三民主義，其論民權主義有云：「人類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能力，才能夠生存……」由此可見自衛之重要。領土者，國家主權之所立；軍備者，國家主權之所寄。欲保守疆土，維持主權，首賴軍備。蓋必有充實之軍備，始能維國家之主權；欲維國家之主權，必須有充實之軍備。斯二者，相因以存者也。

東三省爲中國領土之一部，此調查團諸君之所公認也。既承認爲中國之領土，即當尊重中國之主權。果尊重中國之主權，即不能撤廢國家主權所寄之軍備。調查團之爲此建議，殆以今日之東北，事實上在日本武裝佔領之下，欲撤退日本軍隊，必須同時以撤退中國軍隊爲交換條件，始能獲得日人之諒解與同意，故爲此遷就事實之辦法乎？

須知調查團之使命，係受國聯之付託，而國聯之職責，在維持現時國際公約之義務，以爲解決糾紛之原則。即調查團諸君於此次遠東之行，固亦以此自矢者也。今調查團既明知東三省爲中國之領土，而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與獨立，又必須尊重，奈何竟欲中國自撤其領土內之軍備，以放棄其固有之主權？既明知日人之佔領東三省，爲預定之侵略計畫，奈何竟欲以被侵略國之主權，爲交換侵略國撤兵之條件？由前之說，爲自相矛盾；由後之說，爲瞻徇強權。所謂維持「現存國際義務之基本原則」者，固如是乎？此吾人深爲，調查團諸君惜也。

2. 東三省不能撤廢軍備

(34)
現在世界上固有無軍備之國家，如盧森堡，比利士等國，即其實例。但盧比等國，係國際條約所公認之永久中立國，安寧由列強爲之担保，其國內除維持地方治安之警憲外，無設置軍備之必要。然此種中立，有時亦遭破壞，苟無相當軍備，即不足以資抵抗。如比利士本一八三一年倫敦條約列強所承認之永久中立國，宜可以高枕無憂矣。詎知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開始，即遭德軍蹂躪，破壞無餘。幸當時亞爾培一世早爲之備，得以苟延殘喘；否則今日之比利士，恐已成爲歷史上之名詞矣。然此所謂中立國者，殆皆獨立之小國。而其領地形勢衝要，爲強隣之所共爭，又爲任何一方所不能獨據。故公約爲永遠中立區域，以資緩衝，而免衝突。因其爲永久之中立，故無需龐大之軍備。此即中立國之所由來，亦即撤廢軍備之所由起。其情形與條件，以吾人所應明瞭者。東三省是否應撤廢軍備，當以其是否具有上述中立國之條件與情形爲衡。如不認識此點，即下一應撤廢軍備之結論，特盲人「燭捫」之談，遠

離事實，初無補於問題之解決也。

以地理關係言，東北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以政治組織言，東北爲中國之三省。與中國內部，有種種不可分割之連鎖。夫既非獨立之國家，即不合於中立之條件；既不合於中立之條件，即無撤廢軍備之可能。此以中立之條件言，東三省不能撤廢軍備者一也。以東三省之情勢論，固久爲日俄逐鹿之場所，但中國之領土與主權，誰亦不能否認之。因年來積極整理建設之結果，東北政治，日趨光明。自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成立後，中國主權，益臻鞏固，日人於此，深加嫉忌，故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暴力發動，以武裝佔領東北。實則此爲中日之爭，非日俄之爭，亦非其他各國對於東北之爭，其所處之環境，遠不若比利士與盧森堡等國之複雜。既非極複雜之環境，自無置於中立之需要。既非中立區域，即不能撤廢自衛之軍備。此以東北情勢言，東三省不能撤廢軍備者二也。今日人以武力侵佔東省，我三千萬人民呻吟於日軍鐵蹄之下者，已一載有奇。如現行國際公約之義務果應維持者，國聯早當勒令日方撤退武裝，恢復原狀，使雙方從事政治之解決。乃計不出此，反欲中國撤廢東省軍備，以滿日人之慾壑。是不啻獎勵強權，以啟侵略之漸。此以國際公約之義務言，東三省不能撤廢軍備者三也。由此，可見從任何觀點上，東省既無撤廢軍備之理由，中國更無撤廢軍備之義務。今報告書竟爲此乖理之建議，此又吾人爲調查團諸君所深惜也。

3. 撤廢東北軍備即係損害中國主權

調查團對於解決東北糾紛之建議，有一極大矛盾之點，即一方面承認東三省爲中國領土之一部，絕對不能分割，並否認日本在東北有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管理權；但另一

方面，却表示中日兩國對於東北有同樣之權利。以撤廢東北軍備之建議而論，則矛盾立見：

茲提議以外國教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警憲，為東三省境內之惟一武裝。……該項隊伍，既為東三省境內惟一武裝實力，故一俟組織完成，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即應退出東三省境內。所謂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包括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之一切特別警隊或鐵路守備隊。

第十章第一節

吾人細釋上述建議，調查團實認東三省為中日兩國共管區域，故中日兩國應同樣撤去其一切武裝實力。此種觀察，實屬嚴重之錯誤。須知此次東北事件，日方為侵略國，中國為被侵略國。今竟不識定其情節與曲直，將彼侵略國與侵略國等量齊觀，曲直同科，其何以解於國聯盟約第十條國聯對於會員國所負之義務？此其一。軍備為國家主義之所寄，凡領土所在地，即主權所至之區。欲維主權，必需軍備，此相因之關係，前已申論。明達如調查團諸君，寧尚不知？今竟欲中國撤退在東三省之一切武裝實力，是不啻摧毀中國在東三省之主權。此其二。東北為中國之領土，中國駐軍東北，為其應有之權利。日本與東北為鄰封，日本出兵東省，是為非法之侵略。撤退日本侵略之武裝，固為法理所當然；撤退中國主權所寄之武裝，此豈持平之解決？此其三。如一國領土被他國非法侵佔，被侵略國即應撤去該領土內之武裝，以為解決之條件，此例一開，則世界弱肉強食，詎有已時？幸而中國領土廣大，即如調查團建議所云，尙可以將被侵略區域之武裝，撤至未被侵略之區域。倘或中國版圖，即此東北一隅，今不幸膏

被日軍侵佔，則照調查團之建議，中國國家武裝，將撤至何處？其投諸東流，以引頸受戮乎？抑繳送國聯，請其共管乎？試問解決國際糾紛，寧有此理？此其四。無論在何觀點上，均充分證明中國不能撤廢在東北之武裝。如與日軍同時撤退，此在日本，固為理之當然，且無損於毫末；而在中國方面，則主權上已受重大之桎梏與損失矣。

又警憲之組織，須受「外國教官協助」。所謂協助云云，當包括編制，訓練，指揮諸義。此與一九一五年日本念一條件所謂「中國軍隊應請日本軍官訓練」者，同一意義。此念一條者，中國民衆，始終未予承認，亦誓死不能承認者。今調查團諸君，竟欲強令吾人承認耶？

四、樹立中日新約之評議

調查團建議在中日雙方以國聯行政院之協助，商定解決糾紛大綱後，第二步即召集所謂顧問會議，討論一切問題；同時於顧問會議中，開始談判中日間關於條約權益爭論之事件，談判之結果，應包括於（一）關於日本利益之中日條約；（二）中日和解決斷不侵犯與互助條約；（三）中日商約三種文件之內。茲就其具體建議，加以分析及批評：

1. 關於日本利益之中日條約

(a) 對樹立新約原則可以接受

中日問題之複雜，以滿蒙問題為中心，而滿蒙問題之癥結，則在懸案部份；此種懸案之造成，又為條約解釋之差異所發生之爭執，如一九零五年之中日條約附屬秘密議定書，及一九一五年之日本二十一條要求，即為此爭執之焦點。關於此項爭執，日本往往溢出其範圍，責中國以尊重並履行條約之義務，且動輒採取武裝的威脅手段，致釀

成積年不解之嚴重糾紛，故造成懸案之責任，顯然由日本負擔。今調查團建議中日另訂新約，解決歷年懸案，以謀澈底消弭兩國糾紛，並樹立一種新關係，此項建議，在原則上吾人自可贊同。惟中日間過去之糾紛，純係日本侵略計劃所促成，所謂解決懸案，自不能視為日本侵略行為之勝利條件；換言之，即新約之締結，應確實依據報告書結論所舉解決糾紛原則中之「不違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與「無背中國主權及行政之完整與獨立」兩原則，此應深切注意之要點也。

(b) 建議各點殊難同意

調查團苟有消弭中日糾紛之誠意，必須以公正之態度，堅毅之精神，保持其尊嚴之立場，建立一公道的原則，然後依此原則，樹立合理互惠之新條約關係，凡足以引起兩國之紛爭與違背公道之非法權利，皆應本國聯盟約之精神，掃除廓清，重為釐定。如此方可以奠永久和平之基礎，不負此次調查之使命。乃報告書關於訂約之建議，抵牾偏頗，與其所自立之原則大相刺謬，此不啻為日本之侵略行為張目辯護，俾獲得正式條約之根據，為非法權利加一保障。吾人對於此項建議，萬難同意。茲分別論之：

(一) 忽略法律方面之考察

調查團以中國忽視日本在滿洲之已得權益，為爭議之根本原因，故提議訂立關係日方權益之中日條約，以謀解決兩國糾紛。但若解決權益上之糾紛，僅從政治方面考察此種權益產生之經過，實不足以達到解決糾紛之目的，必須從權益之法律方面，加以考察，始能獲得最後解決之方案。乃調查團既未作法律的觀察，以解釋事實，更未從權

益的法律方面，以尋求解決方案。如一九〇五年來歷不明之「中日密約」，及一九一五年非法成立之「二十一條」，此在中國認為在法律上不發生效力者，調查團初未加以考查。依其解釋，此等條約亦為中國所應遵守，豈非大謬？此外，日本在滿洲享有世界無可比擬之權益，是否屬於條約的合法的權益，調查團對於此點，亦未加以分析。夫日本過去在東三省之權益，除根據正式條約而來者外，其無條約根據之非法權利，所在皆是；其聲望大者，為日本在南滿沿線之駐兵權。按諸滿洲善後協定之規定，日本之南滿駐兵，若俄國在北滿撤退時，日本同時亦須撤退。但俄在北滿之駐兵早已撤退，而日本則延不撤退，雖經中國之屢次照會，日本竟置若罔聞。他若南滿路平行線問題，以漫無空間限制之文句，作為反對中國建築鐵路之口實，亦其一例。此外類此情形者，不可勝數。中國近年來自覺往日所未注意之種種權利，關係重要，不容漠視，謀所以整理之或更利用之，以達到逐漸開發三省之目的。而調查團竟誤認中國自覺已往及現在之正當權利，不再放棄，為削減日本在東北條約上之合法權益，實屬誤解。殊不知日本在東三省所以享有無可比擬之權益者，多半超出條約所規定之範圍以外，由於非法侵略而來。調查團對於中日條約所規定之權益，未能與日本現在東三省所實際享受者，兩相印證，故不免有此錯誤之結論，因而認為日本非法取得之權益為既得權，主張於新約中予以維持。調查團此種不顧法律立場之建議，殊不足以解決中日糾紛之癥結也。

(二) 建議各點為超二十一條之新局面

調查團建議樹立中日新約，殆以中日爭議之二十一條為背景，並為滿足日本侵略野心計，特將範圍擴大，性質

加重。今試將調查團建議該項條約之目的與一九一五年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之二十一條相較，即可知此中關係之不容吾人忽視矣。調查團建議之新約四項，其範圍爲：「(一) 東省經濟上之開發，日方得自由參加，但不得因此而取得經濟上或政治上管理該地之權；(二) 日本在熱河省現在享有之權利，予以維持；(三) 居住及租地之權，推及東省全境，同時對於領事裁判權之原則，酌予變更；(四) 鐵路使用之協定。」而二十一條關於南滿及東蒙條約則有：「第二條，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經營農業，得商租其需用地畝。第三條，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工商業等一切生意。第四條，如有日本國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政府可允許之。第五條，前三條所載之日本國臣民，除須將照例所領之護照向地方官註冊外，應服中國警察法令及課稅。民刑訴訟，日本國臣民爲被告時，歸日本國領事審判；又中國人民爲被告時，歸中國官吏審判；彼此均得派員到堂旁聽。但關於土地之日本國臣民與中國人民之民事訴訟，按照中國法律及地方習慣，由兩國派員共同審判。將來該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時，所有關於日本國臣民之民刑一切訴訟，即完全由中國法庭審判。第六條，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民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東部內蒙古合宜地方爲商埠。」

吾人於此可知調查團建議樹立中日新約之目的，實爲二十一條之化身，且更進一步加以擴大。今再將調查團建議關於聘用外國顧問及組織顧問會議之意見，與二十一條同問題之條文相較，其異同之點又何如？調查團謂：「此項會議，可由中日兩國之代表，暨代表當地人民之代表團

兩組織成之，該代表團，一由中國政府規定之方法選出之，一由日本政府規定之方法選出之……」至關於聘用外國顧問一層則建議：「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民應佔一重要之比例……」行政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所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一)警察及(二)稅收機關。該二員在新政體草創及試行期內，當享有廣泛權限……」在二十一條條文中則有：「第二號第六款：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又「第五號第三款：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讓成輾轉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警察機關。」

吾人觀於上述各點，可知二十一條中之所謂「必須向日本政府商議」及「聘用多數日本人」者，在調查團報告書中則曰：「其中日本人應佔一重要比例」。在二十一條中之所謂「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者，在調查團報告書中則曰：「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警察」，且並無「必要地方」之規定。且也，在二十一條中，日本固未嘗涉及我國之司法行政，(雖有領事裁判權，但此侵害主權之辦法，我國亦已屢次聲明廢止)而調查團則建議「地方最高法院應聘用外籍顧問，至少二人，其一須爲日本國籍，其他法院，延用顧問，亦殊有利益」。此二者互相對照，不獨所擬新約，已將二十一條包括在內，且擴而充之，顯然爲一超二十一條之新局面，使日本得享有非常權利。然二十一條既爲中國人民所一致反對，且未經當時國會之批准，並已正式聲明作廢，早失法律上

之根據。調查竟從垃圾堆中檢出，認爲係日本之既得權益，且必須保障之，實屬違反中國民意及條約上法律上之立場，更忘却調查團本身所負之使命。

若再以調查團所擬之辦法，與去年日外相幣原所提之五項基本原則相較，相去又奚啻天壤？幣原五項原則：一，互相否認侵略政策行動；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三，互相澈底禁止妨害通商自由及煽動國際的惡感之組織的運動；四，保護滿洲各地之日本臣民一切平和的業務；五，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上權益。此五項原則，因二十一條問題發生爭執，已爲中國一再聲明不能接受。今調查團所建議各點，反不如日本所自提之五項原則，世安有於害小者既嚴拒於前，於事大者反欣然接受於後之理？調查團建議，竟抹煞中國方面之意見，揆諸情理，豈得謂平！

(三) 將中國權利贈送日本

報告書中所舉關係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之四項，其權利之大，不獨爲任何國家在他國領土內所未曾擬議，且亦未曾享受者。請爲調查團將中國利益贈送日本，慷他人之慨，誠非過言。請列舉事實爲證：

第一，日本所謂「滿蒙特權」，本有一定限度。例如南滿鐵路之管轄，係根據一九零五年日俄媾和條約第六條，由日本承繼（按期限爲八十年，見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第十二款）；撫順，烟台，鞍山礦產權利，係根據一九零五年日俄媾和條約等六條；鴨綠江森林採伐權利，係根據一九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滿蒙條約附屬協定第十條；凡此皆日本認爲最重要之既得權利。但俱由條約規定，有一定之範圍，初非漫無限制者。至於北滿方面，日本除對洮昂路有借款與築關係外，法律上並無絲毫「既得

權利」。乃調查所擬締結之新約，竟主張「東省經濟上之開發，日本得自由參加。」如此漫無限制，殊不解調查團之用心何在！按報告書第一章至第八章，皆屬於敘述中日糾紛之歷史的事實，則調查團對於日本權利之根據，已瞭如指掌，加以滿洲問題專家楊華德（C. Walter Young）作顧問，若謂該團不知日本之權利有限，未免欺人；若知之而仍作如斯之建議，非斷送中國固有權利而何？

第二，日本在熱河省所享有之權利，根據現有之條約，僅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南滿東蒙條約第四條所規定：「如有日本臣民及中國人民願在東部內蒙古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時，中國政府可允准之。」雖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日本獲得滿蒙五鐵路之借款及投資優先權，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中日交涉，確立滿蒙鐵道投資之優先權，一九一八年獲得滿蒙四鐵道之借款權；但根據上述協議，日本在熱河僅有對洮熱鐵道（洮南熱河間）及洮熱線之某地至海港線有投資優先權。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美國發起四國銀行團，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英，美，法，日四國銀行代表在巴黎開會，決議之第二條云：「關於實業及鐵路借款，除已爲各國之既定權利外，凡現在及將來，此項借款優先權，由本團承受。」當時日本曾要求將滿蒙除外，因英美之反對，往返磋商，至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一日，四國銀行團，協議滿蒙調解辦法第二條規定：「議定之洮南熱河鐵路，與議定自洮熱間至海岸之鐵路，歸入新銀行團鐵路範圍之內。」此外吾人翻徧中日條約，實不知日本在熱河所應享有之權利安在？

第三，「居住及借地之權，推及東省全境」根據二十一條第二號第二款「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爲蓋造商工業應

用之房廠，或爲農業，可向業主商租須用之土地。」及第三款「日本國臣民可在南滿洲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而言，日本在東北居住及租地之權，亦僅限於南滿。今調查團竟建議「推及東省全境」，豈非至可驚駭之事？調查團又謂：「居住權與領事裁判權關係密切，至爲明顯……日不欲放棄領事裁判權地位，其事亦同樣明顯，於是有調和之方法二：其一，現有之居住權及其附帶之領事裁判權地位應予以維持，其居住權範圍應加以擴大，俾在北滿及熱河之日本人民及朝鮮人民，均得享受，但無領事裁判權；其二，在東三省及熱河之任何地方，日本人民應予以居住權及領事裁判權，而朝鮮人民，則僅有居住權而無領事裁判權。」照此辦法，日人在東三省及熱河全境均享有居住，營業，統治（領事裁判權）種種權利，此無異承認東北屬於日本。即非整個屬於日本，亦等於中日兩國共管之狀態。

第四，關於鐵路使用之協定，報告書謂：「在調查團之意，以爲有兩種可能之解決。」第一種辦法，「係中日鐵路行政之業務協定，……中日兩國可根據合作原則，協議管理在滿洲之各有鐵路制度，並設一中日鐵路聯合委員會，……至少加以外國顧問一人。」「滿洲一切鐵路得有利用南滿專門經驗之利益。」照此辦法，結果東北一切中國鐵路，皆爲日本所攫奪，推而至於任何方式之經濟合作，亦復如是。故調查團此種建議，不啻完全承認現在日人在東北傀儡組織掩護下之鐵路併吞計劃，乃美其名曰「中日兩國經濟合作之真實標記」，實與日人所謂「親善之極，融爲一體」，有異曲同工之妙。

建議之結論一段，尤爲妙絕。原文云：「如能遵循以

前途徑，議訂條約，則日本在東三省與熱河之權利，可有法律根據，其有益於日本，至少當與現有之條約協定相同。」此誠滑稽已極。日本去年悍然佔據東北，其惟一口實，「爲自衛權之發動，爲擁護既得權利」，然自實際佔領後，自覺其行動已逾越「自衛權」之範圍，且其所獲亦超過「既得權利」範圍萬倍，遂亦不再提所謂既得權益。迨賢明之調查團東來調查，經數閱月之考查研究，製成解決方案，建議中日締結關於日方利益之中日新約，將東北之經濟開發，居住租地，司法統治，鐵路管理等種種之權益，統歸日本，並主張在新條約中，予以明白之規定。謂如此「則日本在東三省與熱河之權利，可有法律根據」。調查團諸君遷就「既成事實」，苦心焦思，作成此瞻徇偏袒之辦法，宜可以令日人滿意。無如日本志在分割中國領土，對此尙表示輻強反對，此則大出調查團諸君意料之外者也。

（四）大償日人所欲

日本對東北之侵略，原有其一貫之大陸政策。前日首相田中義一滿蒙積極政策之奏章，及日本滿蒙權益擁護秘密會議紀錄，實爲日本數十年來，處心積慮，有計劃有步驟的對中國侵略行爲之總暴露。田中奏章有云：「至對於南北滿之權利，則以二十一條爲基礎，勇往邁進，另添如左之附帶權利，以便保持我永久實享之權利：（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延長其期限，並確認商工業等業之土地商租權；（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經營各種商工業，皆可自由行動及出入南北滿，中國法律須許其自由，不得有不法之科稅及檢查；（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個鐵礦及石炭鑛權，以及森林採取

權之獲得；(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增聘以及傭聘優先權；(六)鮮民取締之警察駐在權；(七)吉長鐵路之管理經營並延長九十九年；(八)特產物專買權及運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九)黑龍江鑛業全權；(十)吉會鐵路敷設權；(十一)東清鐵路欲向俄國收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十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十三)東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十四)牧畜權。日本滿蒙權益秘密會議紀錄摘要中有云：「我們認爲欲永遠確保帝國在滿蒙之權益，名義上應改南滿路爲日華合辦，以實現其共存共榮之招牌；然後再誘致奉派，將鐵道網與南滿路合併，均稱合辦事業。用這種方法，則(一)可以掩飾我們帝國主義的惡名；(二)可以混淆華人的聰明；(三)可以遮斷歐美資本勢力的侵入。萬一有事的時候，帝國更可藉合辦之權利，不論何路，皇軍皆可自由征發和占用。此實爲實現帝國滿蒙政策的一種深謀遠慮的方法。」以上各點，爲日人夙夜夢寐，企求實現，而迄未如願者。今茲調查團訂約建議之(一)(二)(三)項，至少可以達到前者大部份重要企圖；至第四項，更與後者相符合。可謂大償日人所欲矣。然日本對調查團，猶報以惡聲者，特怪其未明許日人單獨吞并東北耳。

(五) 不適合於公斷人之合法形式

倫敦太晤士報謂調查團所擬辦法「不適合於公斷人之合法形式……」此誠一針見血之言。蓋調查團之根本錯誤，在但知「考慮中日爭議之可能的解決辦法」，而忘却本身即爲國聯之縮影，負有國聯盟約，及其他公約之義務與責任，故所建議之辦法，因此缺乏深澈理智之考察。如謂

「對於已往行動之責任，堅持較輕，而對於尋求防止將來再發生此類行動之方法，堅持較重，」此實絕大錯誤。夫既不堅持已往行動之責任，則所尋求防止之方法，自不適合於公斷人之合法形式，乃欲完成其所謂「考慮中日爭議之可能的解釋辦法」之任務，不亦難乎？試舉例以明之：譬有大盜竊據主人之財產，主人訴之公斷人，公斷人主張盜與主人，調和其根本利益，不堅持已往責任，但尋求將來防止方法。微論盜主未聞以調和方法求解者，藉曰事或有之，然能保其盜之不再犯與他盜之不生心乎？今調查團之建議，得毋類是。調查團既有此根本錯誤，故其所建議之辦法，與陳述之事實，自不免前後矛盾，缺乏實現之可能性。夫條約之締結，須毋違當事國之自由意志及其履行之能力，否則將來履行上必發生重大之困難，調查團此種建議，日人以慾壑未填，已予反對；中國對此喪權辱國之條件，將更難接受。以雙方均不同意之條款，而必欲勉強簽訂，則前途之効力，可想而知。現行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非多數國家合意簽認者乎？而其價值乃等於廢紙，無復絲毫之拘束力。若謂中日兩國能樹立一種如上述建議之新約，即能防止將來不再發生同樣之糾紛，其誰信之？况其所建議新約包含之各項問題，不獨剝奪中國固有之利益，且使日本違法攫取之優越權利，一一取得法律上之根據，所謂願以國聯之力以適合公道與和平之辦法，對於中日根本之利益，予以調和者，固如是乎？吾人敢言：此種拋棄侵略責任而謀雙方根本利益之調和，將愈增其爭議之嚴重性，而消失其和平解決之可能性，誠以調查團此種辦法並非根本的；所謂根本利益者，特日人之片面利益耳。自國聯立場言之，欲謀根本解決，應將東北恢

復「九一八」以前原狀，日本違法奪取一切越權利，條約及協定，一律作廢，另訂中日平等友好之條約，乃不失爲正大光明的調解辦法。欲謀雙方利益，更應以恢復「九一八」以前舊狀爲原則，一面將日本在滿洲及中國他部份利益，在平等友好原則之下，予以合理的合法的維持，或於經濟上予日本在東北方面，有若干與中國合作而又妨礙東北政治的經濟的發展之機會。總以達到互利之目的，斯能調和雙方之利益。調查團諸君因據於日軍暴力，故遷就「既成事實」，徒以「公道」「和平」之文字，騰諸口頭，而瞻徇偏袒之態度，充滿行間。此匪特不適合於公斷人之合法形式，而且有損一切國際條約之尊嚴。吾人對此弊害百出之建議，不能不深切注意而堅決反對也。

2. 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與互助條約

調查團關於訂立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及互助條約之建議，原則上吾人自可接受。惟有應加修正與說明者數點：
(1) 東北爲中國領土，且爲國防第一線，當然有駐兵權，不能與日本相提並論。調查團對於此項條約內容主張「締約國之一方或第三者，如對無軍備區域，有任何侵犯，即成爲一種侵略行爲，其他一方——或遇第三者攻擊時，則締約雙方——有採取認爲適當之任何辦法，以防禦無軍備區域之權。」依此主張，則東三省非復純粹中國領土，而爲中日兩國所共有。此與九國條約，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大相違反，吾人反對之理由，已詳前章，茲不復及。茲須鄭重聲明者，即此種剝奪主權，違反公約之辦法，吾人絕對不能承認。(2) 和解委員會應由有經驗之專家組成，多聘學者，少用政客，其職務規定爲協助政府解決懸而未決及將來或有之困難案件。(3) 公斷庭處理關於法律

性質之爭議，其公斷有一造不服者，得轉訴於國際法庭，他造應予同意，並以國際法庭之判決爲有效。(4) 締約國在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下所享之一切權利，並不因此約而喪失，仍有隨時行使之自由。此又吾人所應修正與聲明者也。

3. 中日商約

中日通商條約滿期已久。中國方面迭經聲明，謀與日方協議修訂，日方始終延宕不理。中國始於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九日，毅然宣佈滿期無效。故現在中日通商關係，實際上乃一無約狀態；不過因種種關係，未能照無約國辦法辦理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雙方雖成立關稅條約；然普通通商行船各事，因領事裁判權問題，雙方意見差異，仍未成立新約。調查團建議訂立此項條約，吾人原無反對之意見，惟雙方必須依照平等互惠之原則，始能樹立一有效之新約，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更須有相當解決辦法，否則恐仍徒託宣言也。

至調查團建議在中日商約中，應載入中國政府担任在其權力之內，採取一切辦法，禁止並遏抑有組織之抵制日貨運動之規定。此點，吾人竊不能無疑。須知中國抵貨運動，純係國民愛國心之發動，爲日人侵略行爲所激成之一種報復手段。因果甚明，前已詳述。按報復爲國際法所不禁，况出於人民之自由意志，爲政府無權禁止者乎？此其一。國際盟約第十六條對侵略國原有共同斷絕經濟關係及財政關係之規定。此與中國抵貨運動不同者，即一爲人民之抵貨，一爲國際之抵貨耳。豈有被侵略之國家而其人民無行使此抵貨之權歟？此其二。非戰公約對於自衛戰爭，尙不否認，則中國人民以和平之抵貨運動自衛之手段，實

有可議？此其三。故從任何觀點言，中國政府，絕不負抵貨之責任。既無抵貨之責任，自不能以「禁止並遏抑」之責，加諸中國政府，而調查團之為此建議者，蓋昧於抵貨運動之因果關係，因果倒置，故不免有此錯誤之建議耳。

第五章 結論

綜上所述，吾人對此洋洋十餘萬言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可得一概括之觀念如下：

第一，總觀報告書全文，其較為公平，差強人意者，即東省事變責任之判明與傀儡組織真相之揭露是也，前者曾一再說明日本之種種藉口「不足以證明軍事行動之正當」，尤「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後者，又毅然指出該組織之形成，係受日本武力之哺育，完全為日人一手造成，決非東北民意所產生。此種「不惜摺一強國之怒，而將事實之真相公布於天下」(見李頓爵士談話)之公勇精神，實為吾人所欽敬。但報告書既明言日軍行動之不當，「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然於此種蓄意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之侵略行為，及其一手造成之傀儡組織為違反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之明證，却諱而不言。其於九一八以後日方種種行動，是否與國聯迭次決議及日本政府之聲明相符合，亦毫未提及。至於中國方面所受之蹂躪，所蒙之損失，更無片言道及。竟謂「本調查團之任務，並不在就該案作辯論……僅恃批評不足以達此目的(指解決)」。此非特違反國聯立場，抑且有負調查責任。蓋此次中日糾紛，中國政府既已申訴國聯，是國聯不啻一公斷法庭，調查團不啻一法庭之檢察官，其所負之責任，不僅在蒐集關於爭執之材料，而尤須對於事實之曲直，予以公正嚴明之申

倘果如調查團之建議，將此種辦法規定於通商條約內，此不獨於中國方面，為片面之契約，且並將禁錮中國人民之愛國思想，拘束中國人民之愛國行動，匪特中國不能接受，恐任何國家亦不願接受也。

述，始能得到一終結之判斷。今竟含混其義，模稜其詞，此則未免美中不足者也。

第二，調查團所調查之事實，往往逾越中日爭執範圍之外，而牽涉及中國之內政問題，記載固多錯誤，批評尤為失當。例如不明中國國民黨對外政策之真義，而漫指為「排外」；誤解孫中山先生開發實業之計劃而建議「國際合作」。更因受日方惡意宣傳之影響，誇張中國赤匪之勢力，描寫國民政府勢力之薄弱，指責中國人民不重國家觀念，誤解中國民族主義之根本精神。凡此種種主觀的偏見，均已超越中立之態度，而有干涉中國內政之嫌，實違反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八項之精神。同時報告書對於「中國近年變遷之概況」，論述頗多，詞意之間，顯然承認中國內政問題為滿洲事變之主要原因，且為妨害世界和平之要素；而其結論則以列強合作，為圓滿之解決。因此報告書之錯誤觀念，將予讀者以不良之印象，此又吾人所引為莫大之憂慮也。

第三，關於抵制日貨問題，調查團之觀察尤多錯誤，且指明抵貨為黨部與政府所操縱，故意鋪張揚厲。此對中國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日人侵略之責任，即在此錯誤之觀察下，完全掩飾矣。須知所謂抵貨運動，全係中國人民愛國心之發動，與黨部政府，毫無關係，此乃一國內

法權問題，根本上即非此次調查之範圍。即退一萬步言，調查固有報告抵日運動之必要，亦不應因乘機置，是非混亂，並肯定中國政府應負「給予其種直接之援助」之「責任」。查我國對日抵貨運動，已非一次，率皆隨日本對我武力侵略而起。日本之武力侵略為因，我國之抵貨運動為果。當此中國領土主權被日人侵佔蹂躪，人民生命財產被日人屠殺掠奪之時，中日關係，實際已陷於交戰狀態，中國人民僅能之以最低限度之抵貨運動，已甚和平。乃調查團對於日本之武力侵略行動，與極戰爭之殘暴行為，不敢繩以「責任」二字；而反以「責任」二字，加諸中國之抵貨運動。此種批評，在法律上，道德上，事實上皆公認允。

第四，最令吾人失望詭異者，即報告書關於解決東北事變之建議。其所建議之方案，關係最大者如：(1) 虛

生顧問會議與聘請外國顧問；(2) 滿洲自治；(3) 撤廢軍備；(4) 樹立中日新約。此四項辦法，無一非違背公理，遷就事實，屈於於日本武力之謬見。是不啻自損國聯之威信，自毀國際之約章。如國聯果據此以爲解決之資，則適足以表現國聯之懦弱，顯公公平之觀察，及正義之同情心，而其制裁力不足以罰之。不僅世界和平失其保障，而國聯所引以消弭國際糾紛之職志，亦無從貫徹。何怪乎侵略者益肆無忌憚？彼侵略者被蹂躪之中國，爲顧全世界和平，尊重國際公約，信賴國聯，轉瞬一載，而所得之結果乃竟如此，此誠令人深滋遺憾者也。吾人爲求中國獨立生存計，爲救國世界和平計，對於此項有欠公允之建議，不能不聲明反對。同時更欲喚起國內國外人士，加以深切之注意焉。

中國國民黨河北省執行委員會通告

案查前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奉中央組織委員會電及通告先後令飭凡因特許入黨取得黨籍或因政治關係擁有中央所發黨證而未向區分部報到之黨員無論有無轉移證書一律限於抵滬前向所在地黨部報到逾期不報者即行取消黨籍此項通告業經本會分發各縣黨部外並登報公告凡現居本省因特許入黨或政治關係而向區分部報到之黨員應速向所在地黨部報到逾期不報者即行取消黨籍此項通告業經本會分發各縣黨部外並登報公告仰各該黨員遵照爲要此告

歡迎直

優

點 站在民衆立場

價 目

河北民報

接訂閱

- (一) 計刊..... 每份五分
- (二) 新刊..... 每份五分
- (三) 副刊..... 每份五分
- (四) 小報..... 每份五分
- (五) 調查..... 每份五分
- (六) 資料..... 每份五分

每月	三角
半年	一元五角
全年	二元八角
郵費	通用
外埠每月郵費	一角

社址北平
前門內省
黨部街路
東

目要期九八第刊週學文鐘雷

版出日八廿月一十年一念國民

版出日一廿月一十年一念國民

新希臘的愛國詩人巴拉瑪滋.....白樺

新公園的黃昏.....石尼尼

黃鐘 (續).....李朴園

讀書偶記.....陳大慈

詩.....翔冬 寒潮

人類向何處去.....白樺

新時代的 Fashion Model.....王平陵

肺病初期患者.....張春波

黃鐘 (續).....李朴園

讀書偶記.....陳大慈

詩.....劉仲英 寒潮

通訊處：杭州市西浣紗路知足里五號黃鐘文學社

關日政府意見書之謬詞

中國

李頓報告書送達國聯行政院以後，日政府審其內容，爲大體不利於日本，乃向國聯請求延期討論，以便保留適當時期，發表意見。其始日閱氣焰高張，擬作根本反駁，以示與國聯抗爭到底；嗣鑒於國際情勢之不能孤立，遂緩和其詞，易反駁爲申辯，專以污蔑並中傷我國爲其用力之點。今國聯行政院展期已滿，日本再無推諉理由，姑將所作支離荒誕之意見書，送達國聯秘書處，妄冀搖動李頓報告書之論據，雖爲片面欺人之語，然日內瓦大小諸邦之代表，未能追蹤李頓置身於滿洲境內者，未必不受一時之蠱惑，此吾人不能不辭而闢之者也。

(1) 據日本外務省發表意見書之要點，首爲緒論，其中自承李頓報告書爲日本滿足者有二點：「(一)承認中國紛裂混亂無政府狀態之事實，(二)承認中國抵制日貨，且爲用非法手段，隨暴力而進行之事實，」關於第一點，在李頓報告書第一章中，敘述中國近年之變遷，謂「今日之中國，實爲一正在進化之民族。所有其國民之種種生活，均呈過渡現象。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點，乃爲政變，內訌，及社會上暨經濟上之恐慌，結果乃使中央政府日就衰頹。」又曰：「當日本與泰西通商之始，其難題與中國無異。……日本之變法及改革各問題，無論如何困難，要不及中國之困難也。」於此可見調查團之意，以政變，內訌，及社會上暨經濟上之恐慌，(即日人所謂紛裂混亂)爲民族進化過渡中必有之現象，即日本變法之初，亦未能免。日人果追憶倒幕與維新之歷史，實不否認其自

身亦從種種困難掙扎而來。登彼岸者，回首笑罵中流奮鬥之危舟，刻薄殘忍，豈有人性？且李頓報告書自始即未指中國爲無政府，日人乃捏砌其詞，不獨誣中國，抑且誣李頓矣。關於第二點，抵制日貨不惟爲報告書所承認，亦中國人民認爲抵禦強國侵略之合法武器，毫不必諱。至抵貨運動是否合法？實施之方法，是否無威嚇之處？調查團居利害不切身之地位，固曾發爲懷疑之論，由其不肯推斷此事之因果，僅着眼於日本所受之影響而發言耳。使無萬案鮮案之發生，則抵貨不至實現，無東省與淞滬相繼爲禍之烈，則抵貨亦不至如此普遍而堅強。日本侵佔中國領土，殘殺中國人民，其非法與暴力，視抵貨之程度奚若？是抵制日貨者雖爲中國人，而促成中國抵貨之原動力，則日本之侵略政策也。報告書關於經濟絕交之結論，一則曰，「中國之經濟絕交，既出於民衆復具有組織，雖係強烈之民族情緒所產生，爲強烈之民族情緒所擁護，然操縱之指揮者，大有能發能收之團體在。」又曰：「一切民衆運動，總須賴有一種組織，方能有效。蓋羣衆擁護一共同目的，其忠誠斷難一致堅強。背賴紀律以求目的與行動之一致。」此足證明吾人之經濟絕交，實爲民族強烈情緒之要求，由民衆自動行之，其有組織與紀律而成一團體，亦具有事實上之必然性。無可非難。若謂關於妨害中國人之行爲，此爲中國刑法之適用問題，外人無權干涉，關於日本利益所受之影響，則國際法上亦許有報復抵制之舉動，更不得擬爲非法。至我國政府有無責任問題，報告書亦未敢強爲論

斷，且自覺調查團不應有所表示，日政府尙何辭以說耶？

意見書第一章論中國，謂我國「雖爲曾被統一之國家而有存在之事，現在則不過一廣大區域之名詞。」此出之於堂堂日本政府之口，雖小學之童，亦必譏其誑語。夫國家存在之事實，一方出於自立，一方出於互認，中國自通海以來，與各國成立外交關係，列於國際之林至今並無間斷，只有密切，正如意見書所謂「歐美人對其爲國家而存在之觀念，不能拔去。」日本乃欲單獨拔去此種觀念，違反國際間現存義務以遂其侵略之私，故又曰，「領土不可侵之原則，雖爲神聖，然不能適用於無政府狀態的國家，」藉曰，中國僅爲一廣大區域名詞，試問此區域之統治權誰屬？而日本不久以前，尙派遣有吉明使華，呈遞國書，稱爲敦睦兩國交誼，此兩國中之一國當爲日本，其又一國則爲誰？執是以推，其行事與發言，自陷如此重大之矛盾，殆不足供世人之一擊。又曰，「統一中國之最後政府，即袁世凱之共和政府崩潰後，中國已無政府存在，亦同時停止，華府會議承認中國有統一政府存在之協議，爲中國墜落之原因。」國家之生命，依歷史之進展而永續存在，政府之組織，則視政權之移轉而形態不同。日本尊王倒幕以前，諸藩相攻，政權分割，不能謂其非國家與無政府也，中國自民五以後，北洋政府與護法政府之對立，亦不過政權之暫分，不得目之爲無政府。國民政府成立，繼之以東北易幟，則并暫分之政權亦統一於中央。查自民五以迄今茲，日本與中國締結之條約協定，種類甚多，約文首列皆有「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日本帝國政府，」字樣，不知締約中所稱之中華民國政府，與意見書所稱之無政府，其意義是一是二。華府會議爲列強打破在華勢力範圍與維持門戶開放

之一種新的協調行動，並不爲承認中國統一政府而召集，中國在此次會議所提廢除各國在華特權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要求，未能貫徹，僅得收回郵權，青島威海兩租借地，改訂關稅，承認取消領判權之原則，在中國誠不無遺憾，然亦未始不感歐美各國對華之同情，焉得謂之墜落？且正因華府會議之結果，啟中國國民自決之機括，而革命運動始獲相當成功。日本在此會之致命傷，一爲失一同盟力量（英國），一爲失一青島海軍根據地及山東境內之特權，宜其對於本身參與之華府會議所訂之公約，言之猶有餘痛也。又曰，「列國承認南京政府，就其轄權範圍所及而承認之而已，滿洲自然不在其範圍以內，即李頓報告書亦不承認滿洲在南京政府指導之下。」自國民政府確定政權，奠都南京，列國與中國以前締結之條約，均繼續有效，關於滿洲事件之一切交涉，亦認國民政府爲主權者，如一九二九年之中俄衝突，凡簽訂巴黎非戰公約之各第三國家，均通牒於南京莫斯科兩政府，而伯力議定書之簽訂，亦由國民政府之委任交東北邊防當局執行，又如中國關於滿洲鐵路交涉，在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預備之會議，國民政府交通部委高紀毅爲代表，日本方面委木村爲代表，從事協商，此尤證明，各國與日本均承認滿洲對外關係，實爲國民政府職權範圍之所及。更自對內關係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宣誓服從中央，受任爲東北邊防長官，嗣復任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處領袖滿洲行政之地位，所有中央政府之法令章制東三省無不遵從，則日政府所謂「滿洲自然不在其範圍以內，」將作如何解釋？至李頓報告書中，一再列舉張學良服從中央，滿洲加入國民政府，不過保有較自由之地方分權，並未對於滿洲受南京政府指導之事實有

所懷疑也。

(3)

第二章論滿洲，其要點謂「滿洲最初即離中國本土而獨立存在，自清朝成立，雖一時合併，清朝既亡，自然分離，」日政府何不憚煩而追溯吾國二百餘年以前之歷史，假令一國受治多年之領土，可以隨國內政之移轉或制度之變更，而自然脫離，則其脫離之動機，必在新政權確定新政府成立之際，且必出於當地人民之自由意思。辛亥清廷遜位，民國成立，東三省與中國各部之關係，反較前清帝政時代為密切，民十七南北統一，東三省服從中央，一切法令制度悉受成於國民政府，此鐵錫事實，日人無置喙之餘地。況出日人一手製造之獨立，李頓報告書證明之，世界各國洞鑷之，無候吾人之詞費也。至謂「因張家二代之暴政，獨立之機運，自然於滿洲民間釀成之」此實污我東省同胞太甚。張作霖父子治東三省之成績如何？姑不具論，然東三省人民絕無因地方當局政治之不良而生脫離國家自為組織之觀念。日本手提之傀儡，只薄儀孽種，與少數亡國大夫而已。真正之民間，方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與日軍抗戰於冰天雪地之中，所謂釀成之機運又何在耶？

第三章論九一八事變及其後之軍事行動，為日本責任之所在，故立言尤為蠻悍。如云，「調查團雖承認鐵路爆破，然誰實為之，並未言明」吾人對此種笨拙之口調，誠有匪夷所思之感。如不必引我我方之理由，但就報告書中，尋譯日本方面之陳述，謂路軌爆炸時，自長春南下火車已轉軸可聞，經炸毀處，竟側駛逾越而過，並未停止，該列車於十時三十分準抵瀋陽。故對報告書此事之結論曰：「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至十時半在路軌上或路軌旁發生炸裂之事雖無疑義，惟鐵軌縱有破壞，實際上並謂能阻止長春

南下列車之準時到站，斷不能引為軍事行動之理由。」此即證明中國方面無破壞鐵路之目的，假使有此目的，則破壞計劃必有預定，破壞程度必更猛烈，破壞之後必繼以軍事之攻擊，何以長春南下列車不致出軌，而安然準時到達瀋陽？又何以中國軍隊深居北大營，而一任日軍之襲擊？足見破壞路軌而不妨及行車。為日軍精密之計劃。而以為是為挑釁之口實，且以爆炸聲為集中夜襲之信號而已。意見書及反駁調查團不應斷定日軍行動超越自衛範圍，故云，「假令日本當時不採緊急措置，日本必從滿洲被逐而去，」吾人以為報告書之執筆者，尤多少為日本留餘地。夫自衛云云，必對方有攻擊之事實，至少亦須有攻擊之企圖，始可謂為正當。九一八事變之預定計劃，遼寧政府早有所聞，同時訓令防軍避免衝突，此調查團在北平調閱張學良長官致防軍之原電，已有確切證明。就當時緊張情勢而論，中國乃處正當自衛之地位。在日軍實無其必要，何有於被逐之危險？何待於緊急之措置？關於轟炸錦州一事，報告書已明斥其不當，日政府反謂為「海牙條約所承認之正當行動」，查一九〇七年海牙和平會公約第四件之附約第二十五條，明載祇能砲擊有軍事設備並從事抵抗之地方，歐洲公法家認此條約包括空中戰爭在內，即歐美各國在歐戰四年期內，事實上亦採此項原則。據李頓報告書之敘述，從外人魯易斯函中證明，十月八日日軍飛機十一架於下午一時抵錦州，十分鐘至十五分鐘內，投彈八十枚，中國軍隊絕未還擊，該地兵營實完全無恙，炸彈多落城內各處。即醫院及大學房屋亦遭波及，是日機炸彈之目的，並不在軍事設備地點而在城內無抵抗之民居及學校醫院，此果為海牙條約所承認耶？更進一步言之，當時日軍侵佔，中國退

讓，只可認爲無理暴行，未絕交，未宣戰，尤不應擬之爲兩國入於正式交戰狀態，此則並海牙公約原則所許轟炸敵人軍事設備之權利，日本亦不得援例而享有之，况破壞無設備無抵抗之地方，其罪惡豈堪擲數耶？

本文係按十九日報載中央社十八日上海電傳之原文而作，乃二十一日日本電通社竟聲明此項原文以外務省名義發表者，係屬錯誤，將全部電報紀事取銷，另發表日政府原文一通，措詞與前者多有出入，惟立意大致仍同，故記者磨續批評，亦改以後發表者爲根據。

第四章論新國家，此爲日本最強橫之一點，亦招致世界反感最烈之一點。日本必認滿洲爲國家，方可遂其吞併之實，必認滿洲爲人民自然獨立，可避其侵略之名。其持論第一理由，謂「今次獨立運動，由各地行政組織結成國家的團體，並無日本嗾使之事，……舊清領土推戴往時統治者之後裔爲元首，脫離中國本土之無政府狀態，豈可謂爲日本之主動耶？」日本所謂各地行政組織，舊者已隨日軍武力所及而全部摧毀，新者則由日人監視所組成，李頓報告書對於東三省新設機關成立之經過，均有各別之敘述，於促成獨立之「自治指導部」完全爲日人操縱一節，言之尤爲著明。故其結論曰：「日本逐步以武力佔據東三省，使齊齊哈爾，錦州，哈爾濱，及最後滿洲境內一切重要城市，脫離中國之統治；並於每次佔據之後，即將該地民事行政機關改組。」此蓋證明改組之力量完全出於日人而非華人，更溯九一八以迄今日之現狀，所有各行政組織，均有日人居中監督，握其實權。報告書專採各方之意見，斷定「獨立運動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滿洲從未聽得，」確信「所以能有此項運動者，一爲日本軍隊之在場，一爲

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兩者聯合，發生之效力最大，若無此兩者，新國家不能成立。其此理由，現在政體，不能爲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如此合理之敘述論斷，已使日人無地可以自容，尙強顏申辯，以爲嗾使之罪名不能成立耶？至溥儀由土肥原等挾往旅順，脅其出任偽國執政，此不逃中外人士之耳目者，乃誠爲前清領土推斷之詞，愚人自欺，寧值一嘆？

第二理由，謂「滿洲住民反對滿洲國者，努力雖大，然人民歡迎新政府之事實，頗爲顯著，」且以「新政府爲前清滅亡以來，最初的文治政府，」日人不嘗云滿洲獨立機運係自然釀成乎？則何以有努力反對之住民？今日之東三省，除鐵路沿線之主要城市外，大都爲反對偽國立場之義勇軍所把握，且有原屬偽滿洲軍而舉城以反正者，又有日軍據城內而義軍相持於城外者，所謂人民歡迎之顯著事實始如是乎？其標榜偽政府爲文治政策者，以傀儡本無自由組織軍隊之權，日本在日滿偽協定中，有全滿駐兵保障偽國安全之規定。故不得不作斯說也。

第三理由，謂滿洲之將來在於治安回復。交通改良，金融安定，日人深信爲有望，但同時則以「滿洲兵（指義軍而言）受中國本部支持，企圖妨害滿洲國對外信用之事，最堪注目，」此不啻承認義軍之勢力，足以妨害日人從容經營其劫持之滿洲，因而使治安，交通，金融，之有望者，皆不能實現其希望。又謂「滿洲既聲明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該政府無排外感情，又無共產主義之災禍，」其意在利誘各國之同情，不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政策，經九國公約重申協定後，已與「維持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之原則相輔爲用，今有一國侵佔中國領土並破壞其

行政，則開放與均等之擔保，已根本不存，各國如不效尤分割中國其他部分之領土行政，則惟有一致用力，壓迫侵略國履行其義務而已，甘言利誘，各國理智之士，豈能為之動心？若夫抵制日貨，其動機僅限於報復敵國之橫暴，決不能以排外為其代名；共產誠為中國國家之害，然當前事實，已足證我政府之清除有力，况倡導主義，陰謀組織，日本國內已覺防不勝防，又將何以自解？

以上各章之論據，吾人稍一駁詰，已使其體無完膚，至其第五章之結論，共十一項，或覆前言，或憑空武斷，或詆毀我國之無能，或提倡各國之助虐，皆無何等價值，尤以第六項「日在滿洲為世界絕無之例外之地位」一語，最為兇悍，其不惜與世界為敵之心，亦昭然若揭，不知日內瓦大小諸國之代表，對此有深切之認識否？

時事論評 對抗第一期目錄

沃大瓦英帝國經濟會議	火原
斯丁生談話之評價	白民
東北義勇軍抗日民族戰	方興
汪張辭職問題	悟生
△致死者（小詩一首）	漪泓
△送友人王君參加東北義勇軍（小詩一首）	漪泓
馬克司經濟學在一般經濟學史上的地位	陳豹隱
評「我們所要說的語」並質張東蓀君	呂振羽
勞力土地資本現今在國民經濟上之關係及其將來之處置方法	洛新
釋「反動」	劉長義
資本主義生產的退化	克平
五權憲法與政黨	企澄
中國教育的動向	孟倫
國民國防論	陳洛新
勳匪應注意之事項	
東北民衆抗日討逆軍事委員會宣言	

對抗第二期目錄

時事論評

法國要求軍備平等

湘

希特萊與巴本

襄

歐林匹克世界運動會的清算

方興

陝西實業考察團出發

火原

產業合理化

陳豹隱

所謂「和平曙光」的洛桑會議

孟倫

目前中央財政之剖視

慰生

日本獨占資本之發展

瑤浦

那裏是辯證法

馬耳

從找飯吃的問題談到中國革命的出路

威遠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之滿蒙移民概况

王輯五

近據日本內閣統計局發表，去年日本人口增加數，曾達八十六萬一千人，（但猶較前年減少五萬餘人）平均每小時竟增加九十八人。（每小時平均出生二百四十人，死亡百四十二人。）並且每年海外移民數，平均不過五百人，僅不過人口增加數二十分之一。目下失業者已經超過四十八萬。那末，這羣逐日增加的失業島民，究向何處發展？

垂涎我國東北的島民，已非一日，九一八事變，和滿洲偽國的創生，那一件不是島民挑成！那一件不是為島國殖民的一種政治手段！固然日本之殖民於我東北，已非始於九一八事變，惟自事變勃發以來，那羣失業的島民，這才大張旗鼓的，向我東北進軍。近來日人之渡滿者，一天比一天的增多，其確數雖尚不堪公布，然亦可於事變後，日人渡滿之航路方面，及在滿日人之增加膨脹方面，考察出來。

(一) 事變後，日人渡滿之航路方面的考察

由日渡滿的主要路線，概不外水陸兩種，由航路渡滿者，其主要船舶，概為日本郵船及大阪商船兩種。茲據大阪商船會社之統計，由本年一月至五月，僅由大連商船渡滿的日人，竟達二萬四千七百餘人。若與去年同期比較起來，其渡滿者的激增，概如左表所示：

本年	去年	增加數
一月、二、二八九	二、〇四三	二四六
二月、二、九二七	一、九二三	一、〇〇四

三月	五、七七七	四、一〇二	一、六七五
四月	七、四六九	四、五四六	二、九二三
五月	六、二五七	四、〇八六	二、一八九
合計	二四、七三七	一六、七〇〇	八、〇三七

可知僅由大連商船渡滿者，竟較事變前增加百分之六十七。其他由郵船渡滿者，其激增之數，更不知凡幾。至於經由朝鮮，由安奉鐵路渡滿者，亦較前激增異常。據四月八日，大阪朝日新聞所載，由奉天車站下車者，平均一日約在五十人以上，較事變前，殆增加二倍。若將此種激增的狀態，逐一統計起來，則渡滿日人之加速度的增加數額，實難以預測。事變前，據日人的調查，在滿日人已達二十二萬，鮮民約達百萬。今若按上列增加率計算起來，究未識將增至若何程度為止！

(二) 事變後，在滿日人之增加膨脹方面的考察。

A. 事變後，在滿日人旅館飯店等的激增。

日人渡滿者，既如上述之加速度的增加；那末，在滿日人的旅館飯店等，亦不能不隨之俱增。事變時，奉天日人經營的旅館（包含下宿在內），不過三十家，事變後，竟增加八十五家，幾增加三倍。奉天日人經營的飯店（包含「料理店」及「飲食店」而言），事變時，僅百二十七家，事變後，忽增至百五十八家，較前殆增百分之八十以上。試觀奉天警察署最近調查之下列統計，庶可窺見事變前後，在奉日人旅館飯店等之激增狀況了。

去年九月末	本年五月末
-------	-------

旅館		飯店	
日本人經營者	三〇	日本人經營者	一五八
朝鮮人經營者	四	朝鮮人經營者	三
中國人經營者	一三	中國人經營者	七二
其他外國人經營者	三	其他外國人經營者	五
合 計	五〇	合 計	二〇七
	一一八		二三三

錦州在事變前，日僑不過十二戶，僅四十四人；但是目下日僑已增至十倍，約達一百零五戶，四百餘人。其中日本飯店四十四家，旅館十家，共占總戶數二分之一有奇。

其他如長春，哈爾濱，及大連等處，日人經營的旅館飯店等，其增加確數，雖尚未詳知，然其增加率，亦不劣於奉，錦。且近來日人在滿經營的旅館，不惟連日滿員，且房價亦倍蓰於前。聞長春頭等旅館，若無人豫先介紹，尚不肯輕意租出。至二等旅館，無電燈的一小間，每晚還要日金八圓。號稱頭等的「大和旅館」，近連食堂，也住滿了客人，竟在院子裡做了食堂。七月四日，全滿「大和旅館」的董事，為擴張其生意起見，曾在大連招集一董事會議，並議決於今秋大事擴張。

至若哈爾濱日人經營的「北滿旅館」，「名古屋旅館」，以及大連，旅順，吉林等處，日人經營的頭等旅館，不惟一泊必需日金十元乃至十二三元之稀有昂貴，且連日滿員，若不豫先把旅館定妥，尚有無棲枝之患。事變後，

在滿日人所經營的旅館飯店，既如斯連日滿員，及其數額之增加；那末，日人之積極殖民滿蒙，不難一一證實了。

B. 事變後，在滿日本娘子軍的激增

滿州偽國的日人官吏，逐日增加以來，一般奢侈享樂的淫風，亦傳染至滿蒙各都市。久負盛名的日本娘子軍，亦開始總動員，向我東北進軍。福岡，長崎，大分等處之「九州美人」，近不斷的一批一批的向滿運銷。事變時，在奉天的日本藝妓，僅不過百四十四人，酌婦七十九人；迄至本年五月末，日本藝妓竟增至一百九十九人，酌婦亦增至一百二十三人，殆較前增加百分之七十。

至於光怪陸離的哈爾濱，日人更於事變後，增設日本妓館數處，以與蘇俄之私倡相抗。並增設咖啡館及跳舞場三十餘處每處僱備美女十餘名，暗操賣淫生意。

大連本為日本娘子軍入滿之渡橋，自滿鐵會社移到此處以來，妓館，咖啡館，以及跳舞場等，逐漸增加。目下最流行的跳舞場，大連市內近已增設三處；此外又有請求開設者，尚有三家。最近「遼東旅館」舉行的跳舞大會，而參加的摩登男女，竟不下四百餘人，實為空前未有的盛況。

長春自改為偽都以來，奢侈享樂的淫風，較他都市為尤甚。什麼某某祝賀會啦，某某慰勞會啦，以及歡迎歡送宴會等等，不惟連日開催，且近來日本妓館（「八千代亭」最有名），咖啡館及跳舞場等，亦增設的不少。且此地跳舞場內的音樂隊及舞女等，率由日本內地聘去，其中或有本地及蘇俄舞女加入，編為混成聯隊者，間亦有之。其開場時間，概由午后三時，至夜半二時。晝間日金二角，夜間二角五分，猶較日本內地舞場貴五分。事變前之齊齊哈

爾，日僑僅不過五百人，並無一家明娼，惟自事變後，近在領事館登記的日人，已經超過七百餘人，而明娼竟達至十八家之多。此外並有旅館十四家，每家概備七八位女招待，暗操皮肉生涯。惟念此種接客娘子軍，概多寄生於其民族社會間，今日本這種娘子軍，既如此向我東北突進，足証島民族之積極向我東北侵略，更無庸疑了。

C. 事變後，在滿日本舊有農場之恢復策。

事變前，日人在滿經營農業者，約計七百餘戶。其中約四百戶，在關東州內開設農場；約三百戶，在滿鐵附屬地內經營農業；其在滿洲與地經營農業者，僅東亞勸業會社及大倉組合所經營之數處農業而已，惟此七百餘戶之農民中，除少數農民躬自耕種者外，其餘大多數概兼營其他職業，而僱用鮮民或其他代為耕種。故其結果，日本農業移民政策，毫無成績可言。

然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人之渡滿者，勢如決口之川，大砲所及之地，殆為日本殖民之區，陷於陷阱中之日本農民，遂爭相渡滿，做那一攫千金之夢，同時從來在滿經營農業的日民，莫不大受刺戟，而力謀恢復振興之策。試觀關東應指導下之金縣愛川村的日本農場，滿鐵會社指導下之滿斯兵農業者，以及滿鐵會社傍系的大連農事會社扶植之自作農等，最初雖有莫大的抱負，惟迄至事變時，概多陷於悲觀的境域。

按愛川村農場在金縣西北，魏家屯海岸之低溫沃地。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關東應為實行經營水田計劃，曾召集十九戶農民（其中以山口縣農民為最多），給與水田六十五町步，使之耕種。關東應並代為修築房屋，道路，堤塘及排水溝等，且貸與各種農具，使之共同耕種。惟迄

至事變時，僅剩七戶耕種其地，餘皆陸續退出。

又滿鐵會社扶植之滿期兵農業殖民，乃始於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南滿鐵路守備兵，滿期除隊之際，選拔其富有農事經驗，心身健壯者，由會社貸與每人既墾田（在滿鐵附屬地內）十二町步乃至二十町步，使之耕種；曾於四年間，既墾田六百三十二〇步，陸續與三十四戶。其貸出料金，平均每坪僅二厘，極為低廉。此外並借與置備費三百元，年利八釐，十年後逐次償還。至其經營方法及農作物之選擇等，由滿鐵社員之專家指導。故當創始之際，曾負莫大的希望。惟迨至中途，轉業者陸續退出，迄至事變時，除鐵嶺管內新台子農園外，其餘概兼營典當舖或實行高利借貸，而荒蕪其固有農業。

至於大連農事會社扶植的自作農，雖自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大連農事會社依滿鐵會社之扶植而創成，惟其全般的計劃，當時尙未一一見諸實現，迄至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始募得日本農民七十五戶，開始做第一次農耕。若與其元來擬定之召集農民五百戶，收買三千萬町步的計劃比較起來，僅不過實施其七分之一，實不能不令島民大失所望。

其他如公主嶺及熊岳城農業實習所主辦的農場，雖其經營者受過精神上的及技術上的訓練，惟較之我國農民那種極風沐雨的耐勞精神，及其低廉的生活費，則遠不逮。故其結果終無若何成績可觀。

然自事變勃發。日滿協定一成立以來，事實上，偽國已成爲日本的保護國，日人已自命爲滿州的主人翁，故日本之滿蒙農業殖民，其勞力及耕種方面，雖遠不逮我國農民，然島民背後有大砲支持，動輒以武力強奪我同胞血

產，以供其殖民。上述關東廳及滿鐵會社等扶植的日本農場，其所給與或貸與日民的沃地，何一非剝奪之我同胞者！矧事變後島民既自命為滿洲的主人翁，則不惟渡滿而剝奪我同胞血產的島民，加速度的激增，而從來在日本農場的經營者，亦莫不大展其橫暴的魔手，而侵占我同胞良田。近聞在滿七百餘戶的日本農民，多以經營果木樹或其他事業為藉口，更請求其政府，給與補助，俾擴張其田園；故從來奄奄待斃的日本農場，遂以事變為轉機，沛然復興了。

總之，事變後，日人之滿蒙移民，已成一發莫遏的趨勢。上述之航路方面及在滿日人之激增方面的觀察，已不難一一證實。但是事變勃發後，最初渡滿者之中，那失業

意識形態與經濟結構之關係

路 人

第一節 心理與意識

在社會勞動過程中，人不僅是機械的生產力，同時還是有一定目的底自覺的個體，企圖認識自己對於自然和社會的關係，並表現自身的喜怒哀樂。在每個人的心理中，均有可與他人聯合的共通點；當然，這並沒有排除形成個性的許多的特點。由此，我們可以說，社會心理，是一大部分人的共同心理的要素的綜合，這些人中間，具有一定的社會關係。因此，可以說，社會除物質存在以外，還具有一種心理，作為社會意識的基礎。但是我們知道，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必然分成階級，因此，社會心理，亦就不可避免地帶上階級的性質。個人心理及社會心理，自身

的島民或其他野心家做那一攫千金之夢者，實不乏人。故四月五日，關東參謀長三宅光治氣返日途中，曾公言：「滿洲無生金之樹，若無相當準備資金，僅持一鋤一犁而渡滿者，決難成功」。五月六日，大阪實業組合聯合會組織的滿蒙視察團，在歸國途中，亦謂：「無準備而渡滿者為禁物」。可知日本之滿蒙移民方針，今已為之轉換，由個人的無組織的移民，而進為有組織的集團移民；由無準備的無計劃的移民，而進為有準備的屯田兵式移民。惟念這種有組織的集團的屯田兵式移民，實堪可畏。果任其自由移殖，則我東北數千萬方里的沃野，我三千萬同胞祖傳的血產，將入於島民的魔手！然則，吾人對此島民之侵略，將如之何而後可！

都是希望，感覺，幻想，意念等等的極其龐雜的混合物，牠們中間，並沒有很好的配合，也沒有形成統一的體系。可是，每個階級，必須有多少整飭的宇宙觀，作為實踐環境中之指南，如無此種宇宙觀，牠便不能找到自己歷史的階級利益，和實現這些利益的道路。

這樣的宇宙觀，是怎樣造成的呢？很明顯的，造成的方法，是在於批判地改建階級心理，拋棄那對於階級鬥爭不利的無用的矛盾的東西。當階級心理發展到一定階段之時，這階級的一部分人，即所謂階級的思想家，就來執行這種工作，其結果就得到了比較整飭的思想體系，而形成階級的意識。

意識形態，很明白的表現出某一階級的地位及社會的實質。例如，在資產階級和封建制度鬥爭的時代，資產階級意識的主要特點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對於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科學之注重；反宗教的思想以及對於社會進步的信仰。一般地說來，在這個時代，資產階級的意識是進步的。但在現時，牠的意識，已明顯地表現出保守和反動的性質了。如果在以前，資產階級把科學和宗教對立起來，那末，現在正是相反，牠的思想家，却百般企圖把科學知識和宗教信仰調和起來。

現在我們來看無產階級的意識。無產階級，既沒有私產，復在工廠中習慣了紀律化的共同的工作，所以牠的心理，不能不是反個人主義的和社會化的。經常的與機器接觸，使工人深刻地敬重科學的思想；工廠的勞動，訓練工人重視紀律和組織。自然，無產階級的社會理想，是表白牠自己的生存條件。什麼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友誼的生產的聯合，其中勞動不復帶着強迫的性質，勞動不再是資本家發財的源泉，而是人類創造力之自由的表现。未來的一切，屬於無產階級所有；無產階級從每個事物的發生與不可避免之消滅之過程中，來研究現在的一切。因此，無產階級的宇宙觀，是辯證法的。同時，無產階級宇宙觀之所以是唯物論的，正是因為在勞動過程中，牠感覺着自己是一種能改革物質世界的物質力量。無產階級不是抹殺事實的一個階級，牠想盡量地完全地去認識事實。所以，工人階級信任科學，而與唯心論和宗教作堅決的鬥爭。

最後，只有毫無私有財產和毫不不同資本主義發生利益關係的無產階級，才能創造革命的意識形態，而去無情地堅決地爲全人類脫離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壓迫而鬥爭。

在研究階級鬥爭的理論時，我們已經看到，階級之中，尚分爲許多職業的及等級的集團，牠們都具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很明顯的，這些階級下的集團，相互間均有不同的心理的特點。如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即其一例。固然他們同具工人階級所共通的心理要點，但同時他們却還有些區別。我們已經說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努力想把熟練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割裂開來，比較高些工資，改良熟練工人）的生活條件，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並給他們以某些的便宜（好的舍宿，家俱等）。結果，一部分貴族工人，就居高臨下地藐視其他工人，自視爲特殊的社會集團，放棄階級鬥爭，倡導「階級和平」，甚至有時候，還鎮壓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在這個基礎之上，產生了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至於職業之影響於心理，是大家所熟知的。最後，每人所參加的一定的團體，也影響於他的心理。例如，科學的，音樂的，藝術的，運動的團體，他們的會員，都反映出各自團體所具有的心理的特點。

我們知道，社會心理是由各種個別的心理——始於個人，終於階級——結合而成的。

意識形態在社會中有些什麼作用呢？我們知道，意識形態是促成具有共同階級利益的人們間，團結之要素。假若我們觀察『自在階級』，那末很明顯的可以知道，作爲牠的代表中間的紐帶的，祇是很少的共同的心理特徵，這共同的心理特徵，當然是由一定生產關係中產生出來的。由於階級鬥爭漸次的發展，致階級的自覺亦往前發展，並完成社會的階級形成的過程。所以『自爲階級』，已具有極顯明的共同意識，作爲其精神團結的很本紐帶。統治階級的

意識形態，具有二種任務：（一）根據於那種表現共同利益的思想體系，以團結本階級；（二）使被壓迫階級服從自己的思想的影響。例如：絕對君主專制，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之顯明特徵，乃是君主政權和貴族特權的宗教性質。僧侶特別蠱惑農民，說統治者是由上帝委派的。

不用說，資產階級同樣努力將自己的意識去麻醉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報章，有系統的傳導階級協調的思想，批評社會主義，說牠是空想等等。在學校中，訓誨工人小孩去尊敬政府，法律，國會，憲法，教會，雇主等等。

宗教是使工人階級在意識上屈服資產階級的極好的武器。例如，在德國一百五十萬工人（天主教徒）投票贊成反動資產階級的天主教中央黨。他們把宗教的關係，置於階級關係之上。這就是證明，意識形態和階級利益的關係，絕不是粗看時那樣的簡單。在社會心理的影響之下，特別是在根深蒂固的傳統習慣的影響之下，某一階級的意識可以不完全與其階級利益相適合。例如，英國工人階級的意識，滿貫着過去的傳統，妥協的精神，國會主義和簡單進化論等的思想。這樣的意識，是與大部分英國無產階級的利益非常厲害地相衝突的。現在雖有極大一部分的工人，脫離了這樣的意識而領會了社會主義的思想鬥爭的經驗；可是直至如今，英國工人階級以大多數，還是盲目地相信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理論，因之就減弱自己階級的力量。

第二節 意識與經濟

在上節我們已經說明，社會意識社會心理同階級利益之關係，這階級利益，其本身又為經濟結構的性質所決定。

在原始社會中，社會心理是統一的和整個的，這是後來的時代所沒有見過的。很明顯的，未有階級的社會之心

理與意識，是直接地表現社會的經濟需要，而不是表示特殊的階級利益。

因階級分歧的發展，破壞了以前社會意識的統一與整體；在各種的形式中，牠開始表現各種不同的階級集團的利益。

我們必須再肯定地說，意識與經濟間的關係，是不能從得過分簡單的。

經濟的利益，祇是最後地決定意識的現象，可是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則應該求之于社會心理或階級心理的特徵之中。這種例子，我們在前面已經列舉過。因之，按意識形態離開經濟結構愈遠，則中間連接之環亦愈多，經濟利益的影響，亦多少要經過很大的改變。只有對於意識形態行詳細的分析，才能發現牠的真實的經濟結構。

經濟與法律間的關係，比較一切都容易研究；法律的任務，是在於以某種規範，固定財產與階級統治的現存形式。很明顯的，因財產關係的改變，法律關係，司法原則，法律制度，總而言之，我們所稱為法律的一切觀念，亦都要變更。例如：等級的君主專制之法律，主要的是基於特權的原則之上。土地的私有權和高級的國家地位，都是貴族（和僧侶）的特權。

資本主義財產形式的發展，造成了資產階級的法律，這一法律之主要原則，是形式上的平等，一切等級特權的廢除。形式平等之建立，是為着誰的利益，這儘可以由下列的事實表現出來：在減少工作時間的鬥爭期間中，英國的廠主，要求國家不干涉勞資的糾紛。在資產階級的法律中，工人與資本家的關係，是一種商品佔有者的關係。工人是特種商品——勞動力——之所有者，他根據需要與供

給的法則，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表面的在法律上，工人與資本家好像是平等的，但在事實上，在資本家後面，站着有力的全社會的資本，以及與之有關的國家之政權；而工人所能希望的，僅僅是本階級的力量。

工人階級在自己專政的時代，也不能放棄法律，不能放棄社會關係的法律的調節，因為國家既然存在，法律也不能取消。但是與資產階級不同，無產階級並不掩飾過渡時期的法律之階級性，並且確知，隨接近共產主義之程度，法律與國家，都將漸漸消亡。

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之法權的基本原則，是在於保證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之無產階級的統治權。蘇維埃法律的內容，是由大部分生產力之國有，蘇聯經濟的組織，工農的聯合及過渡時期中經濟關係的特性等等來決定的。所以，蘇維埃的法律，擁護國家的財產權，同時又保障私有的財產（當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所允許的範圍以內），這是絲毫不足為怪。

法律是與經濟利益有密切關係之意識形態。道德離開社會經濟基礎較遠，但其內容，亦是受階級利益所決定的。我們知道，法國唯物論者關於道德的學說，是那個與貴族及僧侶鬥爭的法國資產階級之利益的表現。有幾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認為道德理想，是不依賴任何人的利益的，牠的完成，是根據一定原則和規律而行動的道德義務的結果。可是倫理的歷史，明白地指示出，「道德義務」是與經濟利益有密切關係的。在現時，我們認為奴隸制度是不道德的東西，但在古代希臘和美國南部的奴主，却成爲統治的受人尊敬的社會階級。地主的農奴，等於家畜（甚至還壞些），可是當時的社會（教會也在

內），却認爲這是很道德的。

道德與法律的區別，是在於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來鞏固其統治之基本條件，此種條件，在保護國家上，有極重要的意義，而道德則只是次要的補助的意義，牠並沒有受國家的保障，而是由社會的輿論來維持的。社會主義者，不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理論家那樣，說道德是超階級的，而是自覺地努力闡明無產階級道德的階級實質。道德對於工人階級有很大的意義，因為牠是對人對己的一種組織的聯繫的元素。因此，道德是無產階級社會的和文化的重要基礎之一。資產階級的道德，是養成個人主義，資產階級的倫理，時常反映自由個人的道德觀念。反之，無產階級是集團主義者，在牠看來，並沒有永恆的道德規範。無產階級的倫理，是完全由階級鬥爭的利益來決定的。在共產主義者看來，有利於工人階級爲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的行爲，就是道德的；反之，減弱無產階級力量的行爲，就是不道德的。狂飲，放蕩，不敬重同伴等等的行爲之所以不道德，並不是因爲他們不合某一抽象的道德義務，而是因爲他們妨礙無產階級的社會性及其文化的發展，和減弱無產階級的力量。

藝術之離開經濟基礎，要比法律及道德爲遙遠。在原始社會中，藝術與生產的關係，是非常明顯和簡單的。野蠻人的繪畫，音樂，跳舞，以及各種不同的模倣的表現，差不多完全由其生產活動所決定的。在階級社會中，情形就不是這樣了。在下層階級（特別是農民）中，藝術（跳舞唱歌等）還是密切地同生產相聯繫。可是上層階級因自身很遠的脫離了生產，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化的發展及很完整的技巧，所以牠的藝術，祇在最後基點上是爲生產條件

所決定，這些條件，往往特殊地曲折地透過社會的心理。

某一時代的真正藝術的創作，不僅表現了一定之階級利益，而且同時具有偉大的美學的價值。俄國普希金的詩，直到現在還使人們嘆賞其美麗及獨出心裁的技巧，雖然普希金本人是代表貴族之思想和我們的時代無緣。在貝多芬的音樂中，我們可以感觸到法國革命的巨浪，雖是當時革命的仇敵——國王，宮廷貴人，上層資產階級——却也不能不為之贊嘆不已。

此地必須加以補充。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一樣，極大地受到過去遺習的影響。舊的形式不能一下子放棄自己的地位，牠還百般企圖適應新的內容，堅決保留陳腐的意識形態。而新的形式（從前認為是粗惡的狂放的），僅是漸漸地獲得一般的公認。所以在分析藝術作品時，必須慎重地考察其時代各種特殊心理特徵之綜合。

最明顯的，也可說，最通俗的社會實現之描寫，是文學；文學可說是社會學的很好的引論。因此，在分析文藝作品之時，必須特別地避免簡單化的錯誤。譬如只把屠司托耶夫斯基歸到資產階級思想家的領域內還是不夠的，要理解屠司托耶夫斯基，必須明白七十年和八十年代的特殊心理，智識分子「大改革」以後的反動時期中的悲苦憂愁，以及他們企圖向精神方面求棲息等等的情形。總而言之，在分析文藝的作品時，除引證經濟原則以外，還必須說明一切中間的連環。

科學距離階級利益更遠了，牠的任務，是在發見客觀的真理。真的，數學，物理學，化學等等，在現時並不直接依賴階級利益的影響，因為資產階級也需要這些生產力發展所依據的科學，以便更確切地完全地表現實際的情形。

一切自然科學，都是人在生產過程中所得經驗的總和。社會的生產活動，對於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有決定的影響。幾何學（按希臘文原意，指土地的測量），發生於古代埃及，因為，為正確測量土地起見，必須有一定的規則。算學的發展，主要的依賴於商業，經商如沒有計算的科學，自然是極端困難的。代數學，亦是被中世紀有各商人——亞拉伯人——所研究出來的。天文學的發展，是與日曆的起源相聯的。在尼羅，底格里，猶夫拉底斯等流域上的農業，需要正確地預知河水漲落的時期。當然，這是需要日曆的，而這個日曆之規定，則必須經過長期的對於日月和其他天體運動的研究。所以埃及的，黑爾台的，巴比倫的僧侶，就成了最初的天文學家。在十四，十五，十六世紀時，因滿足商業資本利益之航海術的迅速發展，致天文學亦得到了有力的發展的刺激。長途的海上航行，如無許多觀察的和測量的器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往前發展的海外商業，需要許多探測和測量的鏡器，而這些器具對於高等數學，物理學，化學的發展，又給了很大的影響。化學的產生，一方面是從醫學，而另一方面則從礦業的生產和冶金術。

假使自然科學的產生，是為滿足社會生產的需要，那末，社會科學的起源，主要的便是為着社會階級之政治利益。

法律與國家學說的研究，始於君主得城市資產階級之助而與封建諸侯及教會相鬥爭的時候。因為這一鬥爭，便發生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君主對於屬民的政權，建築在什麼基礎之上？宗教的權力，和帝王的權力，究竟誰高？有些理論家擁護國王的權力，也有些擁護封建的和教會

的權力。從他們的爭論中，便發生了國家的法律科學。在另一方面，工商業的發展，資產階級關係的發展，更需要有系統的法律規條的形成，使之更確切地表現工商業的發展所必需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法律並沒有創造任何新的關係，牠只是鞏固以前已經存在的情形。可是，現代的商業，沒有法律的調節，是不能存在和發展的。

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發展，及新的前所未有的資產階級關係的發生，新的科學——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理論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應時而發展了。

資產階級與貴族的鬥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自然更引起了對於社會科學的特殊興味。十七，十八世紀政治哲學的發展，以及十九世紀歷史和社會學的發展，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因為社會科學是研究那些與階級關係密切相聯的社會現象，所以，在一切社會科學中，階級利益的影響，特別有力地表現出來。非政黨的超階級的社會科學，是不會有的。直截地說，社會科學有兩種：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

正因資產階級是統治階級，所以牠要抹殺一切與牠利益相矛盾的現象。資產階級需要對其他階級說：資本主義制度，雖有些缺點，但牠是唯一可能的經濟制度，牠只可被改良，而不可被變革。因此，資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矛盾，對於牠的一切黑暗方面，對於資產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滅亡的傾向，閉起眼睛，故意不看。所以，現時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是假科學：牠主要的不是發現真理，而是隱避真理。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最多

只能記載些正確的事實，至於思考這些事實，把牠們組成合理的體系，而預測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傾向等等，他們是不能而且不敢的。

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則不然。我們已經說過，無產階級決不需要掩飾事實。牠正要更完全地確切地認識現實情形。牠不僅注意現在情形，而還努力地觀察將來的形勢。

無產階級社會科學的任務，不是簡單的記載事實，牠還是在於思考這些事實，找出那些聯繫許多不同現象的規律。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產階級是現在一無所有，將來可有一切的階級；所以牠的科學，是根據矛盾發展的觀點，不可避免的社會制度變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

總括起來說：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掩飾醜態百出的資本主義社會，而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則給牠以尖銳的批判。

對於社會科學所說的一切，也可完全地應用於哲學。我們知道，哲學是要創造統一的方法，把一切科學統一於一個統系之中，使之能夠組成宇宙的整個的概念，換句話說，就是建立宇宙觀。

因為現在資產階級是反動的階級，所以現在資產階級的哲學，亦具有反動性。

以前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曾是新的進步思想的先導。法國唯物論者大胆地反對宗教。黑格爾發見了發展的革命理論。

現在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提倡哲學與宗教的聯合，科學與神秘主義的聯合。很明顯的，他們反對任何的革命的發展理論，最多，他們只同意於進化的學說，而與唯物論作殘酷的鬥爭。資產階級的哲學家，甚至以唯心主義的精

神，來解釋自然科學的事實。所以，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當講到幾個哲學的物理學家唯心論者時，曾這樣的說道：『這些大學教授（指資產階級的大學教授，下做此），曾在化學，歷史，物理等專門科學中，作出些極有價值的工作，可是在說到哲學時，那就一句也不能相信他們。爲什麼呢？根據同樣的理由，好像政治經濟學的教授一樣，因他在事實的專門研究中，能做出極有價值的工作，可是當他說到政治經濟學一般理論之時，就一句話都不可信了。因爲政治經濟學，在現代社會中，和認識論一樣，同是政黨的科學。一般的整個的說來，經濟學的教授，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夥計學者，哲學教授，也不過是神學家的夥計學者而已。』

各種的意識形態，與專門研究該意識形態的人們集團相關聯。所以，觀念家是一種職業集團，是高度的發展的社會勞動分工的產物。觀念家的任務，在於掃除意識形態中的矛盾，使之整齊起來和合起來，去適應階級鬥爭和生產的需要，並促其向前發展。照這樣看來，經濟結構對於意識形態的發展，只與以最初的動力，只是決定意識形態內容之一般特徵。意識形態之往前發展，是根據一定的內在法則及牠們彼此間的影響，而具有反對獨立性的。例如

如何復興中國革命？

——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假革命的判斷——
風狂雨暴下的形形色色

一個在時代的浪濤裡滾着的青年，他一定承認現在是一個風狂雨暴的時代；對這風狂雨暴的時代，有着透澈的

，從笛卡兒（解析幾何發明者）到牛頓與萊布尼茲（微積分發明者）之數學底發展，是緣於生產的需要，但同時還存在着一定的思想邏輯，及受從前思想家思想影響，和數學本身與別的科學間之相互影響等等。換句話說，以作爲外部規律底經濟結構，是決定意識發展底一般趨勢，而每個意識形態的自身進化，却爲在相當程度上是依賴人類思維法則之一定的內在規律所決定。此兩者同時並行的。

因爲觀念家主要的是執行其本階級的作用，擁護本階級的利益，及戴上本階級的眼鏡觀察世界，所以他們自己的思想，誤認爲離開社會經濟結構及物質存在而獨立的。又因爲這些觀念家，看見自己的思想可以影響全社會的關係，所以誤認思想底進化是完全可以決定存在底發展。這是何等自欺欺人的拘當！意識形態之相對獨立性，在這些觀念家心目中竟變爲絕對獨立性。法律家固然把社會經濟結構當作是依賴法律條文和法律原理進化的東西，哲學家也認爲自己的思想對於社會生活等等具有決定的影響。據恩格斯的說法，觀念家是把世界當作照相機內配光鏡上的影像兒一樣東西，是倒置着的。

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會犯這樣的意識欺騙性，牠的思想，是自覺地同本階級利益相聯結的。

流 瑩

認識的青年，他一定體驗並且把握住了時代突變的方向，然而畢竟是風太狂，雨太暴了，竟有許多青年在這個大時代的轉機關頭，迷亂了，恐慌了，甚至逃避了。

雖然現在是反革命的空氣籠罩着整個的世界，然而

革命」的兩個字，仍舊是時行的名詞，就個人說，無論是感覺性的煩悶或經濟的壓迫的時候，抖起丹田喊一聲革命，好像就驅淨了一切煩惱，渺小的自己不知有了多麼偉大，無論自己的思想行為是站在反革命的尖頂，假設有人說自己反革命，假革命，不僅只一個「不革命」，那麼自己好像就受了彌天的污蔑。在朝的，要殺人，要打仗，要剪鋤異己，於是它的對象便被它插上了「反革命」的亡命旗，它便大張撻伐，在野的，要奪取政權，要謀「取而代之」，於是便把「遺棄民衆」，「反革命」的大白帽子，給它的對象戴上了。甚至在一個小小的官衙裡，區區的學校裡，爲了名利權益發生鬥爭的時候，不革命，反革命，假革命的名詞，馬上成了攻擊對方的利箭，究其竟，誰革命？誰不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假革命呢？竟是一筆極難清算的糊塗賬。

(II) 一些純潔的青年，它的熱血在奔馳，它的生命力在暴跳，有的時候，盲目的給人家做工具，有的時候，無意識的供人家犧牲，於是「抓青年」，「運動民衆」，就成了「一般買空賣空的革命家的絕好手段」。

因此，我們覺得對這些形形色色的滑稽劇，欺騙劇，慘劇，悲劇，有切實的加一個分析的必要。但是，要聲明：我們並不是要作派系的私圖和個人的指責，我們要贈給青年的是一個具有判斷革命，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能力的尺度和天秤，用這個尺度和天秤來分析目前形形色色的混亂狀態，和某個集團的屬性，這，比較說，甲革命，乙不革命，丙反革命，丁假革命強的多，至於我們的判斷方法，不消說，不是觀念論的，而是科學的辯證法的，有所依據的。

革命是什麼？

爲了使我們的判斷有所依據，第一步當然要正確的認識革命的意義。

從革命的字義上考據，則 Revolution 是脫胎於拉丁字 Evolution 牛津大學版字典上對 Revolution 的解釋是 *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即根本再造，據此，就可知道革命不是直覺或簡單的事，更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但時下對革命的誤解，仍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有的把革命認爲就是破壞，有的把革命解釋的同於改良，所以把僅只改朝換代的湯武，也認爲革命，專呼「打倒」「打倒」的人也算是革命，這些，自然都是極其膚淺的見解，謬誤到萬分，所以談到革命的意義，我們第一要注意到的就是革命是關於社會結構的事，社會結構不變更，無論社會政治上怎樣混亂，人的更替上有過百千，那都算不得革命。第二要注意到的是一個社會之所以革命，決非一朝一夕之故，乃是積漸而致的，只以革命的本身而論，則革命是一種突然驟然的鉅變，有人比之於冰山的翻筋斗，可以算得一個確喻。冰山之所以翻筋斗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緣故，但在翻的那一頃刻，則不能不算是一種突然的鉅變。人類社會中的革命便是如此。說到這裡，有一段話必須在這裏夾述，就是一般人把革命和進化看作一件事這一個絕大的荒謬上。不錯，革命是和進化有關係的，甚至說革命源於歷史進化而來，都無不可！然而革命和進化，仍舊截然是兩件事！我們從事實上觀察，歷史的發展，根本是辯證的進化，循着由肯定至否定，由數量到質量，由漸變到突變，這三者合爲一致的變化法則，分別來說，一切制度，文化，莫不如此，不過名詞有些不同，通常是把漸變稱

爲進化，把突變稱爲革命，革命就是「反」否定「正」，而產生「合」。——新的高級的形態——底意思。十八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不是新工具代替舊工具而建立新生產方法的變化嗎？英國法國所出現底「政治革命」不是民主主義打倒封建政治而建設新政治體裁嗎？至於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都可以說是文化上的革命。自十九世紀以來，誰不知道有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呢？又誰不知道有勞動運動，革命運動，俄國革命，這些事實呢？所有的情形，差不多都同近代歷史底前期一樣底矛盾，衝突，不平衡；就是追溯到古代，若父權制與母權制，一神教與多神教，畜牧經濟與漁獵經濟，奴隸社會與民族社會，三天三夜都說不完的新舊更替，都證明歷史的演進是由於革命，（突變），和平的進化，（漸變），只是革命的準備。所以歷史沒有一分一秒不在進化，但斷不能說沒有一分一秒不在革命，所以所謂進步主義，與改良主義，是異名同體的，都不該和革命相混淆。

够了，現在該轉入正文了，

本來，社會的結構的所以形成，一方有社會的生產力，一方有與之相適合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是一種有惰性的東西，是懶怠變化的，等到社會生產力逐漸增長，原來與之相適合的社會制度，便越來愈不適合，甚至變成障礙，於是雙方矛盾抵牾，等到這種矛盾抵牾，增長到一定程度，原來的舊社會制度，遂必然的而不得不破裂，同時在那逐漸增長的生產力之下，養成一種新社會力量，便自然而然的把一種新社會制度孕育生產，這一種舊的崩潰，新的建立，便是革命。從上列的敘述裏我們可以看出革命的幾個具體的概念來：

- 一、革命是歷史的產物。
 - 二、革命是時代的產物。
 - 三、革命是舊社會制度的破壞與新社會制度的建設。
- 革命進程的必然現象

歷史的車輪不斷的進展，時代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然而舊社會制度的破壞與新社會制度的樹立，終究不是一朝一夕之時間和翻手移足的那般容易，在革命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慘苦壯烈的鬥爭；要縮短革命過程的犧牲，必須領導革命的黨抓住它底正確路線；同時，獲得被壓迫的民衆的覺悟和擁護。這，也是需要特別努力的，然而這種特別努力的犧牲，一樣是無法避脫的，所以在理解了革命的正確意義之後，有提出在革命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的必要，從歷史和事實的教訓中，我們最經見而普遍的現象，是下列幾種：

一、勞苦民衆的錯覺

這是一個極普通的最習見的事實。

無論在任何的經濟狀況社會結構的情形之下，統治階級不僅用經濟用制度來壓迫被壓迫階級的反動，而且要用種種的手段，來淆混羣衆的反抗意識，封建時代的君君臣臣，資本主義時代的所謂社會政策或勞資調和，都是用來麻醉羣衆的革命意識的。誰都知道中國的被壓迫羣衆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兩重重壓之下過活的，尤其是幾千年的宗法思想把中國的一般羣衆的意識，束縛得馴如綿羊，他們目革命爲可怕的恐怖事件，他們認革命是人間罪大惡極的事，農民的保守性佔有着他們的腦海，所以每當在一個廣大的革命潮流襲來的時候，他們不是站在統治階級一方面來無意識的

不達辰一，尤其是當革命經過一個長期的奮鬥而失敗，或正在作堅苦鬥爭的流血過程中，農民們是急不可耐，所以當革命勢力有着勝利的把握的時候，他們也希望趕快來一個新時代，（雖然他們希望的新時代是有希望天子聖明的成份）但當革命退流的時候，或者革命部分的成功而尚未能給民衆以直接利益的時候，他們便會由懷疑而失望，甚至怨恨，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後，雖然由於野心軍人的騷擾內戰使着中國的革命流產，但爲了對豪紳階級的鬥爭，對迷信的鬥爭，和貪官污吏的剝削黨不能給以嚴厲制裁，都成了民衆對黨誤解，對革命懷疑的資料。

二、反革命份子的反攻

（18）
革命的另一解釋，可以認爲是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的生活鬥爭，任何將沒落的階級，都不肯輕易順着時代的革命巨潮，而結束了本身的生命，所以革命免不了流血，革命永遠是曲線的進展，革命勢力進一步，統治勢力使後退一步，革命勢力稍一停滯，統治勢力馬上會乘機反攻，北伐後的復古局勢，以及從去年國難到現在的憲政論者，新月派，國家主義派的紛紛活動，都是反革命份子謀乘機抬頭，奪取政權的反革命陰謀！

三、領導者的背叛革命

革命是沒有前例的。一次和一次來得不同，是時間的限制，一國和一國的不同，是空間的限制，有時其終極目標和標榜的主義是一致的，但鬥爭的戰略，却是都不容抄襲。而領導者的背叛革命，在古今東西的革命運動中，却不乏很多的顯例，往往是以勞苦羣衆的利益爲號召，而以少數個人的私利爲歸宿。因爲在革命的初步，民衆往往容易被利用，一等到政權在握，所謂領導者常常不能貫

澈先前所號召的主張，而專以鞏固個人長久的政治地位爲目的，法國的大革命犧牲了多少的勞苦羣衆，都爲了領導者的爭利奪權，才由中產階級的勝利中造出了一個拿破崙，從這一點上說，我們覺得對革命，不革命，反革命，假革命的判斷尤其重要，爲了使勞苦羣衆不受再度的欺騙，爲了避免把我們大衆的血肉，專換一二人政治上的金交椅，這一個尺度，在目前，是更其特別的需要！

此外，假革命份子的投機，鑽營取巧，不革命份子的疑懼，憂慮，動搖，都是在廣大的革命鬥爭中，最習見的事，因爲有他們的存在，革命的戰線，往往會發生分歧，革命的民衆，往往因他們的行動懷疑了對革命的信心，我們在復興中國革命運動中，要糾正勞苦羣衆的錯覺，指出革命的正確路線，要擊退反革命勢力的反攻，要制裁并預防領導者的背叛革命，要肅清投機份子再度的混進革命的陣綫裏，要解決不革命份子的疑懼和杞憂，我們覺得使大家對這種種的形色有判斷的識見，愈發是刻不容緩的！

四、革命行動的路線

要判斷革命和其他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界，最基本的標準便是考察各個集團行動的路線。沒有反革命的勢力會有革命的行動，沒有假革命份子肯向正確的革命道路上，也沒有不革命的份子會有什麼行動路線，所以用實踐的行動和行動所依據的路綫來判斷革命隊伍和其他隊伍的不同處，是再正確也沒有的，不過這裡不是討論中國革命行動應走的路綫，所以所能提出的，只是個一般的原則。這個原則作者要提出的有下列三點：

一、民衆奮鬥的前衛

我們知道革命鬥爭之最完成而又最統一的形態是政黨

和政黨的政治鬥爭。因為勞苦羣衆和統治階級的鬥爭既是不能避免的，那麼這個鬥爭的指導就是最必要的，敵人愈是狡猾，鬥爭愈是艱辛時，鬥爭的指導就更增加了重要性，所以一個真正革命的集團，它必然是勞苦民衆的前衛，（自然它也是參謀部）所謂民衆的前衛，就是說這個集團必然要具備了鬥爭的基本理論（主義）運動的各方面——即鬥爭的各方面——的知識。同時，它不僅集團的本身的每個細胞能活動，尤其要和勞苦民衆結合不能分離的關係，如果它在大衆中間，沒有何等精神的，政治的信用，它的指導遭了大衆的拒絕，那它便根本和革命成了對立的東西。

二、廣大的民衆基礎

（14） 革命集團的基礎，直接是建築在它的細胞上面，更基礎的是該建築在廣大的民衆上面。它的細胞不健全，如同一個美麗的樓閣，而用了土坯作基石，如果它沒有廣大的民衆基礎，就如同美麗的樓閣建築在沙漠上，絕對不能存在。所以我們在判斷它的屬性的時候，最要注意到的就是「它所代表的是什麼？——如果它所代表的是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那麼無疑的它是反革命的，同樣，如果它所代表的是工農勞苦大衆，那麼它一定是革命的，再說一個例子，如果它無所代表，或是複雜的社會份子所構成，那麼它不配談什麼集團不集團，它只幾個野心家，政治流氓，在那裡招搖撞騙！

三、根本的普遍的羣衆利益

這是當某個集團已部分的取得了政權的勝利以後而言的。因為一個獲得政權的集團，是負有貫徹革命的主張之責。對於他們所確切感覺到的需要必定是正當而應得的利

益，這些要求，革命領導者，必須使民衆滿足，一個個農感受了替地主作牛馬的苦痛而要求田地，一個工人吃盡了廠主的虐待而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資，一般民衆被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軍閥買辦及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而要求解放，一個革命者，能用巧妙的飾詞規避嗎？也許有人問「革命是不是爲利益」？我們的回答是：「革命，從被壓迫的勞苦羣衆方面講，是爲利益的，從一切反動，壓迫者講，是叫他們吐出侵掠來的利益」。參加革命的人雖然常受犧牲，但，犧牲只是不可避免的手段，真正的最後目的，是根本的普遍的羣衆利益。

以上三者，都是就積極方面說，茲從消極方面講，則是革命的絕不投機，絕不企待，既不是風頭主義，也不是尾巴主義，更不獨占革命！真正的革命集團，它的行動必然是革命民衆的前衛，它的基礎必然是廣大的民衆，它的目的，只有勞苦民衆的基本的普遍的利益，只有假革命的才會投機，才善於企待，只有反革命的才想獨占革命的權利，壟斷革命的領導權，只有不革命的才持風頭主義或尾巴主義！

但是，「誰來執行這個判斷的任務呢？誰最能判斷得清楚正確呢？」我們的回答是：「要來參加革命鬥爭的青年，都應該負起這種判斷的任務作他們「開步走」的預備。勞苦民衆最能判斷革命的真相，同時握着決定革命成敗的樞紐。時代，歷史，是如此的告訴了我們！」

「復興中國革命」的聲浪現在正逐漸的加高，但對革命和其他假革命，反革命，不革命，中間分界的判斷，正是「復興中國革命」的一個前提。



「中國問題」批判

若 瑜

(15)

「中國問題」新月書店印行，一九三二年八月出版，這一本代表新月派對於中國問題的總認識總見解——對於中國問題討論的總結果，該書緣起謂「我們幾個朋友在這一兩年之中常常聚談中國的問題，各人隨他專門的研究，提出論文，供大家討論，去年我們討論的總題是「中國的現狀」。——今年（一九三〇——一九三一）我們討論的題目是「我們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分了許多子目，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內容包括胡適等十篇文字

1. 我們走那條路？（胡適）
 2. 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羅隆基）
 3. 關於中國各問題的一篇外論（劉英士）
 4. 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青松）
 5. 制度與民性（鄭放翁）
 6. 宗教與革命（全增嘏）
 7. 優生的出路（潘光旦）
 8. 中國的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吳景超）
 9. 我的教育（沈有乾）
 10. 姓，婚姻，家庭的存廢問題（潘光旦）
- 內有六篇是他們「討論會的產果」，胡適之「我們走那條路？」是他們第一次討論會的成績，「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怎樣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制度與民性」，「宗教與革命」，「我的教育」，是他們分題討論的成績，「優生的出路」則是他們討論會的「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題目擴大的變形。

新月派的先生們，掙扎着，掙扎着，到現在仍沒有一點進步。然而他們仍可以過去的尊嚴，欺騙着一部分的讀者，讀者有的也被他們的虛名欺騙了，在這裡我們覺得有批判之必要。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理論是指導行動的導師，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自然，我們只是在理論的作用方面說）而理論的鬥爭是形成新理論的方法，形成高級的，鞏固正確的理論的過程，雖然他們的論據是怎樣的薄弱，然而只要他言之有故持之成理我們便覺得有批判之必要，只有胡適才甘脆的抹殺了一切的爭論，內閃別人的爭辯，以為只「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了的筆墨官司」便從而不開的，我們要把一切，客觀的擺在諸位看官的眼前，把真偽指出來，尤其是所謂「被別人牽着鼻子走的人」我們要看究竟是誰？「可以導人以康莊大道的理論」究竟是哪個？

我們為着批評的方便起見，不，我們為着更容易使胡適輩更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不得不更在個別批判之前加一個總論，因為他們對於社會根本沒有科學的瞭解，然而社會構成的分析，社會發展的過程，各個現象的相互關係，歷史變動的法則，這是一般思想作用於社會的於歷史的，必須先具的知識，所以在我們的批判裡我們要一一的指出，我們不借這一千零一夜的時間，第二我們要在總論之後指出來的是中國問題

之癥結，中國問題的核心的模糊，會使一切都成了虛構，我們應該如科學家一樣先從形態上入手調察該事物之本質，而後始能有所了解有所作用。（自然須使用歷史的法則）最後我們作一個別的批判，雖然費去十餘萬字，只要有益於我們，是無所顧惜的。

一、緒言

二、總論

1. 總論一

2. 總論二

3. 總論三

4. 總論四

5. 總論五

6. 總論六

三、中國問題之癥結

四、分論

1. 分論一 政治制度

2. 分論二 制度與民性

3. 分論三 優生的出路

4. 分論四 農民問題

5. 分論五 宗教問題

6. 分論六 財政問題

五、結論

(一) 緒言

胡適之先生，羅隆基先生，潘光旦先生，吳景超先生，鄭放翁先生……新月派的主角，學術界的名流，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們，合作了一部「中國問題」。胡適是不甘寂寞，過去的光榮全國，青年的導師的招牌，眼

看就要被一般後起之秀給砸碎了，於是乎攘臂而起，一呼數應，登上了「中國問題」討論會的主席台，驕頭便說：（胡適等是反對黨國的，當然是不必舉行儀式，只要開會前寒喧寒暄便了）「我們今日要想研究怎樣解決中國問題，不可不先審查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根本上抱着什麼態度，這個根本的態度的決定，便是我們走的方向的決定。」（註一）

胡適之先生畢竟是有名的教授，「高才虛衷思精心細」（註二）而且具有「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的精神」（註三）於是悲天憫人的說明了他們發表這一本「中國問題」的本旨：「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我們平日都不肯澈底想一想，究竟我們要怎樣的社會國家，也不肯澈底想想究竟我們應該走那一條道路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地。事到臨頭，人家叫我們向左，我們便揮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們向右，我們也使揮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們的領導者是真真睜開眼睛看過世界的人，如果他們確是睜着眼睛領導我們，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跟着他們走上平陽大路上去。但是，萬是我們的領導者是瞎子，也在那兒被別人牽着鼻子走，那麼，我們真有一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池的大危險了。我們不願意被一羣瞎子牽着鼻子走的人，在這個時候應該睜開眼睛看看前面有幾個岔路看看那一條路，引我們到那兒去，看看我們自己可以並且應該走那條路。我們的觀察和判斷自然難保沒有錯誤，但我們深信自覺的探路總勝於閉了眼睛讓人牽着鼻子走。」（註四）

主席的開會詞說完了，於是他們便繼續發言

胡：「今日所謂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牆壁虛造

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着那個自造的革命的對象；好像捉妖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精木怪等等名目，然後畫符念咒用桃木寶劍去捉妖。妖怪是收入葫蘆裡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舊在那兒呻吟痛苦。(註五)

羅：「如今的打仗殺人，都是無知的耗費。如今的『黨統』『法統』，都是迂腐的爛調。如今的『革命』『反革命』，都是孩童謾罵。如今的『黨在國上』，『黨權高國權』，都是無端壓迫小民的篡奪。(註六)

青：「一種純粹的主義，理論上或者是極優長；若要完全實，或是困難極大……譬如蘇俄也不能不通融主義，實行其新經濟政策；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資本主義，流弊甚大；都是極顯著的成例。所以我們如抱住主義，放過事實，結果就是應了莊子的話：『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註七)

鄭：「制度可以使人為惡，可以使人為善，……『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註八)

全：「當代的許多社會學說，例如列寧主義，棒喝主義等等，不知怎的，大都鈔襲了宗教教的故智，變成了牢不可破的『迷信系統』，但是死也不肯承認他們有甚麼宗教的意味，犯甚麼宗教的嫌疑。他們還高呼着：『打倒偶像！』『破除迷信！』正合着基督耶穌的一句話：『只見人家眼裡一根小刺，不見自己眼裡一根

大橡。』嗚呼，其亦可以已矣。(註九)

潘：「(現在)男女名為平等待遇，實則抹殺了女性，其抹殺的程度，要遠在解放運發軔之前以上。學校裡對於女子的待遇如此。出校後社會對於他們的期待也無不如此，於是男女分工合作的局面，一變而為同行嫉妬與競爭的局面：於是婚姻的關係，家庭的組織，子女的生產與教養，一天較一天散漫，浮薄，與失所憑藉，終於造成今日都市彷徨不安的狀態(註十)

真是形形色色無所不有，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優生的，宗教的，都登上了大雅之堂，不能說不是社會科學的榮幸。這些著作不能不算一本「偉著」。「立說必有事實的根據，創議必先想出這個提議應該發生什麼結果。而我們必須對於這些結果負責任：這不是出風頭的事，也不是我們個人發牢騷的事，這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事，我們豈可不兢兢業業的去思想？』我們這唯一的指導迷津的大教主——胡適——依然神氣十足的退了主席台了。其餘聲似乎還告訴我們：『小子們！易歸乎來！』

然而我們的大慈大悲的大教主們，無論怎樣掉花槍，却「總離不了這幾齣演厭了的舊戲」(羅隆基語)

這並不是感情用事，他們雖然在他們的理論上，打下了最「客觀」「最正確」的印記，然而科學是已早早的偷偷離開了他們，他們所把握的却只是浮淺的觀念論了。「掛羊頭，賣狗肉」這正他們自對自的說法，他們充分的描寫他們的特殊的社會地位，與他們所屬的階級，在科學說照妖鏡之下，可以顯露他們的原形。在這裡我們暫不多

說什麼？

- (註一) 中國問題胡適之我們走那條路？
- (註二) 國聞週報七卷四十三期與胡適之博士一席談
- (註三) 曾孟樸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寄胡適書
- (註四) 中國問題胡適之我們走那條路
- (註五) 前書一九頁
- (註六) 前書羅隆基之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 (註七) 前書青松之怎樣解決中國財政問題
- (註八) 前書鄭放翁制度與人性
- (註九) 前書全增嘏宗教與革命
- (註十) 前書潘光旦優生的出路

(二) 總論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蹈於溝壑。

假設真理，是可以追求的，可以認知的，那麼這種真理必是物質的，機器的，離主觀而獨立的，客觀事實證明其必然的。否則真理是觀念中的東西，主觀的產物，抹殺其一切的客觀的，物質的，必然的條件，則「天」可以是圓的，也可以是方的。「地球」可以是動的，也可以是靜的，太陽系的運行法則，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一切的科學成果——一般物質底運動，一般物質的構造，以及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礦物學，生物學，細胞學，發生學，遺傳學等都可以成爲虛構的東西，而觀念論者可以永遠，以其主觀的認知，否定科學的產果，把科學成果，也看成科學家的主觀的東西而與之對立了。這在觀念論者是覺得分不出一真李逵，假李逵」的。

然而，科學發達的結果，畢竟推翻了唯神論，推翻了

上帝，推翻了觀念論，推翻了虛構，而確定了科學的基礎與科學的價值，地球是圓的不是方的，地球是動的不是靜的，一切科學的成果，在客觀的機械的，物質的基礎上，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真理，征服了自然掃除了虛構的神，而被人所認知了。

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亦莫不如此，因科學的發達，漸漸的被認識起來，由混沌的雜亂的，建立了法則規律，由不可知的，衝動的，建立了科學的說明。同樣這種科學的說明，也必須是物質論的，機械的，離主觀而獨立的，被客觀事實證明其必然的。否則社會的說明，是觀念中的東西，是主觀的東西，抹殺其一切客觀的，必然的，物質論的，的條件，則歷史可以是人的，也可不是人的。社會可以是人的，也可以是神的，一切的可以嚮導行動的理論，一切可以說明社會的學問等等，都可以成爲妄想的東西，而觀念論者，可以永久，以其主觀的認知，否定科學的真理，把科學的真理，也看成科學家的東西而與對立，不用分「真李逵，假李逵」了。

其實，還不止此，觀念論者，不止想與之對立，而且在企圖上，要撲滅了科學的真理，所以在觀念論者的觀點上，是科學的取消者，真理的取消者。

尤其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裏，一般資產階級的學者，挾其階級的仇恨；永久是以其主觀的認知，撲滅或破壞社會之科學的進展的。米爾 (J. Mill) 就不承認社會科學，以爲社會科學「遠不如物理方面，求其得人之部份的承認而不可得。」張君勵以爲社會科學「雖學者輩出，而漫無定說。」社會科學「不能發現一切社會現象發生底和變化底客觀原因」郭任遠罵社會科學「外面掛個科學的招牌」，「內容

糟得非常之可憐」。而社會科學家「本來是」以「掛羊頭，賣狗肉」爲「特色的」。並且「現在一切的社會科學都可燒，大多數著名的社會科學教授們，也只好祈禱他們早些千古，勿留在人間。」（註一）胡適以爲這些便是「抓住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裏變戲法」……「愛變什麼戲法就變什麼戲法，本來大可不必認真……作者可以信口開河，讀者也由他信口開河。」而有主義的革命，「大都是響壁虛造一些革命的對象，然後高喊打倒那個自造的革命對象；好像捉妖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魃木怪等等名目，然而畫符念咒用桃木劍去捉妖，妖怪是收進葫蘆裡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舊在那兒呻吟痛苦。」而唯物辯證法呢？也如李季先生所指施班（Othmar Spann）稱辯證法爲「盲目的因果中奇怪的奇怪」。斯特魯味（Peter von Struve）以辯證法爲「消滅連續」。巴薩洛夫（Bajgrow）稱辯證法爲「陳腐」。卡斯天（Edward Bernstein）以辯證法爲「陷阱」。馬沙里克（Thomds Carrière masaryk）以辯證法「簡直是戲法」。善於運用文字以笑罵的中國人，罵得更狠毒；郭任遠說：「辯證法是哲學家在安適椅上和人家喧嚷吵鬧的方法」。胡適說：「辯證法……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註二）

這一堆資產階級的學者們，爲了他們的階級是最忠實的「張牙舞爪的戰士」。對於撲滅科學，撲滅真理，是忠實的盡了牠的力量。然而，如我們以前所說的：假設真理是觀念中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可以抹殺其一切客觀的物質的，機械的，必然的。實証的條件而不屢。把科學塗上主觀色彩，否定了科學所做的，而把科學的成果，看成是科學家主觀的東西而與之對立與之開火的時候，則什麼真

理也是虛構的。無論什麼時候觀念論者，也可以把與自己對立的東西觀念化了利用下面的公式做戰鬥的武器。

1. 他們的認識是那樣；我們的認識是這樣；他們的與我們的不同所以他們的是錯誤的。

2. 他們的說明是那樣；我們的說明是這樣；他們的與我們的不同，所以他們的說明是錯誤的。

3. 他們的理論是那樣；我們的理而是這樣；他們的理論與我們的理論不同，所以他們的理論是錯誤的。

同樣，他們爲着穩定他們的理論是真的，別人的理論是假的。他們不止於鬥爭，而思有進一步的作用——撲滅真理，麻醉讀者，他們還可以把他們自己的理論，觀念論的武斷的，貼上一道「科學的」封條，打上一塊「科學學的」戳記。把別人的理論，觀念論的武斷的，貼上一道「玄學的」封條，打上一塊「玄學的」戳記。說：

1. 他們的認識是那樣，我們的認識是這樣；他們的與我們的不同，所以他們的認識是玄學的。

2. 他們的說明是那樣；我們的說明是這樣；他們的說明與我們的說明不同，所以他們的說明是「玄學的」。

3. 他們的理論是那樣的；我們的說明是這樣；他們的說明與我們的說明不同，所以他們的理論是玄學的。

然而，真理若是可以追求的可以認知的話，這種挾了階級仇恨的撲滅侮辱，畢竟遏止不了科學的生長。在鬥爭中科學要發展起來。漆黑一團的東西，混沌不知的東西，要清楚的把他的秩序，規律，擺在人們的前面。天文學的發達，不但知道了，地球和其他星體的運行，而且知道了

，太陽系的諸球體的生成變化及運動的規則，不但知道了太陽系各球的體積之大小而且知道了各個球體的直徑圓周，以及各個球體的距離。物理學不只發現了力發現了光而且可以計算光之速度力之大小，現在這些幾乎是普遍的真理了。沒有人再否認他而為神學觀者迷惑了。社會科學也是如此，他是逐漸的擴張了他的明度，奠定了他的基礎，掃除了在各個人的頭裏的觀念論的信仰，作了人們說明社會嚮導行動的工具。

胡適先生，首先對人家的痛罵說是別人都是被瞎子牽着走的。現在這樣帶有催眠性的所指給的煩腦問題——究竟誰是瞎子，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他是不是？究竟誰是被瞎子牽着鼻子走的，你嗎？他嗎？我嗎？——這些煩腦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了，是可以指示給人家看了。

「真李達」，「假李達」，不是永遠不能分辨的。

1. 總論

我們首先要研究的便是方法問題。

胡適不只是一個哲學家而且是一個科學家，他是常常的提到「科學」教給學生的，他一再的叮嚀我們要「細心搜求事實，大胆提出假設，再細心求實證」。〔註三〕要「認清問題，認清問題裏面的疑難所在，這是自覺。立說必有實事的根據，創議必先細細想出這個提議應該發什麼結果，而我們必須對於這些結果負責任：這是自覺」。〔註四〕鄭放翁在本書制度與民性一文內也提到「然而我想實利主義本無傷於強國」，的實用主義的彩色。實用主義是什麼？是一種「適應於庸俗者底心理，為庸俗者之所產底庸俗哲學」；是利己思想的核心；是「哲學中底取銷派」。是「一切懶人底哲學旗子」。〔註五〕李季則名之為

「市僧們赤條條地計較利害的一種方法。」（見李季著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

效擊唯物論，在偽唯物論的術語之後隱藏着的唯心論。（伊里奇）

如此則實用主義是已經被唯物論的學者，攻擊得體無完膚了。胡適的科學是沒有把握住半點真理，李季說：「現在剩下來的的工作，就是要替這擊破腦袋和外殼的玄學鬼收屍。」胡適所謂「不受人惑，所謂「自覺的探路」所謂「自覺的革命」，高高的抬起自己，嚷着：「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不算高明，被馬克斯列寧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不分清紅皂白破口亂罵一切都可以不雇了。這是胡適的迴光返照。

「他們，時常反對並毀謗愛爾法修，但沒有勞過神去求了解他（蒲列哈諾夫（Georg Plehanov）唯物論史）」

這正是新月派一般自稱為「指出迷津的大教主們」所幹的，自然關於這些東西是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然而我們為着打破這自為偶像起見，我們有重行提出之必要，一方面我們可以使一般拜倒胡適之的石榴裙下的人們，知道胡適也是一個平庸的人，一方面使胡適打破他自己的誇大狂，重新把人家的理論研究一番，再登台說謊。

x x x x x

現在我們回到「中國問題」批判的正文。

「所謂研究，就是把材料一一當作自己的東西，來析一種發達形態，

追求那內在的紐帶事情」（K. Marx, Kapital I, xxv）

我們不把社會作個科學的了解則已，否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一樣，他們不是一些垃圾的堆積，他們有他們客

觀的存在着的秩序，系統，與法則；社會科學也同自然科學一樣，必須要從複雜的混沌不清的現象中，找尋其秩序，追求其系統，發現其法則，作成一有系統的知識。

第一，精密的整理駁雜之現象，攝取其少數部類，分類排列，使達到一有秩序有系統的敘述。

第二，分析抽象，把複雜分析到簡單，由現象分析到本質，

第三，確定因果關係的法則，使敘述的科學，達於說明的地步。

第四，依據已知的現象法則和原因推測未來的現象，確定人類的努力。

胡適是懂得科學的（？）而且是懂得人的一切生活，行動，是受着客觀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的。胡適說：

「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宇宙裏，天行是有常的，物變有自然法則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競爭的慘劇鞭策他一切行爲——這個兩手的動物的自由是很有有限了。（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註七）然而在社會現象上，他糊塗了，他反動起來。胡適說了。

「一百個大錢，你可以擺成兩座五十的，也可以擺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擺成十座十個的。」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現在我們先說「人」，人不只是一個自然界的動物，而且是一個社會的動物，不只是受着自法法則的支配，而且受着社會法則的支配。（人可以減少自然對人的作用，然而人不能減少社會對人的作用）他根本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他承繼過去的文明，接受現在的影響，他底生活，習慣，思想，行爲

，不但不是超出社會以外（支配社會的上帝）反而爲社會關係所規定，所以個人的一言一動，不是單獨的，自由的，而是整個社會關係的總和之部分的表现。所以在實際上考察，個人的行動雖然是照着自己的意願去做的，然而其反歷史反現實環境的鮮能有所發展。

因此社會形態的規定，不是個人的企圖，歷史的創造，不是個人的妄想，他是根據某種客觀的物質基礎的推動而推動（經濟——自然這是胡適所最煩賦的）人只有適應這一個社會的環境，依照着歷史的必然法則，才能有所用。決不會像胡適所了解的「一百個大錢，可以擺成兩座五十的，也可以擺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擺成十座十個的」那樣滑稽。

社會的移動，絕不是斬新的或單純的憑腦子的思維能力而想像出來友之社會的變革必須是依據着已經存在着的生產狀態準備下了必需的條件。然而這些條件，不是像羅隆基氏所說的「有權可分」，「無產可共」也不是胡適所說的「貧窮」，「貧污」，「愚昧」。這些都依存於「經濟基礎」的產物，而不是，物質的，本質的，必需的東西。

其次我們在談到「心理活動」所謂「心理活動」，在其未生作用於環境之前要受兩種東西的規定：第一發生心理活動的物質；第二喚起心理活動的物質。但其結果仍舊靠着外物的反映。所以人的行爲根本是答覆外物刺激的反影。「思想者，事實之母。」乃就思想的作用而言。「事實者，思想之母」，乃就思想之形成而言。（這只有在形而上學的學者的頭腦裡才會成爲爭辯的問題。）所以我們如果要由心理來斷定社會現象有無法則。就應該在物質方

面探求。我們要生作用於社會，必須要依據物質之因原法則。

我們不願意把社會現象作一種科學的研究則已。否則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把我們的「心理活動」，撇開，把社會當作一個客觀的存在着的實體，用科學的方法，去歸納去分析，去追求，去求更深更精確的認識才有可能，換言之，我們若想生作用於社會，則「社會構成之分析」，及社會發達過程之研究」，實為必要的前提。否則，只把其某一部分高調起來，擴大起來，這只是科學的反動，沒有米點真理的影子。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胡適雖然是想從哲學的（？）科學的（？）新文化的（？）的領域裡，想再踏進社會科學的領域裏來，但他首先犯了不科學的錯誤，不能對於「社會」構造之分析，與「社會發達之過程」作一個刻苦的學習。不能將紛亂的社會現象分類排列為一有秩序有系統的敘述，不能將複雜分析到簡單，不能由表象洞察到本質。

在他的「我們要走那條路？」一文裏，他說：「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在……，因為這種討論徒然引起無益的意氣」，那麼，他展開在我們眼前的，讓我們看見的是什麼呢？——中國五大仇敵。

第一貧窮 「余天休會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

窮以下，張振之估計貧民數目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有些地方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或百分之八十二以上。

第二疾病 「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

了些最近各地的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

第三愚昧 「我們號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一個三十年前的大學。」

第四貪污 「是我民族最大的特色

第五擾亂 「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復。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註七）

胡適說：「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胡適這樣輕快的取銷了一切的爭論，這無異於說：「胡適之為胡適，胡適的靈魂不在內，因為胡適的靈魂，在十年前已經死了。胡適之肉體也不在內，因為胡適的肉體已經腐爛了。」

第一他所抓住的五個大敵是貧弱的。如貪污是我們民族的特色（連胡適也在內）；沒有三十年前的大學可以證明我們民族的愚昧；太平天國之亂證明我們民族的抗亂等等。第二他所抓住的五個大敵是倒果為因的，中國的貧窮不是中國的貧窮所以致之，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治病必先從病因入手，雖然是極昏庸的先生也應該知道。第三他所抓住的五大仇敵，是表面的，片段的，不但沒有更深的洞察社會之實質，而且沒有清楚的理解社會。第四他取銷了一切實質的論究，與認識。帝國主義在中國發生的作用幾字人人盡知，然而胡適說五大仇敵之帝國主義不在內，這自然可以作帝國主義的孝子。但一切依存於帝國主義生長起來的

東西，一切反映着帝國主義之露骨的剝削的東西，這是有目共睹，有手共指的，我們既便捨棄了一切可以使胡先生刺耳的東西，然而我們沒有方法捨棄了事實。「明察秋毫，而不能見與薪。此之謂也」誰能說胡適懂得科學呢？

反之，我們看看爲胡適輩所痛恨的科學家們所作的：在社會構造之分析上，他們不只指示給人以系統的完整的有秩序的認識，而且指示了各部的關聯生長的過程，以及物質的基礎，在社會發達之過程上，不只指示給人以精確的因果法則及發展規律，而且給人一創造歷史的武器，中國的問題也只有依這種精確的科學的成果才能清楚的科學的了解。

胡適是懷戀着過去的五四時代的光榮，以一標新立異「剽竊榮譽否認了一切科學成果（其實五四時代的文化運動何嘗是胡適之思想新奇的功績。）自尋路徑，却不管人家的對的是不對的？也不管自己的路徑是錯的不是錯的？來「戲台裏喝采」，自拉自唱。

（註一）郭任遠之反科學的馬克斯主義

（註二）李季辯証法還是實駐主義

（註三）

（註四）中國問題胡適之「我們走那條路」

（註五）二十世紀一卷四時葉青「胡適批判」

（註六）胡適文存「科學與人生觀序」

（註七）中國問題胡適「我們走那條路」

2 總論二。

觀念論的學者，不肯把入類的經濟關係看做社會之物質的基礎的人們，無論立腳於理性，或立腳於感情，他們都不能說明社會的基礎，全部的構造，以及各部之互相的

作用，這是必然，因爲這裏的真理的探討，是被其階級利害所限着所規定着，他決不能再更進一步。

所以他們不能將社會的複雜現象，分離而爲有系統的系列，如一般物質論的社會科學家那樣將繁複的社會現象分離而爲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之二，政治及法律制度——上層建築之一，社會組織及經濟構造——社會之基礎構造。的清楚的有機的整體的系列。其實，他們不只不能，不肯，而且盡着力量蔑視（像再生派的先生們）破壞這樣科學的成果，雖然自然科學照耀着他們的驚奇的眼睛。這是在一切觀念論的學者們的著作裏，都可以見到都可以指斥的。他們總認爲社會現象是千複雜萬複雜的一堆不可抽繹的意欲情感，希望，歡樂，悲哀，成功，失敗，的不可分離的，不可索解的交織着的網。在他們的目前，他們要把社會弄成一個不可瞭解的神秘的東西，以與科學的說明作頑強的反動，破壞科學的成果。

所以他們也握不住社會的整體。因爲他們不能——簡直是不肯——把社會現象，分離而爲有機，整體的清楚的，的系列。他們只是隨便的武斷的摘取社會現象的任何一角落，任何一面，或任何一部，任何一段，甚而至於任何一點，擴大，炫示，以作他們的企圖的張本——作他們要作的論據，及進攻他人誣蔑他人的陣地。這無疑的在科學的考察上，他們的認知是「粗糙的」，「浮淺的」，「掛漏的」，「錯誤的」的東西。像二十世紀葉青的「胡適批判」一文內所指摘的一樣。葉青說：（一）總括起來，胡適所談到的科學方法，只是科學方法的一部分，掛漏甚多。（二）只是低級的和原始的科學方法，是歐美所共知的常識，非常淺薄。（三）由於他對於科學的無知，造成了

對於科學方法的曲解。(四)關於科學的提倡，他不過在人家後面，鼠一般地，發出些小聲，小氣，小勝的曖昧言辭，去隨聲附和而已。(見二十世紀二卷一期，葉青胡適批判第二部分在科學方面的胡適，第一節(胡適的)科學方法之總的考察)其實，不只胡適，凡一般的布爾喬亞的學者莫不如此。階級利害的限制，不能使他們透進問題的核心。不能使他們擴大到整體的聯繫的研究。

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從社會之發展的曲線上，截取其一截；從社會整體的關聯上截取其一面，而把他神聖化了全能化了，以爲其破壞他人或誣蔑他人科學的成果的武器。所以他們也把握不住社會的紐帶。因爲他們，在社會研究的出發點上，已規定他之必陷觀念論的絕境了。社會現象在其物質的基礎上，形成了相互的關聯，相互的作用。除了其物質的基礎——經濟——爲其全部的變動的形成的因子以外。其他各部所能保存的是相互的，是不能分離的。而觀念論者，在其武斷的，創製之下，忽略了這些有機的構造。同樣，社會，除了經濟爲其決定的因子以外，其他各部分只有在經濟的規定之下，發生其有機的相互作用，然而不是各部的決定的因子。換句話說，就是社會之任何一部，都爲經濟所規定，而在其受經濟的規定之下，影響其他各部，作用各部，而不是各部的決定因子。然而觀念論的學者們，在這裡不求其瞭解。只截取一部，認知其一部對於其他各部的相互作用，當作一種決定的東西看待。因之在布爾喬亞學者們口裏，造成極紛亂，極矛盾的說明，而尤其可笑的，是歸之於人性，歸之於社會本能的。他們所做的，好比中國古代的一部下流小說。下流小說的作者，每願意炫示一個不近人情的大人物遭遇災難。然

而到了真正災難的跟前，不得不又拿出了不近人情的「天神顯聖」，「菩薩慈悲」，來解除小說中的危難，其實就是解脫自己的意想。觀念論派的學者們，是不借讀於神鬼的，然而他們同樣會另換一種方式——人性論——來解脫他們自己爲自己設下的陷阱。所以觀念論的學者所作的，亦不過掩耳盜鈴的把戲而已。其實還不止此，他們實際上，是以此與科學的成果，作頑強的掙扎。

「中國問題」的作者們，怎樣呢？先看胡適：

胡適在他的「我們要走那條路」一文裡說：中國問題的癥結：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爲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爲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不入五鬼不入之國。那麼中國問題的癥結在那兒呢？胡適說：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污；第五大敵是擾亂。胡適是這樣的輕巧的做了中國問題的繫鈴解鈴人。

然而，這裏展開了的兩個問題，是被胡適給取消了：

第一中國這個社會到底是個什麼社會？

第二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是怎樣形成的？

胡適像個瘋狗一般，總是武斷的瘋狂的嚷；中國，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爲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不在內，因爲中國沒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爲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爲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換句話說：就是，中國這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更不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然中國社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胡適却沒有回答。然而這却是一個重要的先決的問

題，這一個問題弄清楚了以後，對於中國問題，才能下手。才能決定中國問題的核心，不作用於中國社會。

同樣，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是怎樣形成呢？胡適依然沒有回答，就提出了五大仇敵。然而這貧窮，擾亂，愚昧，貪污，疾病等等的五大仇敵，是現社會之結果呢？抑是造成現社會之原因呢？胡適沒有回答。然而這却是一個重要問題。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雖庸醫已知其不可。胡適所謂之五大仇敵，究竟怎樣形的？我們不仍請胡適再想一下。

胡適是比其他資產階級的學者更無恥的更笨拙的，提出些更皮毛更微細的東西來，裝成不許侵犯的神聖，自欺欺人。胡適所認知的不過些薄弱（如貧窮的只有中國被剝削被榨取的勞苦羣衆，而不是中國人人貧窮，貪污的，只是一般貪婪的腐爛的統治階級，而不是中國人人貪污。這顯然的是部分的，是階級的，不能當作全般的看待，同樣，不能當作全般的仇敵看待。）皮毛而已。然而胡適爲什麼不從全般的，鬥爭的，階級的眼光去找說明，而偏高調了這些煩瑣的粗鄙的東西呢？無疑的，胡適是爲着他階級的利害而出馬了。他要把一般革命的大衆轉換到馴順的奴使。

羅隆基氏又怎樣說呢？

羅隆基氏比胡適高明得多了，他把一切決定社會的原素歸於政治，社會的不良完全由於政治度不適合時代於是羅隆基氏說：「今日的中國政治，只有問制度不問人的一條路」，在這裏羅隆基是把政治高調起來了。而將其一切可以作用政治，影響政治，決定政治的各部分都抹殺了。

（詳後）

鄭放翁怎樣說呢？

鄭放翁同羅隆基一樣，他把一切決定社會的因子歸之於「制度」。所以他說「主張以仁義道德救國者，其如井蛙語海，夏蟲語冰」。他認爲「其所差者不在人心，而在制度。」「制度可以使人爲惡，也可以使人爲善」。鄭放翁是只把制度高調起來，而把其一切相關聯相影響，以及作用制度，決定制度的其他各部分都抹殺了。（詳後）

潘光旦又怎樣說呢？

潘光旦則注重人才，於是優生使是決定社會的因子了。中國所以造成了二十年來政治上，經濟上，教育上，種種傾軋，嫉妬，散漫，混亂，與相持不下的局面，是因爲中國人有四大缺點：第一沒有健全的體格，只有點皮毛糖勁。第二沒有科學的能力，日以孜孜的，無非是開門七件。第三團結能力和組織能力薄弱。第四是貪污與公私不分，貪得的本能（Acquisitive instinct）比較特強。這顯然是潘光旦氏，把「人性」高調起來而又把其他各部的關聯作抹殺了。

中國問題的作者們，在這裏是充分的暴露了，他們這種摘取社會整體的任何一部——政治的，教育的，法律的，宗教的，經濟的，人性的——當作整體看待。而摘取任何一部所能發生的作用，當作社會決定的因子看待。甚而胡適只取其更毫末的東西，當作活神仙。整體的，有機的，全般的，他們竟至於沒有看見。孟子所謂「明察秋毫，而不能見輿薪」，正是這樣。現在，我們給中國問題的作者們，提起一個「瞎子摸象」的故事來代我們的批判。

第一個瞎子去摸象

第二個瞎子去摸象

第三個瞎子去摸象
 第四個瞎子去摸象
 第五個瞎子去摸象
 第六個瞎子去摸象
 摸完了，這六個瞎子來報告象的形貌
 第一個瞎子說：
 第二個瞎子說：
 第三個瞎子說：

第四個瞎子說：
 第五個瞎子說：
 第六個瞎子說：
 他們爲着爭辯這樣一個問題，竟都堅持了他們的主張，作誓死的抗爭。中國問題的作者們，對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像煞有介事似的，來發表其偉論，亦不過摸象之瞎子而已。
 (待續)

▲▲本刊第六期目錄

不幸之川戰.....	一鳴
別夫汪精衛先生.....	荻風
由時翰金剛法會聯想到罪惡與道德.....	天一
日俄將訂不侵犯條約.....	洪
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正確理解.....	流螢
所謂「和平使者」的報告書.....	薇園
蘇聯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態度.....	午譯
蘇聯五年計畫的完成.....	齊康華譯
北美合衆國與蘇俄的石油工業.....	翦伯贊
德國政局騷動的經濟根源.....	樹生譯
唯物論之史的發展.....	以瓊
方向的轉換呢？革命的取消呢？.....	君達
評羅隆基氏之「論中國的共產」.....	勞淵

胡適治學方法批判

周之鳴

「胡適兔子固學不得，胡適烏龜尤不可學也！」

(一)

自從原始社會解體，產生了階級的文明社會以來，軍界即有所謂軍閥，財界即有所謂財閥，學界即有所謂學閥……而所謂名流，名人的名閥也發生了。

革命的軍人，思想家，學者，財政家等，被目為名流，名人，那是名符其實的；反之，學閥，財閥，軍閥等自稱名人，名流。或被人作為名人，那就為名閥了。這可證之一部良友公司的中國名人傳就可知道。

(二)
中國的所謂名人，比之外國特別出風頭，這就是中國民衆，比之外國，格外來得崇拜，欽佩名人；其之所以然者，無疑的是中國文化程度低的緣故。因此中國所謂名人，雖特別漂亮，但比之外國的名人，即有天壤之別。就是中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精神科學各方面之所謂名人概是有名而無實學的，都是目不識丁的無知羣衆，昧目的信仰崇拜所形成，而被他們竊取的。

固然，名符其實的名人是有一二，但對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所謂名人，任其荒謬，任其橫行乎？為文化的使命，中國的革命，當加以嚴密的清算，無私的批判。

(三)

胡適是中外所崇拜的刮刮叫的博士，頂呱呱的名人，我們對於胡適博士應有精細的檢查，深刻的認識。

本年七月九日北平青年會讀書互助會的演講運動週請胡適講「治學方法」。胡適是演講運動週的最後一天，那

天講演所在的協和大禮堂，說是聽衆異常擁擠，這當然是胡適之名高過一般名人一等的證據。下面就是胡適博士演講法學方法的大意：

我們知道各種學問，都有牠的「治學方法」；但是學問的種類雖是如此其多，貫於其中的一個「基本方法」都是普遍的。這個基本方法，也可以說是，或者無寧說是方法的貫慣。

三百年以前培根說了句很聰明的話，他說世上治學的人可分為三種：那就是第一蜘蛛式的，把網作得很美很漂亮，但是那點學問却只是從他自己的肚子造出來的。第二是螞蟻式的只知集聚，不管有用不用，這是勤力而理解不足。第三是蜜蜂式的，這種最高。蜜蜂採了花去，更加上一度製造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是經過改造製造出新的成績的。是理想的作學方法。

一個人有天才自然能夠使他的事業得到成功，天才不夠的人如果能用功，有方法的訓練，雖然不敢說能夠趕得上天才一樣成就大，而代替天才一部分却是可以說的。

現在說到本題，治學。第一步我們所需要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國的語言文字，外國的語言文字。其他就是基本智識。從中學到大學給我們的都是這東西，這是一把總的鑰匙。再其次就是設備。一些應用的辭典，表冊，目錄是必需的。

第二步就是習慣的養成。可分四點來講：第一是不

要賴。多用眼，多用手，耳，甚至多用自己的腳。如果你要懶，那就要大懶不要小懶，那意思就是要一勞永逸。第二是不苟且。就是不拆爛活。我們要一個不放過，一句不放過，一點一畫也不放過，勤要勤得好，不要勤得沒有用。第三是不要輕于相信，要懷疑自己，懷疑馬克斯，不要相信胡適之。第四是要有無窮盡的虛。虛就是有空的地方讓新的東西進去。要有了習慣的養成才能去做學問。

我們普遍都知道的有什麼歸納法，演繹法，歸納是靠現成的材料，把他集合起來，而演繹法則是由具體的事物推測到新的結果。打個比方，今天我們在協和大禮堂講演，就拿本地風光治病來說，某病用某藥，某病用某藥，都是清清楚楚。但為什麼這就是猩紅熱，而不是虎列拉，不是瘧疾，那就是因為我們知道猩紅熱有某種某種症狀歸納起來得出的結論。同時我們如果知道病理生理那我們就可以知道某部分損害了，就可以得出某種結果，就可以經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要作到這步必須要有廣博的智識。古人說開卷有益，古人留下來的一些現成東西，我們為什麼不去求？不僅是自己本行內的智識要去求，即是與本行相反的也要去求，王荊公說：致其知而後識，所以要博。其次我們就要追求問題。一些有創造有發明的人，都是從追求問題而來。有一次我給學生當邏輯學我說我只考你們一個問題把過去你們以自己的經驗解決了問題的一件事告訴我，其中一人，答得很有意思，他晚上看小說，煤油燈忽然滅了，但是燈裏面還有油，原因是燈帶短吸不起油，這怎麼辦呢，小說不能看完

，如果燈底下放二個銅子墊起來，煤油也仍是不會上來的，他後來忽然想起從先學校裏講過煤油是比水輕，所以他就在裏面灌上水，油泡到上面，燈帶吸着油，小說看完了。這都是從實際裏提出問題得到新的學問，所以無論是學工業學農業，學經濟，第一就是提出問題，第二就是提出許多假定的解決，第三就是提出許多假定解決人（甲乙丙）最後求得證實。

最後還要說一點，書本子的話，我現在覺得是走不通了，那只能給少數的人，作文學作歷史用的，我們現在所缺的是動手。

你們都知道龜兔賽跑的故事，兔子雖然有天才，却不能像烏龜那樣拚命的爬，所以達到目的的不是兔而是烏龜。治學的方法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的口號是：「兔子學不得，烏龜可學也！」自然最好是能夠龜兔合而為一。（摘要于世界日報）

(二二)

治學所需要的工具及習慣的養成，不是治學方法而是法學方法達其成功的工具，所以治學方法不好，雖有良好的工具，習慣，還是無濟于治學。但治學方法是什麼。胡適告訴我們是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的歸納法，演繹法。然而要作到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第一要有廣博的智識，第二要追求問題。可是追求問題是運用廣博的智識來從舊的學問裏求出新的學問的，所以博是追求問題的工具，或條件，而追求問題又為達從舊的智識裡得出新的結論的演繹法所必要的，追求問題是個方法，因此可說是演繹法的初步方法，這初步方法是實用主義的方法。所以胡適治學方法是演繹法事實主義方法，我們受此二個

治學方法來下批判。

現在先說追求問題這個方法。

追求問題的第一提出問題，第二提出許多假定的解決方法。第三提出假定解決人，第四求得證實，就是杜威的思想方法。「杜威論思想分作五步說：（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胡適文存卷二第一二〇頁）所以胡適告訴我們的這個治學方法——追求問題不是胡適傳出來的而是杜威的。只不過思想的第一步與第二步併為追求問題的第一步，其實還是一樣的。

這所謂科學方法，簡單的說就是：

1. 提出問題
2. 提出假定
3. 試用假定
4. 證實

我們再舉他所舉的例子來說明這科學的治學方法。

（一）提出問題：一個人出去探險，走進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樹林裏，東行西走，迷了方向尋不出路子，他怎麼得能尋一條出險的路子；以及墨子小取篇的「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一句話的「也」字究竟可以有解說沒有解說，這就是提出問題。

（二）提出假定：既經認定疑難所在，自然以自己的經驗提出種種解決法。如這個迷路的人，提出爬上樹頂去看，取出千里鏡來，四面遠望，聽聽流水的聲音三個假定的解決方法。又如墨子「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一

句，畢沅說「也物」的也字是衍文；王念孫說「也」字當作「他」字解，這是二個假定的解決法。

（三）試用假定：迷路的人，爬上樹頂看不出路子，用千里鏡也看不出路子，但流水的花郎花郎聲音是聽着了，這是假定試用。又如墨子的「舉也物」「也」字，畢沅的假設是刪去，但雖勉強解說，但總不能充分滿意。王念孫的解說把「也」字當作「他」字，這因第一他字正是「譬」字的意義；第二再看墨子書中的「無也故焉」「也者同也」，都是他字寫作也字。所以應該採用這個假設。

（四）證實：墨子書中「舉也物」一句王念孫能尋出「無也故焉」等例子來證明墨子「他」字常寫作「也」字，這個假定的解決便成了可信的真理了。又如那個迷路的人，跟着水流果然出了險，那就是假定的證實。

這種科學的治學方法，就這樣完成了。可是這所謂科學的實用主義治學方法是科學麼？是真理麼？這倒不可輕輕放過，應當加以檢討。

（四）

假定胡適發生封建社會的懷疑而提出「什麼是封建社會？」這個問題，這是第一步；他根據事實：農奴制度是封建社會，有手工業是封建社會，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一夫一妻制是封建社會，私有制度是封建社會，這是第二步；然後去調查是否有農奴，地主軍閥，貴族，是否是私有制度，是否是一夫一妻制，是否是自然經濟，這是第三步；結果發現手工業，農奴制度，自然經濟，一夫一妻制，私有制度之一，或全被發現，於是，得了實證這是第四步。這是真理麼？我們來看，反面；

胡適發生資本社會的懷疑而提出「什麼是資本社會？」

」的問題，這是第一步；根據經驗：工資勞動是資本社會，一夫一妻制是資本社會，商品的生產是資本社會，私有制度是資本社會，生產手段的獨佔是資本社會，這是第二步；然後去調查是否是商品生產，一夫一妻制，工資勞動……這是第三步；結果發現生產手段的獨佔，工資勞動，私有制度商品生產之一，或是全被發現，這是第四步。

「事實勝于雄辯」，我們拿中國社會來證明。如果胡適發現了農奴制度，私有制度，自然經濟，一夫一妻制，證實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反之如果胡適發現了中國有工資制度，是商品生產，獨佔生產手段，行一夫一妻制，有私有制度，因之又證實中國社會是個資本社會，可是中國有商品生產，工資制度，生產手段獨佔的資本組織；同時又是農奴制度自然經濟的封建組織，那末中國社會，胡適博士認定是資本社會乎？抑封建社會乎？按照他的所謂科學方法可得出中國是封建社會的結論，又可得出中國是個資本社會的結論，那末這是真理麼？

再胡適博士提出「什麼是封建社會？」而發現了證實中的一夫一妻制，私有制；提出「什麼是資本社會？」而也發現了證實中的一夫一妻制與私有制，以中國為例！應當是封建社會呢？抑是資本社會呢？抑名為合封建社會與資本社會的一夫一妻制或私有制社會呢？

現實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有二個階級：資產階級，勞動階級，事實上資本家是支配者，統治者，榨取者壓迫者，勞動者是被支配，統治壓迫榨取者，如果提出「現實社會是那個階級佔有」的問題，是可以得出是資本家佔有，又是勞動者佔有，又是資本家與勞動者共同佔有的結論麼？所以實用主義的治學方法，是科學的麼？所得出來

的結論是真理麼？

我們證明實用主義治學方法的不科學，非科學，再舉二個例子。

胡適博士懷疑自己是否是個大學問家，而提出「何謂大學問家？」的問題，這是第一步；事實告訴他，自然科學的發明家，工程師是大學問家，社會科學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性學博士是大學問家，哲學的實用主義者，或唯心論者是個大學問家，文學的小說家，詩人是個大學問家這是第二步；前後去考察是否是個政治家，小說家，工程師……這是第三步；結果他知道自己出版過一本三分之一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所以是個哲學家；參加過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提倡曹錕吳佩孚的「好人政府」所以是個政治家，整理國故，以白話代替文言，所以是個文學革命家，證實自己是個頂刮刮的大學問家。這是第四步。但是現在二十世紀時代，一個大學問家，須對於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哲學，文學，美學都有深刻的研究，淵博的學問，且有新的發現，自己的創見。單是自然科學技術的發明家，是不能稱為大學問家的。那末所謂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的胡適博士是個大學問家麼？

人家都說胡適博士是教育家，政治家，文學家，哲學家，外交家，經濟家，所以胡適是個萬能博士。胡適博士聽到這種議論，發生懷疑自己真的是個萬能者麼？他隨後根據事實去想，證實自己是大學教授，是爭過人權，唱過好人政府，作過中國哲學史大綱，改變中國文學的形式，是個中央經濟委員會的委員，貢獻過對日外交方針（獨立評論），因此結論，胡適是個真的萬能者。可是胡適博士懂得經濟學是什麼？對日方針是個救國的辦法末？以實主

義方法作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真理末？總而言之我們的事實證明胡適根本不是一個什麼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而是個莫明博士。

所以胡適博士的實用主義科學方法是非科學的，實用主義的治學方法毫也不能解決問題，求得真理。實用主義治學方法只有引導于桃花源，悶葫蘆，迷魂陣，而莫明其妙。

(五)

追求問題這個，實用主義治學方法，我們已經批判過了，現在來看這個可以經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的演繹法。

仔細看胡適所說要歸納法，演繹法的可以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必要有廣博的智識，及追求問題，那末可說這追求問題的方法是達歸納法演繹法的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的一種方法。然而既然追求問題的實用主義治學方法，是包含歸納法與演繹法，而胡適又說實用主義的方法是推翻了二千餘年西洋的法式論理學，認西洋法式論理學是非治學的正當方法（胡適文存卷二第一二六頁）。這倒叫我們糊塗了。因為這從一定的原理來推論出新的理論的演繹法，當牠演繹的時候，必要先有一種原理來作前提。但原理須從現象中去歸納一般的通則而後才能有的；所以演繹先要去歸納，前後可以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而這可以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的演繹法就是形式論理學。那末胡適既說實用主義的治學方法，代替了西洋的法式論理學，而在此又把形式論理學與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同時介紹出來，且說要演繹法的從舊的智識裏得出新的結論來必須要追求問題——應用實用主義的方法，這

倒叫我們糊塗了。但不問這種矛盾，是胡適的進化？抑是胡適的退化？不過在中國學術界形式論理學也很有威權，再根據胡適所講治學方法，這形式論理學與實用主義的方法同樣有考察批評的必要。

形式論理學就是形式邏輯形式邏輯；解釋一切現象，是根據其三段論法，而只去把握一切事物發展的形式。所以形式邏輯是適應形式上學的方法論。現在把這形式邏輯加以說明。

形式邏輯是創始於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他在哲學界統治了二千多年。形式邏輯有最高的三個規律；根據這最高的三個規律，有各種推理的方式。

形式邏輯的最高規律就是：

- 1. 甲是甲 相等律
- 2. 甲非非甲 矛盾律
- 3. 非甲即乙 不容間律

甲是甲，乙是乙，男是男，女是女，這就是說明每一物體的概念與牠自身是相等的，同一的相等律或同一律。換言之就是同一律證明奴隸國家是奴隸國家，封建國家是封建國家，實證太陽是太陽，地球是地球。這就是形式邏輯第一個基本法則：同一律。

第二個基本法則：矛盾律，就是說甲不能是甲又是非甲。證明一種事物本身不能矛盾，例如奴隸國家不能是奴隸國家又是封建國家，太陽是太陽又是月亮，資本主義社會不能說又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得自相矛盾，必須否認矛盾。

一種事物不能是甲又是乙，這樣又那樣，沒有中立餘地。這就是第二個基本法則不容間律或排中律。例如非無

產者，即資產家不能說是無產者又是非無產者，或是資產家又是非資產家；例如非資本主義經濟學，即是社會主義經濟學，非社會主義經濟學，即是資本主義經濟學；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經濟學。

形式邏輯這三個最高的基本的法則所表現的，就是否認矛盾，承認同一。這種理論是否與客觀的事實符合，這是我們要考察的。

(六)

現在我們來舉例子來證明這形式邏輯是否能把握住客觀的事實，是否是個科學的方法。

1. 同一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學就是經濟學。

(6) 基于生產手段的私有（個人的所有）及生產手段與生產者分離之上進行生產之經濟組織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生產力發展之故，雖然各時代同是商品的生產，生產關係的獨佔，工資勞動，可是各時代各有不同，因此有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如果問以「資本主義社會怎樣了？」而答以「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那是莫明其妙的。商業資本社會，工業資本社會，金融資本社會，各有別區，各有特徵，不能說商業資本社會就是金融資本社會或金融資本社會就是工業資本社會。所以雖同是甲，可又非甲了。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期，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力同生產關係的衝突，又經俱備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胚胎了社會主義社會，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已非商業資本社會，工業資本社會一樣，而且也可以說又是資本主義社會了。這就打破了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

主義社會的同一律。

同樣的理由：經濟學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全般發展的過程上，有發生，發展，頹衰，崩潰的各種不同的階段，所以雖同是一種經濟學，或同是資本家的經濟學，所具的見解根必本相反或是大相懸殊。再各國資本主義所由發生的社會背景各異，從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步驟又頗不一致，所以就是同在某一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甲國社會環境孕育的經濟理論，與乙國社會環境所孕育的經濟理論，又必不相一致。于是乎形成了一個敵對的體系，一是資本主義經濟學一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而且資本主義經濟學又分為重農學派，正統派，歷史派，奧大利派，新正統派，新歷史派。所以要是以經濟學就是經濟學，來說明經濟學那是不可能的。

2. 矛盾律：資本主義社會非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學非非經濟學。

資本主義社會，是商業的資本主義社會，又是工業的資本主義社會，又是金融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既是商業資本社會同時不能不為金融資本社會，既是金融資本社會，就不能說是工業資本社會。事實告訴我們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生產力發展有商業的，工業的，金融的資本社會，換言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同時包含了是與非的並存。這又打倒了矛盾律。

沒落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因又俱有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包含了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打倒了資本主義社會非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律了。

一樣，經濟學隨着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而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又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又是資本主義正統派的經

濟學。資本主義歷史派的經濟學互相矛盾而打破了矛盾律。

3. 排中律：非資本主義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非社會主義經濟學即資本主義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社會主義的勢力存在，勞動同盟，無產政黨，無產政府等社會主義的社會，那末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了；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還未完全崩潰，資本家的政府還是未曾根本搖搖，那不是非社會主義社會。以此情形，反之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社會又是社會主義社會；所以牠同時有資本社會，勞動社會的二種性質，因此打破了排中律。

一本經濟學可以說是非正統派的經濟學，又非是新歷史派的經濟學；穆勒約翰的經濟學原理，就其贊成廢除私有財產制度主張社會主義的部份看，則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學，然而就其結果仍是代表有產階級的利益而言，那可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所以所謂排中律又是非事實。

我們再舉個例子：

贊成知難行易的胡適（參看中山先生逝世的胡適輓聯），與非難知難行易的胡適（參看知難行亦不易）；罵統袴子弟可以辦交通，頑固書生可以辦考試，當大頭出身的可以辦一省的財政，舊式的官僚可以管一國的衛生的胡適與參加善後會議的胡適，及現在做經濟委員會的委員會的胡適；當大學教授的胡適與拿中國的錢作外國的官的胡適，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思想的變化，細胞的新陳代謝是不相同的這就打破了胡適的同一律。

思想在胡適腦袋裏變化，發展，所以贊成知難行易的胡適與反對知難行易的胡適相比較，胡適同時是中山信徒又是中山叛徒。胡適受制于社會生活，所以善後會議的胡適與做經濟委員會的胡適相比較胡適同時包含了是與非的並

存。這就打破了胡適的矛盾律。

細胞的新陳代謝在胡適的統一的身體中發展，新以小學時代的胡適與結婚時的胡適是不相同，因此可以說是小學時代的胡適，又是結婚時的胡適，同時又可說非結婚的胡適又非小學時代的胡適。這就打破了胡適的不容間律。

那末我們已經證明形式邏輯是不能把握着客觀事實的，是不能發現客觀真理的，所以形式邏輯不是科學的方法。

(七)

然而實用主義的方法與形式邏輯爲什麼不能把握住客觀真理，符合事實成爲科學方法呢？「照玄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一些個別分析的對象，應該一個一個的分別來看，是一些不變的固定的一次造成，就永遠一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一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的意見，一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一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在同時又是另一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恩格斯：反杜林論）。也就是因爲他們只是在各種事物，一切現象之不變的靜止上去考察，各個隔開個別的去研究，不從流動方面，聯繫方面，發展方面去考察，研究的緣故。當然，如果在一種事物，一種現象的靜止，孤立的這種限界上，空時的限制上去考察研究，是能把把握住客觀之一時的事實。例如：胡適贊成知難行易的時期，是個不反對中山先生學說的胡適；一個封建社會在沒有成爲資本社會的階段中是個封建社會。但是，胡適思想的發展贊成知難行易，忽又反而反對知難行易而說「知困難行亦不易」了；一個封建社會，要自然的

展爲資本社會的這種流動不居的發展過程，那種方法即不能說明了因此實用主義的方法，形式邏輯也就破產了。

「無判批的建設，不成其爲建設，無建設的批判也不成其爲批判。所以我們批判了形式邏輯，實用主義方法，不是科學的方法，那末應當有所建設，介紹個科學的治學方法。」

治學的方法最初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演繹法，牠統治哲學界至文藝復興的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培根建設一種新的工具歸納法，始推翻亞哩士多德邏輯的威權；到現在二十世紀，生產的空前發達，文化的絕代進步，因之科學也就非常昌明，而科學自敘述階段發展至說明階段，就暴露了歸納法的不能解決問題，如發現真理，所以發生了科學的辯證法。我所要介紹的科學治學方法就是這個辯證法。

辯證法就是黑格兒所發見的思考之發展法則無論爲那一思考，必定發生牠的對立的思考，于是有二種矛盾的思考的對立，而此二種對立的思考，綜合于較高一級的思考者，解除二者的矛盾。換言之，每一真理，每一現實，都在發展過程有三個階段，就是正，反合。例如：植物的種子，是一生命的起首的單一體（正），若放于適當的泥土中種子就被分解爲各部分（反），可是他的根本的統一性使這些差異的部分合在一氣，成爲一株植物（合）。再各科學的歸納法，其最初的臆說（正），當遇着相反的事實時，好像是要消滅的（反），但必須從這些不調和的事實求出牠們底相同點，建立一個新的臆說（合），前後科學才能進步。就是思考依這種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法則，不絕地由低級的進至高級的運動形式即黑格兒所說的辯證法。

這種思考的永久法則不但在自然的發展方面及思維的發展方面證明這個方法的正確，而在社會的發展方面也同樣證明是科學的方法。例如：農奴制度的封建生產（合），因生產關係的農奴制度桎梏生產（反），結果封建社會崩潰建立資本社會（合）。又基于生產機關的私有，及生產手段與生產者分離之上的資本主義生產（合），因生產力的發展，而資本組織桎梏生產（反），結果社會革命，解放生產，建設共產社會（合）。

然而黑格兒，以爲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現實是生于觀念，所以現實也是要跟着思想的永久法則；正反合而漸進的。因此，黑格兒的辯證法是唯心的辯證法。但事實上「決定人類生存的不是人類的意識，反之人類社會的生存決定人類的意識」（馬克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以唯心的本身不是真理。例如：封建階級的心理，無論怎樣祈求上帝，想要鞏固剝削制度，但經濟的發展總要反乎他們的心理，促成資本組織之代替封建組織；現實社會的資本家的心理，也縱然日夜的祈求上帝恢復經濟的繁榮，固實榨取地位，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必然的要搖動資本組織，形成社會革命。

馬克斯說：我們的辯證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兒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兒的完全相反。在黑格兒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各種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爲獨立的主體——乃是其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觀。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于人類頭腦去而已」（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言）。所以恩格斯說：「黑格兒看來，歷史和自然界

中的辯證法運動……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的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于某個地方並不受人們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沌狀態是必須剷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的觀念看做是真實事物的反映，而不再將真實事物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對反映。前後，辯證法就成為研究其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一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費兒巴嚇論）。因此，「辯證者的基礎要在唯物的自然界上，無證法是時刻不能這離開唯物論（蒲列漢諾夫）。唯物論的無證法，才能把握住客觀事實，發現真理；辯證法須與唯物論結合，才是個真的科學方法。

(9)

現在為便於了解起見，把下面幾項辯證法的基本法則加以說明。

1. 流動的法則

流動法則就是總要從流動變化的發展中去考察自然上，社會上，思維上的一切事物，一切現象是因為一切事物，一切現象沒有不變的，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變化。如希臘古代哲學家赫拉利圖斯說：「萬物流動不居」，「人不能再渡同一的河流」。日月星辰，器具樹木都時時刻刻在那裏變化。例如岩石，大山脈，好像都是不變的，但據地質學家的證明，這些岩石，山脈，都是由歷史發生的，同時又會消滅；因為岩石，山脈，受風雨的曝露，寒暑的影響不得不變化，不過這種變化緩慢人的壽命短，肉眼不能認識吧了。

階級社會不是不變，是不斷的流動發展的。由奴隸社

會變成資本社會，都流動發展的結果。由商業資本社會發展為工業資本社會，而金融資本社會都是因為生產力變化的緣故。

2. 聯繫的法則

聯繫法則，就是要從自然上，社會上，思維上一切事物，一切現象的互相關係方面去把握，去研究，去考察。例如人沒有空氣就要死，椅子椅子沒有空氣就要仆倒；同時人因空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椅子椅子也要隨住空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所以是有互有關係的。

關於中國革命的問題，就是中國應當走上資本主義的路呢，還是走社會主義的路呢？如果是以上海的買辦階級能左右政治這一面來斷定中國非走資本主義的路不可，那是了解，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的互相關係，與只看到中國的軍閥支配政治的一面，而即主張軍閥主義一樣錯誤。若要得到正確的結論，必須第一，知道買辦階級與軍閥的統治中國及牠們的互相關係；第二，知道帝國主義的支配着買辦階級及軍閥，與其互相關係，然後中國要求解放是不可，而且不能走上資本主義的路，須要走上打倒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軍閥的社會主義的路的結論才是正確。

3. 對立同一的法則

對立同一的法則，是說自然界，社會界，思維界的一切事物，現象，觀念；都是同一的，又都是對立的。例如德國哲學家來布尼茲說：「有一天，他和宮庭中的友人散步，偶然談到：「兩個事物必有區別」的命題，其中有一位便問道：「傍立的樹，是否有兩片相同的葉子呢？這些宮中貴官淑女，就照他所說的去實驗，果然沒有發見兩片相同的葉子。」（伏爾佛遜著：辯證法的唯物論）這就是說

明事物對立的絕對的差別性。反之葉子雖然片片不一樣但同是葉子，這就是事物的絕對同一性。他如牛馬，寒暑，男女都是對立的不同的，但牛馬同是動物，寒暑都是一年的部分，男女同是人，這又是融合，同一了。

正統派的經濟學，與新歷史派的經濟學是對立的不同，但同是資本家的經濟學；資本主義的社會科學，與社會主義的，社會科學是不同的，對立的，但同是社會科學所以又統一，融合了。所以一切事物，觀念，都有絕對的差別性，與統一性的。

4.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就是要從一切事物，現象的矛盾發展中去考察，去把握。試借用恩格斯杜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一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于死滅，這種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如以後枝幹的否定。

社會現象也是一樣。如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爲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的否定爲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弁證法的唯物論）

科學的發達，演繹法爲歸納法所否定，而科學的發達又使歸納法爲辯證法所否定，這種否定的否定產生了最高級的科學的治學方法。

5. 質變量，量變質的法則

這個法則就是說明一切事物的質的變化，量的變化。換言之就是說一切事物都有漸變，與突變。例如在燒開水的水壺裏，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一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

粹是數量上的增加，就是量的變化。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這就是質的變化。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一尺長的橡皮帶可拉長二三尺這就是量的變化，但到了一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下去，則突然由數量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那就是質的變化。

社會發展中來說。例如法國資產階級社會之出世以前的一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是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產生了；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是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的質的變化，又俄國的革命過程也一樣由漸變而至資本主義社會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突變。

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的重農學派，正派學統，修正學派，歷史學派……的不同，那是資本家經濟學的量的變化，而經濟學發展至產生資本論，那就是資本家經濟學爲勞動者經濟學的質的變化。

6. 理論與實際的法則

理論與實際的法則，就是說理論與實際是要一致的。例如：亞丹斯密的國富論決不會出現于資本主義社會漸趨頹廢崩潰的馬克斯時代，馬克斯的資本論，也決不會出現于資本主義社會日臻強固的亞丹斯密的時代。中國須有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所以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路，反之中國具備了，國民革命的客觀條件，必然的要走上三民主義的路。有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榨取軍閥的危害，因之國民黨在此局面之下，要主張革命。中國的革命勢力是農，工，及平民大眾，所以要求中國革命的成功，必須要農，工，及平民大眾爲基礎，爲農工及平民大眾，只有失敗，倒台所以一定要從理論與實際的



第三期目錄

時事論評

中東歐經濟會議.....	火原
巴黎戰事展開.....	方興
古物出賣問題.....	永在
張宗昌被刺之法律論感情論與革命論.....	白民
法國政變與中日問題.....	威遠
馬克司哲學的基礎和在一般社會科學上的地位.....	陳豹
日本帝國主義的厄運.....	呂振
新聞紙之歷史的發展與社會的存在價值.....	吳永
中國土地制度研究.....	天在
藝術家與理想的社會.....	性西
怎樣紀念一九一八.....	波羅
潘陽事變後的歸宿問題.....	一鳴
九一八事變後的國際形勢.....	孟農
九一八事變與日本法西斯蒂運動.....	倫農

物，在考察現象。就是要從列寧那句：「沒有革命的理論，就須有革命的行動」話中去研究一切。

(九)

形式邏輯與實用主義的方法，只能在每一事物，現象的靜止，孤立方面可以一時的應用，如果每一事物，現象的運動發展中形式邏輯，實用主義的方法就沒有辦法了，就不能把握着客觀的事實，發現了客觀的真理。能把握事實，發現真理的只有科學的唯物辯證法。這我們已得到事實的證明了。

胡適博士是中國甚至世界上的刮刮叫的名人，所給與我們的治學方法，只有引導我們入于迷途，而埋葬我們的前途，作為我們的墳墓！這當然是胡適士而不博，名而不

實表現。

胡適是有天才，因有天才所以得到了漂亮的博士，被自為頂瓜瓜的名人；但是沒有科學的治學方法，天才還是沒有用。胡適說：「兔子雖然有天才，却不能像烏龜那樣拼命的爬，所以達到目的的不是兔子而是烏龜。」就是這道理。所以胡適雖有天才，結果還是個有名而沒有實學的名人。

因為寧可我們沒有天才拼命的努力，所以胡適的口號是：「兔子學不得，烏龜可學也！」我們因為胡適的治學方法是玄學，不是科學，所以我們口號是：「胡適兔子固學不得，胡適烏龜尤不可學也！」

第四期目錄

時事論評

歃血為盟與瓦崗寨.....何庸

要人倦勤與民衆責任.....一鳴

日本承認滿洲國.....湘

日俄煤油協商問題.....荻風

甘地絕食與階級選舉.....襄

恐慌危迫下的意大利.....星

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慰生

韓非之社會哲學.....天民

洛桑會議的總結.....樓雲

最近中國經濟之史的變遷.....樂天

中國土地問題研究.....西農

立於戰爭舞台上的帝國主義.....流螢

相對論與唯物的辯證法.....關雎化

「再生」批判.....勞

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歷史的淵源.....Charles Archer 著 史乃 紹 譯

日本承認「滿洲國」與列強的態度.....吳光臨 譯

日本承認偽國後國際的預測.....威遠

唯物的認識論.....林

帝國主義論諸學派的鳥瞰.....神川彥松 著 沉吟 譯

日本對滿蒙經濟的依賴.....齋藤征生 著 克平 譯

△歐與犁（小詩）.....新俄節木 央 白 德 內 宜 著 彭 引

△暴風雨的前夕（小詩）.....游